

陈丕显

苏中解放区

十年

SUZHONGJIEFANGQU
SHINIAN



目 录

在历史的激流中·····李一氓 (1)	
——《苏中解放区十年》序	
第一章 开辟苏中解放区 ····· (1)	
第一节 夜渡长江····· (1)	
第二节 桥头堡上播火种····· (10)	
第三节 东进黄桥····· (19)	
第四节 黄桥烧饼歌的由来····· (31)	
第五节 会师海安····· (47)	
第六节 新的斗争在后头····· (60)	
第二章 全面建设苏中解放区 ····· (75)	
第一节 夏季反“扫荡”斗争····· (75)	
第二节 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 (84)	
第三节 史无前例的民众参政····· (98)	
第四节 地方武装大显身手····· (115)	
第五节 “三冬”运动一片兴旺····· (127)	
第六节 根据地的经济斗争····· (139)	
第七节 开展城市工作····· (152)	

第三章 反“清乡”斗争和准备反攻	(165)
第一节 黎明前的黑暗.....	(165)
第二节 可歌可泣的斗争.....	(176)
第三节 反“清乡”斗争奏凯歌.....	(192)
第四节 车桥战役前后.....	(203)
第五节 开展整风运动.....	(215)
第六节 开展大练兵,准备反攻	(227)
第四章 解放战争谱新篇	(243)
第一节 红旗漫卷西风.....	(243)
第二节 风云突变.....	(255)
第三节 七战七捷震中外.....	(267)
第四节 更严峻的考验.....	(281)
第五节 坚持长期敌后斗争.....	(293)
第六节 保田保家保卫胜利果实.....	(308)
第七节 淮海战役前后.....	(321)
第八节 千军万马渡长江.....	(338)
后 记	(356)

第一章 开辟苏中解放区

第一节 夜渡长江

(一)

1940年7月。江苏南部沿江地带。

一天傍晚，我接到陈毅同志从苏北发来的电报：“粟裕已率指挥部赴苏北，江南主力亦与挺纵、苏支会合，望速带东南局干部渡江，在江都塘头会合……”。收到电报，我激动兴奋不已，立即查看了军用地图。当时，我尚未获得挺进纵队在郭村反摩擦战斗中的详细情况，仅知道陶勇、卢胜同志率领的苏皖支队原活动于皖东地区，此时已东渡运河进入江都县境，与叶飞、管文蔚、王必成等部会合，约略计算共有5千人马。主力如此集中，我估计陈老总正筹划着一个重大战略部署。

当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大约10点多钟，我们一行10多位同志，包括江南指挥部卫生处长崔义田、东南局党训班的谢克东、彭庆旨等同志，还有陈毅同志的爱人张茜同志、刘炎同志的爱人陈模同志等，在镇江以东30余里的聂家渡口附近，由丹北中心县委派来的交通带领，悄悄地登上一艘小木船，离开了南岸。櫓

桨拍打着江浪，发出轻微的“吱嘎，吱嘎”声。长江，多么熟悉而又陌生的长江，我又投入了您的怀抱。

我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一直在丛山峻岭间打游击。但这不是我生平第一次横渡长江。1938年，我率领东南局青年代表团赴延安参加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就曾渡过这条大江。不过，那一回跟今夜不一样，是比较顺利地渡过的。此刻，周围有日本侵略军的据点，江面封锁很严。渡船在江面缓慢滑行，眼前黑洞洞的模糊一片，只能隐隐约约看到轻浪微波闪起的白色光斑。周围是那样寂静，船身不断颠簸，我们屏息着呼吸。由于连日来在敌伪据点、封锁线空隙间穿插，昼伏夜行，野外露宿，尤其是队伍中还有好几位女同志，确实让大家辛苦了。此时急行军过后的疲劳、划破江面的有节奏的桨声，催人入睡。可是，船上却没有一个人合上眼，大家身挨身默默地挤坐着，睁大眼珠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多年的战斗生活使同志们对陌生的环境本能地产生一种警惕性。

我也静静坐着，虽感疲乏，但无睡意。我想仔细看一看万里长江的风貌，可惜此时正是黑夜，天空既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我默默惦念着即将承接开辟苏北根据地的重担，一时思绪万千，难以平静。也许是触景生情吧，我忽然想起在皖南同志们常常歌唱的《渡长江》来：

“划呀哟，划呀哟！
薄雾弥漫着江面，
江水冲击着堤岸，
我们要渡过长江。

饥寒困苦算得什么？
敌舰上下弋游，我们不怕。

长江是我们的，
我们千百次自由地来去。

薄雾弥漫着江面，
江水冲击着堤岸，
当这黑沉沉的午夜，
我们要渡过长江。

我们要渡过长江，
获得更大的胜利，
获得更大的胜利！
划呀哟，划呀哟！……”

这首歌流行于皖南皖北、江南江北，直到旧黄河边。以前常听同志们唱它，只觉得好听，有激情，没有更多的感触，现在身历其境，倍觉亲切，好象它正是为我们渡江谱写的一样。

(二)

木船颠簸前进，江面越来越宽，水流渐趋湍急。木船被冲击着朝下游飘荡，成斜线行进，船工们每划前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气力。此时，张茜同志也无声地坐着，眼望着舱外黑糊糊的天穹。她好象望着它出神，又好象在思索什么。她原是军部战地服务团演出队的骨干，颇有艺术修养，又富于革命理想，吃得起苦，话剧演得尤为出色。我在新四军军部时就看过她参加演出的《阿Q正传》、《一年间》、《魔窟》等许多出话剧。她和陈毅同志刚结婚不久，他们是一对美满的革命伴侣。

时光如江水悄悄地流逝，我心里一直揣摩着陈老总的电报。

苏北的形势究竟发展得怎样？陈老总又考虑着什么呢？记得毛泽东同志在前几个月写过《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对当前国内形势作了精辟的分析。文章写道：目前的政治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受了中国抗日战争的严重打击，已经无力再作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因而敌我形势已处在战略相持阶段中；但敌人仍然坚持其灭亡中国的基本政策，并用破坏抗日统一战线、加紧敌后“扫荡”、加紧经济侵略等方法，实行这种政策。英法在东方的地位因欧战削弱，美国则继续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故东方慕尼黑会议暂时无召集的可能。国内，亲日派大资产阶级早已彻底投降日本，准备傀儡登场。欧美派大资产阶级则尚能继续抗日，但其妥协倾向依然严重存在。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还要团结国民党以外的各派势力对付日本，一面却极力摧残各派势力，尤其尽力摧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顽固派。中间力量，包括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主要统治力量之间有矛盾，同时和工农阶级有矛盾，所以往往站在进步势力和顽固势力之间的中间立场。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派。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进步力量，最近时期有一个大的发展，基本上已经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根据地。他们在全国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在中间势力中亦有相当影响。在抗日战场上，共产党所抗击的日寇兵力，同国民党比较起来，几乎占到了同等的地位。他们是抗日统一战线中的进步派。

毛泽东同志分析的目前国内形势，也是我们渡江时面对的苏北形势。我思索着，进入抗战的相持阶段，斗争确是艰巨而复杂的。1940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反共政策作为其准备投降的重要

步骤，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更加落到中国共产党的肩上。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正是根据这一科学分析，确定了新四军向苏北挺进的战略部署。当时豫、皖、苏边区及皖东地区都是面敌背顽，如我军向西发展，不仅会受到顽第一、第五战区很大限制，难免引起中间派的疑惧，政治上极为不利。而苏北地域辽阔，处于敌后，顽固派韩德勤一贯暗中勾结敌伪，积极反共，破坏抗战，早为中国人民所切齿痛恨，且其内部矛盾重重，互相倾轧，又孤悬敌后，国民党增援接济十分困难。相反，我党早已着手苏北地区秘密和公开的抗日群众工作，我军已创造了挺进苏北的有利态势，此番全力向北、向东发展，既有理，也有利。我们可背靠山东，凭江据海，依托水网，发展华中地区抗日斗争，放手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壮大人民革命力量。如果日军继续大举向西进攻，或国民党敢于公开投敌，我军便可由东而西，配合八路军发展中原，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在目前情况下，江苏北部是我们的战略突击方向，应当集中力量开辟苏北根据地，坚决冲破顽固派的限制，积极向北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黄海边。

对于当时的形势，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统筹全局、高瞻远瞩，还具体针对大江南北的形势，于同年5月4日发来由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的电报《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在收到这份长达2500字的电报的当天下午，东南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委会就召开联席会议，进行传达和讨论。

在这份电报中，党中央再次提醒我们，要坚持执行发展的方针。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放手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里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例如在江苏境内，应不顾顾祝同、冷欣、韩德勤等反共分子的批评、限制和压迫，西起南京，东至海边，南至杭州，北至徐州，尽可能迅速地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将一切可能控制的区域控制在我们手中，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开办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

中央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认识到，苏北是当时华中最有利、最能发展的地区，是我军的战略突击方向。经过讨论，多数同志认为，迅速开辟苏北根据地，不仅仅是关系到新四军发展方向的问题，而应该看作是关系到我党我军对日、对顽斗争的全局的重大问题。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皖南、苏南部队一时无法集中；江北几支部队协力发展华中的步骤也进展得不够顺利。眼见我军现有的力量已不可能在长江南北同时对付顽固派的进攻，国民党蒋介石即部署所属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各部从南、北、西三个方面向我新四军步步进逼，摆开了大举进攻的阵势。就在这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陈毅同志急电中央，认为“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决心移师苏北。6月15日，陈毅同志当机立断，匆匆换上中式夏布衫裤，戴上凉帽，向江北赶去。

7月8日，粟裕同志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及第二团、新六团等部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与挺纵、苏皖支队会合。同月下旬，遵照中央指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为苏北指挥部，陈毅同志任指挥兼政委，粟裕同志任副指挥，刘炎、钟期光同志分别任政治部正副主任，下辖3个纵队，9个团，包括郭村战斗中陈玉生、王澄带来的队伍，全部共7千余人。新四军江南主力过江后，为扫

除抗战障碍，同顽固派代表韩德勤进行了正面交锋。

这就是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对于这错综复杂的形势，我几经思虑，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老首长陈毅同志的雄才大略无限敬佩，一方面又为自己不能更快到达江北感到焦灼不安。凭着多年的战斗生活经验，我预感到，在苏北广袤的平原上，历史将翻开比赣粤边区3年游击战争更壮丽的一页，谱写出人民抗日战争的新篇章。这一想，我不觉心急火燎，真恨不得插翅飞到大江彼岸。

(三)

忽然，交通“猫着腰”从舱外钻进来，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他说：“夹江口过去了，离敌据点三江营约10里，如能避开日本鬼子的巡逻艇(当地人叫它汽划子)，今夜就可以顺顺当当赶到家了。”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船右侧不远处好象有一片黑糊糊的陆地，我料想那就是扬中。扬中特有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了我军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块理想跳板。

木船正行驶在开阔的主航道上，会不会遇上麻烦，交通、船老大谁也说不准，同志们的心情都有点紧张。虽然，丹北中心县委的同志曾向我们介绍说，交通和船老大都是经验丰富且久经战斗的同志，他们熟悉地形，又掌握日军巡逻船只的活动规律，但大家仍有点忐忑不安。

三江营过去了，雷公嘴过去了，北岸的景物已依稀可辨。舱内空气好象缓和了一些，开始有人低声说笑。我们打算在江都的沿江渡口嘶马登岸，事先约好当地同志在那里接应。不料，刚缓了口气，就发现了新情况——在我们身后上游方向，有一级鬼火似的灯光在闪烁跳动。过了一会，又隐隐约约传来汽船发

动机声，据交通和船老大判断，那是日本鬼子巡江的“汽划子”。

汽划子速度比木船快，配备的火力也相当强，因此当地人给它起了个浑名，叫“偷鸡豹”。眼见“偷鸡豹”追来，同志们却很沉着，警卫员早就把枪提在手里，所有带武器的同志也都作好了战斗准备。幸好此时我船距北岸不远，可以迅速靠向岸边隐蔽。我们合计，万一跟敌人遭遇，要打要拚也不能被动地在水面上展开，于是摇橹的船工便加快了节奏。偏偏不巧，此时船尾传来“嘎巴”一声，有人叫道：“坏了，橹断了！”真是屋漏又遇连夜雨，这时虽然没有人说什么，但大家都已作好了应急准备。幸亏船老大有经验，他顺手抽出一支长长的竹篙，正好此处接近滩头，篙子可以撑到江底了。

当日军的汽划子离我们还有几百米远时，木船已经提前停泊在江畔的芦苇丛中隐蔽起来。我们迅速下船，在芦荡边隐蔽，作好了战斗准备。这时，敌艇的马达声听得更加清晰了，鬼子的探照灯亮了，不停地向四周旋照着，一束强光从木船的上空掠过，眨眼间又移到别处去了。敌人距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可以听见江风飘传来他们叽哩呱啦的讲话声，而同志们还是匍伏着准备迎战。

日军到底没能耐，发现不了我们。巡逻艇终于快快地走了，最后连一点亮光也被江水吞没，在我们眼前消失了。渐渐地，江面上又恢复了先前的谧静，同志们这才轻轻吁了口气。

木船撑出芦苇丛，继续向目的地进发。这时，天蒙蒙亮，我探头遥望逐渐明晰的祖国大动脉长江，只见它在浩淼无垠的白色晨雾中，汹涌澎湃，发出沉雄而有节奏的涛声。

长江浩浩荡荡从青藏高原奔泻而来，又从这儿向东海流去。我们伟大祖国就是由黄河、长江孕育发展起来的，五千年光辉灿

烂的历史,使我们每个炎黄子孙都为它而感到自豪。可如今,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反动统治当局的软弱无能,使它沉沦于凌辱、苦难之中。我们每一个热血儿女,想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不由得不奋发起来,愿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而赴汤蹈火。

木船在嘶马附近顺利靠岸,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苏北大地。嘶马是个仅有百来户人家的小镇,是长江边的一个渡口。当地交通站的同志已经焦急地等待多时,见了面真有说不出的亲切。他们说,从嘶马抄小路去目的地塘头还有30里路,如果抓紧时间,早晨就可以赶到。

踏上苏北广阔、肥沃的土地,大家都十分兴奋。当时,苏北地区是一个有2千多万人口,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是控制日军沿江进出的重要侧翼;又是连接我新四军、八路军的重要纽带。苏北抗日局面一旦打开,向南可以与我江南抗日根据地相呼应,扼制长江下游,直接威胁设在南京的日本侵略军总部和汪精卫伪政府;向北、向西发展,可以与山东、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连接,分别勾通华北、中原。控制苏北,对于我发展和积蓄抗战力量,更沉重地打击日军,以及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投降,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就向塘头前进。同志们虽然彻夜未眠,但毫无倦意,精神抖擞地跨开了大步。

第二节 桥头堡上播火种

(一)

从嘶马出发向北行进，我们马不停蹄直奔目的地塘头。

塘头东距泰州城 10 余里，是一个不大的集镇。我第一次踏上苏北土地，面对这热火朝天的新天地，感到既新鲜又亲切。

1938 年 1 月，遍布南方 8 省 15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成新四军，毅然开赴抗日前线以来，取得了大小百多次战斗的胜利，如今我军向北发展，又揭开了历史新的一页，怎能不叫人感奋！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我正在皖南工作，担任中共中央东南局青年部长。1940 年 6 月，东南局指派宣传部长薛尚实同志和我赴苏皖区党委巡视工作。我们接受了任务，随身带着东南局给苏皖区党委的指示信，急匆匆地赶赴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即苏南地区）机关所在地——溧阳县城西北的水西。一到目的地，我立即去看望陈毅、粟裕、刘炎、钟期光等同志，得知陈毅同志召集苏南 10 多县的县团级以上干部开会，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发来的《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电报，即“五·四”指示。广大干部听了传达，受到莫大鼓舞，纷纷表示要坚决遵照中央的指示，不再顾忌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掣肘，甩开膀子大干。

向陈毅同志告别后，我到苏皖区党委机关，会见刚刚到任的

书记邓振询（仲铭）同志。当我了解到太湖地区刚开辟不久，工作头绪纷繁，就主动提出到那里去帮助他们搞好开辟游击区的工作，我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

新四军主力部队挺进苏北，是在抗日战争的第3个年头，而现在我也终于踏上了苏北大地。从嘶马到塘头，沿途到处都是抗日的标语，学校、操场传出抗战歌声，一队队新四军战士、各种打扮的民运工作者、送军粮的农民、查路条的儿童团员，来来往往，热闹非凡。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确实已进入了抗战烽火正在燃起的阵地。

如果说扬中和新老洲是新四军向北发展的跳板，那么，江都沿江方圆几十里就成了我军渡江北上的桥头堡，塘头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到了塘头，首先遇见了苏北特委书记韦一平同志和副书记兼江都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惠浴宇同志。惠浴宇是苏北抗日民主政权委任的第一个县长。我顾不上休息，拖住韦、惠两位就扯起来。特委的同志不知从哪里搞来几个西瓜，于是我们就边吃边谈，话题是苏北的斗争情况。

抗战爆发后，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消极防御，望敌丧胆，一两年间就使苏北大片土地落入敌手。仅1937年底至1938年初，短短几个月，扬（州）泰（州）地区大多数重要城镇都成了沦陷区。日军所到之处，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仅扬州万福桥、江都仙女庙两地，日军一次就杀害无辜群众千余人，使和平的村庄顷刻间变为废墟。提起日军凶残的暴行，不由使我联想起在渡江前不久，听到一个从南京大屠杀中侥幸逃生的人的口述。那人说，南京陷落时，燕子矶聚集了10多万同胞，准备由此渡江逃往苏北，但船只无多，一时无法渡离。不料日军入侵南京的先头部队赶到燕子矶，把难民赶到沙滩上，架起数十挺机枪，肆意扫射。顿时，尸体漂流江面，把江水也染红了。积尸直至

第二年春夏还无人清理，臭恶气味远达数里之外。那人又说，1937年12月23日，日军用数十辆大卡车，载千余无辜老幼男女到沙洲，先掘好一个个大坑道，然后把这些人一律推下活埋，哭喊之声，惨不忍闻。当我初听到这些包含着同胞兄弟姊妹血泪的惨剧，有好几夜难以入眠。

现在苏北人民特别是爱国青年已经纷纷行动起来，抗战热情十分高涨，他们以各种形式宣传抗日，开展救亡活动，踊跃参加新四军。有些爱国青年和爱国军人，受到我党的影响，自发组织抗日游击队。在江都、高邮境内，有陈文组织的队伍；在泰兴、靖江境内，有陈玉生带领的队伍。这些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人数不多、枪械缺乏、战斗力也不强，而且由于他们无所依附，即使在国民党政府的歧视和压迫下，仍然不得不借用国民党部队的番号。但他们却多次打击了下乡扫荡的日伪军，这些抗日武装的出现，深深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1938年6月徐州失守后，苏中大片土地已经陷于敌手，人民群众自发起来战斗，实际上也体现了人民群众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向畏敌如虎的国民党军队争夺抗日主动权。

苏北人民要求抗战，国民党顽固派不让人民抗日，这是两股对立的潮流。如果我新四军不挺进苏北，高举抗战旗帜，就无法取得苏北地区抗日的领导权，发动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战，更谈不上站住脚跟，创建革命根据地。

(二)

陈毅同志对当时苏北四种力量的强弱作过具体的分析，简略勾勒了敌、顽、我力量对比的图景。他认为，日军居第一位，韩德勤居第二位，李明扬、李长江等国民党军队地方实力派居第

三位，我新四军则是名副其实的老四。陈老总根据这样的情况，提出“击敌、联李、孤韩”和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苏北根据地的方针，先着重做好“联李”的工作。党中央也曾这样指出过：“对中间势力，如于学忠、李明扬等，我应采取中立他们的政策。”如果用当时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老四同老三联合起来，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自己，在反摩擦中打倒老二，最后消灭老大。我新四军其后几年的工作，都遵照这样的方针，因而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我听说，抗战开始不久，江苏省政府代主席韩德勤即闻风丧胆，弃省城镇江于不顾，仓惶逃至淮阴。徐州失守后，他见重兵压境，又逃至兴化。韩德勤这个人，当时在江苏实力相当大，自诩拥兵10万。他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江苏省代主席，又是鲁苏战区副总司令。虽称副总司令，实际上他根本没把东北籍的总司令于学忠放在眼里，在东台县城设了一个副总司令部，划地为王。他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江苏省保安司令，因此苏北各路国民党军队名义上都归他指挥。这个人资历虽然不深，但靠着他的苏北同乡、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后台，却成了当时江苏最大的实力派，也成了阻碍抗日的最大绊脚石。我军要坚持抗战，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就不能不跟这个“不打鬼子兵，专欺老百姓”的顽固派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陈毅同志也清醒地看到，当时我们还要争取国民党抗日，如果我新四军马上去消灭韩德勤，或把他逼跑，是不利于争取国民党抗战的。我们要取得抗日领导权，还得团结江苏地区国民党各派势力，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破坏抗战的韩德勤。当时韩德勤的兵力数十倍于我，不联合中间派，在军事力量上也于我不利。所以，我们应该运用“又打又拉”的方法，争取两李和地方武装陈泰运部，让他们站到我们这

边来。

对于两李和陈泰运，当时是两股可以争取的友军。两李就是李明扬、李长江，是江苏的地方实力派。当时他们是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资历比韩德勤老。他和李长江原是国民党江苏省保安处的正副处长。自韩德勤仗顾祝同之势包揽江苏军政大权之后，保安处长的职位便落入韩德勤的亲信、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之手，两李的地位一落千丈，幸亏由于得到桂系的扶助，才勉强维持住现时的地位。两李相比，李明扬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李长江则匪气十足，是个粗人。当时他们也想借助我军的抗日声威，以抵制韩德勤的胁迫和兼并。但是两李在抗日反韩这一根本立场上，也随情况的变化而出现多次的摇摆，因此对他们的争取工作，既要准备“和”，又要准备“打”，没有这两手是不行的。“和”是为了争取，“打”也是为了争取。“和”不能不讲原则、立场；“打”不能把他们打到韩德勤那边去，这是一道很棘手的政治难题。然而，陈毅同志在争取中间势力的统一战线工作中，表现了高超的策略思想和领导艺术。

两李之外，还有一个江苏省税警总团团长陈泰运。这是直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财政部的部队，是宋子文、孔祥熙系统的武装。不过，韩德勤独揽大权后，十分霸道，排除异己，没把陈泰运放在眼里，因此韩陈之间矛盾也很深，为我们做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留下了一个空隙。

(三)

韦一平、惠浴宇同志介绍苏北的情况，使我受到很大的鼓舞。眼下就要大刀阔斧地开辟苏北根据地了，我感到十分振奋。

正说话间，陈毅同志也赶来了。

赣粤边区游击战争时期，陈毅就是我的老首长。他曾随毛泽东同志一起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是我党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军事家，又是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革命家，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又是很有才华、很有修养的文艺家、诗人、高明的棋手。他的工作、生活作风严肃而带风趣，对同志则关怀备至，爱之如兄弟姐妹。

这天，陈毅同志就近摆了一桌饭菜，专门款待刚从苏南过来的同志们。天很热，汗涔涔的陈毅同志解开上衣敞着怀，打着蒲扇与我们交谈。有一件颇有趣的小事，我至今还记得：谢克东同志怕热，光着身子，只穿条短裤，由于初来乍到，一些苏北同志不认识他，还以为是我们从苏南带过来的挑夫。这是现在的青年很难理解的。我们的干部当时大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连陈毅同志也还不到40岁。大家朝气蓬勃，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事都能干，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工作都难不倒我们，不要说穿的差，就是穿的再破烂也照样革命！

陈毅同志说，指挥部机关和一、二纵队准备明夜首批东进，粟裕同志此时正在前方忙着具体组织安排，陶勇、张震东等同志率三纵队作第二批出发。陈老总关照我们，可以在塘头再住几天，照我们原先与李明扬订的君子协定，即将江都沿江30里防区交还李明扬以后，再动身去黄桥。陈老总说，朱克靖同志在泰州与两李谈判很成功，他们愿意协助我们东进，我们也应该守信用，交还他们原驻防区，让他们在韩德勤面前交代得过去。

在我到塘头之前，陈老总先于1939年5月初次到苏北视察；同年8月又第二次来苏北活动。他曾三进泰州，做两李的工作。他从苏北全局出发，精辟地分析了日、伪、顽、友、我各方的斗争形势，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按照发

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卓有成效地争取了苏北地方实力派的中立，得到了地方爱国开明士绅的支持，为新四军北渡长江，发展苏北、领导抗战准备了条件。这方面的报道，已经脍炙人口，传为美谈，后来连小说、电影也写过演过不少。

(四)

在塘头，我了解到，我们已取得两李的谅解，可以嘶马、大桥、吴家桥为中心，在长 30 里、阔 20 里的区域内作为我挺进纵队的活动范围。

在这块桥头阵地上，我地方党的工作正全面迅速地展开，逐步向泰州、泰县、泰兴、靖江、高邮等地区发展，影响日益扩大。在 1939 年 2、3 月间，相继建立了江都、泰县、泰兴等县党的工委。不久，陈毅同志到江都地区视察，指示立即筹建党的苏北工委，由惠浴宇同志担任书记。同年 10 月，东南局又派韦一平同志带了一批干部到江都，正式建立了苏北特委，由韦一平、惠浴宇同志任正副书记；原三县的工委亦正式改为县委，并明确党的组织系统属苏皖区党委领导。

在此前后，苏北地方党组织在江都大桥附近开办了长江军政学校；在吴家桥、网子桥举办了几期党员训练班，培养、训练了一批抗日骨干力量。江都、泰兴、泰县、靖江、高邮、如皋、扬中等县，都有许多进步青年踊跃报名参加学习受训，不少积极分子在学习期间被秘密发展为党员。这项工作，为日后在苏北各地更广泛地建立党的组织，作了重要的干部准备。

在桥头堡上，地方党组织和部队播下了一批又一批抗日的火种。自 1939 年初，在江都县境内桥头镇、小卯庄、杨家湾、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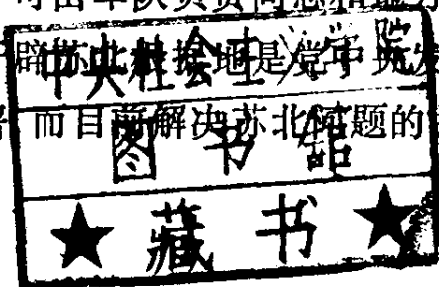
家庄、谢家桥、吴家桥、朱家庄、殷家庄、花家荡、曹王寺、郭村以及扬州城、泰州城等处，都陆续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还有许多城镇、乡村，也都有党组织活动。新四军主力北上不久，江都的形势发展更快。

在塘头时，经韦一平同志介绍，我见到了赵毓华、洪泽等同志，大致了解到江北特委建立前后的情况。江北特委受上海党（即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于1938年8月在南通正式成立，经过两年艰苦斗争，用隐蔽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在（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各地发展党员，组织当地群众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在城市、乡村陆续建立了党的基层支部，还在一些国民党部队建立了党的秘密组织，控制了部分武装，随时可策应新四军东进。

（五）

到塘头的第二天，我趁陈毅同志略有空暇，便向他汇报江南地区工作情况和北渡沿途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陈毅同志笑着说，你们现在赶到苏北来正是时候，但不能急。他希望我将苏北各地方党的组织、分布、人员及素质等方面情况摸一摸，考虑一个初步方案，准备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区党委。他说，这是党中央、中原局迭次电报指示的精神，也是当前苏北抗日斗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说着，他便将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同志）不久前发来的一份电报递给我看。上面写着：“……你们两个特委之外，应成立区党委，以便统一领导；为统一军队与地方党的工作的领导，可由军队负责同志和地方党组织军政委员会。”陈毅同志说，开辟苏北根据地是党中央发展整个华中抗日局面的重要战略部署，而目前解决苏北问题的关键，是尽快



扫除我军抗日的障碍韩德勤，取得我党我军在苏北抗日的领导权。现在，有许许多多的工作要我们去做，比如韩德勤这个人，在江西苏区就参加过围剿红军，反共很卖力。此人当过红军的俘虏，但本性难改呀。他对新四军7千人马进入苏北是决不会坐视不问的，必然会亲自来寻衅，搞摩擦。我们要最大限度孤立国民党顽固派，就得广泛地团结中间势力。郭村战斗，我方大胜，反而主动“割地求和”，就是想方设法消除韩李联合向我进攻的可能性。说着，陈毅同志直起身，神色严峻地说：“我与粟裕同志等反复考虑，并已向党中央提出请求，希望新四军四、五支队及八路军南进支队能速派增援部队策应我部行动。关于这场看来不可避免的韩我决战，战场的选择已初拟几种方案，还未最后确定。总之要远离那些中间势力的防区才能对我有利。省韩有7万人马(号称10万)，恰是我军10倍。此次东进，我们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但我们有苏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得道多助”、“哀兵必胜”嘛！

第三节 东进黄桥

(一)

为了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我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反复分析敌顽我三方斗争形势，确定采取联李、击敌、反韩的策略，迅速东进黄桥，开辟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

7月25日，东进序幕拉开了。

指挥部要求全体指战员作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采取远道奔袭、分割围歼的战术，挥戈东进，直取黄桥。

我随陈毅同志及指挥部机关稍迟一天出发。沿途村庄、农舍的墙壁上，留有先头部队张贴的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坚持对外抗战，反对内部磨擦！”“抗战是生路，妥协是死路！”那时为了迷惑韩德勤，落款一律署明“挺进纵队政治部宣”。标语中还有一条：“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干部、战士虽看不惯，却都明白这话的真实含义。

行军途中，战地服务团的同志和全体指战员一起放开嗓门，唱起了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
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争经验，
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扬子江头淮河之滨，
任我们纵横的驰骋；
深入敌后百战百胜，
汹涌着杀敌的呼声。
要英勇冲锋，歼灭敌寇；
要大声呐喊，唤起人民。
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
创造现代的革命新军，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
巩固团结坚决的斗争！
抗战建国，高举独立自由的旗帜，
前进，前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每当唱起这雄壮的军歌，干部、战士莫不热血沸腾。此刻，这亲切的歌声，使我想起周恩来同志在皖南新四军军部云岭陈家祠堂作《目前形势和我军任务》报告的情景。那是在1939年初春，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与军部及东南局领导同志共同研究确

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行动方针。这一年多的变化真大啊。眼下，我新四军7千人马汇成一股抗日铁流，高举抗日大旗，正踏着苏北大地挥戈东进。

27日夜间，我们通过泰州至口岸附近时，两李所部驻军如约让路，又装模作样地朝天鸣枪，热热闹闹地礼送我军过境，制造激战假象，以便向韩德勤交差。

队伍刚过泰兴境内宣家堡镇，前方就送来情报，说国民党税警总团长陈泰运部由曲塘南下，堵截我一纵队；国民党江苏保安第四旅何克谦也从黄桥出发，向北阻挡我二纵队。这一突然出现的情况，是韩德勤预谋布置的南北夹击计划，企图消灭我东进部队于运动之中。

而当行军队伍抵达老叶庄驻扎时，战况报告来了。叶飞部在北新街、薛家垛一线击溃了税警两个团并歼灭一个多营，活捉了几百名俘虏，缴获大批枪支弹药；王必成部已将保安四旅先头部队击垮，并分兵占领了黄桥镇以北的蒋垛、古溪等地，切断了何克谦的退路；三纵队陶勇一部正向黄桥以南地区迂回，对黄桥的包围圈已构成。前方向陈总指挥请示如何处置税警总团被俘官兵。

陈毅同志听了汇报十分高兴，说对待陈泰运的部队，可按老规矩办，给俘虏们上堂政治课，向他们讲清团结抗日的道理，劝他们不要再跟着韩德勤一伙闹磨擦打内战，然后连人带枪客客气气地送回曲塘。还特别关照说，要注意多做俘虏中营、团级军官的工作。这些人影响大，请他们务必转告陈泰运本人，上当受骗仅此一次，不要再为他人火中取栗，充当炮灰。

(二)

眼前的一些事实,使我感到新鲜。记得在赣粤边打游击那几年,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我们只要紧紧依靠受尽苦难的广大群众,就能不断消灭敌人,壮大自己。即使有时敌人重兵“围剿”,我们也能象孙悟空似的,钻入敌人的心脏闹腾一番。可如今形势不同,有日本侵略军、汪伪军、反共顽固派,以及可以争取的地方实力派。对于顽固派的阵营,也不能一律看待,有死顽固的,也有可争取暂时结成同盟的。这种复杂的斗争环境,需要我们随时掌握新情况,学会区别不同情况,运用巧妙的斗争艺术。

毛泽东同志对此作过具体分析。他指出,“国民党是一个由复杂成份组成的党,其中有顽固派,也有中间派,也有进步派,整个国民党并不就等于顽固派。”(《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我们对于那些忠心抗日的人,对于一切非投降派、非反共顽固派的人们,对于这样的国民党员,是表示好意的,是团结他们的,是尊重他们的,是愿意和他们长期合作以便把国家弄好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

过去的斗争环境不同,我对毛泽东同志这些抗日统一战线的精辟论述体会不够深,也缺乏实践的机会。如今环境大变,认真真学习就显得特别必要了。

毛泽东同志在上述文章中,曾谈到我们应该采取的政策:“一方面,团结一切进步势力,团结一切忠心抗日的人,这是一条政策;一方面,反对一切丧尽天良的坏蛋,反对那些投降派和反共顽固派,这是又一条政策。我们党的这些政策,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这就是力争时局好转,战胜日本。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

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这就是我们的根本方针。”

他又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说，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在接着的一个时期中，双方实行休战。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在他们举行新的进攻之时，我们才又用新的斗争对待之。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说来，就是‘有理’，‘有利’，‘有节’。坚持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派，并使顽固派尔后不敢轻易向我们进攻，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举行大内战。这样，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我反复温习毛泽东同志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论述，是因为东进黄桥遇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深感斗争形势变化很快。而从现实斗争中获得的感性知识，又使我对于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些策略问题，有了更具体的认识。经过长期接触，我觉得陈毅同志是能深刻领会并坚决、忠实地执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制定

的方针政策。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他能十分自如地运用党中央确定的指导方针，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从而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三)

28日，指挥部机关仍驻老叶庄，而粟裕同志及各个纵队负责人都已进入第一线。按预定计划，当夜行动，凌晨向黄桥镇何克谦部守军发起总攻，拂晓时分解决战斗。入夜，繁星满天，白天的余温使低矮的草屋闷得象蒸笼，再加激战前的兴奋，干部、战士都毫无睡意。我原想劝陈毅同志稍稍休息一会儿，但到他的住处一看，警卫员早把准备出发的背包捆好了。我了解老首长的脾气，此刻无论怎么说，他也不会睡上几个钟头的。1936年在赣南油山地区打游击，我曾与他同住一个草棚。那时，我就深知他的性格，越是战前越显得精力充沛过人，而且喜欢与周围的同志谈天说地，把胸中酝酿成熟的雄图大略阐述出来，并仔细观察周围同志的反应，鼓励大家各抒己见。

陈老总见我也没休息，便邀我在屋前大柳树下纳凉。既然达不到劝他休息的目的，那就索性留下陪他熬夜吧。其实，此时我也着实希望他畅谈一番，以便自己掌握当前形势和黄桥战斗的情况。

远处不时传来稀疏的枪声，陈毅同志却若无其事，照常侃侃而谈。他说，这一回我军决定东进黄桥的主要根据是：一、吴家桥、郭村一带地区狭小，不利我军发展，如将该区主动让给二李，可以争取其中立。二、盘据黄桥一带的顽保安第四旅一贯勾结敌伪，积极反共，敲诈勒索，久失人心，且其战斗力较差，与二李及韩顽均有矛盾，易于聚歼。三、那一地区在内战时期曾是我红

十四军的革命发源地，党在群众中留有深刻的影响，抗战以来，已恢复了地方党组织。我军东进抗日，能够获得广大人民的热切拥护。四、我们开辟了黄桥新区，可以由此向东、向北发展，但韩顽决不甘心，必将以全力与我争夺，我即可乘势协同南下八路军一起解决苏北问题。

(四)

我们向黄桥镇进发时，前线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同志们都加快了行军的步伐。几个警卫战士边走边议论：“赶得巧，还可以亲手捉上几个俘虏！”

夜空渐渐发亮，枪声随之稀落下来，先头部队已经进入了黄桥内街。经过一路急行军，我指挥部机关人员刚到黄桥镇郊，陈毅同志即命令一部分部队继续向南至沿江一带搜索，乘胜攻克驻孤山、西来等地日伪军据点；又下令各部检查军风纪，准备入城。当火红的太阳升起时，我们随着大部队开进了黄桥镇。沿途群众夹道相迎，欢快的锣鼓声和拥护新四军抗日的口号声交织在一起，显得格外热烈动人。原来，保安四旅的土匪官兵在镇上盘据数年，闹得鸡犬不宁，居民恨之入骨。当时一首歌词写道：“黄桥是人间地狱，何克谦是专制阎罗。拉伕绑票敲榨勒索，叫黄桥民众怎能生活。”新四军一夜之间歼何部2千余人，拯救群众于水深火热之中，再加全体指战员纪律严明，获得解放的人民怎能不打心底里拥护、欢迎共产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

进入黄桥后，苏北指挥部机关设在镇东一所中学里。这座青砖大瓦的工字型两层楼，可算是黄桥最有气派的建筑物了。陈毅同志的工作更忙，许多重要事情都亲自处理，我曾和他说笑话：“想睡个痛快觉的时间又得向后移了。”他一方面布置部队抓

紧休整，准备迎接更艰巨的战斗；一方面从各部队抽出一批干部组织民运工作队，分赴附近农村宣传和发动群众，组织农抗会，准备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他还亲自过问地方党和地方政权建设的筹备工作。

在日理万机的紧张时刻，陈毅同志仍念念不忘统一战线工作。通过地方干部介绍，他知道有一位叫朱履先的老先生，在当地上层人士中颇有影响。朱履先早在二十年代就担任过高级军职，如今虽已解甲归田，却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极表不满。陈毅同志对我说，此人爱国，是旧军人中不可多得的有识之士，应主动登门求教，请他出面帮助维持地方。陈毅同志的工作做得很细，已经打听到朱老先生住在黄桥镇米市附近。那天去朱府拜访，我和管文蔚也随陈毅同志前往。走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商店、摊头已经恢复营业，人来人往，摩肩接踵，很难看出数日前这里还是个战场。这黄桥镇是长江北岸商品集散地之一，人称“苏北的小上海”，果真名不虚传。行人中，有些似曾相识的老百姓，向我们点头微笑，也有拱手相见的士绅，更多的人是用崇敬的目光注视着陈毅同志，悄声议论道：“这位就是威震江南、日寇闻风丧胆的陈毅将军！”

朱老先生的住处，是一座隔开外街，显得清静安适的深院。陈毅同志与朱老先生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在融洽的气氛中，一个襟怀坦荡，阐发了我党我军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方针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用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投降、打内战闹磨擦的罪恶行径；一个忧国忧民，痛斥国民党政府腐败、民生凋敝、对强敌而在弱不振、步步退缩、丧权辱国的种种伎俩，表示愿为民为国鞠躬尽瘁。我静静地坐在陈毅同志身边，听着，看着，琢磨着。这是抗战以来，首次随他和一位有影响的民主人士谈话，做团结争取工作，

是一次十分难得的学做统战工作的机会，使我受到许多教益。此后，我与朱履先老先生还有几次接触。他的正义感强，为人豪爽直率，对新四军来苏北抗日反遭韩德勤排斥愤愤不平。他曾亲自号召黄桥工商界人士向我军捐款六万元，并四处奔走，呼吁国共合作抗战，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在朱老先生的带动和影响下，泰兴、泰州、靖江等地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也跟着向我们靠拢，为开辟、建设黄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起了不小的作用。

回到指挥部，陈毅同志情绪特别高，说可以召开一个全镇各阶层人士，包括士绅和保长以上的国民党人员的会议，扩大统一战线工作的成果，打消部分中上层人士的顾虑，将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人士吸引到我们周围来。他还对我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宝，新四军7千子弟兵要对付韩德勤10万大军的挑衅，不紧紧依靠苏北人民群众，不争取中间势力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同情支持，是注定会失败的。

到苏北短短一段时间，在陈毅同志身边耳濡目染，感觉到他在勾画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宏伟蓝图时，富有高瞻远瞩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气魄，事事从实际出发，善于因势利导掌握工作主动权。在对二李的争取中，不因郭村战斗时他们曾主动进攻过我们，而趁胜轻取泰州，把他们打到顽固派韩德勤一边去，而以释放俘虏、退还30里防区的“让步”策略，重修旧好，促成有利于我东进的局面。在对国民党税警总团团长陈泰运的争取中，则采取打拉结合，利用他与韩德勤的矛盾，不计前嫌，释放战俘，送还枪支，用宽容诚恳的态度，让陈泰运暂居中立。对这一系列的做法，不少同志起初很不理解。但实践证明，陈毅同志创造性地贯彻了党中央提出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娴熟地运用了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相结合的

策略。

当时，有些地方干部和部队同志，痛恨国民党军队的种种劣迹，一度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热衷于打而忽略了拉。陈毅同志就耐心说服他们，一遇机会就大讲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必要性、重要性，批评那种目光短浅、“顾小利而忘大义，逞英雄而少办法”的狭隘思想和观点，总结出“坚持政治先行，军事后行”，“对顽固派应一面拉一面打，先拉后打，先打后拉”的经验，反对一味蛮干或一味退让的做法。

(五)

1940年8月，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成立后，为了适应形势的大发展，还设立了苏北军政干校，开办党员训练班，大量吸收各地的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训练新党员，培养骨干。9月中旬，苏北区党委正式宣告成立，由陈毅同志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撤销原江北、苏北两个特委，而以新成立的如皋、泰兴中心县委取代。从此，苏北地区江都、泰兴、泰县、靖江、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兴化、东台、宝应、高邮等县地方党的工作即由区党委统一领导。区党委领导区域还包括苏南京沪路北特委所辖各县。

苏北区党委机关设在距黄桥中学不远的一座不大的寺院里。我和区党委的几位部长赵毓华、韦一平、薛尚实、俞铭璜、章蕴等同志一起办公。陈毅同志在紧张部署战斗的空隙，也经常抽时间找我们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地方党的工作。他多次指出，必须迅速改变过去秘密党时期小手小脚的工作方法，大胆放手地发动群众去开展各项工作，注意在斗争实践中培养大批地方干部，以利于支持部队打大仗，建立和巩固根据地。他还说，中

国的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毛泽东同志对此早有精辟的论述，我们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广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才能取得这场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全民战争的胜利。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以来，全国人民都希望国共两党合作御外。在这种形势下，我党只有高举团结抗日的旗帜，才能争取全国大多数人的同情和支持，而要在苏北地区打开抗战局面，第一步必须立稳脚跟，使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士都获得利益。这样，他们就会信任和拥护民主政权，我们才能取得抗日的领导权。

为取得抗日领导权，陈毅同志做过许多上层人士的工作，且都颇有成效。这里不妨提一提他跟韩国钧先生的交往。在黄桥时，经镇江商会会长陆小波介绍，陈毅同志曾数次致函苏北著名人士韩国钧老先生，力陈我党我军团结抗日的主张，请他出面斡旋，调停国民党韩德勤与我方磨擦。

韩国钧先生祖籍江苏海安，是苏北首屈一指的德高望重的人物，那时已届八十高龄。他小时家贫，屡经科举，未中进士，以举人身份拔贡，当过两任知县，政绩甚著。后来他当过交涉使，专办工矿铁路和对外交涉工作。他还出使日本考察农工商矿，和各国办交涉，表现出相当高的民族气节，受到人们的尊敬。民国初创，他当过安徽省的民政长，民国十一年当过江苏省省长。他有真才实学，做官清廉，既通经史，又肯学科学，因此在苏北上层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声望。他八十多岁还担任着黄河苏北入海水运委员会主任、黄灾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他做民政长时钻研过水利，因此他是一个懂得水情的官员。他还当过代理督军，韩德勤的主力第八十九军的许多军官，都曾给老先生送过“门生”帖子，算是他的“学生”。所以，我们争取他的同情和理解就变得十分必要了。另一方面，他是江苏民族资产阶级的著名

代表人物，拥有沿海垦区数千亩土地，对我土地革命的宣传早怀戒心，因此要做通这位老先生的工作，又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

陈毅同志给韩国钧的信，起到了初步的作用，韩老先生当即表示答应新四军的请求，愿为两党两军在苏北合作抗敌出力。

自东进黄桥以来，我军多次粉碎日军报复性“扫荡”，接连攻克靖江境内孤山、西来等日伪军据点，又歼灭了驻防姜堰的反共顽固派部队。我军在苏北抗日、自卫各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广大民众的斗志。当地老百姓说：“新四军是天兵天将，打仗仗仗胜。”以韩国钧、朱履先等为代表的开明士绅，也很同情与敬佩我党我军，称我军为“王者之师”。我曾在陈老总住处，看到韩国钧先生书赠的一副对联：“注述六家胸有甲，立功万里胆包身。”这实在是当时民主人士对陈毅同志的最恰切的赞誉，同时也反映了他们对我军的真诚倾心。

第四节 黄桥烧饼歌的由来

(一)

自我江南指挥部率部过江，苏北顽、我斗争就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正面交锋的阶段。韩德勤是蒋介石养在苏北的看家狗。他对我进驻黄桥，创建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及部队的迅速发展，群众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抗日宣传开展得如火如荼，尤感如芒刺背。黄桥决战前，他就公开要挟：“新四军如有合作诚意，应首先退出姜堰”，妄图以此迷惑视听，并对我实力进行试探。殊不料，我以大局为重、忍让为怀，主动撤出了姜堰，交李明扬和陈泰运接防。

这一着棋，是我坚持自主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的巧妙运用，大出韩德勤意料，弄得他不知如何是好。粟裕同志后来扼要分析过这一情况，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让出姜堰，对我是‘一举三得’，既揭露了韩顽积极反共、破坏抗战的罪恶阴谋，在政治上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同情，造成我党我军完全有理的地位，又加深了苏北国民党军队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还使我适时集中了兵力，在军事上对付韩顽的进攻处于有利地位。这些处置，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略策的杰出运用。”（《挺进苏北与黄桥决战》）

陈毅同志对韩德勤这样的顽固派作过精辟的分析。他说，韩德勤很顽固，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当年在江西“围剿”苏区的作战中就被我红军俘虏过，教育释放后，不但不感恩图报，反而更其反动。抗战以来，他又与我们打了几年交道，变本加厉，既凶残狡诈，又刚愎自用，一朝重兵在手，便毫不顾忌苏北人民的和平意愿及我军公平合理的主张。此时，韩德勤正在东台召开旅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研究进攻黄桥的计划。我们不能不“针锋相对”，一方面，更广泛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中间势力与社会舆论之同情和支持，孤立韩顽之流一小撮最顽固分子；另一方面，充分发动和依靠当地人民群众，迅速作好迎战准备，予来犯者坚决回击。陈毅同志在退出姜堰时举行的民众代表大会上，作过一番精采的演说：新四军只求有利抗战、有利人民，虽血溅四野，万死不辞，为达到合作抗战之目的，愿让步退离姜堰，但求省方诚心履行诺言，不再逼人至入长江喝水的地步。在祖国的土地上，人人均有抗战御侮的职责和权利，不许中国人民抗战，那是决不能容忍的。如省韩必欲置我党我军于死地，则我只有起而自卫一途，也就是说，新四军退到黄桥后决不再退。为祸为福，只好待诸事实来作证明，我不忍再言了。

陈总指挥的发言，真是掷地有声，闻者无不动容。朱履先先生当场代表大家发言说：“如果新四军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骗了新四军，也欺骗了我们，他必遭苏北人民所唾弃！”

这里还有一段小小的插曲。我军在退出姜堰那天，通知李明扬部前来接防，我们暗示他可以趁此机会敲韩德勤一笔竹杠。二李照此办理，果然得到10万元。感激之余，他们将韩德勤下达的作战命令也送给我们，并声明决不参加内战，以示报答。为安抚陈泰运部，陈毅同志还吩咐军械库挑选了100多支步枪和儿

挺轻机枪送给他们。李、陈欣喜之余，都深深感激新四军真心扶助友军的诚意。此事前文已提及，我之所以反复追述，无非是特别钦佩陈粟两位将军的政治斗争艺术。

(二)

我军北渡以来，经过4次战斗，连克黄桥、姜堰重镇，控制了东西200里，南北数十里的地区，取得了初步胜利。这时，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二支队，已从山东南下，抵达涟水以北地区，新四军第五支队已列阵于宝应湖、大运河西岸，与苏北部队形成从北、西、南三面夹击韩德勤的战略态势。

虽然我军在苏北尚未站稳脚跟，但韩德勤已预感到处境越来越不妙，特别惧怕八路军新四军会师。他采取“先南后北”的方针，妄图先把我苏北新四军“扼死在摇篮里”，然后回过头来对付南下的八路军。此时，韩顽误以为我让出姜堰是虚弱，急忙亲自指挥他所能调动的36个团，共3万余兵力，包括八十九军李守维部两个整师、独立第六旅翁达部，外加5个保安旅，一齐向我扑来。而我苏北指挥部3个纵队9个团，加起来不过7千人，其中战斗人员只有5千余人。同时，八路军南下部队受敌、伪、顽的牵制，再加不惯于在水网地区行军作战，仍留在老黄河以北；第五支队整训尚未结束，又受津浦路东敌伪的威胁，暂难东渡。这样，我们必须作好无友军战役配合的准备，独自迎战韩顽。

顽军数倍于我军，如何与敌周旋并战而胜之呢？9月间，党中央针对苏北顽我双方一触即发的军事形势，曾迭次电报指示，“如韩部确实大举进攻陈毅，而八路军及（新四军）四、五支队又未遇敌之大扫荡时，自应增援之。”“由于防御战的条件及地理远

隔，八路军、新四军只能作战略配合，不可能希望他们作战役配合，两军各部均应准备独立作战，各部均不向韩军进攻，而在韩向我进攻时，各个击破之。”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也从皖东地区发来电报，指出：八路军及四、五支队虽因日军扫荡，困难甚多，但抽出一部兵力南下增援仍是可能的，并要陈老总考虑：“进行完全的防御战至两星期时间以上，以待援兵到达并造成政治理由。”

顽我双方对峙之外，还不能完全排除日伪军趁机插手的可能。我们反复分析，韩顽其时尚不敢公开要求日伪向我进攻。更大可能是日伪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只要我以打歼灭战为主，速战速决，估计不至于出现日顽联合攻我的局面。

陈毅、粟裕等同志对中央、军委及中原局的指示反复研究，权衡利害，比较得失。他们都认为：如消极固守待援，干等地处淮北、皖东之兄弟部队，则远道多阻，势必旷日持久；二李和陈泰运及各保安旅日久可能迫于蒋、韩压力，趁我疲惫，转而参战；泰兴等地日军也可能趁火打劫，坐收渔翁之利。如此，我方被动挨打，则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我军将来犯韩部中一路击溃，再行谈判，则可能形成僵持局面，我仍无法一举取得苏北抗战领导权，并继续向北发展。只有在兄弟部队的战略配合下，立足于独立决战，迅速歼灭韩顽主力，才能干净、彻底地解决问题。这就要求我们以少数兵力歼灭多数敌人，而且速战速决。这无疑带有相当大的冒险性，但只要我们采取的方针正确、战术灵活，就可能化被动为主动。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与敌人作战，在战略上是以少胜多，在战役上、战斗上是以多胜少，目前的形势却要求我们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役、战斗上也要以少胜多。同志们认为，我们能够进行决战，而且能够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向我，得道多助。

(三)

10月初的一个阴雨天，在黄桥中学一间大教室里，正召开指挥部纵队以上干部会议。一双双眼睛不约而同地紧紧盯着钉在墙上的军用地图。陈毅同志表情严肃地讲解着顽我双方态势及我军的部署方案。他说，根据已掌握的韩顽作战密令，大战将在数日内爆发。韩顽有一个错觉，认为我让出姜堰是示弱的表现，因此他们准备一鼓作气将我围而歼之，至少也要将我赶回江南。现在，来犯之敌已从兴化、东台等地出发，兼程南下，对黄桥地区构成合围之势。韩德勤以其嫡系第八十九军和独立第六旅为进攻的主力，约有1万5千余人，组成中路军，分别经营溪、古溪和祖师庙、加力、分界等地攻我黄桥北面 and 东面阵地。以二李和陈泰运部，约1万2千余人，组成右路军，掩护中路进攻，并攻击我黄桥以西防线。以第一、五、六、三、十共5个保安旅组成7千余人的左路军，攻击黄桥东南地区防线。左、右两路军钳制我军防御兵力，掩护其主力之两翼。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是这次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亲自率领军部直属队及一一七师，从东北方向进攻。韩顽的总目标是占领黄桥，消灭我军主力。

如何还击韩顽的进攻？这个仗怎样打法？陈毅同志的目光扫过人们的脸庞，又胸有成竹地说道：这是再三过细分析研究过的。黄桥地区北面是通扬河，南边是长江，西面有一段从泰州到口岸的运河，周围有泰兴、靖江等日寇据点。如果我弃守黄桥，不但民心、士气会大受影响，且连我军回旋的余地也将丧失。从另一方面看，凭我军现有的人力、物力，又没条件集中兵力坚守黄桥，即使能做到这一点，至多也只能击溃敌人，而不能歼灭其主力。如果我们洞察全局，力争主动，以黄桥为轴心，采取诱敌

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吸引、调动、消耗敌人，就可能相对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样，顽军来犯摸不着边，我军出击它逃不脱。

人们发出一声会心的微笑。陈毅同志顿了顿，又提高嗓门说：现在请粟裕同志下达命令。

粟裕同志是深孚众望的名将，他的言行举止同样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他来到军用地图前，一边指指点点，一边侃侃而谈。他说：在兵力部署上，我们决定以四分之三兵力作为突击力量，而以四分之一的兵力守卫黄桥。在部署时我们还充分注意到各个纵队的特点。三个纵队（一纵队叶飞司令兼政委；二纵队王必成司令、刘培善政委；三纵队陶勇、陈玉生司令，陶勇兼政委）都属于勇猛攻击型的，其中一、二纵队兵力比较充足，用于突击方面，隐蔽集结于黄桥西北之顾高庄、严徐庄、横港桥地区待机；并由第二纵队派两个主力营配置于古溪至分界一线，实行运动防御，诱敌深入；另以一纵队一个营化装进入敌后，配合地方武装袭扰敌人。第三纵队全部用于防守，担负正面阻敌任务。一应部署完毕，各纵队负责同志稍稍议论一番，便分别进行战前准备去了。

（四）

在黄桥决战全过程中，陈毅同志坐镇严徐庄掌握全局，粟裕同志负责战场指挥。在这次震撼中外的大决战中，他们两位是我方的两根擎天大柱，功彪史册。在决战中，我和管文蔚同志一直随粟裕同志行动，动员苏中全党、全民搞后勤工作。

我知道，决战之前在各路敌军中选择首战歼灭对象，是一桩关系胜败大局的事情。一般常规是，先拣弱的下手，后打强的。

而这次决战，粟裕同志却出了奇兵，把韩顽嫡系中最强的翁达旅作为首战歼灭对象。

翁达中将率领的独立第六旅，可不是一支等闲的军队。它是韩德勤嫡系主力，是韩顽的一张王牌。全旅 3 千余人，清一色的“中正式”七九步枪，每连有崭新的捷克式机枪 9 挺，号称“梅兰芳”式部队（即指装备漂亮）。而军官大都是“军校生”，是蒋介石一手栽培出来的上等人才，阵容是够强的。我们之所以敢碰硬，主要是趁敌不备，出其不意，利用“青纱帐”掩护，对立足未稳的翁达旅实施突袭，把它截成几段，使它首尾不能相顾，从而发挥我军优势，分别聚而歼之。

先打强敌是有点冒险的，但好处却很多。一是二李和陈泰运已向我表示中立，但在韩顽进逼下疑虑重重，如果我先打翁达，把它吃掉，就可以拉开二李、陈泰运与韩顽的距离，稳住李、陈的中立立场，使韩德勤的右翼失去掩护。二是翁达是韩顽中路右翼，把它消灭掉，也就把韩德勤的中路打开了大缺口，有利于我军围攻顽军主力。三是翁达是韩顽的一张王牌，把强者吃掉，那些次等杂牌军士气必将一落千丈，不敢放肆了。这对于整个战役的转变具有决定性影响。

选择什么时候突击最为有利呢？如果突击过早，只打先头部队，而没打着要害，顽军就可以遁逃，反而过早暴露我方部署和意图。如果突击过晚，顽军几路合围黄桥，则我军难以坚守。总之，时机的选择，确实十分重要！

10 月 1 日正遇暴雨，迟至 3 日才放晴，4 日开始行动。我们得到情报：4 日下午 3 时，翁达旅前锋已抵黄桥以北 6 华里处。计算一下，独立第六旅采用一路行军纵队前进，那么 3 千多人的队形就将近 9 华里长。从黄桥到高桥约 15 华里，敌先头部队已进入我伏击地段，而后续部队还在 9 华里以外。粟裕同志

当机立断，提议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分兵多路向翁达旅发起突击，将它斩成数段，然后各个包围歼灭。

陈毅同志同意粟裕同志的方案，马上下令出击。叶飞等同志率一纵分成4个箭头猛插过去，首先歼灭敌旅部和后卫团，迫其先头部队回援，然后从侧翼迂回到翁达后方，乘势把它包围。经过3个小时的激战，把个“梅兰芳”式的部队干净彻底地加以全歼，翁达无处逃生，自杀身亡。

翁达旅被歼，顽军为扭转局势，猛攻黄桥。我防御工事大部被毁，伤亡也大，敌三十三师一部在尘土硝烟中突进了东门，形势又变得紧张起来。这当儿，又传来李守维亲自率领第三四九旅经八字桥向黄桥疾进增援的消息。但当他得知翁达被我包围时，非常惊慌，既不敢援救翁达，又不敢继续前进。于是我二纵队王必成、刘培善、杜屏等同志即带领部队，穿过八字桥，插至分界，截断了顽军，发动围攻。经过一夜激战，于6日清晨，八十九军军部被彻底歼灭了。中将军长李守维，这个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共专家，妄想渡河逃窜，慌忙中失足落水，淹死在八尺沟中……

震惊中外的黄桥决战战况，已有不少回忆文章作了详尽的记叙。我只大体记得，我军自10月3日起至6日止，共歼顽军主力12个团，保安第十旅全部，保安第三、五旅各1个团，共计1万1千余人，报销了2名中将，还有旅、团长数人，俘虏了师长、旅长，及各级军官600余名。缴获长短枪和机枪4千余支，山炮3门，迫击炮数10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

我以5千精锐歼敌1万1千余人，创造了战史上以少胜多的范例。韩德勤见大势已去，匆忙率领残部向兴化方向狼狈逃窜……

(五)

陈毅和粟裕同志指挥的黄桥决战，使我学到了许多斗争知识。现在再回过头来回忆一下战前、战中我做的一些工作和经历的事情。

记得到黄桥镇不久，在一次指挥部军事会议结束后，陈毅同志留下我和几位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谈话。他说，黄桥决战势所难免，战役指挥所已设在距黄桥镇14华里的严徐庄，粟裕同志负责前线指挥。他要我们利用最后的时机，立即用各种方式做好战前的宣传鼓动工作，要密切依靠当地群众，把工事修筑好，组织民兵队、担架队、抓好支前工作。既要协助部队坚守黄桥镇，又要保障外线突击队打歼灭战。

自7月底起至10月初，新四军抵达黄桥刚满2个月，但党、政、军、民、学、商各方面的工作都已迅速开展起来。除镇上1万多居民外，方圆几十里内的农民也都发动和组织起来。有好几万人参加了减租减息运动。工人、农民、学生、青年、妇女、教师、商人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协会。儿童们也组织了儿童团。东西不过5里路长的黄桥镇，当时参加各种抗日团体的居民近7千人。决战前夕，他们从早到晚忙于支前准备和宣传鼓动，满怀抗日反顽保家乡的革命激情。有3千多热血青年参加了主力部队或地方武装。在这样洋溢着革命气氛的环境中，决战的动员工作进展是比较顺利的。

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区党委、临时行政委员会、泰兴中心县委，黄桥军民联合办事处，泰兴县政府等单位，共同召开了近万人的战前动员大会。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大会上，我和管文蔚、韦一平、陈同生等同志，先后讲了话。我除讲解了当时的抗战形

势外，对保卫黄桥还讲了以下几个问题：

一、新四军是抗日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韩德勤不抗日，专反共，打内战，是顽固派。黄桥是抗日人民的黄桥，任何敌人的进攻，都必将会遭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和抵抗。

二、韩德勤部队人数虽多，但进攻黄桥是非正义的战争，所以他们是理亏的、胆小的、怕死的；而保卫黄桥的军队和人民是正义的，勇敢顽强的、不怕牺牲的。

三、顽固派的军队勾心斗角，如今又从远道而来，战线长、地形不熟、补给困难；而我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有充足的粮草，军民一条心，在家门口作战，有根据地，有大后方。两相比较，大大有利于我们。

四、我党我军深得人民群众的真心爱戴和支持，也得到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顽固派韩德勤更加孤立和不得人心。他们胆敢进攻黄桥，必将遭到自取灭亡的命运。

会场上，万头攒动、群情激奋、笠帽、军帽、蓑衣……汇合成欢腾的海洋。军民齐声高呼：“决战决胜，誓死保卫黄桥！”秋雨虽然不停地下着，但四乡的农民还是不断地涌进会场。长久以来蕴积在群众之中的抗日反顽的情绪，此时象点燃的火焰一样，愈来愈炽烈，愈来愈旺盛了。亲自投身在这熊熊的烈火之中，更使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时隔数十年，我还记得当时黄桥一带流行的歌谣，其中有两首是这样唱的：

“天上有个扫帚星，
苏北有个韩德勤；
手里白养几万兵，
专门欺侮老百姓。”

“苏北民众要安宁，
只有打倒韩德勤。
坚持团结反磨擦，
赶走鬼子享太平。”

这首民谣是当时苏北特委干事白帆(周伯藩)同志创作的，揭露了韩德勤的反动面目。为便于向群众宣传，这首歌词最初贴在米巷附近。那料到，歌词一贴出来，就被群众辗转传抄，迅即不胫而走，传遍大街小巷。

大会召开过后，群众与部队的关系更加亲切、团结了。他们组织起来帮助我军挖战壕、修工事、筑圩子。各村各乡的妇抗会组织的支前队，纷纷将军鞋做好送到战士手中。黄桥镇工抗会组织了一支4百多人参加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协助侦察敌情、维护社会秩序。青抗会和学抗会除组织人员参加巡逻外，还成立宣传队，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商抗会和商会也主动参加支前工作。黄桥镇上60多户烧饼店也动员起来，日夜开工为战士们准备干粮。时值中秋，当地群众按旧风俗家家赶做烧饼，最大的烧饼大如面盆。群众竞相送烧饼慰劳子弟兵，转眼就堆满了好几个大囤，就象一座座小山似的。全镇各商店积存的月饼，也源源送往前线。与此同时，担架队也组织起来了，随时准备上前线抢救伤员。尤其使人感动的是，许多群众主动将家里的木料、家具、寿材……送到前沿，给部队做掩体、工事。

10月4日清晨，一阵阵激烈的枪炮声打破了决战前沉寂的气氛，顽固派军队开始从东门方向发动进攻。陶勇、张震东等同志身先士卒，指挥三纵队迎头抗击。枪声就是命令。顷刻间全镇都沸腾起来了。我和管文蔚同志从支前委员会办公处何家祠堂出门时，在进进出出忙于战勤事务的人群中，迎面碰上朱履老先生。我们劝他回去暂避，他却笑着说：“我最佩服共产党新

四军的将士，你们临危而不惧，我老朽之人还怕个啥!？”说着，便同我们一起上街检查各项支前工作，挨门挨户向店主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要他们照常开市。一路上，我们看见许多群众挑着饭菜、烧饼、汤水，谈笑自若地向激战中的东门送去。那时天还没有大亮，但商店的门都开了。经过烧饼店、食品店，朱老先生总要走上前去说上几句：“慰劳部队啊!”“要多做快送啊!”他一直象我们年轻人一样劳累着，还挨家挨户去催店主做烧饼呢!

这时，不断有枪弹将屋瓦打碎，迫击炮弹也呼啸着从头顶飞过，有几处民房着了火……可是人们毫不慌张，仍然在大街上走着，象没有发生战斗一样。有趣的是街头巷尾，到处都闻得到香喷喷的烧饼味……

天色大亮以后，镇东头的枪声更密，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可以想象得到，战况十分激烈，已开始短兵相接了。

刚过中午，东门方向又传来阵阵冲杀声，从不时抬下来的伤员数量上，可以看出战斗激烈、残酷的程度。韩顽以势在必得黄桥之意投下赌注，我以与黄桥共存亡的决心坚守阵地，寸土不让、寸地必争，故而战斗出现白热化。作为预备队仅剩的一个团，也一早拉上去了。手中有武器的民兵，也纷纷涌上前沿参加战斗。

我拦住一位“桂花”的排长打听战况。他说，进攻黄桥东门的顽军是八十九军三十三师孙启人部，他们仗着人多势众，不断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发起冲锋，但我三纵队的战士们是钢打铁铸的，坚守了七八个小时，主阵地一寸也未丢失。正在情况紧急之时，传来老四团第三营由江南赶来，离黄桥只有20里的好消息。粟裕同志振臂高呼：“同志们，江南增援部队快过来了!”顿时，前沿阵地一片欢呼，士气更加高涨。陶勇同志和纵队参谋长张震

东同志把上衣一甩，挥动驳壳枪，带领部队迎着顽军冲去，硬把即将冲进来的顽军杀出东门，使顽军动弹不得！

我急匆匆赶到三纵队指挥所——严复兴油坊的小楼上一看，但见粟裕同志也离开了指挥部，此时正坐在陶勇同志的指挥所里和前沿通话。这里距东门战场仅几百米，是十分危险的，粟裕同志却镇定自若地用电话向对方交代战斗任务。正说话间，几颗炮弹连续在附近炸开，震耳欲聋，气浪把窗玻璃震得“嘎嘎”响，使整座木结构的小楼晃动起来，而粟裕同志好象眼前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继续打他的电话。我劝他快回指挥部，他却高兴地告诉我，老陶脱了上衣，光着膀子冲上去拚刺刀了！……时间过去那么多年，当我现在执笔写到粟裕、陶勇以及许多老战友时，内心是很难平静的。当年正因为有千千万万象他们这样赤胆忠心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视死如归地奉献出自己的一切的革命家，我们才最终取得了胜利，建立起今天这个伟大的人民共和国！

粟裕同志虽然催我离开，但他又拉住我，告诉我刚才三团打了一个漂亮的反击，抓到几百名俘虏，活捉了一名营长。又说叶飞纵队已与翁达旅交上手了，王必成纵队正向三十三师侧后迂回。整个战役正按着指挥部的部署顺利地进行。粟裕同志个子和我不多高，平日里比较沉默寡言，有点象书生，斯斯文文的，但他指挥战斗却勇如猛虎、足智多谋，是我接触到的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

按照粟裕同志的设想，只要黄桥镇能死死守牢，牵制住李守维的主力，使突击队腾出手来，压轴大戏就会令人叫绝了。

不出粟裕同志所料，傍晚就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消息：“梅兰芳式”装备的独立第六旅被我军彻底全歼了！我兴奋地在街上走着，检查工作，同时也与镇上的群众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有

几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将我与管文蔚同志围住，邀我们一起唱：“天上有个扫帚星，地上有个韩德勤……”的歌。我这个青年干部，却不善于唱歌，但这时心里实在高兴，也跟着唱了起来。满载黄桥烧饼的小车队“吱嘎吱嘎”地从我们身边推过。看着一个个烤得焦黄松脆、又甜又香的烧饼，我好象贴熨到黄桥人民一颗颗纯真的心，我的眼眶湿润了……

夜幕降临，黄桥镇上灯火通明，街道口有戴袖章的纠察队员在值勤，商店破例在做夜市生意，人们对我军坚守黄桥充满信心。是啊，有广大人民的支持、拥护，有经得起战火考验的军民鱼水情，有我堂堂正义之师的全体指战员的浴血苦战，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我党我军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大业，是一定能完成的！

第二天，战役的发展更加令人高兴，我江南援兵赶到了；守黄桥东门的三纵猛杀出去，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李守维一一七师、三十三师正在作困兽之斗，面临灭顶的命运。整个战斗的中心一再向东、向北移去，已扩展到分界、古溪一带。

(六)

根据战局的进展，陈毅同志回到黄桥镇上。粟裕、钟期光及我们几位党政负责同志简单地向他汇报了各自分管工作后，又一同研究了追歼顽敌的计划和部署。此时，前线送来叶飞纵队的报告，说顽八十九军军部在野屋基（距黄桥北8华里）被我包围，乔信明和廖政国团正发起攻击。听到了这个消息，指挥部里顿时一片欢腾。

指挥部隔壁的院子里，传来服务团同志们高亢欢快的歌声。那熟悉的嗓音，好象是作曲家章枚在领头教唱一首新歌。我静

静地听着，觉得歌子很活泼动听。事后我才知道，这就是李增援作词、章枚作曲的《黄桥烧饼歌》：

“黄桥烧饼黄又黄哎，
黄黄烧饼慰劳忙哎，
烧饼要用热火烤哎，
军队要靠老百姓帮，
同志们呀吃个饱，
多打胜仗多缴枪，
嗨呀嗨哟嗨哟嘿，
多打胜仗多缴枪，嗨呀嘿！”

黄桥烧饼甜又甜哎，
甜甜烧饼好下咽哎，
烧饼好吃难磨哎，
胜利当中有困难，
同胞们呀努力干，
坚持抗战不投降，
嗨呀嗨哟嗨哟嘿，
坚持抗战不投降，嗨呀嘿！”

黄桥烧饼千万千哎，
千万个烧饼送前线哎，
保卫黄桥总动员哎，
苏北换了新局面，
同志们呀加油干，
一打打到东海边，
嗨呀嗨哟嗨哟嘿，

一仗打到东海边，嗑呀嘿！”

这首歌十分真实地唱出了当时黄桥军民的思想感情！即使现在，一听到这歌声，就能把我们带回当年战斗情景中去。这是一段光辉的历史，这是值得苏北人民永远纪念的历史！

黄桥决战经过三天两夜的较量，我终于取得了全面的伟大胜利，在苏北站稳了脚跟，打开了苏北抗战的新局面，把抗日领导权牢牢地掌握在我党我军手里！它预示着，在黄海之滨的苏北大地上，必将出现抗日民主的艳阳天！

第五节 会师海安

(一)

黄桥战役胜利结束，新四军苏北指挥部主力，在陈毅、粟裕同志率领下继续东进、北上，准备饮马串场河。

10月8日，我们到达营溪一带宿营，先行进入海安镇的粟裕同志派参谋来向陈毅同志汇报，说韩国钧老先生和当地各界代表倡议举行隆重仪式，欢迎陈毅将军及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海安。汇报时，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同志也在场，陈毅同志便和我们几个人一起商量。他高兴地说：“怎么样，老钟，你就辛苦一趟，再跑30里路，连夜跟粟裕同志共同安排一下吧。明天大队人马进城，可以搞得热闹点，扩大影响嘛。把司号班集中起来，奏奏军乐，但要告诉部队，进入新区，千万要注意群众纪律，注意军风纪，不要打了胜仗，就犯骄傲的毛病！”

大战刚过，部队上下都显得轻松愉快。那天在宿营地，陈老总又跟我说起笑话来：“阿丕，前几天我在严徐庄真够紧张的啊！晚上只睡三四个小时，有几夜连眼睛都没有闭过。说老实话，战争这玩艺，多少总有点子‘冒险’，当然不是冒险主义啰。既担心外线的出击，又担心黄桥镇的坚守，还担心日寇趁机捞一把。”陈老总还说，翁达旅被我包围之后，韩德勤狗急跳墙，命令三十三师孙启人非攻下黄桥不可。当时粟裕、陶勇同志唱空城计，连炊

事班、警卫员都组织起来投入了战斗。情况如此危急，确是少有的。我告诉陈毅同志，我当时也十分焦急啊。陈老总转而又笑道：“我怕万一被敌人赶上山再打游击，已经叫张茜把一挑子书籍文稿都坚壁起来，作了最坏的打算。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圣人，还是《国际歌》唱得好：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解放人类，就得靠我们自己。靠无产阶级的政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奋斗。喂！你还记得我在赣南时写的那首《无题》吗？”

我当然忘不了，随口就背道：

“生为革命死不哭，
莽莽神州叹沉陆。
魂兮归来大地红，
小住人间三十六。”

这首诗写于1936年冬天，是难忘的“梅岭事件”期间的作品。同期写下的，还有著名的《梅岭三章》。那时我与项英、杨尚奎同志及警卫员丁上淮、宋生发刚从被敌人包围的斋坑驻地冲出，但从大余县城回来的陈毅同志却不知道斋坑已经出事，差点撞上敌人枪口。这一段惊险经历，我们经常谈起。一晃4年过去了，而今吟诗生情，又使我回忆起风雨吹淋、蜚伏草丛、缺衣少食、同历生死的往事。

“小住人间三十六，如今我已整四十岁了。子曰‘四十而不惑’，谢天谢地，但愿如此。”陈毅同志谈兴正浓，感慨地笑着说：“不过我39年曾预言过，当时的苏北‘三角斗争’尖锐复杂，四种力量，日寇是老大，韩顽第二，两李第三，我新四军名副其实是老四。后来经郭村一战，二李溃败，我跃居第三。如今黄桥又一战，韩顽龟缩兴化，我升居第二位，初步在军事上扫除了在苏北坚持抗战的障碍，倘若政治上再打胜仗，领导千百万苏北人民战

胜日本帝国主义的重任，就非我莫属了。”

陈毅同志是在闲谈中讲这番话的。他总是这样，如同师长一样，随时随地讲形势，讲认识，讲任务，教育、启迪象我这样比较年轻的干部。尤其难忘的是，他不仅教导我们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的指示精神，而且以自己的模范行动感染我们。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

当时，党中央多次指示我们：解决苏北问题主要依靠陈、粟部队和南下八路军密切的战略配合，在战役指导上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中原局也曾一再强调：解决苏北问题对建立巩固的华中抗日根据地，坚持华中抗战，推动和争取全国时局的好转有决定意义。现在我们向东、向北移至海安，正是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所采取的步骤。当时海安是一个富庶的市镇，交通便利，而且位于十字路口，是个军事要冲。控制了海安就能割断如皋、泰州、南通、启东四县的顽军和海安以西以北韩顽主力的联系，北可以直指东台、盐城；西可及曲塘、白米、姜堰、泰州。海安是迎接八路军南下会师的最理想的地点。怪不得指挥部的作战命令中这样规定：“不顾伤亡，不计俘获，占领海安就是胜利！”

从当时国际国内总的形势看，1940年10月，日军为了向太平洋扩张，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占领东南亚，与德寇侵犯非洲相呼应，急欲解决中日战争，巩固南进后方。为此，日方加紧对蒋介石诱降，蒋介石又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的《皓》电，限我在华中与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內开赴黄河以北，妄图引我入瓮，借日军之手消灭我们。同时又以汤恩伯、李品仙等30万大军压向华中。在这种形势下，韩顽怕我新四军北上与八路军会师，我们能够进驻海安，无疑是一个大胜利。

(二)

1940年10月9日。

下午3时许，苏北指挥部机关及直属部队，到达海安西南五里庙附近休息待命，整理军风纪，准备参加入城仪式。

最先迎接我们的是先期抵达海安的粟裕、钟期光同志。他们扼要向陈老总汇报了准备工作情况。随后，部队即迈开雄赳赳的整齐步伐向海安镇进发。虽然经过大战和行军，指战员们疲劳已极，但一个个仍然精神抖擞，伴着嘹亮的军号声，迈开大步前进。

到达西门一座木桥时，管文蔚、黄逸峰、朱克靖、陈同生等同志以及海安商会会长、国民党区长等各界代表，早已迎候在桥头。韩国钧老先生因病不能步行，特意乘黄包车在西街等候。陈毅同志身穿灰布军服，足蹬黑布鞋，神采奕奕，分外潇洒。原先韩国钧老先生以为一位刚刚打了大胜仗的将军，一定会趾高气扬，在人前显出傲慢的神态来。然而陈老总一如往常，对韩老先生仍执后辈之礼，并一再说明黄桥一仗是我军被迫反击自卫，事非心愿，把原来持有“不偏不倚”态度的韩老先生说得连连点头，抱怨韩顽不守信用。

陈毅同志会见各界人士，同他们一一握手，又向沿途欢迎的群众招手致意。所到之处，激起阵阵欢腾。喜悦的人们摩肩接踵、翘首跼足，争相一睹陈、粟将军的丰采。

进驻海安后，苏北指挥部机关就设在东寺庙（现海安中学内）。陈毅和叶飞、管文蔚、惠浴宇等同志，在朱克靖同志陪同下拜访了韩国钧老先生。其间，经韩老先生再三邀请，陈老总才住进韩公馆南厢一座清静的院落。

韩老先生的宅第就在海安镇上，是灰瓦多进的老式平房。它的客厅却很别致，建筑在三四尺高的平台上，有门连着本宅。这座客厅很讲究，柚木结构，呈长方形，南北宽五六米，东西长十多米。三面有窗，窗上有雕花窗格，地上铺细花瓷砖。客厅外，西南北三面都有走廊和栏杆围绕，屋顶呈半圆形，酷似火车车厢。客厅外是小小的花木庭院，有棵高大的广玉兰，另有些大盆景，曲径幽香，十分雅致。在海安，或者说在苏北，这样精致的建筑是不多见的。

陈毅同志向韩老先生陈述了黄桥决战的经过，说明这一战役是韩顽一手挑动的。他表示，大敌当前，中国人不应该自相残杀，应该一致对外，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这番话，观点鲜明，是非清楚，充分掌握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使韩老先生口服心服。后来，他们以诗词书法互酬，关系十分融洽。记得韩老先生第二次写给陈毅同志的对联是：

暴雨袭神州，哀鸿遍野，
刚峰镇巨浪，砥柱中流。

(三)

得知新四军来到海安，四乡群众纷纷前来慰问。鸡、鱼、肉、蛋等慰劳品接连不断送到部队、机关和医院。镇上的妇女组织起来抢着为指战员缝衣洗被。街上三家浴室免费招待抗日将士洗涤征尘。当地群众的热情，使我们深受感动。

10月10日，八路军南下先头部队胡炳云团进抵盐城以南，与新四军王必成同志的二纵队在东台以北的刘庄、北驹间会师。这喜讯是通过东台的民用长途电话直接传来的。

这次会师是八路军和新四军，也是苏南和苏北部队的大会

师。久别重逢，大家有数不尽的战况要交流，有说不尽的思念之情要倾诉……

当时，整个形势，特别是军事形势对我十分有利。东台是韩顽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部所在地，已被我军进驻；黄桥一战，韩顽败退兴化，士气低落，我若乘胜前进，不难陷其老巢兴化，使他在苏北再无立锥之地。然而，陈毅同志经过缜密的考虑，根据党中央多次指示，在反摩擦斗争中要掌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同意韩顽通过韩国钧、李明扬向我求和的要求，不再采取军事行动。

陈毅同志的考虑是十分明智的。他经过反复多次与党中央、中原局、新四军军部以及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电报往还，说明现实情况和今后的行动方针。他是这样考虑的：我党我军总的目标在于坚持团结抗日，韩顽虽然一贯顽固，反共意识根深蒂固，但我们此时倾全力消灭韩顽，反会引起中间势力如李明扬等的恐惧，不利于争取他们，也不利于坚持抗战。再则，黄桥一战，我军有损伤，亦相当疲劳，有待休整，加上水土不服，霍乱痢疾，亦须认真对待。韩顽虽损兵折将，但尚有残部2万余人，若此时攻打兴化，他势将背水一战，利用水网地形，作困兽之斗。如果把韩顽消灭，则蒋介石麾下汤恩伯、何柱国等拥有30万兵马的国民党军队就会插手进来抢地盘，取韩顽而代之。所以，此时我军应暂停进攻韩顽，稳守已有阵地，利用有利时机，迅速进行开辟苏北根据地的工作。

(四)

黄桥决战之后，我军虽没采取大的军事行动，但敌、顽、我斗争依然很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韩德勤不甘心于黄桥决战的

失败，始而收拾残部勉勉强强拚凑了2万人马，继而又在山东南下的霍守义一一二师的支援下，不断对我们进行骚扰，妄想东山再起。

日军经过“坐山观虎斗”，对我在其心脏——苏中地区的胜利，异常惊恐，不断增加兵力。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团结、改造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孤立、打击韩德勤的残余势力。陈毅同志为了消除李明扬、陈泰运的疑惧心理，应他们的要求，同意在新四军与李、陈部队之间建立缓冲地带，请黄逸峰同志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出面，组织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担任统战任务的外围军，番号为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直属纵队、苏鲁边区游击指挥部第三纵队联合抗日司令部，简称“联抗”。1940年10月10日，经苏北指挥部批准，“联抗”司令部在曲塘正式成立。黄逸峰同志任司令员，李俊民同志任副司令员，周至堃同志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派张孤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这支部队由新四军苏北指挥部、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国民党江苏保安一旅三支部队各抽一个连组成，再吸收一批参军的爱国青年，收编白米、曲塘两个常备中队，共约1千余人，编为4个大队，分驻海安、曲塘、白米以北一线。

“联抗”建立以后，在白米、曲塘以北的农村担任游击作战任务。在共产党领导下，“联抗”进行了整训，清洗阶级异己分子，建立党的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进行民族意识教育、阶级教育、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教育，提高了部队的素质。一年后，刘少奇同志曾在军部对“联抗”连以上党员干部作过重要讲话，阐述了党的外围军的作用，肯定这是贯彻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创造。“联抗”可以在特定时间内，于特定的地区，去完成主力部队

一时尚不能完成的特定任务。陈毅同志也说：“你们名义上不是新四军，实际上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一部分，要以新四军的标准来改造部队。要继续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坚持统一战线，要实行党的减租减息政策，发动群众，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

“联抗”部队的建立和发展，在兴东泰地区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联合李明扬、陈泰运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团结地方爱国士绅合作抗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五)

10月的某一天，我在陈毅同志处看到一份党中央发来的电报。大意说，如果能在苏北地区召开一次有韩德勤、李明扬、陈泰运及新四军、八路军代表参加的各界和平会议，将对建设苏北根据地起很大作用。中央同意陈毅同志统一苏北军事指挥的意见。刘少奇同志可与陈毅同志会合，布置一切。

当时少奇同志和中原局机关仍在皖东半塔集，大约于10月底才率千余干部抵达苏北阜宁东沟地区。在这期间，陈老总出席了在曲塘召开的苏北抗敌和平会议，与各界著名人士、工农代表、各抗日部队代表共同商定了“苏北各部队团结抗日的临时办法”和“基本改造苏北的办法”。韩德勤拒派代表参加这一次和平会议，进一步暴露了国民党顽固分子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阴谋。

抗敌和平会议前后，发生了一件事情不大、影响不小的事。黄桥决战时淹死在水里的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的妻子通过韩国钧、黄逸峰两位向我方疏通，想收回李守维的尸体。陈、粟首长当即欣然应允，并令人用棺木装殓，交她运回兴化。此举不

叙使李守维的亲属感恩不尽，也在老百姓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人士交口赞誉共产党、新四军宽宏大量，通情达理，不愧为仁义之师、王者风范。这件事，连国民党部队的将士也暗暗称颂、觉得共产党做了他们不会做也做不到的事情。

我军进入海安地区不久，政治影响迅速扩大，猬集在通如海启地区的各路国民党地方武装，如保安第一旅、南通常备旅、游击第六纵队，工人总队、实业保安团等等，纷纷派出代表与我们接头，表示愿意接受新四军领导，而暗中仍与韩德勤保持联系。鉴于该区日军仅4百余人，而国民党军队却有3万之众，社会情况极其复杂，陈、粟首长决定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团结、争取、改造这些国民党地方武装。于是，他们派陶勇、刘先胜同志率三纵队进入通如海启各县，协助我地方党、政接收各县政权，推行抗战法令，进行民主改革，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我们还在如皋县掘港镇成立了江苏省第四区（沿用旧制）抗日游击指挥部，委季方同志任指挥，刘先胜同志任副指挥。正如同志们唱的那样：“同志们呀加油干，一直打到东海边”。这就拉开了开辟黄海之滨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六）

使我难忘的是1940年11月7日那一天。

上午10时左右，在海安中坝北面串场河码头上，陈毅、粟裕同志和党政军机关干部、战士正热烈欢迎刘少奇、黄克诚等同志的到来。那一天，既是苏联伟大的十月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又是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成立1周年纪念日。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刘、黄、陈、粟几位首长聚会于海安，更增添了喜庆气氛。

首长乘坐的“怡丰”轮，拉着长长的汽笛，刚在码头边停靠。

陈毅等同志就热情走向舱口，和少奇、克诚同志等紧紧握手。看着这激动人心的会师场面，我的眼眶涌出了泪水。码头周围弥漫着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少奇同志面容清瘦，但神采奕奕，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乡音，跟我们一一握手问候。他虽然只有40来岁，但鬓发中已有根根银丝。克诚同志身材修长，戴着近视眼镜，颇有儒将风度。

当天下午，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粟裕同志主持会议，陈毅同志致了欢迎词。在会上，少奇同志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演。他的热情讲话，使整个会场自始至终沉浸在胜利会师的激奋之中。

少奇同志临时住在由“中山堂”改成的海安区公所会议室。这小小的四合院还算素雅宁静。刚安顿下来，他就开始了忙碌，紧张的工作。

一天，他在住所听完我对苏北区党委的工作汇报，即对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等问题，作了很重要的指示。他说，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逆流，投降与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局部反共内战随时有爆发的可能。所以，苏北部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建设虽初具规模，但还要作进一步的扩大和发展，以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发展，抵抗日寇、汉奸及顽固派对我的围攻，迅速建立和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坚持敌后斗争，抑制时局逆转。少奇同志还提出，可以考虑建立军政党委员会来统一军队和地方党政工作的领导。

在谈到政权工作时，少奇同志说，新四军、八路军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我们应该努力宣传、发动各阶层人民积极起来参政，担负起政府的工作，为国家民族利益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这样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

少奇同志的教诲，使我至今难忘。那次谈话后，他还吩咐秘书刘彬同志，将随身带来的许多文件、文稿拿给我看。并说，搞地方党工作的负责同志，首先应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高度，理解和掌握有关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系列政策。刘彬同志给我看的有《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问题》、《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等几本少奇同志写的小册子，以及有关中央文件，我结合自己的实践和体会，对如何建设解放区，特别对彭德怀、杨尚昆同志领导的华北解放区的实践经验，有了较深的了解。我觉得少奇同志的许多见解是非常难得、极其宝贵的。事实上，它对日后苏中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都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导作用。

我们初到苏北时，由于把主要精力都用在武装斗争与统一战线方面，还不太懂得如何收税、征粮。记得在皖南时，部队领国民党政府的粮饷，是不必自行征税、征粮的。总之，我们熟悉的，就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用没收富豪钱财解决红军游击队的粮饷、给养。对抗日战争中的经济政策，既缺乏了解，也无实践经验。身在鱼米之乡，却吃了一年多的苞谷、大麦，因一时不适应，许多同志把肠胃都搞坏了，我也常拉肚子。其实在苏北根据地，大部地区都产大米。后来随着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深入发展，普遍建立了政权，有了民政、司法、税收、征粮等办事机构，部队和机关吃饭、给养等问题，也就顺利解决了。

(七)

11月中旬，在海安镇召开有14个县代表参加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宣布成立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这个会议是建立苏北

根据地抗日政权的标志,也是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组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标志。会上,少奇同志作了题为《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详尽阐述了我党提出的抗日民主施政纲领。他指出:要坚持抗战,就必须广泛宣传、发动、组织群众,依靠群众;联合一切爱国力量;实行民主政治;建立三三制政权;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开展二五减租;大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肃清贪污盗窃行为,提倡廉洁奉公的作风。会上各界人士纷纷发言,表示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对刘少奇同志的报告更是赞誉不止。

少奇同志在海安的时间不长,但他还在繁忙中抽空视察了部队和指挥部、政治部、区党委各机关,亲切地进行慰问,了解同志们的工作情况。在区党委机关的一次集会上,少奇同志又一次对我讲根据地政权工作的重要性,他打比喻说,没有根据地,好比没有家,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坚持不下去的。根据地的建立,军队是支柱,此外就是政权和党的建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了军队和政权,我们就一定能取得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在少奇同志即将离开海安时,党中央同意了他的建议,批准成立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总指挥叶挺同志,代总指挥为陈毅同志,政委刘少奇同志,参谋长赖传珠同志。从此整个华中大根据地的军事指挥就统一起来了。这个任命传达后,同志们欢欣鼓舞之余,又有点依依难舍之情,那是因为总指挥部设在距海安300多里外的盐城,与我们朝夕相处的老首长也将与少奇同志联袂赴任,与我们分别了。

当时,蒋介石、顾祝同、韩德勤都害怕新四军与八路军打成一片,使共产党控制的苏南、苏北,又与鲁、皖相连。他们朝思暮想的是消灭我们,或至少要让陈、粟大军滞留在通如靖泰一隅之

地，发展余地不大，久而自灭。陈毅同志离去，正是革命大局的需要，工作有大发展的朕兆，这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但从个人的感情上说，我从十几岁起就跟随他一道工作，无论如何也难以排遣离情别绪。

那天，我去韩公馆南厢小院与陈毅、张茜同志话别，张茜同志正在打点行装。靠南窗的红木书桌上放着陈毅同志题赠少奇、克诚同志的一首七绝。时间是1940年11月7日。题目是《与八路军南下部队会师，同志中有十年不见者》：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陈毅同志见我不象往日一样有说有笑，便语重心长地说：“怎么啦，不会想不通吧？我们近几年不常见面，现在又要与你这位老战友暂时分手了。阿丕，说心里话，我真有点舍不得啊！”接着又说：“现在可比1936年冬梅岭被困写《梅岭三章》时要好得多啊。如今革命形势朝更有利的方向发展，我这个司令员也是一个棋子，革命需要把我放在哪里就得去哪里。我们的分别是暂时的，不久定会再见。不说什么伤感话吧。韩紫老借给我的一副云南子还在这里，我们下盘围棋吧。最近我对执黑走星位小飞挂角这一着，又有新的创造，正想实践一下，以后就怕更不得闲暇了。”

在当时，我的阅历尚少，有些重大问题处理起来还需要手把手地指点。实际上，渡江以后，接二连三碰到过许多重大决策，首长们都给我做出了示范和榜样。我有个总的体会：自己的思想要跟上形势的转变和发展，就得努力学习，提高马列主义水平，遇事多独立思考，多向同志们请教。

第六节 新的斗争在后头

(一)

少奇、陈毅等同志北上后，长期、艰巨的全面开辟苏中解放区的工作，就压在留下来的同志肩上了。起初我们对形势的估计还是比较乐观的，以为眼下还比较平静，可是形势发展却出乎预料。我们很快就觉察到，国民党顽固派根本不想放下屠刀，愈是遭到惨败，反共气焰愈加嚣张，蓄意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以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名义，致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新四军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诬蔑坚持华中抗战的新四军和八路军“破坏团结，破坏抗战”，强令新四军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此后，又以汤恩伯、李品仙等30万大军压向华中，李品仙叫嚣要我“交还”整个皖东；韩德勤则乘机要新四军“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在反共喧嚣声中，国民党顽固派调兵遣将，又公开声言增援苏北，在皖东一带麇集了大批军队。打头阵的7个团，占领我津浦路西中心区周家岗、界牌集等地；东北军第一一二师霍守义部从山东南下，进至淮阴以东苏家嘴一带；韩德勤会同一一二师先后攻占风谷村、益林、东沟等地，大有继续扩张之势。

针对这一形势，党中央于11月下旬发出了《关于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的指示》，号召“八路军、新四军的一切抗日根据

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同时要准备应付任何严重的反共战争，必须准备粉碎日军与亲日派联合夹击的阴谋。”

为了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的疯狂进攻，保卫华中抗日根据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及中原局，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集中兵力，发起曹甸战役，坚决歼灭兴化、曹甸一带韩德勤残部，以求彻底解决苏北问题。

我投入的兵力为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一、第二纵队及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计10个主力团，分三路由东向西逐次攻击前进，相继攻占了宋庄、蒋营、陶家林等据点，并完成了对安丰、曹甸、平桥等地的包围。

我遵照陈毅同志的电报指示，与管文蔚同志率地方武装3个团，扼守兴化至东台一线，以防扬州、南通日军出动威胁我攻击部队之侧背，保证后方安全。

曹甸战役历时18天，歼顽固派军队8千余人，给顽军以沉重的打击，缩小了他们的反共阵地。新四军、八路军各参战部队，也在沟河纵横、水网密布的复杂地形下，经历了一次新的战斗实践。

不久苏北区党委和苏北临时委员会等机关进驻东台。屈指数来，东台已解放了两个月，韩德勤一度把持的苏鲁战区副总司令指挥部早已西窜；国民党东台县政府也迁避于泰县溱潼镇。我军一进东台，即着手建立抗日民主县政权，任命彭冰山同志为县长；成立党的城区工委，由戴为然同志担任书记。为加强城区治安保卫工作，还成立了公安局，由陈伟达同志担任局长。然而，区、乡一级的基层政权，当时还大部分在原国民党人员的手中。

第一次解放东台，实际上只控制了范公堤以东地区及堤西靠近县城的一些地方，东台以西仍属国民党势力范围。顽固派

张星炳的保安第三旅，在东台、兴化、泰县边区活动；国民党东台县政府竟然能发传票到我军驻地，传人去溱潼出席民刑案件的审判；城里还残留着国民党财政部的两淮盐务管理局，原班人马还照常工作，辖有武装盐警 2 千余人，分散各处。

在这样的环境中，斗争尖锐复杂，工作极为艰巨。

(二)

1941 年元旦刚过，我正与李华楷等同志在兴化东乡的戴窑镇召开兴化县委成立会议，研究开辟工作，忽然接到总指挥部电报，通知粟裕、管文蔚、叶飞同志和我立即赴盐城参加会议。

当时华中总指挥部设在盐城南门附近的文庙，我们住宿在城北一所中学内（现为盐城中学）。各地党政军负责人陆续赶到，自抗战爆发以来很少见面的老同志、老战友，共聚一堂，十分兴奋。傍晚，我冒着寒风去看望陈毅同志。天气很冷，我穿着新发的棉军大衣，还略有寒意。

近两个月不见，陈毅同志消瘦多了，但他两眼依然炯炯有神，儒雅中透露出一种威严感，使我感到熟悉而亲切。陈毅同志告诉我，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已经奉命北移，目前正值反共逆流喧嚣尘上，国民党顽固派早就想对我下手了，看来免不了又有一场拚杀，凶吉未卜。看得出，陈毅同志很为军部的安全担心。在军部，有数以千计从红军时期坚持和保存下来、久经考验的党的骨干，那是党的宝贵财富啊！

震撼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1941 年 1 月 7 日，叶挺、项英等同志率军部及直属队 9 千余人，遵命北移至太平、泾县间的茂林时，遭到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部 7 个师的围攻。面对数倍于我的顽军的突袭，我军激战终日，处境十分险恶。听到

这消息，正在开会的同志们都感到无比惊骇。我们预感中的忧虑，现在终于成了事实。霎时间，群情激愤，连一些平素比较坚强、身经百战的老同志，此刻也禁不住默默地流泪。许多同志请求带兵开赴皖南，与顾祝同一战……

这次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原打算进一步讨论组织华中机动突击兵团和苏北各部队主力统一整编问题，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使会议议题和内容都作了重大改变。

正当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峰之时，也就是军部被围、浴血奋战的第5天，日寇好象应顽固派之请似的，出动数十架次飞机，连续轰炸东台、盐城等地。

那天刚吃过午饭，日军16架轰炸机由东台方向飞来，对华中总指挥部驻地盐城狂轰滥炸。敌机在我们会场所在地的中学校园内，连续不断扔炸弹，轮番俯冲扫射。学校的教室被炸倒了几幢。幸好防空警报响后，我们迅速分散，有的隐蔽在校园内，有的转移到旧城墙脚下的防空壕里，未造成重大伤亡。当敌机袭击文庙时，少奇、陈毅同志都在庙堂改建的总指挥部办公室内，焦急地等待着皖南和延安的电报，未及作隐蔽，竟被炸弹掀起的泥土溅了一身。总指挥部院子里，有一名炊事员被弹片击中牺牲，房屋也有损坏。

西门登瀛桥附近的民船，被炸弹炸毁数艘，死伤百姓10余人。日寇的空袭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野蛮的轰炸扫射，给这座苏北名城留下了严重的战争创伤，更激起各界群众对民族敌人的无比愤慨。

为了避免敌机的袭扰，我们及时转移至盐城乡间仓头，会议又继续开了几天。皖南事变的消息，迅速在苏北党政军和各界人士中迅速传开，引起强烈的义愤和巨大的悲痛。我党对国民党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采取了坚决回击的方针。党中央和军

委发言人先后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报道了他们的血腥罪行，指出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是为了勾结日伪实行联合“剿共”；制造事变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新四军，破坏抗日战争。

皖南事变激起了国内外反战爱国人士的愤怒声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题词，并挥笔作诗道：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在香港的进步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也致电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要求“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从后来收到的情报得知，皖南军部及直属队 9 千余人，除傅秋涛、江渭清等同志率 2 千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北伐名将、抗日英雄叶挺军长，在奉命与国民党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同志、副参谋长周子昆同志，突围后又惨遭叛徒杀害；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同志突围时负重伤，含恨自尽。这是抗战期间，我党武装力量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如此精锐的部队，竟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所摧残，实在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在盐城开会期间，少奇和陈毅同志多次谈到，广大指战员、干部、群众要求为皖南死难烈士复仇，其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大敌当前，我们的行动必须完全听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要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不能以感情代替方针、政策，作出鲁莽、轻率的举动。少奇、陈毅同志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首先保持沉着、冷静，注意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按照中央的指示进行

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少奇同志还向各战略区负责同志宣布，总指挥部已向党中央报告了目前华中工作的部署，准备在盐城重建新四军新军部，由陈毅同志任代理军长。战略区成立师建制，下辖旅、团。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在整个华中大根据地内实行小省制区域划分，各战略区内建立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下设地委和专署，以及县、区、乡、村政权机构。这样，各根据地既可以在日伪和顽固派的围剿、分割中，独立自主地坚持原地斗争，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也便于相互支援、相互配合。少奇同志还就各地新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人选问题，分别征求了同志们的意见。

1月20日，党中央电报指示：以刘少奇同志为新四军军分会书记；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同志任书记。同日，中央军委发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刘少奇同志为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命令下达后，华中全党、全军上下一致拥护。

(三)

我们回到东台不久，新军部定于25日在盐城隆重举行成立大会。在28日的《江淮日报》上，我读到陈毅代军长的就职通电：“事变后重庆军委会当局，即于17日下令取消本军番号，诬本军为叛军；将叶军长交军法审判；令汤恩伯、李品仙统率大军向苏、皖、鄂、豫本军作更大规模之进攻。内战业已开始爆发，分裂已难避免，皖南事变为重庆当局一手造成，其主旨在反共投降，实现中日联合剿共，断送全民族之抗战胜利，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盖无疑义矣。……时至今日，言纲纪军令，言抗战合作，言国法天理，重庆当局已自失主持中枢的风度，上无道揆，

下无法守，国将不国，3年来敌寇重创之余，其快意固无如此时者矣。……1月20日，应本军将士之推选，本人就任代理军长，克日于苏北盐城恢复军部，统率全军9万之众，誓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奋斗到底；本军事已至诚，推行革命三民主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方针，绝不因皖南事变及反共投降派之大举进攻，而放弃抗日救国之神圣职责。急盼全国抗战党派，全国抗战将士，各界同胞，与本军团结一起，为解放中华民族而共同奋斗！本军一息尚存，斯志不容稍懈，敬此宣言。”

新军部成立后，根据党中央指示，将全军扩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活动于苏中地区的原苏北指挥部所属部队编为新四军第一师；所属第一、第二、第三纵队编为第一、二、三旅。活动于苏北盐阜、淮海地区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编为新四军第三师；所属第一、第二、第三支队改编为七、八、九旅。活动于苏南地区的部队及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编为新四军第六师，辖十六、十八旅。除苏北、苏中外，二师活动于淮南地区；四师活动于淮北地区；五师活动于鄂豫皖边区；七师活动于皖中地区。

军部、华中局根据皖南事变后的形势，认为华中地区敌顽我之间的三角斗争将是长期的，任何一方要把另一方消灭或赶走，都难以做到。据此确定今后的总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事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日寇、伪军、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一俟条件成熟即向西、向南发展。”各战略区的具体任务有：“第二、第四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方防御；第五师独立坚持鄂豫皖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打通与第七师的联系；第七师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第二、第五、第六师的联系；第六师坚持苏南，阻止反共军北渡。”第一、第三师则坚持苏中、苏北，建设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强大的地方武装，

以便机动作战。至此，华中新的战略布局形成。

(四)

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逆流之际，日伪也不断对我华中各根据地加紧扫荡，企图达到顽固派在皖南事变中未完成的消灭共产党、新四军的险恶目的。为进攻我苏中根据地，日军将原驻苏南镇江地区的第十二混成旅团南浦部调到苏北沿江和运河一带，约2千余人，并配有海军炮艇部队几个大队，妄图围歼新四军一师主力，并胁迫和掩护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投降。

1月11日，日伪军数千人侵占黄桥，继而又向黄桥以南地区进逼，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扫荡”。这是刚创建的苏中根据地政权，面临的第一次严峻考验。正当敌人疯狂进攻时，退守曹甸一隅的韩德勤也蠢蠢欲动，在李品仙、顾祝同的怂恿下，不断在我根据地边沿地区进行骚扰。

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副总指挥李长江率其所部7千余人，在泰州公开投敌后，成了汪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总指挥李明扬态度暧昧，率千余人离开泰州，用原番号活动于城庄唐家甸子。二李间藕断丝连，暗中继续往来。同时，国民党驻泰州一带的地方武装张松山、李化南、顾凤山、陈正才、祁沛霖、刘东元、肖君恺等人纷纷率部投降日寇，充当汉奸伪军。一时间，国民党顽固派和杂牌军投敌成风，形势迅速逆转，出现了空前严重的局面。

根据党中央指示，盐城军部及华中局当机立断，决心以针锋相对的军事行动，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势力，粉碎日伪对我苏中根据地的大规模进攻。

2月18日，代军长陈毅、政治委员刘少奇同志发布了《讨

伐李逆长江命令》：“查前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于本月12日率部投降叛国殃民，并通电就任伪第一集团军之总司令职，配合敌寇向海安、兴化进攻，为虎作伥。本军为坚持抗战，保卫苏北，决予讨伐该逆。兹特任命本军苏北指挥官粟裕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仰即遵照迅率所部歼灭李逆为要。”

这时，陈毅同志由盐城奔赴曲塘邓家庄一带坐镇，亲自用电话指挥该战役，给一师指战员极大鼓舞。

接到命令，隐蔽集结于海安以西的参战部队便迅速出动，沿海泰公路向西出击，连克姜堰、石家埭、苏陈庄、塘湾等地。12日晨，攻克泰州，俘李逆伪军3千余人枪，取得重大胜利。日军为救援走卒，发动了第二次大“扫荡”。屯驻扬州、高邮、黄桥、如皋等地之敌同时出动，侵占我海安、东台、曲塘、安丰、姜堰等城镇，“扫荡”如皋以东之掘港、马塘等地。其一部向泰州城进逼，企图从侧后袭击我军主力。我主动撤离泰州后，参战部队转入敌后广大农村，开展灵活的反扫荡战斗。由于皖南事变我军受损，苏中地区国民党军队纷纷投降日寇，加上日军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扫荡”，许多重要城镇陷于敌手。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革命队伍中个别患有“软骨病”、“动摇症”的人思想产生了变化。泰兴县县长张某就是个典型，他在敌人的进攻面前临阵脱逃，造成极坏的政治影响，致使部分原来靠拢我们的中间分子，此时情绪也低沉下来。毫无疑问，个别党员、干部的逃跑、叛变是十分可耻的，但革命如大浪淘沙，艰苦的斗争环境会使我们的队伍锻炼得更加纯洁、坚强。

记得黄桥失守不久，陈毅同志找我谈话，要我以苏北区党委的名义，起草《关于粉碎敌人扫荡的指示》。文件写好后，陈毅同志亲笔作了修改，并要求将文件传达到每个党支部、党小组、每

个党员，坚决贯彻执行。文件中提到，要“巩固群众胜利信心，解释黄桥失守原因，打击反共派的造谣污蔑，号召各党各派、各界人士团结一致，苏北全体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保卫根据地，保卫民主政权，保卫乡土，保卫自家生命财产，反对敌人的扫荡，反对反共派趁火打劫，从反扫荡斗争中巩固壮大苏北根据地的基层。在党内、政权机关内，坚决反对惊惶失措、动摇逃跑现象，指出反扫荡斗争是对共产党员、革命战士最好的锻炼。”

讨伐伪军李长江部的战役开始后，当地的日本驻军最高指挥官第十二混成旅旅长南浦，调动部队分南北两路包抄、夹击我党政军首脑机关驻地东台。敌人凭借其水陆交通工具的优势，一路先乘汽艇侵入兴化，后东犯台北（今大丰县）西团，切断我北与盐城军部的联系；另一路由如皋出动，沿通榆公路北窜，占海安、富安、安丰，直逼东台。

由于事先掌握情报，我亲自向直属机关和特务营的同志作反扫荡的动员，提前一周作好了撤退的准备工作。2月21日晚间，日伪军侵占东台城，我们已安全撤至黄海边的三仓、许河一带，后又向东南方移动，进入泰东县（今东台、海安、如皋三县交界处）唐洋、李堡一线。抗日战争进入敌我相持阶段后，苏中地区党的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可以说是从撤出东台开始的。而当我们转入农村后，日伪便暂时停止了扫荡，在其占领区内加紧构筑据点，这使我们能够相对稳定地进行准备。

3月中旬，华中局宣布撤销原苏北区党委，成立苏中区党委，由一师政委刘炎同志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战争时期流动性较大，一些担任部队要职的常委、委员不能经常参加会议，讨论工作，只有遇到重大问题时，才召集各位负责同志都来参加会议，共同讨论，作出决议。

同时，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撤销，正式成立苏中区行政委员

会，由管文蔚同志担任委员会主任兼苏中区行政公署主任。苏中行政区内，又划分成几个小行政区。军部还宣布成立苏中地区地方武装的指挥机关——新四军苏中军区，由一师师部兼。

上级明确划定苏中区的范围：东台、宝应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东、黄海以西，面积为2万余平方公里。当时，我们控制的区域约占40%左右；日伪占领区占30%左右，友军（即国民党军队）占4%左右；游击区占20%左右。苏中解放区人口约800万，其中我控制的地区约500余万人；敌占区约200余万人；国民党统治区约40万人。

从苏中当时敌伪、顽、我各占区域和人口的比重，可以看出“三角斗争”虽依然存在，但形势已起了明显的变化。正如2月20日少奇、陈毅同志写给粟裕、刘炎、管文蔚同志和我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过去顽固派集中力量对我进攻，使我不能集中力量抗敌，现在由三角斗争主要形势变为两角斗争形势了。因此，反对敌人和汉奸伪化苏北，保卫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成为你们及苏北人民目前唯一的直接任务。”“这是更简单、更直接、更严重的抗日任务。”更具体地说，工作方针应是：“一切为了开展群众工作，坚持游击战争，培养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

苏中区党政军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后，随即在通如海启地区成立了苏中四地委（南通中心县委撤销）、四专署、四分区；在靖泰泰如地区成立了苏中三地委（泰兴中心县委撤销）、三专署、三分区。再在江高宝地区及兴东泰地区，分别建立苏中一地委、一专署、一分区和苏中二地委、二专署、二分区。这样，在苏中根据地范围内，划成4个小行政区，加上“联抗”地区，更有利于我在日伪扫荡、清剿、分割的复杂形势下，坚持原地斗争。

苏中根据地总的局面打开了，但各个地区的开辟和建设工作，发展是不平衡的。黄桥战役前后，三分区县区的开辟、建设

工作已初具规模，党、政、军、群及地方武装等工作都有较好的基础。海安会师后，陶勇、刘先胜同志率部继续东进，又打开了通如海启局面。随之，一二分区的开辟、建设，也逐步开展起来了。

4月间，在泰东县浒零镇召开的苏中军政党扩大会议结束后，我即沿海堤一路北上，到东台、台北（1942年7月正式划县）、兴化等县检查工作。

在刘庄，我向兴化县的负责同志传达了苏中军政党扩大会议精神，要求抓紧开展群众运动，在夏收中实行二五减租减息，尤其是在我中心区，要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在各区、乡级农抗会基础上，迅速建立起县农抗组织。据初步统计，全苏中区参加农抗会的会员目前已达9万5千余人。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或正在组织起来，参加各项抗日保家工作，在各种抗日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赎田、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等斗争。群众参政、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标志着民主政治日益加强，这样，根据地的巩固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5月初，农历立夏前后，苏中区党委在泰东县李堡，召开了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进一步讨论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统一战线、政权建设以及加强县区地方武装等问题。参加会议的各地负责同志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表示要坚决执行华中局和军部的指示，不失时机地用大刀阔斧的方式开辟新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当时普遍的反应是地方干部不够用，远远跟不上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全苏中已有近百万群众参加“双减”运动，亟需大批能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土生土长、有斗争经验的骨干分子。客观形势要求我们运用各种形式，壮大干部队伍，尤其是加强对当地干部的训练和培养。

(五)

记得那年讨李战役结束后，陈毅同志返回盐城军部前，找到泰东的唐洋去谈了一次话。他指出，苏中的抗战局面虽已初步打开，但全面开辟解放区的工作仍是长期艰巨的任务。各级领导干部对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务必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对开辟泰东地区十分关心和重视。他指示：“李堡、拼茶一带，目前已是一师部队的后方基地，与北边的（台北）大中集连成一片，是块较大的根据地，大力发动群众，搞好统一战线，发展武装力量，建立、健全‘三三制’政权，建设和巩固该地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又说：“领导干部应该亲自抓一两个点的工作，总结出成功的经验来，可以指导和推动全局。”

根据地工作重心由城镇转入农村，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也一度驻在泰东地区，这使我对开辟泰东有了较多具体的实践。当时泰县的县委副书记杨源时同志、组织部副部长于晶等同志分工搞泰东的工作，我找他们共同研究过开展工作的具体计划，拟在拼茶、李堡、唐洋三个区试点，为深入发动群众，并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将泰东原分县委和行署（当时是泰县的派出机构）撤销，正式建立独立的县建制，由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直接领导。不久，泰东县委成立，调陈扬同志任书记，董希白同志经过民主选举担任抗日民主政府的首任县长，下辖拼茶、李堡、立发、角斜、唐洋五个区。

5月间，在腰灶乡一所小学里，召开了泰东县首届临时参政会，100多位参政员聚集一堂，共同商议国事、政事。苏中行署民政处长宋日昌同志到会祝贺并讲话，阐明我党各项民主政策，特别是对改善工农生活等政策，得到参政员们的热烈的拥护，取

得很好的效果。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政府关于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法令。

起初，各区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区长，随着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遵照“三三制”原则，让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担任区、乡级的领导职务。这在当时是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成果之一，团结了一大批当地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解放区的建设。

在抗日民主的县、区政权领导下，泰东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如筹款征粮、减租减息、救济灾荒、修堤修闸、开办教育、扩充武装、镇压封建刀会、反敌扫荡等等，都做出了很大成绩，使该地区成了苏中军民坚持敌后抗战的可靠后方。

6月中旬，华中局、军部给区党委的指示中指出，江都、高邮、宝应三县是华中新四军在苏北和江淮地区的结合部，是我一师与二师、三师乃至四师的联接点。为打破日伪对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战略区的分割，眼下即着手开辟该区域很有必要。并提到，惠浴宇同志（当时任泰县党政军负责人）原在江都工作过，情况熟悉，建议派他率一批干部及一支精干小部队负责这项工作。

说是开辟江高宝，其实江都县的工作主要还属恢复性质；高邮和宝应两县当时是“伪化区”、“同情区”，有待于从头开辟。自李长江公开投敌后，我们在原有基础上，恢复了江都县委和县政府机关，由一直在原地秘密坚持的张雷平同志负责。但活动的范围狭小，仅局限于通扬运河以南的几个区。

接到上级命令后，惠浴宇同志带了一批干部，随同前去的还有一旅汪启祥和张孤梅同志率领的一个主力营。他们一到，就在原江都党政领导班子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江高中心县委和政权机关江高行署。这就是苏中一地委和一专署的前身。同时成

立的还有江高独立团，由谢友才同志任团长，张孤梅同志任政委。

江都河南沿江地带，早在1939年就是我党我军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桥头堡，原先的工作很有基础，如今老部队回来，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恢复老区，开辟新区，进展十分顺利。沿扬泰公路向北，很快就恢复了郭村以北的麻村、麾村、小纪、樊川等附近地区；并开辟了纪北及汉留等新区。在新辟地区，抗日民主政权公开颁布法令，建立税收制度，用累进制办法征收地方税收及公粮，抵制或取消了日伪顽的苛捐杂税，既有效地保护了当地群众的切身利益，又保障了抗日队伍的供给。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新组建的江高独立团连续向驻扎于永安镇、乔墅镇、樊川镇等地的日伪军据点发起攻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气焰，振奋鼓舞了江高地区民众抗战的信心。

当年10月，原先在苏南东路地区活动的新四军六师十八旅，奉军部之命由江渭清、温玉成、夏光同志率领，北渡进入江高宝地区，大大加强了该地区的武装力量。不久，苏中一地委、一专署、一分区（十八旅兼）即正式成立。这时，华中几个战略区终于连成一片，苏中战略区自身也健全起来了。

在根据地，我所到之处亲眼看到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农抗会、妇抗会等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三三制”政权普遍建立；新四军与老百姓的骨肉情谊，使我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与喜悦。“江淮河汉今谁属？”我说，属于中国共产党和铁的新四军，属于千百万抗日救亡的人民群众。我也深深感到，党中央领导的英明、正确；华中地区有刘少奇、陈毅同志掌舵令人宽心、鼓舞。

第二章 全面建设苏中解放区

第一节 夏季反“扫荡”斗争

(一)

1941年和1942年,是苏中根据地从开辟、巩固到进入全面抗战和全面建设的阶段,是苏中根据地在建设中巩固,在斗争中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这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惊心动魄的事件层出不穷。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希特勒的军队肆意横行,席卷了整个欧洲,先后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法国、希腊、南斯拉夫等国。1941年6月,希特勒挥戈东指,大举进犯苏联,铁蹄到处,苏联许多大城市纷纷陷落,德军直逼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与此相呼应,日本不宣而战,袭击珍珠港美国海军基地,同时进攻美国、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日本企图从中日战争的泥沼中解脱出来,并把沦陷的中国大地作为它的战略后方,对国民党顽固派采取了以政治进攻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国民党顽固派在日本侵略者的怂恿

下,公然打出“曲线救国”的幌子,指令大批军队投降日本,参加伪军者达50万人,占伪军80万人的62%。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大批投敌,高级将领投敌竟达达58人。同时,日军、伪军又勾结国民党顽固派,向我华北、华中、中条山、浙赣等根据地不断发动进攻,实行扫荡。

在敌伪和国民党顽固派夹击下,八路军由1940年的40万人,减少到1941年的30万3千人;抗日根据地的面积也缩小了,人口由一亿降到5千万。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1941年6月,骄阳当空,暑气蒸人。江淮流域特有的“阴雨绵绵无尽期”的季节刚过去,转眼又热得连一身单军装也穿不住。苏中区党委、行署和一师师部都驻扎在泰东、耕茶、浒零一带乡间。黄昏时分,警卫战士们爱在附近的沟河、池塘里洗澡。有时,粟裕同志也拿条毛巾约我同去水塘边擦擦身子,驱除整天忙碌的疲劳,顺便扯扯工作。写到这里,我又不禁想起那时跟粟裕同志生活在一起的情景。那时候,他担任一师师长和苏中军区司令员(后又兼区党委书记)重任。他有指挥大部队作战的高超艺术和卓越才能,他那临危不惧、遇难不乱的坚韧沉着、果敢机敏、指挥若定的性格和远见卓识,使我十分钦佩和敬仰。我与他相处整整一年,从他身上学习到了许多宝贵的东西。

北渡长江以来,365个日日夜夜过去了。共产党、新四军和苏中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经过艰苦奋战,终于创建了一块有万余平方公里、500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这是多么伟大的历史进程呀!作为区党委领导人,我又深深感到自己肩负的担子很沉重,更觉得只有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才能建设、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推动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

经过两次“扫荡”与反“扫荡”,敌我斗争形势愈益严峻。我

们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动群众，抗击日伪的“扫荡”，这样，才能坚持长期抗战，保卫根据地。

4月间，我军连续作战半月，攻克泰州和靖江地区的古溪等5个日伪据点。令人兴奋的是4月17日，在泰兴以东的姚家岱战斗中，击毙日军泰兴城防司令以下20余人，生俘日军3人，开创了苏中地区生俘日寇的记录。

我沉浸在刚刚过去的战斗记忆中，值班机要员打断了我的思绪，送来军部和华中局连夜发出的紧急敌情通报。通报说，7月17日起，东台、兴化、射阳镇、陈家洋各地之敌均增至千余，敌酋南浦已抵东台；20日，射阳之敌北犯（建湖县）蒋营、盖林镇，旋占领建阳镇；东台北犯之敌，一路已占领白驹并进至刘庄以南10余里；另一路进占东台以东之四灶及三仓河以西之小八灶；（射阳县）陈家洋之敌也有进攻（建湖县）的动向。据此情报，敌集中力量大举“扫荡”盐城地区已很明显。对敌企图夹击盐城的部署，一师二旅应负责打击由东台北进之敌，务必歼灭或击溃，始能改变战局。如敌已北犯，应尾击直至盐城附近。

看来，近5个月根据地相对稳定时期已告一段落，反击日伪“大扫荡”的阶段开始了。盐城是我华中军事、政治中心，现在敌人集中兵力，企图从各个方面夹击我军部和华中局驻地，这无疑是对我党政军民的挑战，我应准备进行反扫荡的紧急动员。我预感到敌人此番进攻的规模，必将超过今年初春的两次大扫荡，初创的根据地又面临着新的考验。苏中区怎么办？看完敌情通报，我焦灼地期望与粟裕同志商讨对策。

次日清晨，粟裕同志派参谋通知我参加紧急会议，地点临时定在师部驻地的作战室。在那间不大的砖瓦结构的屋子里，军用地图几乎挂满了整片西墙，敌我态势的标记已经一一注出，可以想象得到，粟裕同志和作战参谋们又辛苦了一夜。

赶到作战室时，粟裕和刘炎同志都在。我汇报了昨夜反复思考过的想法，他俩都表示赞同，认为很有必要以区党委名义，立即向各地委、县委发指示信，要求各级党政军机关对反“扫荡”斗争作出具体部署。师部和军区也同时向各部队发出相应指示，积极配合苏北地区反“扫荡”斗争。

军事形势是很险恶的，日军以十五师团、十七师团及十一旅团各一部，接替了十二混成旅南浦部在长江北岸、运河沿线各据点的守备任务，由南浦亲率所部2千余日军及伪军杨仲华、李长江等部共约3万余兵力，正向盐城合围，与我军部直属部队、三师黄克诚部及一师二旅王必成部接上了火。敌人此次对我解放区的扫荡，意在配合当时希特勒德国在欧洲的进攻，是其扩大侵略战争的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

华中局和军部提出了保卫盐城，保卫根据地，粉碎敌人“扫荡”的政治口号，要求全体军民投入到反“扫荡”斗争中去。刘、陈、赖（传珠）首长指示，一师部队（除二旅外）在苏中地区选择适当时机，发动猛烈攻势，向海（安）泰（州）线、南（通）如（皋）线及海安至东台间各据点进击，广泛开展游击战，钳制敌伪，策应苏北反扫荡斗争。这个部署，正与我们的意见完全吻合。

苏中根据地党政军民遵照上级指示，积极行动起来了。主力部队、各地方兵团及大批群众自卫武装组织，迅速地在苏中敌后全面发动攻势。自7月下旬起，围困了泰州、泰兴、姜堰等城镇；攻克了天星桥、孤山、黄桥、季家市、加力、古溪、金沙、马塘、石庄等敌伪重要据点，毙伤日伪军数千人；袭击或破坏了南通、如皋境内的许多据点，及东台至盐城的交通线，使敌人顾此失彼，陷入困境。进攻盐阜区之敌，终于在8月初被迫南撤。三师乘胜收复了阜宁、东沟、益林等地。日伪军北犯受挫后，于8月13日集中万余兵力转向苏中，进行空前规模的报复性大“扫

荡”，先后占领李堡、耕茶、掘港、马塘等近十座集镇，袭击党政机关，抢劫群众财物。我主力部队分散游击，勇歼日伪军；群众武装主动破路拆桥、运输担架，有力地配合主力进行反“扫荡”斗争。

在苏中、苏北军民的紧密配合下，历经43昼夜的第三次反“扫荡”斗争，作战130余次，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日军14名，伪军800余名，击伤击毁日军汽艇30余艘，终于取得了初步胜利。

(二)

在夏季反“扫荡”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回想起来，夏秋季节对我开展反“扫荡”斗争还是有利的。在广阔的江淮平原上，各类高杆植物形成了天然的青纱帐，主力兵团、民兵、游击队都可以随时凭借这些地形、地物、地貌，与日伪军周旋，跟他们捉迷藏。因此，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却注视着敌人的一举一动，敌人打不着我们，我们却能随时打击敌人。

从1941年到1942年，敌人“扫荡”频繁，整个苏北战火弥漫。苏中根据地几乎处处是前线，到处在打仗，各分区平均每半月就要遭敌人“扫荡”一次。1941年夏秋间，日军参加“扫荡”的人数增至1万多人，加上李长江、潘干臣、杨仲华等伪军3万余人，分兵7路合击盐城。敌人首先控制纵横交错的交通线，构筑碉堡据点，然后再从点、线扩展到“面”，把占据的地方一块块分割开。敌人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反复“梳篦”、“拉网”的战术“清剿”，又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以制造“无人区”。这种灭绝人性的残酷手段，有如蝗虫践踏庄稼一样。当地民众对

此恨之入骨，称日军为“黄狗”，称伪军为“二黄”。

敌人的凶残横暴激起苏中军民无比强烈的民族仇恨。新四军各部队以及民兵武装，在广大群众的有力支援下，全面开展了反扫荡斗争，运用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许多上层人士也挺身而出，表现出凛然的民族正气，如海安的韩国钧老先生一再拒绝敌伪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誓死不为敌伪所利用。

在对敌斗争中，记得有一则中秋节巧妙消灭日寇一个大队和伪军一个营的故事。当时我一师七团在南通北面的谢家渡，英勇地凫水抢夺了敌人派来增援的战船，那船上装满了弹药和援兵。船上敌人突然发现平静的河面上钻出密密麻麻的一片人头，持着刺刀冲到船边，有的吓得跳水，有的弃船逃走。跳水的淹死了，逃上岸的又遇到伏击。入夜，我七团战士，吹响嘹亮的冲锋号，喊着震耳的杀声，投出一束束手榴弹，冲进谢家渡，把惊魂未定的敌人吓得无处躲藏。敌人眼见被我团团围住，指挥官狗急跳墙，竟命令放火烧村子，逼着士兵往火里跳，以“武士道”的精神最后为天皇尽忠。我七团战士一面冲锋一面高喊：“陶麻袋！”（日语：站住）、“可密噜优待是噜！”（日语：缴枪不杀），但敌人已经烧死不少。我们活捉了3名俘虏，据供称，在大“扫荡”中横行于南通一带的日军大队长保田，也自焚在烈火中。

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我军有个营缴获了日式装备，日本枪、日本钢盔，小伙子们兴奋地穿戴着，不料竟和日军遭遇。我军抢先占领有利地形，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指挥官却一个劲地摆旗子，打旗语，表示是自己人，一面还“哇哩哇啦”高声喊话。我方战士不理他那一套，继续开火，把日军打得稀里哗啦。战士们一面打一面开心地叫道：“看啊，鬼子大白天在做梦哩！”日军遭到很大伤亡，那指挥官气急败坏，威逼士兵向前冲，待双方比较

接近，听见战壕里我军指战员的声音，才发觉又上了新四军的大当！

在反“扫荡”斗争中，类似谢家渡这样的战斗，还有泰兴姚家岱战斗、西高明庄战斗、芦港战斗、东台西团战斗、泰兴霍家庄战斗、盐城秦南仓、古殿堡战斗……这都是苏中军民英勇杀敌的光辉的记录。

(三)

这里，我想提一下苏中根据地的秘密交通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同志们，在抗日战争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艰苦岁月中，是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当年，苏中区的交通总站一直由区党委直接领导。总站通过秘密交通线，上可与华中局、军部以至延安联系；向下可与苏中各地委、县委以至区委联系；横向可与大江南北各战略区和上海党组织（江苏省委）联系。各分区设分站，各县有县站，中心区或区也都设有交通站。整个根据地内，象布满无形的蜘蛛网一样，结成一个秘密交通网络，即使是在敌伪“扫荡”、“清剿”、“清乡”的复杂艰难的环境下，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时，我们的情报、文件、报刊、物资、人员等等，都能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传来送去。担任交通员的同志，都是政治素质良好，对党的事业十分忠诚的人。由于工作需要，他们常用各种“合法”身份做掩护，所从事的工作又都经过专业技术训练。我们曾举办过多期“研究班”，组织交通员们学习各种秘密通讯技术。不难想象，敌人四出“扫荡”，我地方武装分散作战，却又缺少现代通讯设备，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信息传递四通八达的秘密通讯网络，怎么能及时传送情报，相互协同配合！

当时，泰东县是新成立的，“八·一三”后，连这个弹丸之地的

小县也被敌人分割成三块，各以范公堤、串场河为界。守在据点里的日伪军凭籍公路、河流、海堤构成封锁线，蚕食解放区，推行伪化，给我们的行动造成极大不便，相互间联系十分困难。为适应游击战环境，我们于年初就实行了“小省制”、“小县制”区划。后来在有些县还设立了分县委、行政办事处等副县级派出机构，以精干的领导班子，深入基层扎根群众，掌握游击武装，分散地相对独立地领导组织当地群众与日伪展开顽强斗争。反“扫荡”时，苏中的抗敌书店、报社、印刷厂和总抗会服务团一些同志都分散开来，坚持斗争。耕茶镇被敌人占领后，当地游击队就不断袭扰敌据点，搞得日伪不得安宁。每到傍晚，敌人就拉起吊桥，龟缩在炮楼里，不敢越雷池一步。夜幕降临后，整个镇子又成了游击队的天下，贴布告、散传单，警告伪职人员、镇压死硬汉奸……搞得热火朝天。

黄桥镇虽又陷入敌手，但镇郊的广大乡村，却仍然控制在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手中。在反“扫荡”中，黄桥地区群众武装斗争非常活跃，不时给敌伪以出其不意的袭击，使敌人防不胜防。敌人占领了城镇，但日伪军从不敢轻易走出据点，因为当地老百姓曾用镰刀砍死过单独行动的鬼子兵。每到夜间，敌伪据点里就紧张起来，怕民兵打枪、甩手榴弹。等到第二天天亮，据点周围的电话线被切断了，电线杆也被锯断了，公路被挖掘得百孔千疮，不能通车。由于敌人被我限制在据点里动弹不得，因此广大农村照常能开展减租减息、民众参政和以反“扫荡”斗争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及其它各项建设工作。日伪“扫荡”的破坏性虽然很大，但反“扫荡”斗争的胜利过程，也确实锻炼和教育了群众。

在反“扫荡”斗争中，这类英勇事例是很多很多的，可惜我不能一一回忆出来。

(四)

经过1941年夏季反“扫荡”斗争，苏中根据地之所以能粉碎敌伪野蛮疯狂的进攻，得到巩固与发展，主要是由于我们党抓紧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内有能征惯战的新四军主力一师及若干地方兵团，还有10多万民兵、自卫队武装，这是我们能战胜敌人的基本保证。如果没有他们的浴血奋战，苏中根据地是无法在平原水网地区开辟和建立的，当然更谈不上巩固和发展。

从夏季反“扫荡”斗争全过程来看，另一条值得总结的经验是，各级党组织紧紧地依靠和发动群众，围绕武装斗争来开展各项工作。根据地内10多万组织和武装起来的民兵、自卫队员，在对敌斗争中形成了卫国保家的一支强大力量，他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是敌人钻不出去的；他们手中的武器，也正是为敌人挖掘坟墓的工具。在整个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在共产党领导下，逐步完善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自卫队三者相结合的武装体制，这是新的斗争形势下的一个伟大创举。

为了巩固和发展反“扫荡”斗争的胜利成果，9月间，粟裕同志命令一旅参谋长张藩同志率二团一部组成“高宝挺进支队”向西发展，配合江高独立团进一步打开江、高、淮、宝地区的局面，拔除小纪、樊川、八字桥等敌人据点；又命令三旅参谋长梅嘉生同志率一部主力组成“南下支队”，开辟通海地区，击溃了当地伪军邱冠生部5个团，拔除了雁荡镇、通海坝等据点。

这一形势，正如粟裕同志当时向陈毅同志汇报中所说的那样：“此次敌扫荡时达月余，企图构筑据点，分割缩小我根据地之阴谋被粉碎了”；“敌伪虽占我城镇、点线地区，但我之根据地却愈益扩大与巩固起来”。

第二节 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

(一)

1941年春到1942年秋，苏中解放区百万农民投入减租减息运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1941年11月，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政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曾明确指示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应把农会放在第一位。”（《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少奇同志还提出：农民运动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通过“双减”运动，将广大农民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参加根据地各项建设，使党的组织得到巩固，使统一战线具有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

提起减租减息政策，现在的青年同志可能都不太了解，这里不妨顺便交代一下。这个政策是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外敌入侵，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为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土地政策，也就是一方面减租减息，一方面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1937年2月，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夕，我党为谋求与国民党合作抗战，在谈判中就提出了“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到了1937年8月，鉴于日本侵华战争已全面展开，我党更加明确地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第一次公开将我党抗战时期的土地政策称为“减租减息”。从没收地主的土地到实行减租减息，这在

政策和策略上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事后证明，党的这一政策在各根据地实施以后，获得了千百万农民的拥护，团结了各阶层人民共同抗敌。

我苏中根据地开辟稍晚，故减租减息运动直到1941年春才正式开展。这事一经提上议事日程，苏中农村的群众运动便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中心区，减租减息运动一展开，便调动起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并促进了根据地的党、政权、经济、武装等各方面工作的发展。

我在东南局工作时，学习过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文件，但缺乏实践的体会，认识比较肤浅、零碎。真正对“双减”政策认识有所提高，还是在海安见到少奇同志以后。那时，少奇同志经常找我们几个搞地方工作的同志谈话，有时好象是拉家常，介绍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经验，强调我党在抗战时期的各项政策的重要意义，其中就谈到在开辟、建设敌后根据地过程中要认真贯彻“双减”政策，通过减租减息运动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

少奇同志是很会做工作的。他耐心地、有针对性地向我们苏中主要负责同志阐述我党实行“双减”政策的道理。我印象较深的是，他反复说明减租减息政策与搞好统一战线之间的关系问题。

抗战期间，我党与一切愿意抗日的阶级、阶层，包括地主、士绅、商人等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在农村停止实行“打土豪，分田地”，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做法，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以缓和地主与农民的阶级矛盾，做到既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保障农民的人权和切身利益，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生产与抗日的积极性，而对赞成民主改革、拥护抗日的开明地主和士绅、商人，也应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联合他们一致抗日。党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的目的是，在于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依靠广大

农民,巩固统一战线。少奇同志反复强调说,关键就在于基本群众是否真正发动起来了。如果仅仅是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的统一战线,而不是广大基本群众通过共产党和地主、士绅、商人结成的统一战线,那还是没有力量,没有前途的。少奇同志还说,由于抗日时期国内阶级斗争的状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党暂时在农村采取逐步限制剥削的办法,以兼顾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用减租减息政策改善农民的生活,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才能确立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地位。

少奇同志特别提到,要注意改善贫苦农民的生活,我当时就有不少感触。自渡江以来,我一直比较注意体察农民的生活。苏中地区水网纵横,农、副、牧、渔都很齐全,盛产粮、棉、生猪、油料、盐、水产,其中棉花产量当时已居全国首位。苏北农村的生活条件虽然比不上苏南,但在全国范围内也称得上“鱼米之乡”了。可是,这里的老百姓一般生活都很贫苦,封建的压迫、剥削使广大农民喘不过气来。他们大多住在破烂不堪、低矮潮湿的茅棚里(当地人叫“丁头舍”,是“顶头舍”的谐音),进屋时要把腰部弯得很低才能进去。在这闻名全国的棉花产地,大多数农家冬天垫的是稻草、芦席;盖的是满布破洞的硬棉絮。大冷天许多农民衣衫单薄;衣不蔽体的孩子们露裸的小屁股蛋冻得发紫,看了令人心头发酸。种植粮食的农户,吃的是糠菜各半的“糝儿粥”。沿海烧盐的灶民更苦,常常靠“蒿子”(盐碱地上长的野草)充饥。每年春天,成群成群的农民扶老携幼,离乡背井,出外“逃荒”,遇到灾荒年份,常常饿死人。

农民贫苦的根子在于封建土地制度。苏中农村沿海地区土地特别集中,有些大地主竟占好几万亩土地。为数在千亩以上的地主,则更加普遍。贫苦农民世代代都是他们的佃户。苏中中部地区和运河两岸土地集中程度稍弱,中农、自耕农占多

数,但他们自己土地不够,仍租用一部分地主土地,实际上是佃中农,也受部分剥削。苏中地主的租额较高,如东县有个姓丛的大地主,他的庄园就占地10亩。庄园里养着自卫团和狼狗。他拥有4000亩土地,数百家佃户分布在方圆五六十里中。丛家地主出租的田地,租额高达农民收获量的71%。许多佃户包括佃中农一年辛苦耕作,交完租税,所得无几,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还得不断应付日伪、土匪的苛捐杂税,什么“田亩捐”、“枪支捐”、“人头捐”、“抽丁捐”、“慰劳捐”等等。日寇侵占地区的捐税更多:“枪支捐”、“壮丁捐”、“扫荡费”、“汽艇修理费”、“招待费”、“区公所月捐”、“翻译官月捐”、“事务员人情费”,甚至还有日伪军“嫖妓费”、“烟土费”……名目多如牛毛,农民不得不负债交税交捐,若再加上高利贷盘剥,岂不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丛家有个伙计葛春荣,从24岁起就到丛家干活,起早摸黑干了50年,最后地主嫌他年老,要他“告老休养”,强行把葛春荣的6亩活命田买去,葛老头一气之下便病死了。偶然有些百姓忍无可忍,纠合起来到衙门里去告地主的状。可俗话说“官府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官司打来打去,最后还是佃农倒霉。海启一带有家姓祝的地主,拥有几万亩土地,世代剥削穷人,愈到后来愈变本加厉,立下“新章程”:除缴原有租额外,租种千步田要再缴押金大洋60块。佃户们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于是推派了8个人去评理,评理无结果就去打官司,最后的结果是佃户坐了班房,“新章程”照行不误!有的地主出租土地,附加许多条款,比如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要佃户“送礼”,鸡多少、鸡蛋多少都有规定。如果不送,就象借债一样利滚利,几年工夫,光这一条就能逼得你上吊或投河!总之,在苏中地区与全国各地农村一样,残酷的封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加上连年战乱、兵匪成灾、敌伪掠夺,农村中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已经尖锐到

无以复加的地步。因此，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切需要我党正确处理地主与农民的矛盾，限制地主、富农的剥削程度，改善农民的生活，以解决他们起码的吃穿住问题，这样才能调动广大农民抗日的积极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既可满足农民的基本要求，又不过分触动地主的利益，安定农村生活秩序，无疑是唯一能够实行的正确的政策。

回溯一下历史，“减租减息”并不是我党的发明，而是北伐战争期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首先倡导的。后来蒋介石曾经提出“二五减租”，但他从未准备实行过。现在我党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真正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当时，我们不少干部，也不大懂得减租减息。记得戴为然同志出任兴化县委副书记前，曾经问我什么叫“二五减租”。我告诉他，“二五减租”就是农民向地主交租，一担谷减掉二斗半的意思。这件事后来被当成了笑话。我们既实行了减租减息，同时也要求农民保证向地主按规定比例交租交息，使地主的财产也得到共产党政策的保护，故而不少开明地主也表示拥护。

少奇同志《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的报告，还系统地阐述了我党提出的施政纲领，其中谈到取消苛捐杂税，建立统一合理的税收制度，实行减租减息，征纳公粮等抗战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政策，得到与会 14 个县 3 百多位代表的热烈拥护。会议把实行减租减息和保证交租交息写进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的《施政纲领》中，并得到会议一致通过。这是我们在苏北运用民主政权形式第一次公布减租减息的法令。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文件经过反复琢磨，从起草到改定，研究讨论过 13 次之多。

(二)

1941年4月，苏中区第一次军政党扩大会议在泰县浒零镇召开。会议由苏中区党委书记刘炎同志和我主持。中心议题是夏收减租与开展群众运动的问题。

会上大家对“二五减租”问题讨论颇为激烈。大多数同志认为，中央规定的二五减租符合苏中地区的实际情况，减租以低于原租额25%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25%比较合理。但也有部分同志认为，二五减租使地主、富农得益太多，农民得益太少，要实行三七减。对于减租比例，中央也曾有过指示，1940年底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写道：“地租，一般以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中央的指示也很明确，各地一般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只有在群众充分发动的地区，才能实行倒四六分或倒三七分。我当时不同意倒三七分，是考虑到苏中地区刚开始减租，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不具备倒三七分的条件。但在会上刘炎、粟裕同志和我都没作最后结论，而是将两种意见归纳起来请示华中局。不久少奇同志来信，指示苏中地区还是按中央要求一般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如个别地区条件允许的话，也可以实行倒四六倒三七减租。这样苏中区党委确定以二五减租为原则，各县抗日政府颁布了减租条令。对减息也作过规定，不影响农村正常借贷关系，地主与农民或农民与农民间借贷，一般以一分半为计息标准，被称为“分半减息”，最多不得超过二分。

为了迅速打开农村工作的局面，区党委在党、政、军机关中抽调了一批干部，在拼茶镇举办了夏收运动“二五减租”骨干训

练班，学习少奇同志《关于大刀阔斧发动群众开展夏收“二五减租”运动的一封信》。经过短期集训，组成几支民运工作队奔赴农村。记得谢克东同志率领一个队到丰利区；顾凤同志带一个队到小海区。我们区党委选择了角斜、栟茶两个区作试点。自上而下地发布政令，自下而上地深入发动群众，两者结合，减租减息运动便在频繁的战斗间隙有步骤地展开了。

我记得，少奇同志在晋西北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曾总结过华中的经验。他说：“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运动，主要是农民运动”，“华中群众运动的经验是这样的：派工作团下去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时，先选择几个中心县，在中心县里，找二三个中心区，在中心区里，找二三个中心村，把大多数干部和最强的领导干部派到中心县、区、村去。非中心区、村的干部，开始只做宣传工作，沿村宣传减租减息、改善雇工生活。在中心区、村，集中力量发动群众，突破一点，打开局面。非中心区、村则及时宣传中心区进行减租减息的成绩和经验，造成声势，相互呼应。”（见《刘少奇选集》第235页）少奇同志的总结，是十分切合实际的。

当时苏中广大农民看到民主政府张贴的“二五减租”、“分半减息”的布告，将信将疑。区党委便在角斜、栟茶试点区广泛宣传减租减息的意义。工作队员访贫问苦，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扎根”活动，串联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向地主要求减租减息。我们还注意做开明士绅的工作，要求他们执行政府法令，对自己的佃户主动减租减息。民运工作队对地主、士绅普遍进行守法教育，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1941年春季是个灾荒严重的季节。春荒使苏中地区不少农民揭不开锅，有的村能吃的野菜、树叶都吃光了；有的农民饿得走不动，成天躺在床上。农民们实在熬不下去了，就向地主借

粮、借款。我们了解到这一情况，便要求各县及各民运工作队，通过组织借粮、借款，提高农民斗争的信心，并增强“双减”的要求，同时注意培养农民骨干，挑选农抗会筹备人员。各县、各民运工作队根据区党委指示，一方面组织农民向殷实富户借粮、借款，一方面做地主、士绅和各阶层代表的工作，号召他们互助互济。对积极响应号召的开明人士予以表彰，对为富不仁坐视不救者，组织农民上门说理。这样，农民在抗日政府的支持下，度过了暂时的困难。与此同时，我们在部队、机关内部号召节衣缩食，由政府从公粮中拨出粮款救灾。仅在泰东县 11 个乡镇放赈，就有 44450 人得益，贷款 9200 元；贷粮 40 担；放赈款 173180 元；放赈粮 1592 担。广大贫苦农民把新四军和民主政府看作是自己的亲人，遇到部队经过即奔走相告：“菩萨军来了！”

互助互济这个突破口选得好，群众对新四军、民主政府怀有极大的信任，而且看到了贫苦农民团结起来的力量。在互助互济中涌现出来的一批积极分子，成了民运工作队的依靠力量。民运工作队员和农民积极分子进一步串门访苦，帮助大家调剂种子，安排春耕。农民们亲昵地称民运队员为“指挥员”、“新四军同志”。有的驻军还下田帮助附近农民春耕，向群众宣传抗战和减租减息政策，启发群众的觉悟。这一年的春荒，就这样顺利渡过了，春耕生产热火朝天。在封建压迫的深渊中挣扎的贫苦农民仿佛看到了一个新的春天，心头燃起了希望的火苗。

转眼到了夏粮收获季节，减租减息运动进入实施阶段。经过民运工作队的几个月串联访苦、宣传教育，广大贫苦农民就已经敢于跟地主面对面说理，要求按民主政府法令减租减息了。有些地主、开明士绅在民主政府的号召下，与自己的佃户换了租约，按二五比例减租。但也有不少地区开始时并不顺利，有些地主见农民要求减租，表面上客客气气，实际上拖延，或装腔作

势叹苦经。还有的地主声言，如果减租宁愿抽回土地不出租，吓得佃户不敢吱声。有的地主则在背后捣鬼，向佃户送礼、传话，要佃户照顾情面，明减暗不减。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采取积极措施，从苦大仇深觉悟高的农民中物色农抗会干部人选，从保、乡到区把农抗会架子自上而下搭起来。以农抗会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为骨干，带领农民向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同时，由各县、区民主政权和民运工作队选择有典型性的地主，作为斗争对象，开群众大会，狠刹地主的威风。泰东县曾揭露一个姓杭的地主和大赍公司的不法行为，公开批判他们蔑视民主政府的减租法令，责令他们遵法退租。对于开明士绅和守法地主，民主政府也通报表扬他们的遵法和抗日的爱国行为。

1941年秋季，我们又适时地开展了秋收减租运动，因为那年日伪“八·一三”大“扫荡”造成根据地一些困难，“双减”运动没有充分展开，更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直到第二年，即1942年夏季才形成高潮。

(三)

1941年的减租减息运动，特别是那年夏收的运动，取得比较大的成果。苏中区党委总结了工作中的经验，意识到要真正广泛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且能长期巩固下去，就必须把农抗会普遍建立起来。

从1941年减租减息运动中发现，许多地区都出现明减暗不减的现象。民运工作队一撤走，当地不少农民夜里就偷偷将白天减下来的租子送还给地主。这种现象表明，任何群众运动都只有在变成群众自觉的行动时，才能获得真正的效果。“双减”只有在农民自己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时，才会得到巩固。因此，

成立农民自己的群众组织——农抗会，就显得非常迫切了。

在“双减”运动中，我们还认识到，有些地区减租减息搞不开，跟基层政权未经改造大有关系。当时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一般是自上而下搭班子，每到一地先挂出县政府牌子，然后建立区级三三制政权，但乡、镇、保、甲基层组织来不及改造，一些地主狗腿子、代理人掌握了基层政权，替地主、富农讲话，阻挠“双减”运动开展。这说明“双减”运动不仅是经济斗争，也是一场政治斗争。我们区党委逐渐觉察到这个问题，决定在广泛建立农抗会的同时，加紧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政权的改造，吸收农民中的积极分子入党，由靠拢新四军、共产党、拥护抗战的农民、开明人士、农抗会干部、党员担任基层政权的领导职务。

苏中地区从1941年11月起普遍建立农抗会。11月17日，苏中区党委颁布了《农民抗敌协会暂时组织章程》，确定了农抗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法。丰利区的农抗会是苏中第一个区农抗会。我和章蕴同志在栟茶新坝乡三官殿小学召开了各乡干部、青年代表、小学教师等参加的联席会议，介绍了丰利区农抗会筹备过程的试点经验。不久，我们又在丰利镇召开了有上万人参加的丰利区农抗会成立大会。那天正好是端午节，各乡敲锣打鼓欢迎代表来开会，整个大会隆重热烈，喜气洋洋。代表们白天开会，晚上回家，会议共开了三天，开得很成功。

一些农民代表在会上的发言非常振奋人心。这些在旧社会见了地主腰不敢直、腿直打颤的泥腿子，平日里说话结结巴巴，但在讲台上却慷慨激昂得很，他们历数地主剥削的不合理，证明共产党二五减租政策的公平正确，并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决心。许多外区外乡的农民，看见自己的兄弟姐妹判若两人的神情笑貌，惊奇地发现世道确实变了。发言的人和听讲的人，心头都涌起一种翻身感和当家作主的高昂情绪。参加会议的人，一个个

都按捺不住喜悦的感情，纷纷表示回去以后也要象丰利区一样成立农抗会。混入会场的地主代理人，听了农民的发言，心神不安，如坐针毡，有的中途悄悄溜走了。

丰利区农抗会的成立影响很大，不少区、乡也相继成立了农抗会。每个农抗会成立时，县、区都要悬榜遍告各界；开会时各级政府和附近部队领导人都出席讲话，给予支持。农抗会普遍建立，成了各级政府的有力助手。苏中的农民从此有了自己的组织。

在减租减息运动中，如皋县江安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个姓周的不法地主，口头答应减租，背后却在捣鬼，他威胁农民，欺骗政府，伪造帐册，不肯减租。当地农民组织起来后，决定跟周姓地主算帐，把未减的租全部清算清楚。那天，60多位农民去地主家算帐，他事先得到消息，特地假借名目摆了三桌酒席，宴请当时在附近的叶飞和许家屯同志，叶、许等同志不了解情况，以为是一般应酬，就应约去了。地主见农民们进屋，便以傲慢的口气向农民摆摆手说：“我家正请叶飞司令员吃饭，有什么事明天来吧！”农民们不听他那一套，当面予以斥责：“周欣堂，你为什么至今不肯减租？”要他去区政府讲清不肯减租的缘由。大院里的嚷叫，惊动了正在里面吃饭的领导同志。出来一问，原来是农民要求地主减租。农民们见叶飞、许家屯同志在场，就请许家屯（当时任三地委副书记）同志讲话。姓周的地主一听，满脸堆笑，满以为地委领导同志会替他解围。许家屯与叶飞商量后，说：“农民弟兄们，减租是政府的政策，政府已颁布了法令，这件事可按政府法令去办，政府是支持你们的。”话音一落，数十位农民立刻拥上前去，便将周姓地主扭送到区上去评理。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广大农民在政府支持下挺起了腰板，许多地主再也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了。

由于各地普遍成立了农抗会，群众真正发动了起来，“双减”运动得到了巩固。至1942年5月，苏中已有县农抗会13个，区农抗会91个，乡农抗会420个，领导着15万农抗会员。苏中区党委成立了苏中临时农抗总会，发出了《关于成立苏中农抗系统的决定》，统一领导全苏中各级农抗会。在农抗会的影响下，青抗会、妇抗会、文(教)抗会、工抗会、渔抗会等抗日群众团体也相继建立起来了。

(四)

1942年春，苏中区党委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汇报了苏中地区减租减息工作，得到华中局的肯定。我在汇报中指出：“区党委曾作《关于执行中央土地政策决定的决定》，行政公署颁布了租佃条例，使中央土地改革的决定和苏中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因而获得了各阶层的热烈拥护。一般的民众已将我党中央的土地政策视为法律，说服和推动了许多地主实行减租，在地主、资产阶级心目中造成了一种法律观念。我党土地改革政策在社会上，在广大群众中的合法地位已经确定，我党政及群众方面，更能以此作为处理土地问题的准绳。”经过减租减息运动，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启发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不但假减租的现象已大为减少，而且许多农民已自动要求退租减租了。总之，地主方面已采取让步的态度，农民已逐渐树立了优势。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我党中央土地政策的完全正确，并且是能普遍实行的。

不久，苏中区召开了军政党第二次扩大会议，根据华中局会议精神，决定将苏中区的“双减”工作进一步引向深入，确立了普遍建立农抗会的方针和扩大中心区“双减”运动范围，将“双减”

工作推向游击区和边缘区。我们认真学习了党中央当年1月份下达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决定，深入理解“要实行既减租减息又交租交息，保护地主、富农的人权、地权、财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我记得少奇同志1940年在海安时就向我们交代过，所以苏中区“双减”工作一开始就注意防止过“左”现象出现。现在中央进一步明确这项政策，我们即指示各级党委、政府、农抗会认真检查，发现过“左”行为立即纠正。

那次会议以后，我们又一次组织大批民运工作队到边缘地区搞“双减”。边缘游击区的农民，听说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受到莫大鼓舞，纷纷找到民运工作队，请求领导他们进行减租减息。于是，我们就采用武装工作队的形式，分赴游击区，发动农民起来搞“双减”。在执行政策方面，我们加强调查研究，成立了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由周林、施平同志任正副主任，抽调专门人员，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状况、阶级关系以及中心区、边缘区和游击区的不同情况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

1942年9月1日，苏中区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我做了《夏收运动的总结》报告。经过1941年至1942年两个夏收、两个秋收的“双减”运动，苏中区“双减”运动基本上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假减租现象一年年减少。“双减”运动提高了基本群众的阶级觉悟，锻炼出一批工农干部，提高了党与政府政策法规的威信，使抗日民主政府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双减”运动促进了农村民兵武装的发展。仅1941年6月，“双减”运动初期，全苏中不脱产的自卫武装就有16万，脱产的自卫队也发展到近万人。

“双减”运动推动了农村党组织的发展。1941年底，苏中党员人数已达9620人，建立了1001个支部，中心乡一般都建立了

党支部,为党在苏中农村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双减”运动还锻炼、培养了大批干部。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涌现的积极分子,有的当了农抗会干部,有的被选进区、乡、村各级行政部门。还有不少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学生,通过民运工作队的锻炼,与农民交上了朋友,改造了世界观,许多人后来走上了党、政、军各级领导岗位。

第三节 史无前例的民众参政

(一)

开展减租减息运动，这对于打开抗日战争的新局面和巩固根据地，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苏中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经过1940年下半年和1941年的努力，县以上政权已经得到改造，原来国民党政权中的留用人员，有的经过斗争锻炼，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有的在日伪军的“扫荡”、“清剿”中自然淘汰。有些区级政权，经过一番改造，也成了抗日民主政权。但旧的乡、保基层政权却没有丝毫变动。这种情况当然远远不能适应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当时，我们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约请积极参加抗日的著名士绅，如海安的韩国钧、黄桥的朱履先、泰兴的刘伯厚等先生，还有南通的著名人士季方同志等，召开了临时参议会。整个苏中解放区有半数以上的县以及30个左右的区也成立了参政会，有的县、区政府多次召开政务扩大会议，吸收更多的各阶层人士参加政府工作，讨论政权建设。但由于政府工作人员良莠不齐，有些人搞宗派，有劣迹，因而引起群众不满，削弱了政府与民众的联系；同时也还有许多进步人士、有才干的人没有吸收到各级政权中来，结果造成了领导机关往往由共产党员包办，而基层乡保政权仍为旧势力把持那样一种不正常的局面。

我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斗争，那时根据地有党领导的军队，还有党领导的一整套立法机关、民意机关和行政机构、各类群众团体、组织。抗战前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由于敌人残酷围剿，主力红军长征北上，大块苏区丧失，只剩下分散的党的秘密组织或游击武装，保留了一些团组织、妇女组织，基本没有革命政权组织。白色恐怖一来，红色的苏区仍旧变成白区，革命斗争的烈火，剩下燃不起来的火星。这种历史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记取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方 8 省 15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都下山集中，组织起党领导下的新四军，接着便分头开赴敌后作战，开始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进行新的实践。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从中央苏区的星火燎原，到赣粤边 3 年游击战争的艰难坚持，再到东进北上的敌后斗争，直到在苏中地区建立根据地，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总结的经验。

(二)

记得我刚北渡到达江都塘头镇时，前来迎接我们的是当时苏北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惠浴宇同志。从政权这个角度来说，江都抗日民主县政权很有典型意义。它是第一枚火种，第一面旗帜，日后才逐渐扩大到整个苏北、苏中根据地。从塘头、黄桥开始，我就反复思考开辟建设根据地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多次得到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的指点和教诲，尤其是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方面，少奇同志对我的帮助、教育更大。

在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如何在敌后领导抗战？如何发动、组织群众？如何建立、健全根据地的民

主政权？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复杂而难于驾驭的新事物。

随着开辟工作的深入发展，苏中根据地的党政军领导同志们，渐渐摸索、总结出了一些经验。至1942年春，苏中地区的政权建设，已有相当规模，下辖4个行政专署及10多个县。根据工作需要，在各专员公署和县政府内，设立了秘书、民政、总务、税收、粮食、财经、审计、公安（保安）、司法、文教、交通等办事机构。根据地的政权机构，工作人员虽然缺乏经验，但做事认真负责，搞得朝气蓬勃，不象旧政权贪赃枉法、营私舞弊、拖拉敷衍，因而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戴。饱经战祸的苏中人民感到，自己的头顶上出现了一块晴朗的天空。

苏中行政区和各专区在参议会、行政委员会及专署中，初步实行了“三三制”的规定，即在工作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进步人士和中间人士各占三分之一，使抗日民主政权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各阶级的人，为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记得在阜宁单家港召开的那次华中局扩大会上，少奇同志在总结报告中，还赞扬了苏中的政权建设，说我们“一直是全华中地区的模范”，号召各战略区向苏中学习。

苏中根据地创建的时间不长，加之日伪军不断清剿、扫荡、清乡和伪化、蚕食，再加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干扰，给新生的民主政权的建设工作制造种种障碍，使它难以走上正规化的道路。当时，县级以上的政权工作搞得较好，区、乡等基层政权都未得到充分改造。尤其是相对稳定的中心区与斗争尖锐的边缘区，政权工作的差距就很大。纵观全局，可以这么说，苏中民主建政、民众参政工作，还处在明显的不平衡状态中，严重地影响根据地各项工作更深入、更有效地开展。比如江都地区，它虽然是

第一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但鉴于当时斗争的尖锐复杂，为了更有利于执行“联李、孤韩、击敌”的策略方针，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我军东进的条件，我们不得不暂时保留农村的保甲制度，未撤换旧的乡保甲长，仅加强了党对区政权的控制和掌握。这种状况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斗争形势时而紧张时而缓和，这是敌后斗争的一个基本特点。正因为此，一些旧乡保甲长为了保全自己，他们学会了一面应付日伪，一面又为抗日政府做事的手法，变成了典型的“两面派”。当然，对这种两面派要具体分析，其中有的为抗日出力是真，对敌伪则敷衍应付；另一种“两面派”表面敷衍我们，却死心塌地甘当汉奸。这些“两面派”在根据地中心区以外的边缘、游击区较为多见。有时随着我军事力量的壮大，抗日民主政权的威望日益提高，加之我们的争取工作适时、得力，“两面派”也会转变，即转向我方，这时的“两面派”就变成了坚持抗日的“一面派”。我们如果不拘泥于形式上的简单变化，用辩证法来分析，“两面派”政权和“两面派”分子都是特殊斗争环境下的特殊产物，它的出现有其一定的规律性。它必将随着斗争环境、敌我力量对比和存在条件的变化而转化。“两面派”存在的时空是相对的，最后必然转化为“一面派”。当然，如果希望他向好的方向转化，我们就要做很多的工作。当时有的同志对“两面派”不加具体分析，一律采取排斥的态度，这显然是简单化的做法，对革命是有害无益的。斗争实践教育了这些同志，后来他们的态度和看法也逐渐转变了。

我们做“两面派”的鉴别工作，也有过一些生动的故事。当时有个县城是敌我双方争夺的游击区。在县城里，我们设有一个情报站，成员大都是本地人。有一次，情报站连续三次送假情报，引起了我们的警惕。同时，县城里还刮起一股日伪要来扫荡

的妖风，使我干部不敢进城。因此，我们决定检验这个情报站，办法是请情报站的人喝酒，探个虚实真假。那些人吃喝惯了，一下子就被我们的人灌醉了。那个站长经不起我们三问二问，最后说出情报站与日本宪兵队有关系。经公安局进一步侦察、核实，搞清楚了情报站的16个人确有问题，于是一网打尽，把他们全抓了起来。原来这个属于我方的情报站被敌人收买了去，成了红皮白心的“两面派”。这个案件公开披露后，在当时很轰动了一阵子。

(三)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3月，就曾以党中央的名义起草过一份关于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其中提到：“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区别的，也和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区别。”这段话概括地阐明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

当时，少奇同志在《江淮》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只有大多数的人民都积极起来参政，积极负担政府的工作，并积极为国家民族的利益与为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努力的时候，抗日民主政权才能巩固与发展，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压迫才能推翻，中国的独立自主与人民的民主自由才能实现。”

在海安召开苏北工农绅商各界临对参议会期间，有人向我们提出，是否可以民选县长和区长。当时我和管文蔚同志吃不准，曾当面向少奇、陈毅同志请示过。少奇同志说，这就象烧菜煮饭一样，重要的是善于掌握火候，否则，不是夹生就是烧焦。他

的意思是，这要看基本群众发动得是否充分，只有广大群众真正发动了起来，民主参政才有实际意义。于是，我们就广泛深入发动组织群众，将减租增资、抗日保家的群众运动烈火普遍点燃起来，让群众在斗争中得到实际利益，同时也提高了群众的政治觉悟。当他们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自己是根据地的主人时，自然会产生政治上的民主要求。所谓火候，就是指群众的觉悟程度。在眼前，我们委派县长、区长，委任专员，都是必要的，正确的，这是过渡性措施。

不难设想，我们如果不委派县长、区长去主持政府工作，将会形成怎样的局面。记得陈毅同志当时还插了一句话：“受命于危难之时嘛！”少奇同志接着说，人民群众希望我们领导抗战，我们就应当仁不让嘛！少奇同志又说，自日军占领苏北各重要城镇之后，国民党的专员、县长大多弃官丢印，只顾自己逃命，区长也吓得匿身于乱世，不见踪影。这些被尊之为“父母官”的大小头目，心目中哪有一丝一毫黎民百姓的影子？共产党新四军挺进敌后收拾残局，就是为民作主，就是最好的民主。这番话，言简意赅，使我深受启发。

当然，由于基层干部很少，基层政权建设百端待举，对于大批原有的乡保甲长，只要他们不公开充当汉奸，又肯为抗战办事，也得暂时留用。我们搞民运工作的同志，应以积极的态度对待旧政权的旧人员，促使他们转变立场，为人民为抗日多做好事。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苏中的斗争依然是很艰苦的，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并没有因为日伪军频繁的“扫荡”、“清剿”而停止。相反，在根据地被分割成若干小块的情况下，各项建设仍取得了显著成效。

1942年秋冬之间，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在如皋（今如东）县

南坎镇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这是苏中解放区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为期近一个月的会议上，除检查以往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外，还作出了许多重大决策。如：实行精兵简政；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开展根据地“三冬”（冬防、冬学、冬耕）运动；改造旧政权；广泛进行游击战争以达到公开坚持之目的，等等。谭震林同志正巧来南坎，也参加了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

当时刘炎同志因病休养，由粟裕同志兼政委和区党委书记。为贯彻落实会议决定，区党委内部作了分工：粟裕同志留四分区检查帮助工作；管文蔚同志赴二分区帮助工作；我率区党委机关去一、三分区帮助工作。同时，各地委、军分区主要负责干部，也作了适当的人事调整，原各级军政党委员会都撤销了，建立了统一领导的党委。一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韦一平同志；二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陈时夫同志，副书记章蕴同志；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叶飞同志，副书记许家屯同志；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吉洛（姬鹏飞）同志，副书记钟民同志；兴东泰地委书记兼“联抗”司令员黄逸峰同志，副书记戴为然同志。

（四）

离开南坎镇前夕，粟裕同志找我作了一次长谈。这时旧历冬至已过，正是当地民谚所说的“三九四九冰上走”的季节，一场纷纷扬扬的瑞雪下得正紧，使原来就人口不多的小镇显得更加冷清。幸好警卫员用木炭燃起一盆火，渐渐地才使室内升起一丝热气。粟裕同志说，苏中形势将空前严重，我们很快又要分散到各分区去打游击了。根据情报，南京方面敌人对南浦旅团和李（长江）、杨（仲华）伪军在苏北的“扫荡”、清剿连遭失败大为恼火，拟调三个师团日寇和参加过苏南清乡的皇协军加强苏北，替

换我们的老对手十二混成旅团。汪精卫还要伪江苏省主席李士群来苏北坐镇，加强伪化我区。我们应当认识到，客观环境必然日益紧张，根据地的各项建设工作会遇到很多阻碍和困难，我们应尽量作好思想上、工作上的准备。他又说，日前已草拟好一份向华中局、军部汇报新敌情的电报稿，如果大家看后无异议，即可发出。前几天军部正在由盐阜区向淮南区转移，估计近日可抵盱眙县的黄花塘目的地。粟裕同志踱着步子，话说得很慢，他常常边思考边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粟裕同志对面临的严重局势考虑得很多很深。他说，我们到苏北已整整两年，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武的，文的，都有成绩。就以政权工作来说，迄今为止，县上都建立了民主政府，区一级一般也都经过局部改造，半数以上的乡村建立了党支部，各类不同形式的群众性抗敌组织也成立了不少，这正好说明基层群众已树立了优势。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区以下的乡保旧政权还未经过改造，客观上苏中政权好象是“新民主主义的头，半封建势力的脚”。有不少地方，我们发的命令，在乡保基层实行起来还是老的一套，使人民群众感觉不到抗日民主政府的新力量和新面貌。列宁有句名言：“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我们从苏区出来的同志对这句话都很熟悉。现在，大力改造根据地的一切旧政权，已经成了当务之急；若再拖延，则原地斗争也难坚持。少奇同志在离开华中赴延安前夕曾经留下一封信，提到无论从眼前或长远打算，迅速在根据地范围内实行“新乡制”、全面实行“三三制”政策，是当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环节。

粟裕同志稍稍停顿了一下，接着吩咐我与管文蔚、宋日昌等同志共同商量研究一下，先在二分区搞个试点，摸索出经验来，再在全苏中大力推广普及。临行前，他又关照我，将政治

民主交到群众手里，让人民自己来推选有威信的领导人，这可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呀，得抽调一批得力的干部来做这项工作！

遵照粟裕同志的指示，我们以区党委名义向全区发出了《关于改造基层政权机构，加强民主建设的决定》。于是，史无前例的民众参政运动，在苏中轰轰烈烈地展开，而且是在斗争最艰难困苦的1943年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热潮。统治中国农村几千年的封建顽固势力，终于在千百万民众参加的民主运动中，动摇了，崩溃了。这正如陈毅同志在1942年10月25日写的《盐阜区参议会开幕感赋，兼呈参议员诸公》诗中所表达的那样：

“列强风雨苦相催， 腐朽犹存是祸胎。
碧血前驱流万斛， 新坟后继起千堆。
飘摇专制霸图尽， 茁壮新生民主来。
应知天定由人定， 日月重光世运开。”

(五)

1943年4月，我和区党委几位同志在江高宝地区参加一地委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讨论发动群众实行新乡制等问题。就在这时候，作为苏中根据地改造基层旧政权的试点工作，也在台北县的万盈乡开始了。苏中行署民政处长宋日昌同志抓试点，摸索经验，以便提供给各地参照推广。同时，苏中行署及时公布了《苏中区乡镇政府暂行选举法》、《苏中区乡镇政府组织法》等几个法令，使根据地群众有法可依。

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因环境相对稳定，各种群众抗敌组织大都经过了斗争的锻炼，群众生活有了改善，也有管理政权的民主要求，所以，用民主的方式开展乡选，进展比较顺利。实践

也证明，民主乡选是基层政权改造的有效形式。苏中乡选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宣传教育，使民主政治的意义和具体内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实现民主政治的方法、如何运用其政治权利，以及乡政府组织法和选举法等，力求家喻户晓。第二阶段是组织工作，首先成立区的选举委员会，作为乡选领导机关，随即成立乡选委员会及选举事务所，负责具体工作。这工作很繁杂，包括登记选民，发表选民榜和公民证、划选区编公民组、组织公民选举、组织乡政扩大会、群众大会、选委会、预选会、决选会等等。其中发表选民榜是很有意思的，一般用红、黄、白三种颜色的纸公布，享有公民权的人名字写在大红纸上，年龄在18岁以下的写在黄色纸上，少数没有公民权的人名才出现在白纸上。当地群众都把看榜当作十分庄重的事，许多村镇都兴高采烈地迎接这一天的到来。有的年轻人，因为岁数不足而名列黄榜，显得十分懊丧。许多妇女因有了公民权，姓名被列入红榜而觉得无比荣耀。千百年来妇女被压在社会最底层，如今男女平权，她们也成了根据地的主人，怎能不欢欣雀跃呢！第三阶段是竞选、预选与决选。竞选是决选的序幕，是乡选中竞争最激烈、活动最紧张的阶段，是民主运动的高潮。我们主张无论那个爱国的阶级、阶层或党派，只要不是特务、汉奸，都欢迎参加，允许人民公开自由地发表政见，投入竞选活动。

预选大会就是选区公民大会。会上，候选人发表演讲，公民可以自由发表意见，或对乡政大计作出各类提案。决选，则是乡选的正式选举，选出乡政府委员并从中产生乡长。选举方法，在苏中根据地各处可以说是百花齐放，一般根据群众的文化程度而定。少数文化较普及的地区有采用票选法的，而大部分地区则采取举手表决、捻筹子（用竹片做成筹子，写上候选人姓名，放在候选人后面，供选民去捻）、烫香洞（选民用点燃的香，在

候选人名单上烫一个洞表示投一票),或在各候选人身后放一只空碗,让选民向后选人碗中投豆粒的方法进行。烧香洞和投信任豆,是根据地选民的创造。他们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都表现出高涨的政治热情。

台北县万盈乡的乡选试点工作就是典型的例子。多少祖祖辈辈的泥腿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今天翻身做了主人,行使民主权利,投了神圣的一票。这件事,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但泥腿子居然由自己作主来挑选自己的乡长,这可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出现过的大事呀。江都县纪北区黄思乡在选民中,把一个童养媳出身的乡妇抗会长虞兰英选为乡长,这是江都县第一个女乡长。这位能够联系群众,吃苦耐劳,工作大胆泼辣的女同志,深得当地群众的信赖和拥戴。她在黄思乡当权后,果然不负众望,做出了很好的政绩。兴化县屯军乡的民选乡长也是一位妇女,叫殷巧珍。她也干得十分出色。他(她)们都是根据政府公布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规定,被群众推上领导岗位的。对于被选的妇女来说,她们出任乡长更意味着打破了封建专制,改变了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因此,当地社会风气为之大变,广大农民群众莫不欢欣鼓舞。

民选工作从一个乡试点开始,发展到1944年以后1000多个乡全面开展。这过程充分展示出苏中根据地近1000万人口汇集成的民众参政运动壮丽的画卷,加速了基层旧政权的彻底改造和民主化进程。

1944年的初夏时节,我们又在二分区的东台(东台、泰东两县于1942年底合并)县和唐洋区分别进行了县、区政权民选试点工作。东台县经过上一年的民主建设,全县80个乡镇中已有38个实行了新乡制;唐洋区所辖的11个乡,也有七个经过了民主改造。唐洋区参加民主区选的100多名各界代表开了六天

会，选出了苏中根据地第一个民选区长何患同志。

不久，选举苏中第一个民选县长的东台县临时参议会召开了。按照“三三制”原则，以各抗日团体为单位选出农抗会、工抗会、渔抗会、灶抗会代表 41 人；青抗会、妇抗会、医抗会、僧抗会、自由职业代表 37 人；士绅及公司代表 36 人，以及其他代表共计 145 人。前县长董希白同志率县政府全体工作人员向苏中二专署提出辞职书，获准后，由全县 39 名候选人先后发表竞选新县长的演说。结果，作为县参议员的董希白同志仍参加竞选，以 134 票的压倒多数，当选为东台县 55 万人民的民选县长，同时选出县政府委员 14 人。整个选举过程，充分发扬民主，气氛异常热烈。我从当时的《苏中报》上读到连续报道，十分感动。

苏中根据地采用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和组成各级抗日阶级、阶层联合的新型民主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抗战力量，这也可说是新中国民主政府的雏型，为行将诞生的中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设，打下了一块小小的基石。

董希白同志作为苏中第一位民选县长，是深孚众望的。抗战前，他原是上海某学院的院长兼教授，年轻时曾留学法国攻读法律，不仅有丰富的文史知识，而且对法律亦颇有研究，算得上是位大知识分子。1939 年初，他瞒过家人到皖南参加新四军，我和他由此相识。随后他来苏中工作，一直表现很好。这位非党知识分子，经过抗日战争艰苦环境的磨炼，在 1941 年 5 月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我特别提到他，联想起当时我党在抗战期间对知识分子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招贤纳士，亲切关怀，发挥所长，委以重任，以致吸引了大批有文化的爱国青年、中年甚至老年知识分子投奔我解放区。记得毛泽东同志于 1939 年 12 月为中共中央写过一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号召全

党做好这桩事情，产生过相当深远的影响。

时至今日，纵观我国数千年文明史，横鉴世界各国的政情，凡是对知识分子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和做法的国家或个别领导人，无不最终自食恶果、苦果，那是因为从整体上说，知识分子掌握着人类的文化、科学知识，继承和发扬着人类的文明传统，谁要是压制、否定他们，那就意味着障碍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在这方面，我党也不是没有惨痛教训的。建国前不去说它，建国以后，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尤其是灭绝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最值得反思的吗？

当年，董希白同志赢得了东台县数十万人民的信赖，说明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只要虚心向群众学习、紧密联系和依靠群众，忘我地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人民是不会不拥戴他们的。董希白同志解放后在国务院外交部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被“四人帮”一伙迫害含冤病故，实在令人惋惜。

(六)

1942年冬天，我们在南坎召开的会议刚刚结束，就有人来报告说，爱国文化人、“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先生来苏中根据地参观考察，现已到达三分区的靖江。粟裕同志、管文蔚同志和我喜出望外，立即派人前往迎接。在此之前，我们已接到华中局发来的电报，嘱咐我们“确保安全，热情款待”，没想到韬奋先生这么快就来到了苏中解放区。

邹韬奋先生是一位民主运动的坚强战士，在全国民众的心目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抗战前，他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主编《生活周刊》，从事进步文化活动。他是著名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他写的文章泼辣、犀利，文采飞物，敏锐地反映了民众的呼声，故

而深受人们的喜爱。当时国内反动势力控制的学校里，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书刊是被禁止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害怕进步读物广为流传。但是，这些学校里的青年师生向往光明，要求进步，渴望了解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他们不顾风险，经常传阅《生活周刊》及各种进步书籍。我在东南局工作时，经常接待来自上海、武汉等地的抗日青年，发现他们大多随身带着韬奋先生的著作和他主编的刊物。由此可见，在抗日青年中，韬奋先生的影响之大。来自海外的华侨青年也曾告诉我，在海外的华裔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中，韬奋先生主编的刊物也有很多读者。韬奋先生主编的《生活周刊》和后来创办的《大众生活》，多次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但这些进步刊物的销量却不断上升，达15万至20万份，创造了当时中国期刊的最高发行纪录。韬奋先生是人民大众的忠实代言人。他之所以受到民众的拥护，就在于他坚持人民大众的立场，为民众说话，唤醒民众，教育民众，而又认认真真向民众学习。

抗战爆发后，韬奋先生等“七君子”曾因爱国而获罪于蒋介石政府，但他刚从苏州监狱中获释，便又投入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8·13”战火中，韬奋先生为了进一步激励民众奋起抗日，毅然创办了《抵抗》三日刊，愤然抨击国民党的消极抗战政策，主张彻底开放民众运动和言论自由，实行真正的全面抗战，呼吁全国军民团结御侮，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上海沦陷不久，他将《抵抗》三日刊迁至武汉继续出版，改名为《抗战》三日刊。韬奋先生几乎每期都亲自撰写文章，鼓舞民众的抗战热情。之后，这个颇有号召力的刊物，又改为《全民抗战》周刊。

“皖南事变”后，韬奋先生目睹蒋介石政府的倒行逆施，愤然辞去国民党参政员之职，秘密离开重庆，潜赴香港，继续挥笔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统治，促进爱国民主事业。这次他来苏

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打算先到新四军军部，再前往延安，沿途顺便进行参观考察。

韬奋先生刚到区党委驻地，我立即出门迎接。韬奋先生身穿古铜色呢袍，清秀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框眼镜，瘦弱的中等身材，约莫五十来岁。当时，韬奋先生身体欠佳，却还抱病听取我们关于苏中根据地建设的情况介绍。他手里总拿着小本子，一边听，一边记，而且问得很详细，不清楚的地方，往往询问再三。

在短暂的逗留期间，粟裕同志、管文蔚同志和我一起，跟韬奋先生交谈过好几次。他对苏中根据地的建设赞扬不已，还向我们提出，想看一看根据地的民兵、妇抗会、儿童团、学校，深入了解基层的民主政治实施情况。于是，我陪他去三仓河东部垦区，进行实地采访体察。一路上，韬奋先生向我们介绍了许多关于沦陷区、国统区各阶层人民抗日救亡的情况，以及他前几年赴欧洲、美国、苏联考察的观感。韬奋先生很健谈，而且谈得很生动。我见他身体很虚弱，旅途又很辛苦，特地关照许墩乡乡长崔宗宽买两片猪肝，给韬奋先生增加点营养。那时猪肝可算是最珍贵的补品了。

恰巧，东台县许墩乡正进行民主乡选工作，我和管文蔚同志便陪韬奋先生前往，并在墩塘庄召开有千余群众参加的盛大欢迎会。会场布置得十分隆重，到会群众格外兴奋，韬奋先生颇受感动。我记得，那时他耳朵里常流脓血，开会前还感到疼痛难忍。但他坚持出席会议，同到会的干部、战士、农民群众见面，而且强忍疼痛，作了精彩的演讲，并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他畅谈大后方民众致力于抗战救亡和民主运动的事迹，抨击国民党政府制造“皖南事变”的罪恶行径，激情似火，妙语如珠，引起了阵阵热烈的掌声。最后，他热情勉励苏中军民建设好根据地，并带

头振臂高呼“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

会议结束,稻奋先生累得几乎瘫倒,但情绪却很好。稍稍休息了几天,他又到许墩乡参加了几次干部、群众、中小地主座谈会。他无比感慨地说:农民群众能投票选举乡长,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做到。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创举,也是中国的希望所在。他还说,自己过去从事的民主运动,与此相比只是隔靴搔痒,如今在抗日根据地才亲眼见到真正的民主政治。稻奋先生这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离开三仓河以后,稻奋先生由刘季平同志陪同,继续参观考察。事后,刘季平同志告诉我,稻奋先生对苏中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教育事业、民主政治赞叹不已,还郑重地提出,他想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听了很高兴,立即电告华中局,转达稻奋先生的心愿。

我感到无比遗憾的是,那次同稻奋先生见面竟成永诀。他离开苏中、抵达盐阜不久,终因耳病日趋严重,不能不秘密返回上海治疗。1944年7月,这位不屈的民主战士,伟大的文化先驱,不幸病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依然坚持自己的崇高信念,呼吁全国人民“坚持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并再次向党中央提出请求,希望身后能被追认为共产党员。稻奋先生的不幸病逝,对于坚持抗战的根据地军民,特别是广大知识分子,除沉痛的怀念外,更受到鞭策和激励。可以告慰先生英灵的是,他的崇高愿望终于得到了实现,党中央及时近认他为中共党员,并对他们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关于稻奋先生身后获得殊荣的消息,我是在1944年10月才获悉的。我和稻奋先生相聚虽短暂,但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远见卓识,对我们根据地

的政权建设颇有启迪意义。此后两年，苏中党政军民积极加强基层政权的改造，基本废除了旧保甲制度，不断削弱农村的封建势力，推毁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基础。这样，根据地军民运用自己的民主政权的力量，加速了抗战胜利的进程。这也预示着，建立人民群众广泛参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已经为期不远了。

第四节 地方武装大显身手

(一)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使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了新变化。中共中央向全党指出，蒋介石集团仍然坚持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投降分裂的危险依然存在，我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依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党中央特别强调，敌后军民必须咬紧牙关，渡过困难，并准备好一切条件迎接反法西斯斗争的全面胜利，争取在战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和平、民主的新中国。

华中局根据党中央指示，于1942年1月20日，在阜宁县单家港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

单家港位于县城西北，是一个座落在废黄河南滩上的小村庄，隔河与涟水县相邻。自夏季反“扫荡”后，华中局、军部机关即北移，辗转至此。我从苏中赶到这里，正值滴水成冰季节。这里没有盐城街市的繁荣、喧闹，有的是穷乡僻壤的冷清、宁静。入冬后，老黄河的水位猛降，据乡亲们说，滩浅处河水仅数尺，单家港成了徒有其名的无水港。

参加扩大会议的华中局委员、各战略区党政军负责干部共20余人，列席会议的有数十人。我和管文蔚、叶飞、钟期光、朱克靖等同志代表苏中根据地参加了会议。大会由少奇同志和陈

毅同志主持，我代表苏中区党委向大会作了工作汇报；管文蔚、钟期光两同志分别就苏中政权建设和一师政治工作作了汇报。

会议期间，华中局明确规定，苏中区今后的任务是，“要切实、迅速地巩固苏中根据地，聚集与加强力量，以便将来能应付国内外的事变；建立独立作战的地方军，主力部队应该地方化；广泛建立群众性的游击队与不脱产的民兵”等等。

这次会议开了45天，预备会与正式会议之间除有4天休息外，连年三十与大年初一都在紧张的会场上渡过。

(二)

会内会外，陈毅同志一直很忙，即使如此，他还是挤出时间跟我谈了两次。我向他汇报说，自去年10月，江渭清，温玉成等同志率六师十八旅北渡，进入江都、高邮地区后，江高一带情况日益好转，党政军各方面的领导力量都加强了，我们打算会议结束后，在江高宝地区成立苏中一地委、一专署，第一军分区可由十八旅部队临时兼管。对这一建议，陈毅同志很赞成。他说，十八旅可以考虑将来划归一师建制，这样便于开展根据地的工作。另外，我汇报了二地委、二专署与第二军分区的情况。提到东台、泰东时，陈毅同志问道：“阿丕，听说前些日子你们遭日本鬼子偷袭了，是不是？伤亡怎么样啊？我对你们不知说过多少遍，要提高警惕性，要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敌情严重时，机关不能统统集中在一起，要分散驻、多设岗哨。你们呀，就是听不进。如果让敌人真的包了饺子，怎么办呢！向谁交代？”说完他狠狠地抽了两口烟，眼睛瞪得大大的，真有点生气了。

陈老总满怀深情的批评，我是完全接受的。我们在敌后，跟他相隔数百里，可他仍时时刻刻关怀着我们的安危。想起这些，

恰似一股暖流注入心田。我低着声，讲了那次与敌人短兵相接的大致经过。

那是去年冬天，四分区军民在胜利粉碎日伪秋季大“扫荡”以后，我三旅主力七、八两团分别集结于丰利镇整训。12月上旬，驻岔河、掘港据点日伪军千余人，分数路向丰利我军驻地包抄、合击，进行冬季重点“扫荡”。为了迎击敌人，粟裕、陶勇同志亲自指挥三旅主力部队和敌人展开一系列的反“扫荡”战斗。8日晚，在如皋花市街冒雨设伏，次日晨胜利地围歼了由掘港出动之敌。是役，毙日寇中队长以下30余人，伪军200人，生俘分队长羽田及上等兵松野觉（后成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宣传委员，做了不少工作，不幸在车桥战役中牺牲）。这一仗，打得南浦旅团长恼羞成怒，遂集重兵紧追我军不放，叫嚷要跟我新四军一师主力决战。粟裕同志胸有成竹，命令部队沿黄海滩向北移至二分区境内，避敌锋芒。这时师部进入李堡附近，与区党政机关相邻。

当时，区党委和行署机关就驻在泰东县唐洋区一带。元旦过后数日，我们机关一直宿营于张家灶。一天清晨，庄外东面突然传来“叭贡、叭贡”的枪声。这尖厉的枪声，听得出是鬼子的“三八式”。遇上敌情，我们迅速作好战斗准备。幸好在前一天，二地委、二专署机关刚与我们分开行动，章蕴、刘季平等同志都不在张家灶，我身边只有保安处长周林同志和警卫大队长吴福海同志指挥的一个连。要是许多机关集中在一起，那真会象陈毅同志所说的，被敌人“包饺子”了。

吴福海同志命令连长王前同志带两个排东去迎敌，掩护机要员、电台和领导同志突围，余下的一个排和机关同志一起向西边庄子外转移。幸亏哨兵发现得早，鸣枪报了警，大家才及时西撤。我们一路匆匆行军，枪声不绝于耳。待我们抵达安全地带

时,才从回来的便衣侦察员汇报中得知,王前同志与两个排打掩护的全体战士都光荣牺牲了。他们的英勇作战,狠狠打击了偷袭的日伪军,用忘我的献身精神,保护了苏中党政机关的安全。

后来知道,粟裕同志和师部那天就宿营在距我们驻地不远的村庄里,是白天敌人刚“扫荡”过的庄子,没有被敌人发觉。游击战争时期,我们区党委机关经常转移,与敌人捉迷藏。这一回,我们在张家灶住的天数多了,难免走漏消息,险些造成更大损失。

陈毅同志听了以上汇报后,沉默了一会,说,“一身系得几安危,我们这些人从参加革命的那天起,就作好了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这是对的,但并不是随随便便地把自己的脑壳抛出去就叫献身精神。要学会在任何恶劣的环境下斗争和生活,努力学会避免一切不必要的伤亡、损失。因为无论领导同志还是普通战士,都是党的宝贵财富、宝贵的革命力量。游击战争是一门艺术,在对敌斗争中非多长几个心眼不可!”现在当我回忆起当年陈毅同志跟我谈话时的情景,一股思念之情油然而生。著名老作家聂绀弩同志写过三首《挽陈帅》的诗,其中一首尤其真切,使我久久不忘。诗曰:

“枪十万支笔一支,
上鞍杀贼下鞍诗。
大儒惜墨如今处,
虎将涂鸦以血时。
水侧磨刀工部句,
楼头看剑稼轩词。
酒酣抓笔当枪弹,
一弹洞穿膏药旗。”

在和陈毅同志两次谈话中,得知海安韩国钧老先生在日伪

威胁利诱面前，大义凛然，可歌可颂。陈毅同志沉痛地说：“紫石先生对苏北的抗战是有很大贡献的，他的高风亮节应广为宣传，成为根据地人民群众及一切有产阶级、旧知识分子的楷模。在我国历史上，反抗外族侵略的民族英雄屡见不鲜，紫石断头丧身以殉国，真是承上启下的民族英烈。前不久，我还与人商量，拟请老人移家香港暂避战乱，那知敌人倒先下手了。可惜啊，这也是我们工作上的疏忽。”我还看到陈毅同志为悼念韩老先生而赋的七律手稿。

“忍视神州竟陆沉，
几人酣醉几人醒？
坚持晚节昭千古，
誓挽狂澜励后生。
御侮力排朋党论，
同仇谋止阍墙争。
海陵胜地多人杰，
信国南归又见君。”

陈毅同志还特别叮嘱我和管文蔚同志，要我们回苏中后，尽可能对紫老的亲属作妥善安排。他说，所有对抗战作过贡献的开明士绅，根据地的各级民主政府都要设法予以保护，这也是统一战线中的一条重要政策。

不久我们回到苏中，得知 85 岁高龄的韩紫老临终前，曾亲笔写了一封信致陈毅同志，详述他的近况，信是托人从苏中转送军部的。当年 5 月间，苏北各界数千人在盐阜区为老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东台县也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我也曾到会志哀。当时，会场气氛肃穆而悲恸，非常令人感动。

(三)

我们终于踏上南返的路。

参加华中局会议的苏中代表一到师部驻地，粟裕等同志早就立在门外等着我们，大家都想早些了解华中局会议精神，纷纷问长问短。第二天，我们出席会议的几位同志向粟裕同志作了详细的汇报，又经讨论决定，于4月上旬召开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第一次是在1941年4月在泰东县浒零召开的），传达会议精神，并按上级要求布置当年工作。

我们在单家港开会的几十天里，各个分区的反“扫荡”斗争依然十分频繁。江高宝地区敌伪增兵千余，新构筑了近20处据点；日寇将伪第二集团军杨仲华部2个师从盐城调至如皋境内。敌伪配合，连续扫荡我启海地区，苏中兵站、印刷厂、军用物资仓库所在地东台琼港，原是我后方基地，最近也遭敌扫荡，师部已令乔信明同志率第二军分区部队向驻一仓河之敌发起进攻，逼其撤兵。斗争形势最为严重的还是苏中三分区，因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汪浩然部（属军统特务戴笠系统）2千人突然由苏南北甯靖泰地区活动，日伪军数千人又对该区进行重点扫荡，这一带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三角斗争”局面。叶飞同志（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正急着赶回去指挥战斗……

4月10日，苏中根据地各分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都陆续汇集到启东县海复镇，苏中区军政党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这黄海边的小镇上召开了。那次会议，对认清时局、统一思想、明确任务、部署工作，对苏中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会议通过了《新四军一师及苏中军区为接受华中局扩大会

议关于苏中军事建设决议之决定》。这个决定提到：“坚决完成华中局给予苏中党发展2万地方军的任务”；“不脱离生产自卫武装(包括民兵)之建设，不仅对于地方军和主力之建设有着决定的作用，没有广大的人民自卫武装、地方军与主力之发展巩固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根据地之巩固与坚持就要大受影响，而且民兵建设是实行义务兵制的第一步，不实行全民皆兵的义务兵制就不能应付将来更大的战争，更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民兵建设是我根据地内军事建设之基础”；“根据华中局扩大会议之决议，我苏中应在一年内组织不脱产的自卫武装50万，其中基干部队(即民兵)10万”。此外，还明确提出了关于主力部队地方化的实施方案；一师各个旅的指挥机关与其活动区域的军分区机关合并，以便更好地统一指挥和缩减机关，更适应游击战争的需要。

事实就是这样，当时在苏中地区日军有4千余人，伪军共有3万5千左右；还有顽固派韩德勤所部万余人及张星炳部2千余人，分别盘踞曹甸和溱潼一带。面对日伪的军事高压，我们如不充分发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自卫武装作用，就不能达到坚持和巩固根据地的目的，也不可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自1942年初夏始，日伪军对苏中的“扫荡”、“清剿”更为频繁。特别在夏秋季节，日伪军先后纠集了数千人，轮番对苏中各分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敌人的据点一度增加到339处，使根据地的面积比1941年相对缩小，部分中心区变成了游击区，部分原来的游击区又成了敌占区。敌人不断加强伪化区，继续蚕食我解放区，使我主力部队以团为单位活动都有较大困难，只能以连、营为单位作分散活动，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伺机打击敌人。因此，迅速建立和发展地方武装，紧紧依靠当地群众，担负

地方反“扫荡”、反“清剿”任务，以顽强坚持原地斗争来巩固根据地，就成了当务之急。

(四)

八、九月间，一师及苏中军区各部队，开始具体贯彻落实军政党扩大会议关于主力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的决议，先后进行了统一编组。一师所属四个旅（包括划归一师建制的六师十八旅）各组织一个主力团，即一团、四团、七团、五十二团；其余二团、三团、五团、六团、八团、九团等，均划归苏中地方军，作为骨干，以营连为单位，分别充实到各地方兵团。经过这样一番重新编组，使苏中各地方武装大大加强了。新组建的有泰东警卫团、如西独立团、靖江独立团、泰兴独立团、泰州独立团、台北独立团、兴化独立团、东台独立团、如皋警卫团、启海警卫团、南通警卫团、通西警卫团、高宝独立团和海防团等 10 多个兵强马壮的地方兵团。这是我苏中根据地军事建设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加强根据地地方武装建设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采取这一战略性措施后，使师部（军区）仍有主力在手，而各分区、各县也有主力部队巩固边区，遇日伪“扫荡”、“清剿”时，主力野战兵团属于大突击和大转移的部队；各地方兵团则属于坚持原地斗争或小转移的部队，从而克服了过去因地方部队战斗力较弱，主力部队不得不常去担任许多地方任务的矛盾。这样，在敌人据点林立、斗争白热化的严重形势下，我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既有分工又有配合，相辅相成，都有较大发展。正如陈毅同志后来在《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所说的：“自从决定主力精干化，而拨主力并入地方军，情形便改观了。一面主力编入地方，一年以后所有地方部队均战斗力高强，能追随主力之后独立应

付敌顽，在事实上扩大了主力；一面使根据地巩固并向外扩大。”“这是走的加强其地方性，以最终消灭其地方性转化为主力的道路，这一辩证的发展便把主力地方化、地方军主力化的矛盾正确解决了。”

陈毅同志对这个问题说得透彻，也很符合实际。

1942年7月初，泰县党政机关和警卫团在缪家野遭到敌伪奔袭，原县委和警卫团的主要领导同志缺乏作战经验，反“扫荡”的思想准备也不足，遭敌迂回时未能及时组织转移，结果被敌包围，致损失惨重。县委书记徐克祥同志等30余人不幸牺牲，40人被俘，还有数十人负伤。这一来，整个县的形势急转直下，地方亲日反共势力日益嚣张，不少地区被“伪化”。泰县形势的恶化，促使地委、旅及分区领导下大决心实行主力地方化，决定从最强的主力团中抽出一个整营，由曾如清同志带去组建独立团。9月，部队由如西开赴泰县，与县委会合，确定以武装斗争为主，发动群众打破“伪化”局面，恢复和加强根据地建设。

为了打好主力地方化的第一仗，独立团采用诱敌深入的战术，反复引诱敌人。孔瑞五率伪军6百余人从蒋垛、古溪据点出动，分两路出扰雅周区，一路抓壮丁、抢钱粮。当他们准备返回时，我独立团立即出击，兵分两路以钳形态势向东夏庄合围。雅周区民兵和群众千余人配合行动。刹那间，四处一片呐喊声，铜锣、爆竹、火铳齐响，枪声和手榴弹爆炸声惊天动地。伪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六神无主，不知所措。逃窜的伪军正好落入民兵、群众布下的天罗地网之中。这一仗，歼敌百余人，生俘伪营长以下50余人，缴获枪支弹药一批，夺回粮食、禽畜、财物100多车，救下被绑架的近百名青年农民。这次战斗不算大，但在群众的心理上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使迷漫一时的悲观情绪一扫而去。

东夏庄一战使河东形势出现了转机。县委立即着手整顿各区游击武装、民兵组织和各种群众团体，号召各区总结对敌斗争经验。独立团还派出部队到各区巡回活动，主动打击敌伪势力，保卫秋收，协助基层开展减租减息工作。

数月后，独立团在蒋垛附近的缪家野伏击伪军，事先我们就掌握了伪军出动人数、行动计划以及所走路线等重要情报，还进行策反宣传，瓦解伪军军心，因而战斗进行得很顺利，除击毙一部外，还生俘伪军 600 余人，缴获步枪数百支、掷弹筒 4 个、轻机枪 4 挺、手枪 10 余支，

苏中军区海防团开辟琼港的斗争，多次完成海上运输物资、建立海上交通、输送干部等艰巨任务，被誉为“打不烂、割不断的交通运输线”。地方武装配合主力作战，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

(五)

自苏中行署和苏中军区联合公布《苏中人民抗日自卫武装组织暂行条例》以后，根据地民兵与自卫军武装，得到了更迅速和更大规模的发展。在参军热潮中，各个分区的县，以及有条件的区、乡都成立了游击武装，而且在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至 1942 年底，苏中区脱产民兵已有 2 万 6 千余人；不脱产民兵有 26 万余人；自卫队与基干队有 7 万 4 千多人，几乎每一个乡都有一个武装游击小组。这为“坚持敌后斗争，渡过难关，积蓄力量，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的实现，打下了可靠的基础。

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已经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基本力量。在当年苏中的《滨海报》上，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记载：“东台唐洋、角

斜两区游击连民兵，在此次李堡战斗中配合主力与地方兵团作战，表现出高度的参战热情和沉着勇敢。当战斗开始，该两区民兵即组织了破拆队、担架队，在配合作战中亦无丝毫害怕现象。战斗延续一昼一夜，民兵虽几顿未曾吃饭，也未影响勇气与情绪。当我军最后解决战斗时，民兵即有组织地平毁工事，直到我军离开李堡扩大战果时，唐洋民兵与游击连仍坚守该镇。至22日下午，如皋敌伪来援复侵李堡，我唐洋游击连即予以顽强抵抗，民兵于作战中英勇伤亡数人。但敌因我不断袭扰，并被击毙1人，乃不得不于当夜退出李堡，而我民兵随之再度收复该镇，彻底摧毁工事。角斜游击连在配合主力伏击增援之敌军时，除俘伪军5名外，并缴获机枪1挺，步枪8支。这种高度参战热情及顽强作战之精神，实为我二分区游击连、民兵之好示范。”这一段简短的文字，虽不能概括当时地方武装的全貌，却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地方武装和民兵英勇斗争的精神。

唐洋、角斜民兵英勇杀敌的事例，苏中二分区司令部与政治部曾颁发过嘉奖令，号召各区民兵、自卫队、游击组织加紧训练，以饱满的斗争热情，随时准备配合各主力作战，打击敌人。

在群众武装大显身手，并在残酷的斗争中锻炼成长、壮大时，根据地人民群众包括妇女、儿童也积极行动起来，用各种方式开展拥军抗日活动。章蕴同志曾给我讲过一个真实动人的故事。她说，在东台县的一个村子上，村头有妇女和儿童组成的秘密岗哨。有一天，有个叫化子进了村口，担任秘密岗哨的妇女一面纳鞋底，一面留神观察。为什么穷人要饭还用新布做口袋？她趁着给他粮食的时候，顺手伸进叫化子的布口袋里，抓了一把米出来看看，发现里面一色的粮食，而不是“千家饭”。她即按照事先规定好的暗号，在她身边的孩子屁股上拍了几下，儿童团员就跑去送信。后来把叫化子抓起来一审，果然是日伪军派来搞

侦察的特务。

另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如皋与南通交界处，有个陆家庄。庄上有位陆嫂子，人们都说她有本事，能脚踩两条船。那年春天，有位身穿长衫的高个子打卦先生，送来一封密信，要她想法子搞几支枪，约定3天后来听回音。陆嫂子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怎么搞法呢？她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个办法。她当天发出请帖，说是后天自己过“生日”吃寿面，邀请保安团、宪兵队、警察局的几位大佬作客。那些家伙都知道陆嫂子做得一手好菜，人也长得俊美，便欣然应邀。那天，陆嫂子采购了鱼、肉、鸡、鸭，亲自下厨掌勺。酒席一开始，那班黄狗、黑狗便狼吞虎咽、猜拳行令，一直吃喝到伸手不见五指，还不肯善罢甘休。突然，陆嫂子的看门狗“汪汪汪”地叫唤起来，引得全庄的狗狂吠不止。这下子酒鬼们警觉起来，有枪的掏枪，没枪的准备逃命。陆嫂子站在堂屋前，连连摇手，叫大伙安静。她说：“在座诸位那位没尝过新四军、游击队的厉害，真的包围上来，你们硬碰硬肯定要吃眼前亏。”陆嫂子见大伙听她的话，随即拿出许多她男人的衣服让大家换上，并把各人带的枪留下来代为收藏，把他们藏进后屋里去。过一会，狗吠得更凶，还听见“嚓嚓嚓”的脚步声，盒子枪的碰击声。一听就知道来的队伍人数不少，吓得那几个黄狗、黑狗直打哆嗦。折腾到天亮，陆嫂子把那帮家伙放出来，他们看见陆嫂子家也被翻得乱七八糟，陆嫂子正在哭哭啼啼诉说新四军来过了，他们的衣服枪支都给搜去了，请他们原谅。那帮家伙信以为真，只得自认晦气，灰溜溜地走了……

类似上面所说的故事，为数既多，流传又广，虽有可能经过润色、夸张，但大体上是有根据的。它的确反映出当年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革命精神。群众是真正的抗战英雄，群众是抗日保家的铜墙铁壁，这话是千真万确的。

第五节 “三冬”运动一片兴旺

(一)

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包括军事建设、发展生产、民主建政等等，都是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参加的。每一个干部都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没有最广泛的群众性的活动，根据地的建设就一步也不能前进。这一点，我在前面的一些章节中，也都提到了。开展“三冬”运动，虽然不象如火如荼的武装斗争，也不是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但我仍然想在这里作一专门的介绍。1942年10月，苏中军政党扩大会议期间，总结基层工作的经验，通过了开展“三冬”运动的决议。其后，每年冬季相沿成习，都坚持开展“三冬”运动。这个运动已成为解放区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每届冬季，天寒地冻，农民大都闲在家里。水网地区河水结冰后，交通很不方便，敌人进行“扫荡”也比较困难。我解放区军民即利用这一时机，开展“三冬”活动。“三冬”，即指冬防、冬耕和冬学。冬防，是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整编队伍，进行战斗训练，防止敌特破坏，并发动群众参军、拥军优抗等活动，即加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设。冬耕是以提高农业生产为目的，加强根据地生产建设的运动，还包括农货、赈济等工作。冬学，是向基本群众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和普及文化知识，旨在提高广大群众

的抗日民主意识，促使根据地大批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结合。

1943年6月，我代表苏中区党委作过一个《关于“三冬”工作的基本总结》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从1942年12月初到1943年3月底的“三冬”运动中，所取得的成果是很可观的。通过冬防，一些没有民兵自卫组织或组织薄弱的地区，发展壮大民兵组织。1942年冬防中，有96%的乡建立了民兵组织。苏中行署在冬耕中提出5万担公粮为农贷基金，三分之一作为农业生产贷款，也为最贫困的农民解决耕牛、种子、肥料困难；三分之一作为贷款，三分之一作为灾荒救济贷款。在冬学运动中，苏中84%的乡开办了识字班、识字站，进冬学的学生达120935人，学生成分中民兵和青年占80%以上。在短短的三四个多月里，动员如此广泛的群众参加“三冬”运动，在苏中解放区还是第一次。

群众为什么如此热烈投入“三冬”运动呢？那是因为，这个运动既代表了群众的共同愿望，也确实为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毛泽东同志说：“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三冬”运动无疑也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的。

(二)

现在，许多青年对抗战期间根据地建设是很陌生的，在他们的心目中，根据地好象只有武装斗争，打仗就是一切。事实并非如此。根据地的工作内容是异常丰富的；根据地农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是多姿多采的。全国解放后，我们

搞社会主义建设，也吸取了不少民主革命时期根据地的经验。农村相对来说比城市落后，但有党的领导，有一支坚强的人民军队，有大批坚持抗战的农民先进分子和知识青年充当各方面骨干，因而在根据地广大农村也建立了一些先进的制度，如民主选举各级政权的干部，农村合作化运动，也包括比较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办法，等等。

冬学是群众性的政治学习和文化教育普及活动。这里我要着重介绍一下冬学。不普及新文化，就不可能提高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苏中根据地商品经济比较发展，因而群众的文化程度略高，但文盲仍占80%以上。翻身以后，他们迫切希望识字明理，我们的冬学就确定“明理第一，识字第二”的教学方针，从识字开始，结合进行抗战教育。围绕教学方针，苏中行署文教处刘季平处长编了一本名叫《万事通》的冬学教材。这本教材通俗易懂，内容丰富，从时事形势、任务、政策，讲到根据地各项建设工作，如发展生产、减租减息、拥军优抗、缴纳公粮、民兵工作、妇女工作、科学卫生等。文字浅显生动，虽然每课只有短短几句，却能把一件事或一个问题的主要意思突出地反映出来，让人获得鲜明深刻的印象。例如《万事通》的第一个单元，共有三课，课文是：

(一)

人牛要太平。

(二)

人不是牛，

人不是马，

做人不做牛马。

(三)

今年做牛马。

明年平天下。

当时，敌伪军常到根据地“清剿”、“扫荡”、抢牛、抢粮，弄得人和牛都不太平。“人牛要太平”，是根据广大群众的普遍要求提出的。牛是农民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这里用牛来体现群众的切身利益，既很恰当又易理解。可是，怎样得到太平呢？那就要大家起来坚决同敌人作斗争，彻底打垮敌人的“清剿”、“扫荡”，直到把日伪军赶走。所以，第二课讲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启发农民起来斗争。第三课指出斗争胜利的前景，原先农民象牛马一样受剥削压迫，只要团结斗争，明天就将是新社会的主人。

另一单元，是讲武装斗争的，也是三课：

(一)

龙有头，
树有根，
打敌人要骨头硬。
那个顶硬？
新四军！

(二)

千把锄头万把叉，
三个两个一把抓，
十个八个四面打，
来得太多吓跑它。

(三)

攻城要攻心，
君子不杀俘虏兵。

这一单元首先讲武装斗争必须有党的领导和坚强的人民军队，接着讲民兵战术，“千把锄头万把叉”，形容群众武装的声

势，下面讲民兵运用机动灵活的战术，到处打击敌人。最后一课对民兵进行俘虏政策教育，因为民兵、自卫队常常捉到俘虏，进行政策教育很有必要。

宝应县在“冬师”训练班上根据《万事通》的章节和内容，按当地流行的曲调，编成《明理小唱》。上课时把《明理小唱》抄出，挂在墙上，“冬师”先用树枝做的教鞭指着教材逐字教，认好字再讲解内容，讲好就教唱，唱会了再由学员自己谈体会。其中《老政府》、《新政府》两首歌词，新旧政权对比形象鲜明，群众易于接受，所以流传很广。

“老政府，
当道啊，
粮税多啊，
敲不尽的竹杠，
吃不尽的苦啊，
公粮就要六斗多一么呀！
我的亲妈妈，
公粮就要六斗多一么呀！”

通过《明理小唱》，群众对老政府（指国民党政权）、伪政府（指汪伪汉奸政权）、新政府（指抗日民主政权），中央军、和平军、新四军的区别弄清了。谁是抗日的，谁是帮助劳苦人民翻身的，认识明确了，对抗日民主政府和新四军也更加拥护了。宝应县水荡多，往来要靠船。根据地建立后，军队、政府人员往来频繁，交通不便，县委决定在广洋湖、射阳湖、和平荡、水泗荡、绿草荡上筑五条坝，动员3万多民工，1000条船只到工地，冬学也办到工地上。“冬师”除了教《明理小唱》外，又根据工地情况，编成《打坝杂唱》，进行宣传鼓动，各区、乡的民工互相挑战，比快比好，不到半个月，就将顶宽1丈，出水5尺，总长30多里的五道

大坝筑好了。冬学不仅教群众识字明理，还激发了群众的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万事通》课文，把政治和文化教育结合起来，不仅是农民上冬学的教材，也是部队战士上课的教材。《万事通》共有十几个单元，四十多课，各地翻印时又结合具体情况，补编若干课文。《万事通》的课文，不仅在课堂上讲，还作为标语、口号、墙头诗写在墙壁上，或当歌词唱，传播很广，真是人人欢迎，家喻户晓。

冬学一般采取开班上课的形式，有的称冬学班，有的称民校或识字班。一般以自然村为单位办冬学，遇有敌情时往往化整为零，临时编成小组坚持学习。家务重、孩子多的妇女，跑出去上课困难，就近组成冬学小组，由儿童团派小先生登门教授。上课一般借小学或私塾的课堂。冬学小组的灵活性比较大，因地制宜，左邻右舍打一声招呼，随便集中到那一家就可以上课。没有黑板、课桌，就用烧炭、树枝在地上写字。有些民兵把冬学和值勤结合起来。他们上课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在值勤时，边完成值勤任务边上课。如西县高明乡有一个民兵冬学组，经常在卢庄、界沟、芹湖敌伪据点附近活动，他们上课时唱的歌，敌人在据点里都能听得清清楚楚。有时，他们配合武工队深入到敌伪据点进行宣传活动，敌伪也无可奈何。

冬学教师主要由中小学教师和经过挑选的私塾教师担任，有时也有基层干部、青年学生和社会进步人士参加，通称为“冬师”。1942年冬，我们共动员了4337位中小学教师担任“冬师”。开学之前，“冬师”先进行集训。那时，苏中的私塾占的比例较大，如江都河南地区的浦头乡，在32个自然村中，私塾有50多所，学生1500多名；小学只有3所，学生300多名。两者比例为18:1，学生人数比例是5:1。私塾分布的面广，大一点

的村庄有二三所私塾，小村庄也有一所私塾。私塾教师在当时显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他们搞的是封建教育。私塾教师的待遇很低，据江都县河南地区调查，塾师全年收入一般一人只有五六石黄豆，少的只有三四石，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但这批知识分子除此别无出路，这就是苏中根据地私塾比学校多18倍的根本原因。在冬学运动中，既要发动他们参加冬学，又要对他们的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进行教育改造。为此各区专门举办了塾师训练班，由区的领导干部对他们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组织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对他们进行业务辅导。为了保证教学质量，还将“冬师”就近编成小组，定期开会交流教学经验，定期讨论集体备课。通过集体备课，明确每课教材的中心大意和教学要点，教学方法，然后让他们去上课。

冬学运动促使教师面向工农群众，联系抗日战争实际进行教学，使教师和学生都在政治思想上得到提高。当年根据地在组织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的同时，组织了教抗会，把学校和私塾的教师吸收到教抗会中来，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少奇同志在1942年也曾说：“如果我们能在深入的教育工作中吸引了数百万基本群众与青年儿童，使他

们不论在什么困难的情况下都跟随我们走，那我们就要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开辟后，就很重视教育和教育制度的改革，冬学运动促进了解放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改革。

为了保障儿童的身心健康，教抗会要求废除体罚学生，宣传民主教育方针。经过提倡和宣传，多数教师不搞体罚了，但少数仍对学生体罚。江都麻村区教抗会在1942年的儿童节，召开了儿童代表大会，举行“焚刑大典”，当众销毁戒尺、藤条，大造改革封建教育制度的舆论，受到广大学生和家长的 support、拥护。

1943年6月，苏中行政公署文教处颁发的《彻底改造文教工作十大要领草案》中有两项规定：一是把整个文化教育和坚持根据地、准备反攻、建设新中国的实际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二是把所有中等学校加以调整改造，转变为培养师范生和中级干部的机构。根据草案精神，对原有中学进行教学制度改革。三分区如西县中增设了财经会计和简师实验班，初中又增设了根据地建设、生产知识、医药知识、军事知识、政治常识等课程。时事政治课占的比重较大，主要对学生进行形势、任务、党的方针政策以及青年前途的教育。没有统编的教材，就选用毛泽东同志著作、鲁迅的文章、报刊上的论文、通讯，朱克靖同志的《回忆与感想》、俞铭璜同志的《新人生观》等作为政治文化课教材。没有书本，就由师生动手刻写讲义油印成册；没有粉笔，教师自己动手制作；课桌、板凳不够，发动学生自带。由于敌人经常出动“扫荡”，学校经常移动，河坎、树林、草堆头、车蓬里都可作为课堂。教学采用分散的方法，充分利用“小先生”制，以小组讨论、大组总结为主，经过灵活多样的教学活动，使教学坚持下去。

苏中还创建了一批新型学校，如苏中公学就是在1943年秋仿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创办的，由粟裕同志兼任校长，管文蔚、

夏征农同志为副校长。苏中公学的培养目标是区级以上干部，设有政治、军事、财政、民运等系。学生有几方面来源：一是各分区、县选送的干部；二是向社会上招收的青年学生；三是沦陷区地下党输送来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地下党的干部和党员。此外，苏中中学还把日军中反正是的反战青年编成日本学生队，参加苏中中学学习。每期学习6个月，学生按班、排、连编队，过的是供给制的军事生活。苏中中学把转变学生思想放在首位，教学的每个单元由学校领导作报告，我也去苏中中学作过报告。大的报告因人多，常在露天广场举行，有时也利用祠堂、庙宇上课。学员们听课坐在背包上，用膝盖当课桌作记录。学校的文娱、体育活动开展得很活跃，每个单元学习结束，都搞会演、搞体育竞赛，还公演根据《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话剧。学生生活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经过半年的学习，学生的思想觉悟大大提高，不少人在学习过程中入了党。苏中中学共办了两年多，于抗日战争胜利时结束，共培养了数千名政治、军事、财经、党群干部。这批干部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成为骨干，作出了很大贡献。

(四)

冬学运动推动着根据地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许多“冬师”为了提高群众的学习情绪，常常结合当地涌现的好人好事，编出故事和唱词，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娱形式，如荡湖船，打花鼓、挑花篮、唱凤凰、莲花落等等排练节目，在春节期间演出。那时，我们每行军到一个村庄，只要看到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开展起来，就知道这个村的冬学一定办得比较好。通过冬学的组织和发动，涌现出许多农民文娱活动分子，有的不仅会唱小调，还会唱。

戏，有的不仅会编顺口溜，还会编戏文。宝应县就把这批农民出身的文娱积极分子集中起来，办了一个农民剧社。社长是一位62岁的农村艺人，他唱戏动情时，自己淌下眼泪，感染得观众也淌眼泪，只要他出台，观众情绪就高涨起来。在旧社会民间艺人唱戏是专供有钱人消遣的，当他们明确现在唱戏是为了动员群众、赶走日本鬼子、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以后，积极性大大提高了。每次只要向他们讲一个故事梗概，他们就会分配好角色，一面编情节，一面串戏，角色自己编唱词，戏串好，剧本也编出来了。这个剧社成立不久，车桥战役打下10多个据点，他们就赶往刚解放的地区演出。新区群众通过看戏，对党的方针政策也有所了解。在减租减息没有开展或开展得不彻底的地方，剧社演出淮剧《照减不误》，打消了群众心里的顾虑。在演唱会上，农抗会接着布置减租、退租斗争，农民认识提高了，敢和地主面对面进行说理斗争了。许多群众、干部都说，用唱戏宣传政策，比什么都灵。

(五)

对于苏中文化事业的发展，我在这里也记述一二。根据地群众政治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报纸就成了人民群众的主要精神食粮。我们党历来有办报的传统，把报纸看成是集体的宣传者、组织者。当时军部有《抗战报》、《江淮日报》，一师政治部办过《抗敌报》，苏中区党委先后办了《滨海报》，后来改成《苏中报》。这些报纸在苏中地区发行，影响都很大。各分区、各地委又办了《前哨报》、《人民报》、《群众报》、《江潮报》、《江海报》、《江海导报》等等；各县为了指导具体工作、交流经验，也纷纷办起了在一个县范围内发行的《简报》。

在敌人频繁激烈的“扫荡”、“清剿”中，在敌人封锁，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办报是一件十分艰难的工作。这里，我想介绍一下，三分区于1941年7月1日创刊的《江潮报》。

《江潮报》的编辑、印刷、出版、发行的过程，是一个战斗的过程。在根据地斗争最艰苦的1942、1943年，报社同志背着电台、刻腊纸的钢板，走到那里就在那里出报。有时，他们用独轮车装运纸张、油墨，奔走于广大乡村。有时，他们用小船在芦苇荡里穿插转移，既当记者，编辑，又是抗日战士。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他们写稿、收电讯、编稿、刻写、印刷、发行，有时甚至在民兵和群众的掩护下，隐蔽在望得见敌人碉堡的边沿区坚持出版。

开始时，他们用筷子和缝衣针做成刻钢板的笔，用小学生的尺代替油印的滚筒印报。后来，《江潮报》的油印刻画工艺，被被誉为印刷术的奇迹。报纸的标题就象铅印一样都是正规的各号宋体、黑体字，小字一律用宋体刻写。字字正规清晰，被称为“新四军的铅字”，甚至连配合新闻绘制的地图、人物头象、插画、题花、美术字刊头也都书写得精致、美观。后来中缝的广告还出现了套色。缮写钢版的同志经过苦心的钻研、摸索和实践，能用不同的钢板、铁笔和书写方法，精心刻写出各种字体和图画，又能保证大量印刷（每期最高印刷量可达2600份）而蜡纸不破。油印的同志摸索出在不同的气温条件下用不同的油墨配方，能够始终保持字迹的清晰度。其精美的程度，猛一看，往往会以为是用珂罗版印刷的，有的图画连明暗浓淡都能表现出来。

《江潮报》的出版，在敌伪据点里也产生极大的政治影响。报纸贴到敌人据点附近，敌占区许多青年就是看到报纸而投奔到根据地来的。有的群众把报纸剪成小块，躲开敌人耳目带到城里去，暗中传阅。连伪军士兵下乡搜到《江潮报》，也塞进子弹袋

里，带回去私下传阅。有些被敌人囚禁在牢狱里的同志也千方百计托人找《江潮报》看。由于报纸的影响越来越大，敌伪机关竟出价50元、100元收买1份。后来，敌人害怕《江潮报》，竟伪造《江潮报》反宣传，在下乡“扫荡”时散发，但它内容反动、印刷拙劣，很快就被群众识破，无法继续出版。

办报的同志还告诉我，华中油印得最好的《拂晓报》和《江潮报》曾送到大后方参加展览会展出，获得很高的评价，并曾介绍到法国去展览，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伟大毅力与克服物质困难的最具体的表现，影响巨大。据说，1941年1942年间，《江潮报》的同志们将当年的合订本一份，作为献给反法西斯战争的领袖斯大林寿辰的礼物，托地下交通送到当时在上海的苏商时代出版社转送莫斯科。后来，他们还收到回赠的中文版《列宁主义问题》精装本两册及《真理报》等书刊。

在冬学运动中涌现的广大工人、农民积极分子看到自己的报纸，就把刚学到的一点文化用来读报，有的还当上报社的通讯员，为报纸写稿。报社同志十分认真对待他们写的稿件，精心为他们修改、补充、加以发表。每发表一篇稿子，往往成为工农群众继续学习文化的动力。不能发表的，也往往得到报社记者、编辑帮助，指正错字、错句，象语文老师改学生作文一样，告诉他们今后应该怎样写，使他们在文化和写作上不断提高。许多通讯员就是因为通过实践，肯学习，进步快而提拔到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上来的。同时，报社也由于有了一大批能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活跃在第一线的记者和通讯员，使报纸越办越好。

第六节 根据地的经济斗争

(一)

长期坚持抗战，没有源源不断的财力、物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军队要吃饭穿衣，打仗要枪枝弹药，一发步枪子弹就是几元钱，一发八二炮弹等于一两金子，动枪动炮更少不得化钱。当然，如同《游击队员之歌》所唱的那样，“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国民党蒋介石确实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但是，建设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做好财经工作是绝对不能忽视的。

翻开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关政权工作的历史文献，其中，1941年度苏中财经工作的总结，记述了如下一些数字：

“本年收入总数为2,000万元(法币)，盐税300万元，占总收入15%；棉花税380万元，占总收入19%；猪税300万元，占总收入15%；进口税420万元，占总收入21%；杂税150万元，占总收入7.5%；寒衣捐50万元，占总收入2.5%；田赋400万元，占总收入20%。因田赋税收工作还未广泛深入地去做，故可能该收而未收到的尚有100余万元；进口税亦是如此……本年支出，包括党政军民、宣传、教育、生产救灾、上缴军部等各项在内，合计为1,930万元，收支基本平衡。”

以上虽是一些简单的数字，却反映了苏中根据地初建时期

财政经济的工作概貌。这个数字，与1942年苏中区财经总收入8,550万元相比，显然少得多，仅占四分之一弱，可是1941年即使只有2,000万元，也就非常了不起了。因为，它是苏中根据地开辟后在财经方面所迈出的第一步，在此之前，我们的干部对这方面的工作是比较陌生的。

回顾新四军创立之初，根据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协议，我们的粮饷及一切军需，都是由国民党政府供给的，分管那方面工作的同志，定期向驻上饶的第三战区兵站总监部领取，尔后分发至各支队。尽管国民党一贯克扣我军饷，并在人、枪、款各方面限制新四军发展，但当时也或多或少领到过一些钱。已经开赴敌后的几个支队更困难些，有时往往因部队和地方党政人员的急需，不得不向地主、富户借粮借款，或以募捐的方式解决燃眉之急。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悍然宣布“解散”新四军，“撤销”我军番号。打那时起，原先已少得可怜的那一点粮饷，国民党政府也分文不给了。抗日之师无衣无粮又无钱，面临着巨大的财政困难。

顽固派的卑劣行径是难不倒我们的。人民子弟兵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得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们扎根于民众之中，“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们开始学会在自己活动的区域内收税、征粮，寻找解决供给难题的办法。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政权，在自己的根据地内收税、征粮，毕竟是个新课题。我们许多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同志，比较熟悉用没收土豪劣绅的钱财来解决给养。那时，我们也搞财经工作，甚至也征点税，但数量很有限。抗日战争与土地革命战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所不同，方针、政策也相应有很大变化。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以实现抗战建国纲领与实行三民主义政纲为方针，需要时刻注意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巩固与发展，合理调节统一战线内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不断破坏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地方民主政权则与之相反，“在清楚顾及人民大众利益的条件下，必须使不反对抗日的地主资本家能够保有一定的利益与地位，以便适当的调整各阶级的关系，以打击日寇诱引地主资本家的阴谋，打击投降派鼓煽地主资本家的活动，并巩固敌后的团结抗战。”所以，在日寇入侵的历史转折关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只有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集聚民力，组织大生产，在打击日伪的同时还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解决给养问题。这是一门新学问，有待我们从头学起。

初到苏北时，我们曾在局部地区尝试着搞过一些税收工作，为东进的人民子弟兵解决吃穿困难。但那时根据地小、军队也少，我们也不懂得如何征粮收税，在富庶的苏中鱼米之乡，我们吃了近一年时间的杂粮。到了黄桥，准备与韩德勤部队决战，部队给养问题很突出，可是税收总额也只有20万元，实在艰难得很！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有趣的故事：1940年春，先期北渡的新四军挺进纵队驻扎在江都县三桥两荡一带（大桥、吴家桥、网子桥、焦家荡、花家荡）。惠浴宇同志兼任“江都县民众抗日自卫委员会”的主任。这个委员会，是当时苏北最早的半政权性质的群众抗日组织，也是新四军在“桥头堡”立足的地方行政机关。但是，国民党的江都县长还是派人到我军控制的区域收税征粮。当地有一位主张抗日的开明士绅袁希伯先生，发现新四军供给困难，生活艰苦，就对惠浴宇、孙更舵两同志说：张县长身为父母官，不抗日，见了鬼子就跑，他收税要粮，为的是养姨太太，你们共产党真心抗日，难道不该收税、征粮吗？他不抗日能收四角钱，你们真抗日，收个半数两角钱难道还过份吗？

我看你们这样做无愧于江都父老！结果，惠浴宇同志真的按袁先生的建议去做了，群众很拥护。后来大家常说这叫做“半政府收半税”。

当时，挺进纵队在沿江口岸的大桥镇、三江营等地设过卡，征收一些来往商贾的进出口税，其中主要收贩私盐商户的过境税。这类筹款方式虽没定为制度，但在部队积极开展抗日斗争而吃穿无着之际，解决了部分钱、粮问题。

(二)

皖南事变爆发不久，我刚进入泰东地区农村，就读到一篇题为《论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文章。这是延安《解放》周刊上的社论，看后颇受启发。文中讲到我们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主张积极发展工农业生产与商品流通，欢迎各地资本家到根据地开办实业，我们将切实保护他们的经营。我们奖励民营企业，而把抗日民主政府经营的企业当作整个生产贸易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主张以发展生产事业以调剂货物流通，达到根据地各区域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我们主张根据地内贸易自由，而对于日寇破坏我抗日经济力量，掠夺被占区资财以实行“以战养战”的阴谋，坚决予以打击。

那篇社论阐述精辟，它说根据地民众，包括工人、农民都有纳税的义务，主张实行有利于团结抗日建国的合理的税收。

这篇社论，给苏中根据地开展财经工作作了非常适时的指导。我还重温了过去阅读少奇同志《关于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政策问题》等小册子所做的笔记，使我这个门外汉从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认识了这项工作的意义。说到财经工作，如税收、征粮、发行抗币、指导生产自给、制订财经制度、培训财经审计工作

人员等等，朱毅、陈国栋等同志做了不少工作。朱毅同志一直担任苏中行政公署的财经处长。苏中根据地的建设，确实离不开他们这一批好管家。

少奇同志很早就提出，要“招革命的兵，买革命的马”，囤粮聚财，建立根据地。根据地，顾名思义是赖以生存之地，抗日武装固然是主要支柱，但党政军民的衣食住行及其它生活必需品，也是很重要的。空着肚子、光着身子是无法抗战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讲起来很简单，但要充分认识它的重要性，真正付之实行，不经过亲身经历，就很难深刻体会到。

(三)

历史事实反复证明，财经工作的开展，对我苏中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坚持、发展，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都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抗日战争中，财经领域的斗争，也和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一样十分尖锐复杂。一方面，它要保证一师部队及各地方兵团等抗日武装的军需供给，保证根据地各级党政人员的生活供给，还要不断改善民生，保障广大抗日群众的生活需要；另一方面，还要与敌寇的经济掠夺封锁、与顽固派的干扰破坏作拚死搏斗，以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苏中位于长江下游的黄海之滨，气温适宜、地富人稠、物产繁多、交通便利，是华中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之一，尤以棉花、盐、粮油、生猪等质好量大而著称全国。日寇自侵华战争开始，即对我盛产战略物资的苏中垂涎三尺，作为势在必夺的目标。敌人依仗军事上的优势，占领我大小城镇、水陆要道，用“清剿”、“扫荡”以至“清乡”等残酷手段，将我根据地分割成零星小块，再加以封锁掠夺。特别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更加加紧对苏中地区的控制和掠夺，以遂其“以战

养战”的策略。他们到处设立公司、洋行，垄断市场、搜括五金、盐、粮，强购农产品；在伪化区则苛捐杂税，强征暴敛。有些地区税目竟达百种之多，连农民买肥料也要纳税。据统计，敌人在数年内，仅在东台一县掠夺的棉花就达数10万担。日寇敲骨吸髓式的经济掠夺、血腥搜括，使苏中这块富饶土地上的工农商业日益萧条，根据地经济遭受到极大的破坏。因此，在财经这条战线上的敌我斗争也跟军事斗争一样，显得愈益激烈和复杂。

在税收工作方面，敌我之间就进行了长期的搏斗。日伪常绑架和暗杀我方税收工作人员，四处设立伪税务局，破坏根据地税收。当时，苏中各县民主政府基本上都建立了健全的税收机构。仍以江都为例。1940年春，仅在大桥镇开始学着收半税，到了1942年，县税务局之下又设立了曹王寺、真武庙、丁伙、纪北四个税务所，并设立曹王、余板、大桥、嘶马、口岸、刁家铺、白塔河、纪北、麻村、邱墅阁、杨庄、乔墅、真武等许多征税点，有一批责任心强、作风正派的同志专门从事基层税务工作，并随时准备与日伪军、特务、流氓作斗争。据统计，1941年间，全苏中根据地就有200名税收人员光荣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护卫根据地军民的生命线，是可歌可泣的。他们的功勋，永远值得后代铭记、景仰和崇敬。

八年抗战中，1943年是苏中敌后斗争最艰苦、紧张的一年。日伪除集中兵力对四分区实行“清乡”外，对其他分区亦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扫荡”、“清剿”，根据地军民面临一场空前残酷的生死搏斗。战争形势的严酷，加上局部地区发生蝗害、旱涝等灾害，更造成了我们财政收入的重大困难，各级领导同志都免不了对财源问题担心。

当年3月，华中局向各战略区发出了一个春季工作的指示，

其中重点强调了关于抓紧生产运动的问题。指示说：“各地应参考陕北及华北各地生产经验，集中注意到生产问题。各级军政机关应迅速作深入的动员与订出各类各项生产计划，实行开荒、植树、种田、种菜、种麻、种豆、养猪、养鸡、养鹅、养鸭、自制鞋袜毛巾，凡是军队机关所需用的一切东西都设法自己动手。各级党政机关及群众团体，应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发动群众开展生产运动，采取各种妥善与积极的方法帮助贫苦群众解决种子、耕具与肥料问题，鼓励群众多生产与军需有关的东西，多开办制造农具与纺纱织布等小规模生产合作社。各地都应将财政经济的基础放在生产上，而不要放在税收和纸币的发行上。”

记得与华中局这一指示同时下达的文件中，还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摘要。毛泽东同志说：“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是我们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但是有许多同志片面地看重了财政，不懂得整个经济的重要性；他们的脑子终日只在单纯的财政收支问题上打圈子，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字作为抗日根据地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如果不掌握住发展生产这个中心环节，一味地征粮，收税，那就势必加重根据地人民群众的负担，而长此以往，则无异是竭泽而渔。1942年底，我们虽发放了1000万元农业贷款，用作局部受灾地区恢复和发展生产的资金，但对于发动党政军民一齐大规模开展生产运动，以自己的双手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的，我当时的思想认识也是不够的。经过中央如此一点拨，思路才豁然开朗。

苏中的群众和全国各地群众一样，堪称勤劳勇敢，但由于

战争破坏、生产水平很低，生活非常艰苦。他们时常是宁愿自己吃粗粮、一日两餐，也决不让新四军战士挨饥受冻。他们富于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急子弟兵所急，事事、处处想着抗战大业，我们怎能不关心他们的疾苦？

区党委一班人，认真学习了华中局的指示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精神，认识到日后苏中根据地的巩固，既要动员群众，在军事上打败敌人，又要建设好政权，大力抓好生产，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千方百计改善抗日军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四)

1943年5月间，我们离开了江高宝地区，经兴化水网地带，又辗转进入东台三仓河一线。经过精兵简政之后，区党委、行署和一师师部都很精干，统统聚集在黄海之滨。分别数月，我又和粟裕、管文蔚、钟期光等同志聚在一起了。当时党政军机关分驻在相距仅里把路的邻近的几个小村庄上，县委书记陈扬同志、县长董希白同志也常来谈话，汇报县里的工作。我喜欢东跑西走，经常到附近农村调查研究，了解农民生活状况。

1942年，党中央在延安倡导军民大生产运动，一面打仗，一面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流传至今的歌曲《南泥湾》、秧歌剧《兄妹开荒》就是当时生活的真实记录。面对苏中根据地的财政困难，我们区党委也决定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以发展和繁荣敌后经济。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我苏中党政军民又一次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精神进行的一次伟大社会实践。

6月上旬，区党委在三仓河北边的吴家村召开了扩大会议，总结和布置工作。会场设在当地一座寺庙里。宽敞的三官殿内坐满了各地、县委的主要负责同志，这是继去年底南坎会议后的

又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会上，我和管文蔚同志分别作了《“三冬”工作总结》与《精简工作总结》。兼区党委书记的粟裕同志则作了《半年来苏中工作总结及今后几大任务》的报告。他说，我们今后总的任务，就是党中央、华中局提出的敌后三大任务：战斗、生产、学习，以积极增强自身的力量，粉碎任何严重的清乡扫荡，达到坚持苏中原地斗争的目的。粟裕同志在讲到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时指出：“从对敌斗争来说，经济斗争也是重要战线之一，只有经济战线上之斗争胜利，才能给敌人更严重的打击。今天经济建设之重心，应集中于生产建设上面。生产建设之主要目的，则在于广泛的组织人民之生产热忱，继续改善人民生活，使人民丰衣足食。”他还明确指出：“部队及机关生产，目的是力求能自给自足，要打破动荡环境不能进行生产的观点。”

会议期间，各地来的同志们对以组织军民大生产运动，来促进根据地经济繁荣，改善人民生活，解决我财政困难问题，都很关心。有人提出，遇敌扫荡时可用当地民兵、自卫队武装保卫生产；有人提出，可动员群众开垦荒地，增加土地耕种面积，军队除了作战、训练外，也可参加开荒；还有人说，产棉区应发动群众，家家纺纱织布，村村做鞋缝袜，这样一来，我军民穿戴才有保证。各级领导同志对实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方针，打破敌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与掠夺，充满着胜利的信心，思想认识上是统一的。

提起军民大生产运动，我们苏中得天独厚，拥有土肥水美、气候宜人的自然条件，理当赶上全国皆知的陕北南泥湾。那年，从我们驻东台起，直到后来迁往宝应，区党委机关的干部和警卫战士们一道，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运动。我也在驻地门前屋后种过瓜果蔬菜，在浇肥、捉虫时洒下了汗水，不多久

化成了收获的喜悦。自己动手学纺纱，倒是一门新学问，当年不少同志下过一番功夫。记得苏中报社的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在生产运动中表现很出色，一时被传为佳话。那些记者、编辑们，原本是动笔杆的书生，但经过数年革命战争的锻炼，都成了能打仗、会劳动的抗日战士。他们在报社驻地周围，硬是靠肩拉绳拖，犁出了近10亩菜地，自己砌茅厕、养猪解决肥料；撒种、栽苗、浇水、施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功夫不负有心人，报社人员的菜蔬供应终于自给有余，既改善了生活，又节约了经费。他们还打了几部木纺车，工余时间轮流纺棉纱，制作土布军衣。这个团结战斗的集体，提出“向延安解放日报社学习，争当苏中根据地机关生产第一名”的口号，把生产运动搞得热气腾腾。

(五)

苏中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运动，规模声势之大，收效之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在区党委提出的“以发展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为主，以发展手工业及农业相适应的副业为辅”的方针指导下，苏中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都踊跃争当生产建设运动的模范，涌现了大批先进个人。区党委和军政委员会趁热打铁，及时表彰好人好事，推动生产建设运动深入发展。经过全体军民共同努力，根据地财政经济情况迅速好转了。

翻阅当年苏中根据地的报刊，时时可见反映军民生产的生动事例。

当年，东台县军民年内即垦荒地3万5千亩，仅粮食一项即增产1万5千担；靖江县组织群众2万5千余人兴修水利，7天时间就完成了塌港河工程疏浚任务，为来年旱涝保收奠定了基础；兴化县4千6百户农民自愿入股，办起了生产合作社，走上

组织起来的道路，用集体互助的形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如皋县拼丰区群众 1300 余人，用 10 天时间开挖了深 10 尺、长 7 里的灌溉渠，使沿岸 2 万亩荒田变为良田。

在那前方打仗、后方生产的年代里，苏中妇女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繁荣经济、自给自足作出了很大贡献。黄海边上的女劳模王美珍就是无数先进人物中的一个。这位来自群众、受人爱戴的基层妇女干部，带领滨海乡的妇女们组织了纺织合作社。500 多部土纺车一齐转动起来，一天就能产 125 斤棉纱。既为部队军需提供了原料，也增加了群众的收入。后来，《苏中报》报道了她的事迹，影响极大，推动了沿海棉区纺织业的发展。还有被誉为“一朵大红花”的著名女劳模李桂英，是全苏中的先进典型。那年她参加苏中区生产建设大会，我还向她表示了祝贺。

军民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根据地财政经济状况日见好转，不能不引起日伪的仇视。为了加紧经济封锁和物资掠夺，日伪采取了两种恶毒的方法，疯狂破坏我根据地人民的生活动。一是搞不等价交换，即提高工业品价格，压低农产品价格，以掠夺大批农产品，致使根据地人民愈益贫困。二是滥印滥发伪币，并用伪币抢购根据地的各类物资，加剧根据地财政经济困难。随着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节节失利，伪币的信誉和价值日益低落，它的流通使根据地的财政金融遭受到强烈冲击。1944 年《江潮报》曾刊载过一则活生生的事例，有个农民把一头肥猪赶到镇上出售，刚脱手离开镇市，他手中的一大把伪币就买不回一只小猪仔了。那农民气得连呼上当，大骂伪币“揩屁股还嫌小”。

针对敌人毒辣的阴谋，苏中区党委和行署接连发出几个指示，号召根据地军民迅速对敌展开经济斗争。除提出若干具体

措施,如:严格管理进出口物资,实行以货易货办法;严禁伪币流通,一切交易与伪币断绝关系;确立抗币本位制度,一切货物都以抗币定价;多办合作社,解决群众运销、消费、生产、借贷等困难之外,还及时颁布了财政、金融、工商、供销贸易、粮食管理等一系列的法令和规定。为了进一步加强经济斗争的组织领导,区党委决定苏中区及各地委都建立财经委员会。我兼任苏中区的财经委书记,陈国栋同志担任副书记。全党集中力量,领导这场不用枪炮但又十分尖锐的特殊战斗,一方面发动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参加对敌经济斗争,另一方面又开展了大规模的节约运动。

(六)

在车桥战役之前,区党委发出了《关于开展节约运动的指示》,号召根据地党政军各级机关都应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制订节约计划,完善审计制度,加强物资管理,紧缩财政开支,控制供给标准,提倡自觉节约各项费用,最大限度地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区党委机关的成员带头响应,许多同志主动节约津贴费、伙食费、办公费和保健费,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厉行节约,蔚成风气。在一段时间里,各机关原规定每天一斤粮、五两菜、二钱油的供应标准下降了,菜金和油干脆不发了,津贴费也没有了。但是,人们自己动手,努力参加生产,生活条件虽艰苦些,但硬是渡过了难关。有许多小事情我至今仍记得很清楚。当时,一张信纸都两面写字;一只信封用后拆开再用,两面用过再贴白纸,至少用三四次。当时的供给标准是:机关人员每人每天供应大米38两(按16两制的老秤计算),部队每人每天大米40两(菜金、油、盐、柴草一起折算在内);津贴费每人每月只

几毛钱，仅够买斤把猪肉，后来增加了一些，但官与兵、领导干部与一般干部大致数量相等，而大家对清贫艰苦的生活却甘之如饴。共产党员们更以节约为荣、浪费为耻，时时处处为群众做表率。

当然，也不是说当时革命队伍就像清水一盆，这是不可能的。也有极个别的人表现不好，有人堕落，有人犯罪。如师部原特务营长，就因贪污千元公款而被判死刑。我们对这类事的处理是十分坚决的。起初，有人姑念那位营长是老资格、立过战功，对处理有异议，我和管文蔚同志也向粟裕同志说过情。但结果还是坚决处决了他，那真是《三国演义》里的“挥泪斩马谡”啊！这道理也很简单，在法纪面前不人人平等，社会风气又怎么好得起来？然而要做到这一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厉行节约、发展生产，是根据地开展对敌经济斗争的两个重要环节。紧紧抓住这两环，我们才粉碎了日伪的经济封锁和掠夺，渡过了难关。

苏中根据地军民，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在敌后游击战争环境里办起了被服厂、印刷厂、兵工厂、卷烟厂，主要依靠地下交通线，由水陆两路从上海等地运回医药用品、医疗器材、机械设备、布匹颜料、收发报机等等大量物资。其中，我们首创印刷抗币的印钞工业，第一批江淮币的版子，就是在上海秘密加工好运回苏中的。此后，华中各地的淮北银行、盐阜银行、淮南银行、大江银行、江南银行、浙东银行等，也陆续建立起来。我去印钞厂看过，其中许多设备，如园盘机、胶印机、凹形电镀版及油墨、道林纸，都是上海工作的同志协助解决的。他们所作的贡献，苏中人民是永志不忘的。

第七节 开展城市工作

(一)

城市工作也是一条重要战线。在苏中根据地，这是指敌占城镇中我党的秘密工作、敌占区与根据地之间的秘密交通，以及对敌人据点的策反、收集情报，等等。开展城市工作的目的，就是争取敌占区群众，瓦解敌人。这项工作，在苏中根据地的斗争史上也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苏中的战略地位日益重要，变成了华中、山东战略区对外联络的东南门户，连结上海的“跳板”。许多抗日志士都是从上海进入苏中根据地，然后奔向其他解放区的。上海地下党组织民众给新四军、八路军以人力、物力的支援，有许多也是从苏中中转的。在上海与苏中根据地之间，我党逐渐建立起一条摧不垮、打不烂的地下运输线，对苏中、苏北以及山东鲁南根据地的巩固、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

苏中境内中小城市和大小集镇比较多，敌、我、顽反复争夺斗争非常激烈。黄桥决战以后，顽固派在苏中的地位逐渐被我取代。我军占据广大农村腹地，建立抗日武装和各级政权，日伪则占据城市和重要集镇。敌人利用他们控制的主要交通线，对我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军事、经济封锁，并不断下乡“清剿”、“扫荡”、“清乡”。城市、集镇被敌人占领，但并未完全为敌人所控制。在城

市集镇中，群众倾向我党、我军，还有一批机智、勇敢的同志深入虎穴，战斗在敌人的“心脏”里，充当根据地的“耳目”，这股潜力是不能低估的。

(二)

上海人民支援新四军的工作，在1940年以前，是由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的。抗战前，党中央派刘晓同志到上海，恢复上海地下党组织，于1937年11月重建了江苏省委。一方面积极开展城市工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另一方面组织市郊农村游击队，配合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的战略任务，并利用上海的特殊地位，把大批人力、物力输送给新四军，特别是送往皖南新四军军部。

从1938年开始，江苏省委陆续派干部到崇明、苏北的通如海启地区，在当地国民党地方武装中发展秘密的武装力量。

1940年10月，新四军东进部队在黄桥反顽决战中取得重大胜利，苏中局面初步打开，急需大批干部，以便开辟和扩大根据地。为此，江苏省委加紧组织上海青年，输送到黄桥参军。抗大五分校当时在黄桥设立招生处，欢迎上海等地青年入学参军。从敌占区来的青年，刚踏上革命根据地，立即被那火热的斗争生活所感染，为自己能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而感到自豪。从大城市来的青年，有些人穿着西装或长衫和皮鞋，有的一时分辨不出韭菜和小麦，甚至误把向日葵当菊花，但过不多久，这些青年穿上土布军装，在革命的大熔炉中得到锻炼，成了根据地建设的一支生气勃勃的力量。从这时起，江苏省委把对新四军的人力、物力支援，重心逐渐由皖南转向苏北等敌后根据地。在此期间，新

四军所辖各根据地，也派人在上海设立了联络点。

考虑到上海地下党力量比较强大和有英、法租界的特殊环境，军部计划在上海设立机构，统一领导上海与各根据地之间合办采购、扩军等事务，并把上海作为军部北移的中转路线之一。东南局副书记曾山同志于1940年底到上海组织落实。江苏省委为全力配合做好这项特殊工作，决定把原由赵毓华、刘锋同志负责的上海至苏北根据地的地下交通机构，划归东南局派来的杨斌同志管理。

(三)

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不少干部、战士冲破重围，几经艰难曲折，陆续进入上海。这是当时形势所逼，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实际上，在环境复杂、特务、汉奸多如牛毛的上海，这许多同志的处境仍然是危殆的。因此，迅速疏散、转移这些同志，使他们安全进入苏北根据地便成了紧急任务。军部决定正式成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强化地下交通机构，负责安置皖南事变突围人员。华中局委托苏中区党委和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保持横向的工作关系，对上海办事处工作加以领导。

区党委指定由我负责这项工作。原在上海管理交通工作的荣健生同志调到苏中，配合区党委组织部统一负责上海来苏中根据地人员的接待工作。不久，这项工作又由苏中区党委交通总局设立一个科专门负责，对外称它为总务科，由荣健生同志任科长。

上海办事处由杨斌同志负责，先后参加办事处工作的同志约有40人，大部分是江苏省委抽调的干部。杨斌同志是东南

分局青委委员，我与他十分熟悉。解放战争期间，杨斌同志在上海被叛徒出卖，英勇地牺牲在敌人的刑场上。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上海办事处成立之初，杨斌同志因患严重的肺病，手术动得过大。但他不顾体弱，全身心地投入这一工作，着手组织力量，增辟了上海至南通任家港、海门青龙港等路线，许多突围同志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秘密进入根据地的。那时抗大通讯处以及后来的区党委交通总局，在苏中三、四分区靠近长江的各港口与敌伪交界的边缘地带，也设立了许多秘密的或公开的联络站。对进入根据地的同志，根据不同情况，有些转送至盐城军部，有些就留下参加苏中根据地工作。

记得那时从皖南事变中突围经上海来苏中到军部去的，有李一氓、谭启龙、余立金、钱俊瑞、夏征农、薛暮桥、胡立教、符确坚、陈茂辉等同志。我和这些同志有的是在中央苏区就熟悉，有的是在皖南军部认识的。他们几经周折突围来到苏中，身体都显得很虚弱、疲劳。在交谈中，他们对坚持华中敌后斗争，开创新局面，都很有信心。

(四)

紧急输送突围人员的工作，至1941年底大致结束，但上海办事处工作仍继续进行。输送从大后方撤退来华中的人员，还包括南洋各地返国参加抗日的华侨、苏南部分撤退干部以及上海去根据地参军、工作的人员。这些人中有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如邹韬奋、吕振羽、孙冶方、贺绿汀、范长江，也还有一些国外进步人士。据统计，上海办事处从成立至1942年底撤销，共安全护送过2000名左右人员。有许多交通员是冒着生命危险，

护送同志们通过敌人层层封锁线的，其中不乏机智神奇的故事，解放以后我读到过不少当事人写的记述文章，令人难以忘怀。

上海办事处当时在租界内设两个固定的秘密联络站，都归杨斌同志掌握。地下交通人员还利用上海一些马路地段、戏院、图书馆、饮食店为临时联络点，与往来人员接头。然后通过敌占区，与我方联络站接上关系。

上海办事处以及浙江一带游击根据地、地下党向华中局递送的汇报文件，一般也是由政治交通员随身带进根据地。密信都是用很小的字写在极薄的纸上，搓成蚕豆大小形状，缝在衣服的贴边里，或者密写在牛皮纸上，作为鞋袜衣裤杂物的包装纸，借以蒙混敌人。这种出敌不意的做法，当时确能一次又一次地躲过敌人的耳目。

对护送本国人，稍加化妆还能对付，对护送国际友人进入根据地则颇费周折。1941年春，军部通知做好接待国际友人、奥地利大夫罗生特同志的准备。上海办事处和区党委派荣健生同志护送，由张达平、汤季宏等同志具体安排，并找到安泰轮船上一位职员协助，将罗生特大夫装扮成传教士，隐藏在船上。荣健生同志与罗生特大夫的铺位贴近，但装作不认识，暗中保护。船到张黄港时，先期到达的王建中同志疏通了伪军，罗生特、荣健生同志连同一只装满医疗器械的大箱子，从安泰轮秘密接到一艘事先准备好的小划子上，乘夜色绕过敌人哨所，与我如西县派出的接应部队联系，然后转往军部。不久，德国共产党党员、作家希伯和夫人秋迪来苏北，也通过这条交通线，让他们夫妇俩扮成医生、护士，安全抵达目的地。

(五)

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技术工人、知识青年进入根据地，对根据地的各项事业的建立和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根据地的新闻、出版、卫生、教育、金融、工业等方面都呈现出一派崭新的气象。特别是医生、护士、技术工人和教师，当时是根据地急需的专业人材，没有这些同志的支援，根据地的建设就无法发展起来。

1941年冬天，苏中办起了大众书店，骨干职工都是从重庆、桂林、湖南等敌人大后方来的。苏中根据地有了自己的书店，促进了根据地的出版事业。书店经售马、恩、列、斯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根据地的一桩大事。书店还经销大批抗战读物和文艺书籍，也颇受大家欢迎。这些书，就是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地下党通过各种渠道，突破日伪的查禁而送入根据地的。有时甚至能成百册地偷偷运入根据地，敌人一点也觉察不到，说起来简直有点神奇。记得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高尔基的《母亲》、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普希金的诗集、茅盾的《腐蚀》以及郭沫若、巴金的著作，我们的大众书店当时都有销售。著名文化人邹韬奋先生参观了大众书店后，由于他本人是从敌占区秘密进入根据地的，深知路途的艰险，故而对此赞叹不已。他说根据地能办起这样规模的书店来，十分了不起。他鼓励职工们再接再厉，不管在怎样险恶的情况下，应该把书店坚持办下去。后来，韬奋先生不幸病逝，苏中三分区的大众书店即改为韬奋书店，以资纪念。

上海办事处和上海地下党除了向根据地输送干部和各种人材外，更大量的工作是源源不断地运输各种物资，打破日伪对根

据地的经济封锁。当时，根据地刚开辟不久，物资奇缺，医院缺乏药材和医疗器械，尤其显得突出。我一师后方医院，没有一套完整、齐全的手术器械，连清洁伤口的双氧水都不能轻易用，一般只能用冷却的食盐开水洗伤口。没有抗生素一类药品，只有少量消治龙和消发啞定等消炎药。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一次有位护士给伤员发消炎片，不慎一粒药片掉进病员睡的草铺上不见了。为了找这粒药片，护士们把草铺拉开，一把草一把草地查找，甚至连草带泥用筛子筛过，最后终于找到了。当时珍视药品的情景，于此可见一般。至于伤员们用的绷带，那都是用了洗，洗了用的。做药膏没有凡士林，就用猪油、羊油或牛油代替。没有蒸馏器制作蒸馏水，就用雨水或井水反复过滤配制生理水。为了购买药品、器械，我们当时组织过一批又一批同志到上海、南通、如皋、扬州等地去采办，有时则不惜重金向商人求购。

根据地军事上用的收发报机、电话机、大电池等等，仅靠战斗中缴获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记得区党委机关当时有架收发报机，十六瓦功率，靠人工发电。许多零件是拼拼凑凑装配的，整个机器又破旧又笨重，经常发生故障。行军时还得靠两个力气大的同志扛着发报机走，但我们还把它当作宝贝。直到后来，区党委交通总局专门派人到上海采购了二十部发报机，我们才有较好的通讯条件，同时也解决了野战部队的需要。当时有的报社没有电源，就用两个人摇机发电，八个人日夜轮班，用手摇个不停。

根据地办报纸、印抗币所需的设备，也是从无到有逐步完善起来的。印钞用的圆盘机、胶印机、凹印机、铜锌版、凹形电镀版以及油墨、纸张，全都是从上海等地采购来的。第一批江淮抗币的版子，也是在上海秘密加工，然后运到苏中印刷，再加印号码发行的。《苏中报》报头是粟裕同志题字的，原先用木刻版套

印,后来上海地下党同志在上海做好锌版运入苏中,《苏中报》才换上新装。以上这些点点滴滴的输送工作,都是在日伪军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同志们为此冒着多大的风险呀!

我们利用各种关系把货物收购进来,把根据地的农副产品运出去,发展了根据地的军工、民用工业。有了机器,又有技术工人,加上原料,苏中先后办起了印刷、印钞、造纸、制皂、卷烟、枪械修理等小型加工场。根据地当年生产的“飞马”牌、“蓝工人”牌、“红工人”牌香烟,还颇受苏中嗜烟者的欢迎,甚至运销山东根据地哩。

(六)

新四军上海办事处于1942年底撤销,大部分人员撤回根据地,留下少数秘密工作人员在上海隐蔽,积蓄力量,工作由苏中区党委城市工作部领导。当时,机构虽撤销,但上海与苏中、苏北的秘密交通线仍有联系,并未中断。鉴于根据地所需物资越来越多和日伪对四分区准备进行大规模“清乡”,粟裕同志指示加强苏中军区海防团力量,开辟根据地至上海的海上运输线。由一师采购科张渭清、吴明义、郭熙炜、王兴文等同志组成地下采购、运输物资小组,负责开辟东台海边大镇蕲港至上海的运输工作。

这时的上海,形势已不同于前两年。日寇对上海实行了全面占领,汪伪在上海公开建立政权,各港口均有日伪宪兵盘查。因此,要把大量物资运回根据地,困难是愈来愈大了。同时,在上海收购到的物资,藏匿的时间长了也容易走漏风声。再加上上海有海匪骚扰,长江口有日寇的汽艇巡逻,通过时很容易被发觉。

后来，张渭清等同志先在上海收买了一些商行、鱼行、药店作为物资的存放处，接着又渐次办起自己的秘密商行、货栈；又在关卡口安插我秘密人员和收买伪军、警察。吴福海同志领导的海防团对几股海匪，或打击，或争取，千方百计把鸭窝沙等原先由海匪占据的海岛，变成了海防团运货的中转站。

1943年秋，苏中根据地粉碎日伪对四分区“清乡”，急需一批无缝钢管制造六〇炮。粟裕同志派张渭清、吴明义等同志到上海。在地下党协助下，采购了一批无缝钢管和车床、刨床等造炮原料和设备，估计可造六〇炮、八二炮二三百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曲折斗争，同志们终于将这批重要物资避开了日伪检查装上船，驶出吴淞口，运到鸭窝沙，再由海防团从海上分批运到了琼港。当我们听到这批物资运到时，真象比过节还高兴。粟裕同志见到这批无缝钢管，激动地说：这可是几百门大炮呵！六十年代上映的电影《51号兵站》，就是据此创作的。但我觉得，电影里的惊险镜头，不如当年实际斗争那么惊心动魄。

当年11月初，八路军鲁南军区在上海采购了一批物资，有印钞机、切纸机、车床、油墨等，一时无法运往山东。粟裕同志指示一定要协助把这批物资迅速运出。张渭清、王兴文、郭熙炜等同志想尽办法，把这些物资从上海市区运往宝山上船，避开吴淞关卡，运到鸭窝沙，然后北上。途中差点出事，幸亏我交通同志机智果敢，化险为夷，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这条海上运输线，从开辟到结束的3年时间内，从上海运回3万吨左右的物资。苏中各分区以及苏北根据地在上海设立的一些秘密商行、货栈，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经过统一整理，加强了领导，开设了较大的一些商业公司，作为解放区的秘密联络站和贸易机构，其中较有名的是“大华公司”。

(七)

区党委对苏中沿江的一些城市、集镇，也十分注意做秘密工作。

1941年，苏中区党委专门作出了《关于苏中区城市工作的决议》，决定各地委建立敌后城市工作委员会，三分区以泰州城市为中心，管辖泰兴、靖江、泰州；江都中心县委以扬州为中心成立城委会，管扬州、高邮、扬中；四分区以南通为中心，管辖如皋、海门、南通、崇明、启东。其他敌占城市及大据点，设市委或支部；兴化、东台在城区建立区委。敌后城市工作的任务，是掩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等待时机，以作最后反攻的准备。

城市中的地下党员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合法身份，做好各阶层的统战工作。在学校、工厂、团体内部，运用各种方式宣传抗日道理。在抗日积极分子中间，秘密、慎重地发展党员，依靠社会关系把各种重要物资运入根据地，动员青年投奔解放区参军。

城市地下工作者还有一项重要任务，是秘密打入日伪、敌特重要机关，刺探情报，掌握敌人的一举一动。我记得四分区反“清乡”斗争时，南通市我地下工作者林克、李鹤峰、王承志同志，利用伪政工团长孙永刚在中学时的师生关系，打入伪苏北“清乡”地区政治工作团从事秘密工作，搜集到日伪对我四分区“清乡”的许多重要情报，及时送到根据地，为我反“清乡”斗争及时提供了敌人的动向。一次，我海启县委组织部长腿部受伤被俘，他事先把随身携带的文件袋丢藏在河边芦苇荡里。这位组织部长经组织营救保释出狱，但不幸那文件袋被随日寇下乡的伪政

工团搜去，放在办公桌上准备上缴邀功。当时日伪政、宪、特等组织系统往往各自为政，相互封锁，我秘密工作人员李鹤皋同志及时地把文件袋中一些重要秘密文件和有我党组织若干党员名单的笔记本抽出，转送地下党组织，避免了一次意外损失。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我秘密工作人员的机智、勇敢精神。他们不愧是无名英雄，人们将永远纪念他们！

(八)

在当时，敌人分割我根据地各分区的联系，使担负着政治交通的同志，常常要冒极大的风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时，一般采用秘密投送或武装投送办法送信件、情报。有时交通员利用农村办红白喜事的机会，夹在人群中混过关卡。即使如此，仍然有不少同志遭到逮捕、追查。其中绝大多数交通员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严守机密。北至洋口一线有个交通员叫宫八银，被汉奸告密，日寇把他抓到柘茶敌据点严刑拷打，要他交代。宫八银同志毫无畏惧，只承认自己是抗日的新四军战士，别的什么话也不说。最后，敌人将他杀害。就义时，宫八银同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象宫八银同志这样的交通员，在苏中又何止成百个！海中区交通站站长杨家俊同志，16岁就当交通员，是个独子。一次，他从海南区站执行任务回来，半路遭敌伏击，被抓到一所尼姑庵里。敌人从他身上搜到一本收发簿，用燃红的铁条烫得他遍体鳞伤，他始终不吐一点真情。

战争年代，人民群众是我交通工作的坚强后盾。群众把交通员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次，有位地下交通员在泰州城附近一个村庄接关系，碰上日寇下乡“扫荡”。交通员急忙闪入一户人家。房东老伯见我交通员满口外乡音，料想碰到麻烦。恰好那

时房东的儿子不在家，老伯连忙吩咐儿媳妇和交通员假扮成夫妻，各抱一个孩子睡在床上。敌人进院后，抢了一些东西，推门看见屋里夫妇孩子四人睡在床上，不加怀疑就走了。这样的事，在当年封建礼教浓重的农村，若不是群众心向新四军，肯这样做吗？想起这件事，我至今内心仍十分激动。

1944年底，区党委把秘工部和敌伪军工作联络部合并成城市工作部，加强对敌占城市的工作，以迎接大反攻的到来。根据华中局的指示精神，苏中城工部的工作重点，放在对上海敌伪的策反和对苏中沿江城市伪军的瓦解上。城工部专门派出几位同志到上海与原留在上海的苏中秘工人员组成秘密工作委员会，做上海的伪军、伪警的策反工作。对苏中的孙良诚伪军部队，我们也派了同志去秘密谈判。城工部还编印了《群众新闻》小报，针对城市居民的情况，以第三者的口气发表评论、新闻，分析形势，鼓动城市群众起来斗争，迎接抗战胜利。



第三章 反“清乡”斗争和准备反攻

第一节 黎明前的黑暗

(一)

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经过 1940 年至 1942 年三年时间的创建、发展和建设，我党在江都、靖江、泰县、泰兴、南通、海门、启东、如西、如皋、宝应、高邮、兴化、东台、台北等 14 个县，公开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这时，整个苏中根据地总面积为 23000 平方公里，人口 800 多万，有了初步的规模。

苏中根据地，与日伪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隔江相望，因而被日伪视为“心腹大患”。数年来，他们调兵遣将，动用上万兵力，对苏中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清剿”，却无法摧毁我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也将我根据地视为“隐患”，处心积虑搞反共磨擦，但它的阴谋也没得逞。

在与日伪顽反复较量中，苏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卫生各项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蓬勃发展起来。减租减息、民主参政、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普及文化等等政策、措施深入人心；整个苏中有近万名共产党员，大多

数乡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文(教)抗会、工抗会等群众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农抗会员就有50多万，还有近30万不脱产的民兵、自卫队员遍布苏中乡村。虽然苏中的不少县城、主要集镇、交通干线仍为日伪重兵把守，但广大农村已成为我骁勇善战的游击健儿神奇出没、打击敌人的场所。总之，苏中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是全国19个解放区之一。

日军和汪伪“扫荡”无效，“清剿”不成，又开始更为残酷的所谓“清乡”。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新花招，也是汪伪政府的一项所谓“国策”。早在1941年1月，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首次提出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进行“清乡”的方案。这一招，与“扫荡”、“清剿”有区别。“扫荡”、“清剿”是日伪对抗日军队、抗日根据地采取的军事行动，目标针对抗日部队。“清乡”则是日伪采用的一种综合性行动，时间较短，一次次进行的，主要目的在于摧毁我抗日根据地，破坏我基层政权，建立伪政权，妄图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全面占领。他们仿效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秘诀”和蒋介石“十年剿共”的经验，用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综合运用军事“清剿”、政治欺骗、经济掠夺、思想奴化等各种手段。

“清乡”方案一出笼，日本中国派遣军第十三军团司令官官泽田茂和派遣军总部参谋、汪伪政府军事顾问晴气庆胤，急忙制定出具体的“清乡”计划。由晴气庆胤与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正式向汪伪政府提出，经汪伪政府最高顾问影佐祯昭的赞同、支持，得到汉奸头子汪精卫和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的批准。1941年3月，汪伪政府成立了“清乡委员会”，由汪精卫亲任“委员长”，大汉奸陈公博、周佛海任“副委员长”，李士群为秘书长。日伪各级“清乡”的头目，一个个粉墨登场，杀

气腾腾地举起屠刀，向我根据地军民疯狂砍来。

(二)

汪伪政府的“清乡”首先在我苏南抗日根据地施行。1941年5月，日伪确定以常熟为中心，将苏(州)、常(熟)、太(仓)、澄(江阴)、(无)锡、虞(常熟)列为第一、二期“清乡”地区。当年6月开始，抽调2个师团日军和6个师伪军计1万5千人，全面扑向苏南地区“清乡”，由日军担任“作战及封锁事项”，汪伪担任“政治工作”。由于敌我兵力悬殊，加上我江南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缺乏反“清乡”经验，且客观条件也于我不利，以致我苏南根据地遭受了一些损失。虽经苏南军民英勇抗击，但斗争仍很艰苦。同年10月，华中局决定六师十八旅由江渭清、温玉成同志率领一部分主力北渡长江，进入苏中江高宝地区暂归一师建制，留下六师十六旅等坚持江南反“清乡”斗争。对于苏南根据地的初次反“清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认真作了总结，这对后来苏南根据地丹北地区及苏中四分区、三分区的反“清乡”斗争，直至取得胜利，起了积极的作用。

日伪在苏南“清乡”部分得逞，气焰越发嚣张，汪精卫亲自巡视苏州、常熟地区，狂言“清乡”就是“清除共匪”、“清乡先要清心”，要使共产党“绝无潜伏的可能”。接着，在伪上海市政府、伪苏北行营内成立“清乡”机构，扬言要扩大“清乡”地区。日伪宣传机构大肆渲染“清乡”成果，借此向老百姓敲诈勒索。比如，汪伪政府先扬言要把上海附近的南汇、奉贤、北桥、崇明、嘉定、宝山、川沙、浦东划为“清乡”区，分三期进行“清乡”，不久又叫嚷只要上海各界肯出钱出物资，就可以免除“清乡”，把“清乡”当作敲诈勒索的筹码。我们区党委意识到，日伪扩大“清乡”地区，主要

是把矛头指向各抗日民主根据地；苏中与苏南毗邻，势必成为下一步“清乡”的目标。因此，自1941年下半年起，苏中区党委即根据华中局指示，布置了反“清乡”的准备工作。

1942年12月1日，汪精卫以“清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发出《民国三十二年度上半年清乡工作训令》，决定把南通附近列为“苏北第一期清乡地区”，同期进行的还有镇江、丹阳、常州附近，崇明、嘉定附近，杭州、海宁附近及余姚盐场四周。

华中局、新四军军部获得情报，立即要求苏中区党委、新四军一师紧急行动，加快反“清乡”准备。这时，由于情报失误，忽然传来日军3个师团将派来苏北地区“清乡”，闹得根据地军民十分紧张。后来才了解，是日军调3个师团去太平洋作战。1943年1月28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明确提出：“我华中全党全军对今后华中敌后空前严重与高度复杂的斗争形势，必须有明确的估计，对敌寇的‘扫荡’‘清乡’以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等的联合进攻，必须有充分的准备。须以从最坏处打算，向最好处去努力，才可避免重大损失和打击。”华中局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彻底实行精兵简政，紧缩机关，精于上层，加强下层，使敌后党政军一切机构适应艰苦斗争形势。

苏中区党委、苏中行政公署、一师师部刚刚结束苏中军政党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我和管文蔚同志分头去了一、二、三分区，粟裕同志留在四分区组织反“清乡”斗争。根据华中局指示，我们几个人分头督促各分区加紧精简、落实“三冬”计划、巩固基层政权，为反“清乡”、反“扫荡”作准备。为加强对敌伪军的工作，苏中区党委设立了敌工委员会，管文蔚和白丁（徐平羽）同志为正副书记。各地委、县委也相应设立了敌工部。对于精简工作，苏中从1942年下半年就已着手进行，只是决心不大。这次情况紧急，苏中区党委、行署、军区三大机关决心较大，带头精简机

构，各分区也闻风而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据1943年6月统计，全苏中各级党政军民机关共精简9200余人，并对部分行政区作了调整，充实了各分区党政军领导班子。

1943年2月，苏中区党委和苏中军区联名发出反“清乡”紧急动员令，号召全区军民坚持原地斗争，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反“清乡”斗争的胜利。各地还抓紧“冬防”工作，大力扩编民兵自卫队，增强群众自卫能力。苏中区党委还从最坏处打算，加强了苏中海防团，准备必要时把一部分机关和部队转移到海上，粉碎日伪对四分区的封锁。

3月初，粟裕同志从四分区来电，证实敌人对四分区“清乡”迹象越来越明显。华中局也来电说日伪将于4月1日对通如海启地区（四分区的一部分）“清乡”。

腥风阵阵，恶浪翻滚，日伪精心策划的“清乡”步骤正逐步付诸实施。1月初，“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筹备处”在苏州成立。抗战初期曾任国民党嘉定县长，后投降汪伪死心塌地充当汉奸的张北生，因在苏南“清乡”中立了“功”，得到日寇派遣军总司令部特务机关“梅机关”的赏识，被委任为“苏北地区清乡主任公署筹备处”的“主任”。而为筹措“清乡”经费，训练政工、保甲人员，购买封锁器材，汪精卫事先就亲赴日本，朝拜天皇，乞求借款5亿日元，作为“清乡”经费。这次“清乡”，汪伪政府除继续乞求日本援助外，又加紧了对占领区进行掠夺。张北生等从浙江、安徽、福建等省征调大批毛竹作为封锁器材，陆续运往南通附近沿江地区，还派人到南通现场勘查，确定“清乡”的具体范围是：西面从天生港沿运盐河到丁堰，北面从丁堰沿串场河到掘港再东延至南坎，抵黄海岸，南至长江边，面积约3600平方公里，人口270余万。在苏州，张北生以蒙骗手段，招募了警察700余名，政工队员220多名，保甲指导员近30名，收罗大批地痞流

氓充当爪牙。一时间，“苏北特工区站南通特工站”、“党务办事处”、“政治工作团”等“清乡”附属机构先后成立，闹得个乌烟瘴气。

与此呼应，日军陆续集结于苏中，六十一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出任苏北地区“清乡”日军最高指挥官，苏南“清乡”有经验的菊池联队 3200 余人陆续调赴苏北，再加原驻苏中地区的日军南浦旅团，日军在苏中的兵力大增。原驻苏中的李长江、杨仲华两个伪集团军由于得不到汪伪政府的信任，在这次“清乡”中受排挤，被整编，杨仲华竟被汪伪软禁。日伪军内部频繁的调动，陡然使“清乡”总兵力增至 1 万 5 千人左右。

日伪自 4 月 1 日起将对我四分区进行“清乡”的阴谋公开化以后，粟裕同志来电，指示苏中区党委机关人员去一分区，要求我在一分区注意运河沿线日伪军行动，密切与淮南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联系，防备敌人两面夹攻；指示苏中军区直属机关和苏中行署机关去二分区，加强二分区领导，要求二分区保证打通与一分区及盐阜地区新四军三师的联系，并注意防止韩德勤的国民党军队残余向我苏中根据地骚扰。粟裕同志如此周密细致的布置，目的在于巩固后方，集中力量对付日伪的大规模“清乡”。多年来，粟裕同志的作风就是如此，从来都是在战略上高度藐视敌人，而在战术上、具体战役上、每一个战斗环节上又极端重视敌人。人们称他为“常胜将军”，我想他常胜的诀窍或许就在于此吧。

粟裕同志此时还留在四分区督促检查反“清乡”准备工作，身边仅留下数十位工作人员，我当时很替他的安全担心。陈毅同志来电，希望粟裕同志迅速转移，免遭敌寇突然袭击，但粟裕同志一心牵挂着四分区的反“清乡”准备，直到敌人进攻前夕，他才安全地撤到二分区。

二、

日伪军于1943年再次发动对华中空前规模的“扫荡”，“清乡”，是有其深刻的国际背景的。1942年底至1943年初，国际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红军冬季反攻进展很大，使德军无法抵挡，节节败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更敲响了德军的丧钟。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开始逐岛反攻，控制住了制海权和制空权，克复了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占领的战略要地。德、日法西斯已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日本内阁召开了八十一届国会，为避免南北两面作战，提出了新的方针，那就是继续维持与苏联的中立协定，放弃向北进攻的意图，集中力量向南对付美英军队的反攻。1943年3月，东条英机专程来华访问，扶植汪伪政府，加强对中国占领区的榨取与殖民化，利用中国的战略资源和人力，对付美英未来的军事反攻。汪伪政府在其主子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驱使下，加快和扩大实施蓄谋已久的长江下游地区的“清乡”计划。日伪对苏中四分区“清乡”，是对整个苏北地区“清乡”的第一步。

风闻日伪即将进行大规模“清乡”，苏中军民思想波动较大。由于敌人在苏南搞“清乡”的残酷兽行骇人听闻，我军在苏南反“清乡”部分失利，难免引起大家的重重顾虑。不久，传闻第一期“清乡”限于通如海启地区，四分区有的地方显得十分紧张，其他几个分区则又产生了松懈麻痹情绪。为此，区党委及时进行教育，使广大军民认识到，敌人对四分区“清乡”是对整个苏中乃至整个华中“清乡”的第一步，如果敌人的阴谋得逞，则势将迅速加以扩大，遍及各区。各分区应时刻提高警惕，抓紧做好反“清

乡”准备,不要存在侥幸心理,而要坚决粉碎日伪的“扫荡”,巩固后方,互助支持,协助四分区开展反“清乡”斗争。四分区军民则应树立胜利信心,克服紧张情绪。我们越紧张,敌人越猖狂;我们沉着应战,敌人就不能为所欲为。粟裕同志根据华中局指示精神,具体指导反“清乡”准备工作,明确提出反“清乡”斗争就是“坚持”二字,以公开武装斗争为主,达到坚持原地斗争的目的。

苏中区党委耐心向各分区同志分析形势,阐述我苏中军民能够坚持原地斗争并且必定会取得胜利的七个有利条件。这七个条件,粟裕同志在四分区反复宣传,我在一分区也反复向干部们讲述:——

一是国际国内形势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

二是苏中反“清乡”的准备工作,

三是苏中区党群工作的基础较好,群众的斗争经验也比较丰富;

四是苏中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我军反“清乡”。与苏南相比,苏中交通不便,敌人封锁、运输都有较多困难;

五是苏中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较为成功,可以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起来反对敌人的“清乡”,这是进行民族斗争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之一;

六是敌人有在苏南“清乡”的经验,我们也有苏南反“清乡”的经验;

七是苏中地区敌军内部、敌伪之间、以及伪军内部矛盾较深。如南浦旅团与小林师团有矛盾;伪军李长江、杨仲华与南浦日军有矛盾;同时南浦怕伪军李士群、张北生来苏北扩充地盘,不赞成李、张来苏北,相互勾心斗角,闹得不可开交。

当时我们对广大军民进行政治动员和战争动员,还根据苏

南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比较注意伪军策反工作。我们针对老伪军、伪政权人员对“清乡”中汪伪政府改编、调防而产生的惶惶不安情绪，鼓动这些伪军、伪政权人员起来反对集中、反对调防、反对改编、反对参战。我们还正告伪军政人员：汪伪“清乡”总部下设几个科，有对付新四军、共产党的科，也有对付重庆国民党的科，还有一个对“和平军”也就是对付他们的科，这说明汪伪对本地的伪军、伪职人员也是不完全信任的。因此，我们欢迎一切“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伪军、伪职人员激发天良，不要把屠刀杀向自己的同胞，要向日寇和李士群、张北生等死硬汉奸算总帐，希望他们认清苏联节节胜利，德日法西斯连连失败的国际形势，慎重选择何去何从的道路。同时，根据华中局指示，苏中区党委还派敌工人员秘密打入伪军内部，策动伪军反正。

在准备反“清乡”的紧张日子里，华中局多次指示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区党委据此做了许多耐心艰苦的工作。在苏南“清乡”时，敌人很狡猾，对上层士绅往往采用拉拢争取手法，甚至公开声称：“中国最有势力的是中坚分子，新四军共产党对士绅、地主青年，因认为其系非阶级分子，是不要的，故我可争取之。”以往，日伪就乱写委任令，聘请士绅为参议，给予较高薪水；伪造士绅反共谈话，在报上发表，以挑拨离间新四军共产党与士绅的关系。我们要求各地委、县委做好开明士绅、开明地主、工商业者工作，广交朋友，建立友谊，宣传我党统一战线政策，迅速纠正减租减息中产生的个别“左”的做法，以稳定开明士绅的情绪。由于我们态度真诚，工作过细，处事稳妥，因而各阶层民主人士都倾向于我，很少发生倒向日伪的事。

(四)

四分区反“清乡”准备工作是粟裕同志精心安排的，做得扎实而充分。四地委和四分区的领导核心经过调整，由吉洛即姬鹏飞同志担任地委书记兼四分区政治委员，钟民同志任副书记，季方同志任专员兼军分区司令员，反“清乡”后季方同志调任苏中行署副主任，一师三旅旅长陶勇同志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梁灵光同志任专员。各县、区的领导班子也进行了调整。周一峰、洪泽、王澄、顾尔钥、赵毓华、王野翔、汪克明、叶胥朝、程业棠等富有斗争经验的同志到各县任职，直接留在“清乡”圈内指挥各县反“清乡”斗争，并对各地农村党支部进行调整，使它成为领导群众坚持斗争的核心和堡垒。对不适宜坚持原地斗争的人员疏散转移；凡政治面目尚未暴露并有社会职业可资掩护的党员，组织秘密支部（又称乙种组织）。地委成立城市工作部，由谢克东同志担任部长，以应付可能逐步恶化的环境。

在开始“清乡”之前，广大群众经过反“清乡”政治动员，积极行动起来，改造地形，把大路改小路，直路改成弯路；挖断通行汽车的公路；在河道筑暗坝、打暗桩、拆大桥架小桥；变固定桥为活动桥……为在平原水网地区开展群众游击战争创造有利的地理条件。四分区军民，以先发制人的行动，抓住日伪“清乡”准备尚未就绪和日伪军队调防有些据点出现脱节现象之机，连续攻克曹家埠、孙家窑、余东、三阳、悦来、小洋口等据点，又出动部分兵力挺进江边，烧毁了日伪从江南掠夺来的部分封锁器材。

根据华中局和区党委指示精神，四地委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以积极的斗争为主，充分发挥主观力量，广泛地开展游击战，处处打击日伪。同时，适当地利用不同的条件开展各种不同

的辅助斗争，以达到公开坚持的目的。3月24日，粟裕同志在四分区认真听取地委关于反“清乡”准备工作的汇报，在会议上作了重要指示，四分区军民很快就发动了起来，村村寨寨严阵以待，自卫队、游击队、短枪队纷纷建立起来了。各个基层党支部响应粟裕同志提出的号召：“每乡每支部每月捕杀一个敌人”。干部、党员、群众以各种方式表达出誓与日伪斗争到底的决心，许多群众还歃血为盟，“反对敌人抽壮丁”、“不让敌人造名册”、“不让敌人筑篱笆”、“不让敌人修公路”……

因字

第二节 可歌可泣的斗争

(一)

抗日战争时期，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是艰苦卓绝而英勇悲壮的。这一场斗争，自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历时1年零7个月，主要是在苏中四分区展开的。经过这场斗争，充分暴露了日伪军疯狂残忍、垂死挣扎的本质，更显示了根据地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无畏的气概。

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黄桥决战前，江苏省委已派唐守愚等同志到该地开展救亡活动。我军东进后，苏北区党委派钟民、周一峰、梁灵光等同志就抗日团结问题，同该地区国民党军政当局商谈，陈毅同志还请爱国民主人士季方先生出面统一该地区军政领导。此后，应当地群众团体电请，陶勇、刘先胜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三纵队进驻这一地区，从而正式开创了苏中四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

苏中四分区(行政上为苏中第四行政区)，包括南通、如皋、海门、启东四县，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近300万。它东濒黄海，南面长江，北西两面与苏中二、三分区接壤，呈犄角形，扼长江下游要冲。日伪对苏北(包括苏中)地区“清乡”，首先把矛头指向苏中四分区，以为只要封锁住它的北面、西面，当地的新四军即成了“瓮中之鳖”。

当时，日伪头目曾吹嘘：“此次清乡胜利，唾手可得”。小林信男叫嚣：“清乡1年不成则3年，1个师团不够，还可以增兵”。李士群给张北生打气说：“牺牲10万人要清乡，即使牺牲百万人也要清乡”。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的头目川村敬三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喊：“要用我们的血，我们的汗，来完成我们的清乡工作”。

1943年4月8日，小林信男与李士群签订《苏北第一期清乡工作实施之协定》，以所谓“中日合作，军政一体，双方协力，从速实现国民政府之抱负，建立模范的理想乡”为宗旨，确定4月10日开始“清乡”。4月11日，“苏北清乡主任公署”在南通正式成立，张北生任主任兼保安司令，汪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苏北分区”、“苏北地区党务办事处”、“政治工作团”等伪特机构同时成立。姜颂平负责特工系统，孙永刚负责党务、政工系统。日伪还把整个“清乡”区划为四个“特别区”，委任了一批区公署长、特工站长、自治区区长等大大小小爪牙。一时间，红面猴、白面猴、巴儿狗、癞皮狗纷纷登场，气焰十分嚣张。

然而，四分区军民威武不屈，早已严阵以待。

(二)

敌人的“清乡”分“军事清乡”时期(敌谓“安民时期”)和“政治清乡”时期(敌谓“训民时期”)。在“军事清乡”时期，主要以优势兵力，对我四分区实行“扫荡”、“清剿”，企图完全消灭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达到所谓“和平清乡”的目的。

4月初，日军从苏南太湖地区陆续调来第六十一师团的4个联队和部分宪兵、3个伪警大队、5个“清乡”大队和大批特工，伪行政人员，对四分区进行大规模的“清剿”。原驻苏中的伪军及新调入苏中的伪军共整编为10个保安大队，分驻各个据点封

锁干线。敌人的“清剿”由西北向东南，采用多路出动、合围一点、密集搜索的战术，企图压缩我军主力于东南一隅的黄海、长江沿岸狭长地带，南通县中部地区是四分区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过去常驻之地，被日伪视为重点“清剿”地区。敌人在“清乡”区内增筑据点，三五里内筑一据点，每一交通要道必修碉堡，如同插“梅花椿”似的，短期内“清乡”区据点即由43个增加到99个。

原来，一师三旅和第四军分区根据苏中区党委和一师师部指示，早已作了周密安排。陶勇同志将主力部队中大批骨干力量抽出，充实地方武装，加强政治保卫队和锄奸队，分散在“清乡”圈内打游击。四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则转移到日伪“清乡”圈外边缘区策应“清乡”圈内坚持斗争的地方武装，破坏敌人后方补给线，牵制“清乡”圈外敌人增援。这样，我军主力化整为零，地方武装则在“清乡”圈内与敌人周旋，日伪军就不能不处处扑空又处处挨打了。

日伪军每到一处，就搜捕党员、干部和民兵，追捕壮丁、强拉民伕，奸淫烧杀、掠夺财物。仅在通中地区就有数百名妇女惨遭侮辱，被抓走壮丁300余人。4月间，日伪进行了三次大“清剿”，万千百姓惨遭浩劫。我留在“清乡”圈内的南通警卫团、通西独立营、东南警卫团部分武装，从敌人一个又一个合围圈里打出来又打进去，保存了实力。为了掩护子弟兵，各地群众坚壁清野，大规模“跑反”，致使日伪两眼抹黑，连烧饭的米也找不着。

敌人到处构筑封锁线，以切断我四分区与外界的联系。张北生曾对“清乡”人员训话说：“封锁成功了，新四军就要跑。”4月下旬，敌伪二十二师，三十四师以及保安大队的一部分担任封锁任务，从江南运来500余万根毛竹，到处打竹篱笆。这种竹

篱笆一般高3米，沿河岸一侧筑起，由天生港至丁埭，向东经掘港、马塘到南坎，再由天生港沿江至启东海边，向北到吕泗，绵长二三百里。在竹篱笆沿线，每隔一里筑有碉堡，交叉路口设有大小检问所150多个，配备了所谓经过训练的400多名检问人员。来往行人必须从检问所经过，出示“良民证”，严格遵守进出时间。敌人妄想凭借这一道道重兵把守的竹篱笆，使我四分区军民动弹不得，叫嚣什么“篱笆打成功，清乡便成功”。而且，敌人还把竹篱笆两侧的玉米、高粱等高杆作物全都砍光，造成一目了然的开阔地，如有人在空隙间穿越，一经发现即遭枪击。许多无辜群众就是这样被敌人杀害在竹篱笆边的。有一天，天生港附近有两个小孩在竹篱笆边玩耍，母亲恐有不测，追上去制止，结果母子3人全被日伪杀害。当时许多群众慑于敌人的虚张声势，远远望见竹篱笆就毛骨悚然。一时间，敌人的封锁不仅对我军行动构成严重威胁，更对群众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许多农民怨恨交集，唱出了这样一首民谣：

“竹篱笆，竹篱笆，
你也看不到我呀，
我也看不到你，
两眼泪花花。
竹篱笆，硬分家，
南边田，北边家，
良田荒芜没法种，
好好的粮食吃不到它。”

(三)

反封锁斗争主要围绕着破坏并毁烧竹篱笆展开。陈毅、张云逸同志等曾给粟裕同志电报，提到新四军十六旅领导苏南群众大破竹篱笆的经验。我们及时向四分区吉洛、钟民、季方、陶勇等同志转达了军首长的意见。5月初，四地委在给各县指示中，号召各地方武装、短枪队、区队和民兵、群众迅速行动起来，在敌人编结篱笆的地方，迅速展开反封锁斗争。

起初，群众缺乏破坏竹篱笆的经验，往往用牙齿咬铅丝，一根一根拨毛竹。经过不断实践，创造了许多好办法。譬如先割断篱笆两端与木桩连接的地方，再用绳子将篱笆成片地拉倒，或者在篱笆上浇上油，用火烧。为预防日伪袭击，群众采用“调虎离山计”声东击西，使敌人防不胜防。我短枪队、民兵深入虎穴，专打敌伪区长、检问所主任等头目。因为这些死心塌地的汉奸，具体负责催运封锁器材、强拉民伕，作恶多端，民愤极大，消灭了这些坏家伙，就会打乱敌人筑竹篱笆的计划。

与此同时，我军民还对担任巡逻任务的伪军开展政治攻势，在封锁线附近张贴、散发各种宣传品，警告伪军不要再充当日寇的殉葬品。苏中的老伪军，长期与我抗日军民交手，深知我军的厉害。这次日伪“清乡”，张北生等新派势力处处排挤、吞并、强编原苏中老伪军，又使他们心中窝了一肚子怨气。我军民巧妙利用新旧伪军之间的矛盾，利用老伪军怕整编、怕调防、怕打前锋的“三怕”心理，要求这些伪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要执迷不悟，与我军民顽固对抗。如皋民兵写过这样的传单劝诫伪军：“北面篱笆南面河，中间有条阎王路，民兵隔河来打枪，东西南北无处躲。”许多老伪军深知自己左右为难的处境，暗地里说，鬼子

见新四军都头痛，我们和平军那里是新四军的对手。他们白天押着据点附近的老百姓筑篱笆，而心里很明白，夜晚趁着月色拆竹篱笆的也就是这些老百姓。许多地段的竹篱笆就是这样，白天筑一段，晚上拆一段，拆了补，补了拆，开工有日，完工无期。

为了保护竹篱笆，日伪在封锁线两侧苦心设置了“爱护村”与“护笆队”。可是，“爱护村”与“护笆队”却利用这一机会监视日伪巡逻队，掩护大家拆篱笆，但等篱笆拆毁或起火以后，“护笆队”才装模作样向日伪“报警”。日伪巡逻队眼见竹篱笆一天天被拆毁，又时常接到“报警”，可就是找不到人，气得直跺脚，却又毫无办法。

四分区军民不断拆毁、焚烧竹篱笆，总计长达180里左右，毛竹约150万根，参加反封锁斗争的群众有10多万人次。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四分区的反封锁斗争取得了重大进展，区党委决定趁热打铁，在7月1日组织四、三两个分区军民联合行动，掀起了更大规模的烧毁竹篱笆的斗争。当夜，各级武装分段警戒，数万群众分成几十路声势浩大的突击大军，在东起南坎，西至岔河镇，北起丁堰，南至平潮镇约300里长的封锁线上，锯倒电杆，割断电线、挖毁公路，整个封锁线上人声鼎沸。霎时间，火光在黑夜里闪烁，火趁风势，风助火威，顿时浓烟滚滚，火光烛天，宛如一条弯弯曲曲望不到头的火龙。竹篱笆“劈劈剥剥”烧得满天通红。爆裂声、人们的呐喊声、欢呼声，混和在一起，响彻云霄。日伪军眼见如此情景，龟缩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眼睁睁地望着惨淡经营了3个月的竹篱笆，一夜之间就化成了灰烬。延安《解放日报》很快就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苏中军民这一英勇斗争事迹，大大鼓舞了坚决反“清乡”斗争的苏中军民。为了推广他们反“清乡”斗争的经验，区党委还专门组织了反“清乡”报告团，奔赴各分区巡回讲演，取得了较好的

效果。

(四)

日伪按其预定计划，在两个月的“军事清乡”之后，实行“政治清乡”，竭力推行以编查保甲、建立乡保伪化机构，这是敌人更毒辣的一招。张北生直言不讳地说：“清乡之工作推进，用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要“采用严密的保甲来应付新四军的严重威胁。”日伪在四分区还提出“打匪安民”、“确立治安”、“改善民生”、“清除骄兵悍将、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等口号，企图混淆视听、麻痹群众。他们还在公共场合制造假象，把抓来的民伕拉到据点，给白米饭吃，伪军却故意当面吃粗糙的糝子饭。有时伪军先进村抢老百姓家里的棉被，而后又装模作样按家归还，活象演戏一样，想用假仁假义捞取政治资本。显然，他们的目的是想顺利编查保甲，建立各级伪化机构，实现伪化统治。

应当说，编保甲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无非沿袭我国封建统治者对付农民起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对付中国工农红军的成例，也搬用了华北“强化治安”和苏南“清乡”的卑劣手法。其基本做法是：十户编成甲，设甲长；十甲编成保，设保长；推行一户“犯法”十户同罪的联保连坐切结，强迫户与户之间相互监视，遇事相互告发。编完保甲的村庄，家家户户门上挂块牌，木牌上写着户主姓名、年龄、男几口女几口……经过清查户口的家庭，每人发给“良民证”，外出必须携带，以便随时接受核查。同时，他们还按保甲，强迫居民轮流守夜，敲锣报警。一应编查定当，敌人得意地说：“保甲编成，清乡完成。”

各地群众针锋相对，展开了反保甲运动，提出反对编保甲

的口号：“册上录了名，将来跑不成”；“保甲册是阎王簿，门户牌是神位牌”，“保甲编成功，壮丁抽个空；谁要编保甲，人人都可杀”……。许多村庄群众相约把门牌摘掉，碰上敌人查户口，青壮年就“跑反”，留下老人应付敌人。有时则利用谎报年龄、人口等方法，使敌人造不成名册。

敌人恼羞成怒，便采取“武装编查”的办法，强行编查保甲。敌人往往采取突然袭击手法，大批“清乡”特工人员、警察和伪保甲指导员、伪乡长在日伪武装人员掩护下，早上从据点出发，赶到一个区，把伪保长找来，挨家挨户编查。编完以后，这批人不敢在乡里过夜，害怕遇上短枪队、民兵的偷袭，就慌里慌张返回据点。敌人一走，我村干部立即动员群众把户口册、保甲牌、壮丁册统统付之一炬。碰上敌人追问，群众就说是新四军烧的。伪保长害怕我村干部、民兵找他“算账”，也采取敷衍搪塞态度，两面讨好，不敢吐露真情。

敌人见“武装编查”也无济于事，又变换手法，采用“强化编查”，计划“6月强化启东、7月强化海门，8月强化南通，9月强化如皋”。为此，敌人不惜集中大量兵力，封锁一个又一个区，强行编保甲。如敌人在海门一个区编保甲时，竟集中了600多名武装人员。有两个乡，敌人还修筑了13个临时据点，大批特工、警察、保甲指导员，在伪区长、乡长、保长带领下，象警犬一样穿插搜查，如临大敌。每到一地，他们就集合群众，逐个审问，甚至用吊打、枪杀等手段，威逼群众指认共产党员、村干部。在编成保甲的地区，敌人进一步推行伪化，组织“自卫团”、“爱卫会”，训练壮丁、登记田亩、摊派赋税，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

7月24日至26日，日伪在南通县十总店，搜捕我干部、群众200多人，枪杀5人，活埋53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十总店大屠杀”事件。然而，敌人的暴行没有吓倒苏中人民，只能激起

苏中人民的强烈义愤！

(五)

这段时期内，敌人显得特别猖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使我四分区遭到一定损失。血淋淋的现实，使有些群众担惊受怕，情绪低落，甚至想跟敌人妥协，暂且“维持”一下。这种情绪是不难理解的，关键在于我们党政军骨干态度是否坚决，能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积极引导。

这样，在反保甲斗争同时，开展反“维持”斗争，向群众进行民族气节教育，便提上了议事日程。有一个乡有些群众想搞“维持”，我干部就把伪乡长找来，要他当面向群众说明“维持”的真相。这个伪乡长说：“维持是可以的，第一要送壮丁；第二送钱、送粮……”。群众一听，恍然大悟，原先想搞“维持”的也反对搞“维持”了。群众说：“维持下去没路走，敌人是喂不饱的狗！”如皋县群众更明确提出“五条死路，四条生路”的口号——“坐在家等死，抢走粮食饿死，先维持的先死，编好保甲逼死，抽去壮丁送死”；“做好情报逃命，当了民兵保命，保了粮食渡命，反掉保甲活命”。

经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很快认识到，搞“维持”等于送死，坚持对敌斗争才是唯一的生路。于是，广大群众自觉投入反“维持”斗争，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事迹。其中，朱大玉同志自焚住房，发誓跟敌人拚到底的事迹，尤其感人至深。

朱大玉是合堤乡民兵干部、共产党员。反“清乡”以来，他勇敢地带领群众与日伪军斗争，组织群众抵制日伪的“维持”。东南地区海复镇、大闸镇据点的日伪军，在合堤乡搞不成“维持”，扬言要下乡烧房子。朱大玉担心有些群众不能坚持，便自己动手

拆掉自己的住房，放火烧了剩下的芦笆，以示与日伪斗争到底的决心。消息传开，全乡民众深受鼓舞，顿时增强了反“维持”斗争的决心和信心。

还有一则故事也很感人。有一次，日伪到余西区新安乡捕了数十名群众，并烧毁了村长的房子，胁迫群众搞“维持”。群众坚决不答应，日伪无可奈何，只得把捉去的人放回。不久，日伪军又下乡捉人，进一步威胁群众。有个富农怕乡亲们吃眼前亏，偷偷跑到据点接洽搞“维持”。他儿子参加了我方民兵，得知自己的父亲出面搞“维持”，十分气恼。他把父亲训斥了一顿，还说要亲手处决胆敢投敌的人。这个富农见儿子真有大义灭亲之意，吓得再不敢谈“维持了”。

据当年9月统计，四分区军民反对编保甲、反对搞“维持”成效显著，全分区撕去门户牌7万多张，毁户口册5万多页，杀伤日伪保甲编查人员53名。日伪虽然投入了全部的力量，施展了各种伎俩，只在39个乡、19个保、1个市镇勉强编起了保甲，而且不时遭到打击、破坏，“维持”也无法进行。日伪当局不得不承认：“苏北环境与江南不同”、“推行保甲工作颇为不易”、“目前所办到者仅属保甲之躯壳而已”。

(六)

汪伪原计划从4月至9月对苏北实行第一期“清乡”，可是6个月过去了，所谓“军事清乡”、“政治清乡”都困难重重。封锁线被我军民打破，编查保甲大部没有兑现，“清乡”的敌伪人员神情沮丧。相反，我四分区军民则保存了有生力量，积累了斗争经验，增强了坚持原地斗争的信心，情绪十分高昂。在反“清乡”斗争取得一定进展的基础上，区党委及四分区及时总结经验，研

究下一步斗争的方法。区党委于6月中旬召开扩大会议，粟裕同志作了《半年来苏中工作总结以及今后几大任务》的报告。7月中旬，苏中四地委在如皋刘家园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地委书记吉洛同志作了《三个月反“清乡”初步总结与今后形势发展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段时期，区党委不断听取了来自四分区反“清乡”第一线同志的汇报，向四分区领导同志和各县委发出指示、电报、信件，指导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四分区的反“清乡”进展也十分关注，不断有电报指示。

反“清乡”斗争是一场人民战争。南通县金沙区张沙乡召开了800多人的乡民大会，公开宣誓反“清乡”。海启地区不少乡的农抗会员要求组织“决死队”。如皋县24个乡的私塾教师组织了“塾师会”，表示团结一致反“清乡”。有的区干部为了表示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将妻子送回娘家。有的家庭提前嫁女儿，准备“豁出去”干。许多上层民主人士也针对日伪在苏南“清乡”的烧杀抢掠行径，斥责日伪的“清乡”是“清箱”，表示愿意同我广大军民同仇敌忾反“清乡”。海启地区有一位士绅在反“清乡”动员大会将近结束时，主动登台讲话，并当场把汪伪启东特别区公署发给他当伪区长的委任状撕碎。这一切表明，广大民众的觉悟程度和抗日斗志，是反“清乡”斗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在日伪“清乡”前夕，四分区普遍实行了党员军事化、农村兵营化，县队、区队、民兵和各类游击小组分散隐蔽，严阵以待；妇女、小孩、老弱群众随时准备疏散，坚壁清野。

在反“清乡”斗争中，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党支部都成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坚强核心。启西区正诗乡党支部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正诗乡在敌人盘踞的汇龙镇、久隆镇、曹家镇、新

港镇等据点的包围之中，特别是近在咫尺的圩角镇，在“清乡”一开始就被敌人占领，并在通向正诗乡的中央河南边德记木行安了据点，这样，正诗乡恰恰就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然而，日伪军踏进正诗乡，藏在四处青纱帐里的民兵，东打几枪，西放几枪，吓得敌人没敢进乡。

经过半年时间反“清乡”，正诗乡各村公开活动的民兵，从30多人发展到近60人，武器也从3支步枪增加到20多支。党支部还把农抗会、妇抗会、儿童团发动起来，老百姓腰间都别着“小插子”，随时袭击单独行动的日伪军，致使敌人没法建立伪政权，编不成保甲，收不到捐税。日伪一出圩角镇据点，就遭到民兵的伏击，四乡群众都称赞正诗乡是“打不破的铁皮乡”！

圩角镇据点新调来的伪军中队长金长发，据说是“江南模范清乡中队长”，他疯狂叫嚣“要血洗正诗乡，撬开铁皮乡”。正诗乡党支部决心刹刹他的嚣张气焰，当即发动民兵和群众把圩角镇据点围困了3天3夜，断了敌人的粮草。金长发顽固不化，过了几天又下乡抢劫，终于被我启西区队和民兵设伏击毙。正诗乡仍然是坚固的“铁皮乡”。虽然在反“延期清乡”、“高度清乡”的时候，正诗乡群众遭受了一些损失，但是正诗乡党支部始终站在斗争第一线，带领群众反“清乡”，直至最后胜利。

在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中，党支部书记兼民兵指导员倪学章同志起了重要的领导作用。老倪一家是有名的“倪家将”。二哥倪学贵、二弟倪学家分别是民兵大队长和分队长，老大倪学道和他的儿子倪文亮都是民兵骨干，连倪家妈妈和四妯娌也都参加了妇抗会。任凭日伪烧他家房子，把刀架在脖子上，他们全家丝毫不动摇抗日到底的坚定决心。

英雄的正诗乡党支部是一个缩影。整个四分区各基层党支部，都响应粟裕同志提出的“每月每乡每支部消灭一个敌人”的

号召，发动广大民兵拿起钉耙、锄头、铁叉、小插子伺机捕杀单独活动的“清乡”人员。四分区的每一片土地都燃烧起抗日的烈火，四分区每一个乡村都奏响了斗争的凯歌。苏中反“清乡”斗争证明，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是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

(七)

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是在区党委统一领导、各分区配合支援下进行的。4月15日，正当日伪对四分区通中地区大举“清乡”的时候，三分区主力部队与泰兴、靖江县团埋伏于靖(江)、新(港)公路五号桥附近，把伪军十九师七十三团450人全部歼灭，俘伪营长以下200人。伪如皋警卫团朱开聪率3个连在三、四分区交界处的三腰庄强行筑据点，企图切断三、四分区的交通联系，三分区主力部队又用火攻摧毁了据点。除在外围不断袭击歼灭敌人，三分区在物资上还给予四分区大批枪支弹药。

这段时期，粟裕同志统筹全局，组织三分区在“清乡”边缘地带袭击敌人。南通警卫团一部在“清乡”圈边沿的平潮、白蒲一带曾击坏了苏北“清乡”头目张北生的汽车，击毙了他的随行人员。5月下旬，在陈毅同志的指挥下，新四军各部在盐阜区、淮海区、淮北和皖中区，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进攻。半个月中作战100余次，杀伤敌人千余，生俘758人，缴获长短枪983支，机枪74挺，迫击炮2门，掷弹筒19个，子弹3万多发。新四军的春季攻势，在战略上也有力支援了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

反“清乡”前夕，粟裕同志要求四分区从部队和公安部门抽调一批政治上坚定、富有作战经验的人员，配备短枪，组成“政治

保卫队”，专门对付特务、“清乡”重要人员。一、二、三分区即各抽调一个排组成“短枪队”，潜入“清乡”圈内，与四分区各县的“短枪队”配合。这支“短枪队”，由陈伟达同志领导，归四分区统一指挥。当时四专署专门颁布的《反“清乡”期内紧急治罪条例》规定，汉奸、特务“国人皆曰可杀”、“短枪队”可以行使这种权力，区以上政府和民众团体也有执行权。“短枪队”的行动，造成日伪“清乡”人员极度的恐慌。岔河大检问所主任凌月东，就是被我神出鬼没的南通短枪队，闯过三重步哨线，击毙在天生港旅馆内的。汉奸、特务一听到“短枪队”，就吓得索索发抖。海门茅镇特工站的站长，一连三个月不敢出门一步。南通 10 多个伪区、乡长，龟缩在南通城里不敢下乡，惊呼“短枪队是神兵天将”。

在苏中抗日斗争的历史上，“汤团行动”也是值得记叙的。粟裕同志 1975 年还对我说过：“汤团打入敌军，是华中局决定的，汤团的领导、干部和群众英勇机智地完成了党所交给的任务，对于反‘清乡’斗争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个评价是客观而公正的。

早在敌人“清乡”前夕，华中局根据当时斗争的形势和对敌斗争策略的需要，决定派遣少量的部队乘苏北新旧伪军闹矛盾，新派伪军头目张北生大量扩充自己势力的机会，潜入敌人内部，以配合我军坚持公开斗争。区党委几经谋划，决定由汤景延同志率领的通海自卫团（简称汤团）打入伪军内部。选派汤景延同志率领部队担负这一特殊的任务，主要考虑到他是中共特别党员，抗战初期参加过国民党的地方部队，与汪伪上层人物有“旧交”，便于打入敌人内部。行动前，我们明确向汤景延、顾复生（政委）、梁皓群（党总支部书记）等同志交代任务：打入后，要查明敌人的“清乡”计划，做好情报工作，便于我军主力行动，控制南通到海门的沿江地区，取得同江南新四军的联系，掩护我方人

员往来,搞好军火物资运输,做好争取和瓦解伪军的工作。还特别提醒这些同志,部队打入敌人内部后,要防止被敌人分化改编,要始终掌握住部队,要胆大心细、勇敢机智,出污泥而不染。此外,我们还作了一些人员调整,加强政治工作。全团有38位共产党员,设有基层党支部和党小组,并在党内规定了严密的单线联系方法。

大概在3月底,汤景延同志与汪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区长姜颂平、伪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主任张北生挂上钩,还同日方代表高木谈判议妥。约4月中旬,汤团接受伪“外勤警卫团”番号,分驻海门、姜灶港、张芝山一线。汤团打入伪军后,日伪曾大吹大擂宣扬了一阵子,伪江苏省政府“主席”李士群在苏州召见汤景延,晋升他为旅长,授少将军衔,还将汤团番号改为“苏北清乡主任公署保安司令部第二教导大队”。

汤团的处境是艰难的,既要提防日伪军对他们可能引起的猜测、分化,还要默默忍受苏中老百姓因不了解内情而产生的仇视和鄙夷。对此,汤团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他们牢牢记住党的重托,表现出高度的对党和人民的忠贞。整个汤团近800名干部、战士,在敌人的巢穴里度过了不平静的163个日日夜夜,除少数经不起考验的人被及时处理外,全团同志都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打入敌人内部后,他们利用分散驻防的机会,控制了长江边上的宋季港、牛洪港、青龙港,保持住江北与江南的交通联络;利用伪军部队经商的机会,开办了“协记公行”,经营粮食、禽畜、菜蔬等贸易,为根据地筹集款项,购买、运输药品、布匹等军需物资,掩护我部队进出敌据点;并利用各种机会,将一些军火秘密运往四分区部队,还传递了不少重要情报。

9月下旬，粉碎敌人“第一期清乡”已胜利在握，考虑到汤团行动的目的已达到，区党委遂决定让汤团从伪军中拉回来。

9月29日晚间，汤景延同志指挥分驻刘桥、石港、季家灶、骑岸、金沙、余西、余东、三余长达100多里沿线的部队同时行动，举行“起义”，凯旋回到我根据地。全团的装备比打入前增加了重机枪1艇、轻机枪2艇、步枪100多支、子弹10万余发。

汤团胜利归来，震惊了汪伪政府。伪苏北清乡公署主任张北生和汪伪特工总部江苏实验区南通分区区长姜颂平等原先曾向上司推荐汤景延，免不了受到其主子日寇师团长小林的严厉训斥，几乎丢官丧命。

我苏中区和四分区为庆祝反“清乡”斗争的初步胜利和汤景延部队出色完成特殊任务，召开了祝捷大会。汤团返回后编为联抗二团，继续为抗日斗争作出贡献。

第三节 反“清乡”斗争奏凯歌

(一)

1943年秋，苏中四分区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更是如火如荼地展开。日伪“第一期清乡”毫无成果，八方受挫，骑虎难下。相反，我四分区军民群情高昂，对日伪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攻势。在县团武装的掩护下，各地民兵在敌人据点附近摆开宣传阵势，向敌伪人员上抗日课，还通过各种关系向敌伪人员写警告信、劝告信，广泛散发传单。武装起来的群众荷枪扛锄，还将海复、二窰、中兴、北新、聚阳等镇伪军据点层层围住，逼使伪军撤退。群众性的武装包围据点的示威运动，迅速扩展到南通、如皋等县，参加的群众达8万多人，规模之大，声势之壮，确实非同寻常。

与此同时，苏中各武装部队也积极出击，发动了全面的军事攻势，袭击日伪据点和封锁线，短枪队和游击小组也深入据点去抓俘虏。在我强大攻势下，伪军和“清乡”特工束手无策，情绪大为低落，引起大批逃亡。一时间，向我自首的日伪职人员，多达891人。伪“清乡”人员中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打油诗：

“‘清乡’无把握，
生死不可卜；

大家捞一票，
赶快出苏北。”

(二)

8月，区党委和一师师部召开会议，讨论四地委书记吉洛同志所作的《三个月反“清乡”初步总结与今后形势发展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又当面听取了周林、张日清两同志的汇报。讨论后，苏中区党委、一师师部就粉碎日伪“第一期清乡”后的形势，给四地委军分区发出一份重要的指示信，肯定了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认为四分区提供的宝贵经验证明，日伪的“清乡”是完全可以挫败的，各分区军民都应该增强反“清乡”斗争的信心。

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估计四分区将面临两个前途：一是敌人在四分区“清乡”结束后，可能将一部分兵力转移到其他地区，继续进行“清乡”；二是敌人“清乡”失败，却于心不甘，继续在四分区进行第二期“强化清乡”。

因此，区党委明确向四分区指出：“你们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作充分准备，认为两个月后反‘清乡’就胜利了，好象‘清乡’就转到其他地区去了的乐观空气，在四分区事实上是存在的，必须克服这种不应有的观念，特别是干部中应深刻认识反‘清乡’斗争的长期性、艰苦性。‘清乡’为敌伪国策，其不计成败地贯彻下去是不用怀疑的。但必须防止悲观失望的抬头，说明即使敌伪进行第二期强化‘清乡’，我们亦有充分把握粉碎之。牵制敌人于四分区进行第二期‘清乡’，是四分区党的光荣任务。”

如何继续反“清乡”？区党委和一师师部的意见是，密切注

意日伪动向，加强政治攻势，使反伪化、反保甲与反自首运动及伪军和“清乡”机关的不合作运动成为中心内容。在作战方针上，仍然坚持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为主。如果敌人对四分区“清乡”暂告段落，移兵他去，四分区军民可以进行反攻，形式最好是里应外合。但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反攻不是最后胜利的反攻，主要在于摧毁敌之“清乡”机构（主要是区级）。

区党委特别担心干部群众中滋生轻敌、骄傲情绪。当时，苏中各分区出现了民兵脱离生产、脱离群众的现象，警卫团、区游击队也有集中行动的倾向，忽视了分散游击，寓兵于农的指导方针。区党委和一师师部认为，我们还没有夺取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敌强我弱仍是当时的基本态势，反“清乡”斗争的主要方式仍然是群众性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而不是主力兵团、地方武装、民兵自卫队集中行动与敌决战。因此，区党委向各地重申，民兵（包括基干民兵）的性质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即使在“清乡”地区或游击根据地，民兵因作战需要而处于半脱产状态，但也决不意味着向全脱产方向发展。民兵应与群众结合起来，民兵与群众脱离是危险的，区游击队应与民兵结合，警卫团更应彻底地方化、群众化。在四分区反“清乡”地区，区游击队以班为单位，分散与民兵基干队结合，在每两个区建立1至3个作战基点。警卫团应取消营、连、排重叠编制，每县保持1个精干的连，随团部行动，其余部队一律以活动地区为单位编成若干分队，用极端分散的游击战术，到处打击敌人，使小股敌人不敢轻易下乡，以支持群众的斗争。

在这段时期，区党委书记粟裕同志在黄花塘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区党委的主要工作由叶飞、钟期光、管文蔚同志和我商量决定。粟裕同志一直与区党委保持电讯联系，关注着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粟裕同志来电指示，如果通中、通西各据点之敌

全部撤退,即可能是“清乡”暂告结束。四分区应抓住此次反“清乡”胜利,在群众中进行深入宣传教育,以提高斗争热情与信心;对各界人士应进行普遍慰问,以便更进一步团结他们,对蒙难民众应发动各阶层人士进行普遍救济;对伪军则应扩大我反“清乡”伟大胜利的宣传,以促其动摇。他特别提醒我们:“必须防止轻敌与骄傲,以防止敌人反袭。”

但是,由于群众性的反“清乡”斗争达到高潮,干部群众斗志昂扬,却没有树立起长期进行艰苦斗争的思想。有些干部群众以为,日伪在四分区军事力量已经削弱,暂时不会有大的行动,可以松口气了。谁料到了10月中旬,日伪对四分区“清乡”杀了个“回马枪”。由于四分区军民在思想上、组织上准备都不充分,遭到了一些损失。再加四分区地势平坦,既无山岳可依托,又无湖泊可掩护,夏天茂密的青纱帐已逐渐消失,原来筑有暗堤、暗桥的河流进入枯水季节,这许多主客观因素交合在一起,使四分区反“清乡”斗争进入了极为艰苦复杂的阶段。

(三)

9月底,敌“清乡”头目张北生声称,要以“延期清乡”来“补充完成总纲所定而未了事项”。汪伪南京政府“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也窜到南通,决定通如海启地区“第一期清乡”再延期3个月。不久,汪伪国防会议决定由项致庄任苏北绥靖公署主任,伪第一行政区专员公署与“清乡”公署合并,张北生专任“清乡”专员。接着,汪伪又对原驻苏北(包括苏中)的伪军李长江第一集团军加以整编,李长江明升暗降,被调任伪军事委员会参议院副院长。这一系列措施表明,日伪不甘于第一期“清乡”失败,正准备对苏北地区进行更残酷的“清乡”。

1944年1月开始，日伪对四分区又实行“第二期清乡”即“高度清乡”，还准备把“清乡”范围扩大到二、三分区。日伪总结了前期“清乡”失败的教训，采用游击对游击的办法，搞“武装特务化，特务武装化”；各县自备一支以日军为主体的机动部队，加强军事“清剿”，同时重点对我基层组织进行破坏，继续编查保甲，推行伪化措施。敌人采取这些新花招，就是机动“清剿”与分散“驻剿”相结合，军事行动与特务活动相结合。日伪头目毫不掩饰地宣称，“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就是“流血清乡”！这期间，日伪分散兵力，深入我前期斗争胜利坚持的中心区，构筑据点30个，在边缘地区增筑封锁据点15个，又调配宪兵、警察、特工人员组成“武装特务突击组”，每组20到30人，每区派3到5个组，大搞特务破坏活动。我方干部群众稍不留意，就可能被敌人盯上，而且很难甩掉。南通警卫团团长殷逸同志率领的一支部队，就遭到过武装特务的袭击，他本人和一位战士不幸牺牲。殷逸团长的牺牲，对部队的打击是很沉重的。同志们认真总结了“大船翻在阴沟里”的沉痛教训，加强了对付便衣特务的积极防范措施。

以日军为主体的机动部队煞是凶残，他们配备轻重武器，凭借小据点，往返穿插，日夜出动，多路合围，进行有目标的“驻剿”。他们“驻剿”一地，便大烧大杀，发现群众有抗日行动，即加以杀害。据中共南通市委党史办公室编写的《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一书记载：从1943年10月9日至21日，日寇在南通就捕捉群众560多人。许多无辜的群众，受到日伪灭绝人性的残害，如活埋、剥皮、“点肉灯”、“灌肚肺”、戳钢针、上电刑等等。10月23日，山本机动队在石港镇土山脚下，用马刀砍死群众23人，割下人头装在竹篮里示众。其中有一孕妇，也被日军马刀捅腹致死。这是日寇继十总店大屠杀之后，制造的又一大惨

案。敌人搞“流血清乡”，使我方损失较大。仅就1944年初2个月统计，县级干部被捕2名，牺牲3名；区级干部被捕23名（其中牺牲12名）；乡级干部仅4个区即有76名被捕，平均每区约20名。群众损失也十分严重，据5个区统计，群众遭杀害达130人，烧去民房1475间，被捕被抓壮丁即达1609人。由于干部被捕牺牲，我基层组织一度陷于瘫痪，使一些地方的工作几乎陷于停顿状态。

四分区反“清乡”斗争一度陷入了被动应付状态。

（四）

在日伪的淫威下，“清乡”圈内的干部群众产生了两种情绪：一种是感到敌人力量强大，斗争情绪一度低落，因此对继续坚持公开武装斗争、依靠群众性的游击战战胜日伪军表示怀疑；另一种主张是如前期反“清乡”那样，大规模搞群众行动，以回答日伪军的烧杀政策。实际上，这种主张在敌人“延期清乡”、“高度清乡”阶段也不切实际，是盲目的硬打硬拚情绪。

粟裕同志这时已从军部回到苏中。他针对四分区情况，于1944年1月提出了关于振奋群众反“清乡”斗争情绪的意见。他认为，“清乡”圈内群众的情绪尚不能算是退潮，只是缺乏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斗争日益尖锐和残酷，敌人更加狡猾与阴险，我们单凭过去那一套斗争方法是不行的，必须适时地运用各种更巧妙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继续坚持顽强的斗争，以达到最后的胜利。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发来指示，要求苏中的反“清乡”斗争注意吸收苏南丹北地区反“清乡”斗争的成功经验，即以秘密斗争为主，武工队配合，开展公开的武装斗争，坚持阵地。

在粟裕同志主持下，区党委反复研究了四分区情况，根据苏中的特点和条件，部分吸收了丹北地区反“清乡”经验，制定了新的斗争方针，即“以公开坚持武装斗争为主”，同时“采取各种辅助的斗争策略、斗争方式（如秘密斗争、合法斗争、加强特种工作等）。”当然，采用各种辅助斗争，并不意味着放弃武装斗争。粟裕同志反复强调：“应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采用其他复杂的斗争方式，也正是加强武装斗争的有力步骤。”“将公开的武装斗争部分转变为合法与秘密的斗争，是围绕着武装斗争进行的。”

粟裕同志经常向我们提起，红军时代方志敏同志在闽浙赣边，发动群众运用原始的武器、旧式武装打击敌人的成功经验，如用松树炮、拉丝炮、地雷、炸弹、陷井、洋油瓶歼敌等等。他希望进一步发挥民兵分散打击敌人的作用，发动群众挖陷井、埋地雷，在敌人的据点附近及必经道路，广泛使用地雷、陷井，严密封锁敌人。据此，我们动员各分区制造大量小型地雷运往四分区，四分区也广泛发动群众自造地雷，并训练群众使用地雷。这办法果然很灵，日伪机动队、特工队时常踩雷掉入陷井，附近搜索又不见我民兵踪影，整天疑神疑鬼，心惊肉跳。

粟裕同志还指示各地组织神枪手，远距离杀伤敌人，而且专门以敌人的“长官”为目标，以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短枪队继续神出鬼没地出入市镇和敌人据点，镇压罪大恶极的特工头目。这些武装斗争的手段，使敌人十分恐慌。同时，我们还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一面渗入伪组织领导群众进行合法斗争，一面在伪自卫团中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使合法斗争、秘密斗争和公开斗争紧密配合。群众在我秘密组织领导下，有了“主心骨”，以“爱儿会”、“兄弟会”、“保丁会”等名义巧妙地与日伪周旋，反对敌人“抽丁”、“编甲”。日伪军大伤脑筋，便又强迫群众

参加伪自卫团，筑“瞭望台”站岗放哨，群众又趁机创造出新的应付办法，送假情报、瞎点火、乱敲锣，搞得日伪真假莫辨，疲于奔命。

这期间，区党委还要求四地委加强对“两面派”保长、乡长的工作，以便控制利用。由于敌人推行伪化，一时出现了不少两面派人物，有的是“红皮黑心”的真两面派，表面敷衍我们，骨子里是日伪的鹰犬；有的是“白皮红心”的假“两面派”，是我方组织秘密安插的；也有的是被我教育争取过来的。经过教育、争取，不少两面派有了转变，背靠日伪，心向我们，也做了些有利于反“清乡”的工作。

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区党委和四地委还针对因战火焚毁无法生产而造成的四分区百万难民的生活困难，紧急动员全苏中各地群众开展救济运动，帮助“清乡”圈内群众渡过春荒。

区党委原来打算，除对难民实行救济外，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移民，将四分区部分难民特别是我方人员的家属，转移到二分区东台台北及一分区江、高、宝地区。华中局复电认为采取移民措施不够妥善，因为广大基本群众离开本乡本土，势必造成我们无法立足原地，而且事实上我们也无法长期救济如此众多的移民。接到华中局指示，区党委就放弃移民计划，集中力量组织全苏中各阶层人士广泛募捐救济，动员“清乡”圈内群众生产自救。四分区各县先后提出互助互济、加强团结、协力生产、坚持斗争等口号，动员上层人士参加救济运动，号召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形成广泛的社会互助互济运动。苏中各级党政军机关带头捐献，领导干部主动将保健费全部献出，机关人员捐出伙食尾子、夜餐费，共计4万多元（江淮币）。苏中行署还决定减收或免收四分区1944年的税款。

四分区各级党组织根据季节，发动农民群众种青菜、黄花菜

等易生易熟又可暂时充饥的食物，组织沿海群众下海拾海货为生。群众性的互助互济，生产自救，较好地解决了当时的生活困难，而且更加激发起群众对日伪烧杀抢掠的仇恨，增强了斗争的信心。

(五)

在反对日伪“高度清乡”的斗争中，广大军民经历了最严峻的血与火的考验。东南警卫团团长王澄、政委鲍志椿、南通警卫团团长殷逸等同志，都是在反“清乡”斗争后期为革命捐躯的。区、乡一级干部的牺牲更大，死难群众更加无法统计。但这并没有吓倒英勇的抗日军民。

这里，我想特别提一提如皋掘马南区区长、共产党员白桐本同志，他是许许多多反“清乡”英模的杰出代表。他曾带领战士7次潜入敌人的据点，惩办伪军、特务、汉奸多达20余人，故而英名远播，威震敌胆。敌人谈虎色变，却又无可奈何，便去马塘、孙窑、曹埠等地张贴告示，悬赏40万元捉拿白桐本。然而，广大群众说：“就是金子堆成山，敌人也休想捉到我们的白区长。”有一回，日伪军得知白桐本住在周家店一户姓陆的人家，就连夜出动人马，赶到周家店搜捕。陆家老大娘突然听到日伪军敲门，忙把白桐本藏了起来。这时，几十名日伪军闯进门来，枪口对准陆家老大娘，凶神恶煞似的嚎道：“白桐本的有的，快快的交出来的！”陆家老大娘“啊”了一声，好象似懂非懂，忙转身去拿出一只黄铜盆，一本正经地解释道：“你们硬说我家有白铜盆，其实我家一直都用黄铜盆，哪来什么白铜盆呀！”敌人哭笑不得，便把陆家老大娘打了一顿，又胡乱闹腾了一会儿，只得快快而回。

1943年初，日伪在孙窑筑碉堡、编保甲，进行篦梳式“清乡”。孙窑西街有个保长名叫曹元。此人死心塌地为日伪卖命，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是出了名的地头蛇。白桐本与孙窑民兵大队长陈进才合计，决定尽快干掉这个伪保长。计议既定，白桐本、陈进才就带着十几个民兵，摸黑包围了曹家大院。不一会，听得院里有动静，白桐本使用外乡口音喊道：“曹先生快起来，今晚有30名皇军过境，要在孙窑借宿，请你准备50条被子，20只鸡子，外带一口大肥猪。”曹元半信半疑地问：“你是什么人？”白桐本大声答道：“我是马塘的皇军翻译。”曹元还不放心，又问：“翻译官先生，你怎么不早点通知呀！这深更半夜的，叫我怎么来得及张罗？”白桐本“哎呀”一声，不无气恼地说：“皇军今夜过境，事先连我也不知道，怎么能通知你呢？闲话少说，反正皇军只住一宿，天一亮就开赴石港，现在只能有劳曹先生了。”曹元虽没完全消除疑虑，却更怕真有其事，开罪于皇军，便披着衣服开门相迎。说时迟，那时快。没等曹元省悟过来，民兵们早已一拥而上，用棉花团塞住他的嘴，架着他一口气跑出3里多路，旋即推进草丛，结果了这条恶狗的性命。

1944年3月15日，身患疟疾的白桐本同志在堤南乡开会，不幸被日伪包围。突围中，他又多处负伤，以致落入敌人魔掌。日伪威逼利诱，要他“自首”，白桐本同志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最后英勇牺牲。掘马南群众闻讯十分悲痛，家家户户设灵堂、供牌位祭奠他。为表彰英雄业绩，当年《苏中报》、延安《解放日报》都以醒目标题发表文章纪念“人民领袖白桐本”，表彰他那崇高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精神。

在这场斗争中，许多开明士绅与我党同心同德，奋起反抗日伪暴行，他们的事迹也值得颂扬。比如南通县沧南乡开明人士刘剑人一家，就是“正气却敌”的典型。刘剑人先生在民主参政

中被群众拥戴为我方的乡长。反“清乡”斗争开始后，他的大儿子、民兵干部刘永芬同志，二儿子、区队副刘永芳同志都先后英勇牺牲在反“清乡”战场上。刘老先生义愤填膺，化悲痛为力量，又把三儿子刘永尉同志、四儿子刘永健同志送到革命队伍，决心与日伪决战到底。他本人也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他的老伴、大儿媳中计被捕，但婆媳俩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刘剑人先生及我武装力量活动情况。刘剑人先生一家齐心协力抗日的事迹，深受广大群众赞誉。1944年底，刘剑人先生终于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刘剑人一家还在四分区召开反“清乡”斗争群英会上，获得了“满门忠义”的光荣称号。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苏中军民的反“清乡”斗争，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史诗，是一曲民族斗争的壮歌。许许多多英雄人物的革命事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江苏省委和原苏中区党委的同志现已着手收集这方面的史料，是很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人把千百位英烈的业绩写成本本专书，有的可作为中小学生的课外辅导读物，用以教育我们的后代。

第四节 车桥战役前后

(一)

1944年春天，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战争局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转。苏联红军已将德国侵略者驱逐出国境，希特勒的彻底崩溃已成定局。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连连失利，转而企图摧毁美军在华东、华南的空军基地，以援救其侵入东南亚的孤军。同时，日军为打通平汉、粤汉铁路线，另辟通往东南亚的孔道，向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大规模新攻势，进一步胁迫多次表现动摇的蒋介石投降。在华中和苏中地区，日军为转嫁危机、摆脱困境，一面收缩防务，放弃若干次要据点，调派新兵取代老兵；一面对伪军、伪组织加紧整编，加紧控制，并相对集中兵力继续对四分区进行“高度清乡”，对二、三分区分别实施“强化屯垦”和“扩展清乡”。真所谓困兽犹斗，妄作垂死挣扎。

针对这一形势，苏中区党委及时提出了相应的工作方针，“更顽强的坚持原地斗争和更有效的准备反攻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迎接抗日战争反攻阶段的到来。区党委号召全体军民保持清醒的头脑、旺盛的斗志，用积极的姿态应付目前依然严峻的局面，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作好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和物质上的充分准备；广泛开展对敌人攻势，收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为最后战胜日寇创造有利条件。

2月下旬，区党委召开第五届扩大会议，研究部署1944年根据地的工作。

(二)

冬去春来，这一年的春节来得早(1月25日)，但黄海之滨的三仓河却依然冰封雪飘。驻地农舍的屋檐下，倒挂着排排锥形的冰凌，朔风呼号着，连坐在室内的人都感到寒气透骨。然而我们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这是中国人民奋起抗日的第7个年头，胜利在望的自信心与喜悦感鼓舞着顽强战斗的根据地军民。

面对这样的形势，粟裕同志运筹帷幄，多次找我议论。为了沟通苏中与苏北、淮南、淮北的战略联系，进一步发展苏中的斗争形势，他考虑组织一场较大规模的战役。当时，我对扩大苏中部队机动范围，积极改善根据地斗争局面，为正在进行的干部整风、部队整训、军民生产等运动创造安定环境的这一战略性考虑，是完全赞成的。这在我脑海里也酝酿多时了。

我与粟裕同志相识于抗战初期的皖南军部，共事数年，朝夕相处，使我对他在政治、军事方面的远见卓识和组织、指挥才能，十分钦佩。作为杰出的军事家，他对每一次战役及战斗的时间、地点、规模、方法、意义的筹划，都很审慎、细致、深入、严谨。我参加革命多年，也经历过不少战役，学习了一些理论和实践的知识，但对战争指挥艺术却还是个“门外汉”，特别在粟裕同志面前，真可说是一个小学生。说实在话，当时我并没有一下子就看清华中敌后战场实行局部反攻的时机已趋成熟，可是想从苏中根据地的实际出发，促使局势好转的主观愿望却很强烈。正是

在这一点上，我与粟裕同志各自思考的轨迹吻合了。我曾多次对粟裕同志说，苏中党校、苏中公学的筹备工作已经大体就绪，就是缺少一个相对稳定的地理环境。苏中党政军的不少负责同志也颇有同感。如果说即将进行的战役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这个“因”就源于当时客观的形势及苏中党政军民共同的意愿。人的主观能动性所发挥出来的巨大力量，对改变苏中乃至华中敌后抗日局势起着积极的作用。

区党委的扩大会按预定时间召开。会场当中用木炭燃起一盆火，与会同志们聚拢在火盆四周，边暖着手，边发表着各自对形势的看法。在会上，粟裕同志对形势作了详尽分析，他用沉稳的语调说：“目前大的局势对我们敌后抗战十分有利，虽然苏中地区的斗争仍很复杂，战斗也极为频繁，但日寇终不可能解决因战线延长和兵力薄弱所造成的基本矛盾，因此敌人无法摆脱顾此失彼、被动挨打的局面，这就为我们在局部地区转入反攻提供了战机。”他又说：“我曾与阿丕等几位同志交换过看法，将苏中敌后战场的战略相持推入战略反攻，这不仅需要有外界诸种有利的客观条件，有时往往还需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陈毅同志不是常说：‘时势造英雄和英雄造时势是相辅相成的’吗？抗战7年来，艰苦的敌后坚持的环境，已将800万苏中军民锻炼成真正的英雄，英勇的苏中军民也完全有能耐向盘踞在自己家园内的日本侵略者发起一次强大的新攻势，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毛泽东同志说过，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所采取的战略，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他也提倡‘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由此可见，再科学的原则最终也是要靠我们自己来掌握，并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灵活实施的。”

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粟裕同志这一番充满激情的话，使会场上原先就很热烈的情绪迅速升到了沸点。从各分区来的负

负责同志争相发言，希望能尽快实施新的战役行动。你一言我一语，愈谈愈具体，最终的一致意见，都趋向于在淮宝涧河沿线的车桥地区，发起一场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战役。一分区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韦一平与专员惠浴宇兴奋地说：“打开车桥，我们江高宝就有更大的发展余地了。”一师副师长兼一旅旅长叶飞同志说：“自主力地方化以来，我们保持了3个主力团，机动力量比较集中，地方武装也得到了加强，一大批战斗力仅次于主力团的县独立团（或警卫团），以及师（军区）直属部队和各分区特务团已经迅速成长起来了。全苏中骨干武装力量已达20个团，3万人枪。眼下部队士气正旺，尤其主力部队集中进行了冬季练兵，战术、技术都有新的提高。前些日子，我在北行练兵场上看过投弹手们大显身手，他们向模拟敌人碉堡枪眼的高达10米多的竹圈投掷手榴弹时，一枚枚铁弹凌空穿圈而过，比古人所说的‘百步穿杨’还要神奇。依我看，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车桥一役的胜利是有很大把握的。”

（三）

车桥是淮安县东南的一个大镇，位于苏中、苏北和淮南3个根据地的交界处，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动枢纽。具体地说，我们要沟通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各根据地的战略联系，进一步改善苏中的斗争局面，车桥是势在必取之地。在当时，车桥又是华北日军第六十五师团与华中日军第六十一师团的结合部，比较孤立突出；守敌则仅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大队，虽然从淮安向东流经车桥的涧河沿岸，敌军修筑了许多据点，但相对来说兵力也还是比较薄弱的。

在区党委扩大会议期间，一师和苏中军区司令部也抓紧时

间召开有关部队团以上干部会，具体讨论了战役行动方案。粟裕同志提出了攻坚与打援同时并举，而以打援为主的作战方针。

在共同讨论形成的几个方案中，经过再三比较，权衡利弊，最后一致决定采用先打车桥，后打泾口的方案。其有利的方面是：一、车桥是日军在该地区的指挥中心，打下车桥，周围的泾口、曹甸等地必陷于孤立，便于我军乘胜攻击。我占领车桥后，其余据点之敌可能自行撤出；二、车桥处于敌占区中心地带，是日军驻守的心脏部位，敌人不致料到我会绕过外围若干据点，先向它进攻。先攻车桥是我出奇制胜的一着；三、车桥敌人守备与工事虽强，但周围地形、地物、地貌却比泾口更有利于我攻击部队接近；四、车桥是苏中、苏北根据地的边区，敌来援方向较多，但距敌两个师部的驻地——扬州、徐州均较远，短时间内敌人难以派出大部队增援。况且，距车桥西北12里的芦家滩一带，是援敌必经之路，又是设伏的良地，十分有利于我军集中兵力和机动，更便于我军集结、荫蔽和指挥。

以上四个有利因素，促成这一方案被采用。参战部队组成3个临时纵队：以三旅七团为攻坚纵队，担任攻占车桥任务；以一旅一团、泰州独立团四营、三分区特务营组成一个纵队，在芦家滩、韩庄一带构筑阻击阵地，担任淮安、淮阴方向的打援任务；以划归一师指挥的六师十八旅五十二团、江都独立团和高宝独立团各一营，组成一个纵队，部署于官田、崔河、大小施河一线，担任曹甸、宝应方向的打援任务；以师教导团一营及四分区特务团两个营为总预备队，并与苏北根据地新四军三师黄克诚部联系，以策应这一战役行动。

由于粟裕同志要继续主持区党委的扩大会议，决定由副师长叶飞同志负责这次战役的前线指挥，师参谋长刘先胜同志协

同指挥。

(四)

数日后，粟裕同志和我接到叶飞、刘先胜两同志从盐城地区建湖县发来的电报。报告说：前线指挥所抵达预定地点，参战各部队准时在曹甸、泾口一线以东之蒋营附近集结，拟于3月4日24时前各部进入预定阵地。不久，又来电告诉我们：前线指挥所已进至车桥以北20里处的扁担城，据潜入敌据点的侦察员报告，守敌已产生我可能进攻泾口的错觉。

车桥本是顽固派韩德勤所部盘踞多年的老巢，还是国民党省府所在地。自1943年2月敌寇扫荡淮宝，韩顽受创逃往运河以西后，即被日伪所占。经日伪顽相继经营多年，车桥已逐渐成为沟深垒高、防备森严的军事要塞。它除有高约2丈的大土圩外，敌驻地附近四周还有小土圩3道，明碉暗堡50余座，镇西南还有个敌人的小飞机场。在车桥镇周围，包括泾河、张桥、曹甸、泾口、凤谷村等处，布满日伪据点，构成便于相互策应的一座梅花型的防御体系。但世间事物妙就妙在互为因果或相互制约。正由于车桥守敌有“固若金汤”的自我安全感，平日守备相当松懈，万万没有料到新四军主力敢于碰硬，会出奇兵发动“掏心战”。

车桥战役于1944年3月5日凌晨发起。我攻击部队分南北两路，乘月色迅速行动，用云梯架桥通过壕沟，又用云梯翻越圩墙。密集的枪炮榴弹声骤起，车桥攻坚战打响了。

三旅旅长陶勇同志亲自指挥千余勇士，仅用了20多分钟，就冲进镇内街巷，与敌人开展肉搏战。按预约的规定，各部告捷的信号弹纷纷射向天空。战斗进行了一上午，攻坚部队已拿下

日伪军碉堡 35 座，斩获甚多，镇内仅剩少量残敌负隅顽抗。

车桥告急的消息传到淮安、淮阴、泗阳、涟水等地，各地敌军大为震惊。当天，日军即在淮安集结 200 余人，首批驱车南下救援。至芦家滩，进入我军伏击阵地，与我主力一团遭遇，被我劈头盖脑一顿猛打，日军慌忙散开，妄图顽抗，恰好又进入我预设的地雷阵，损失惨重。随后，第二批、第三批援军亦相继遭我截击、分割，完全处于挨打境地。晚 7 时，我军有意让残敌会合于韩庄而包围之，激战至晚 9 时，几批援军被我歼灭殆尽。车桥解放了。

当一师参战部队与日伪紧张战斗之际，兄弟部队三师给予了有力的支援。三师七旅为牵制日军，一举攻克了北面的朱圩子据点。三师参谋长洪学智同志还前往叶飞同志指挥所，表示祝贺与慰问。

车桥战役历经一天两夜激战，共歼灭日军三泽大佐以下 465 人，伪军 483 人（内含生俘日伪山本一三中尉以下 24 人）。我军伤亡 200 余人。车桥战役结束，敌人被迫仓惶收缩兵力，放弃曹甸、泾口、塔儿头、鲁家庄等重要据点 10 余处。这样，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便为我军全部控制。

（五）

车桥战役取得了攻坚打援的双重胜利，是抗战以来我军在华中歼灭日军最多的一次，因而被称为“华中六年抗战以来的创举”。车桥战役胜利的喜讯象长了翅膀似的，顷刻间传遍苏中、苏北各抗日根据地，人民群众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锣鼓声、鞭炮声象庆祝节日一样到处燃放，欣喜若狂的三仓河群众在街上、田头跳起了秧歌舞。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的代表们格外

振奋，有好几位同志按捺不住，连连催促我向车桥参战军民发贺电。经粟裕同志和与会同志研究，我们即以苏中区党委、苏中行署、军区、一师师部的名义，分别给前方发了祝捷贺电。

当时正在延安的陈毅同志也发来嘉奖令：“车桥之战，连战皆捷，斩获奇多，发挥了第一师部队历来英勇果敢的作战精神，首创了华中生俘日寇之新记录，除通报外，我们代表全军，庆祝你们的胜利！”

继续进行着的区党委扩大会刚刚作出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满怀胜利喜悦而归的叶飞、刘先胜等同志，风尘仆仆回到了三仓河师部驻地。在与他们几位亲赴前线指挥的同志的交谈中，我又得知许许多多有关这次战役的新情况，听来十分令人鼓舞。

车桥战役的胜利，离不开指挥员用兵巧妙，战士们英勇顽强，而淮宝地区广大群众对我军的巨大支援，也是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战前，淮安县和宝应县党政机关分别由县委书记许亚和曾涛同志挂帅，动员和组织了数以千计的民船，并配以船工，及时将部队、担架队以及攻坚器材等辎重运至各攻击地点附近。当地群众响应号召，支援了大批粮食、蔬菜、油盐等军需物资。仅宝应县安丰镇一次就交售了5万斤粮食、百万斤柴草。为了克服当地水网纵横，我军行动不便的困难，战前即有3万多农民群众在曹甸、安丰等地筑路、打坝，很快就修成了顶宽1丈、出水约5尺，总长为30余里的5条大坝，为我参战主力数千人奔袭敌人据点铺平了道路。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淮安、宝应两县千余武装民兵都枕戈待命。直至战斗打响的前夜，为阻击敌人的增援，张桥区群众及民兵，还在平桥以北、三堡以南的大运河线上开沟挖塘，破坏淮安与宝应间的公路；安丰区民工切断了宝应至车桥、曹甸的大路；石塘区大批民兵在淮安到车桥公路沿线站

岗放哨，埋设土造地雷，使日军援兵每跨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战斗进行间，安丰、崔渡等地民兵，又遵照前线指挥部的命令，集中埋伏在吕舍的日伪据点周围，随时准备阻击敌人向泾口方向溃逃。吕舍据点的敌人被我全歼后，这支民兵队伍迅速赶了几十里路，破坏了车桥镇郊的敌飞机场。

战斗刚结束，宝应县 40 多个乡的数万名群众，纷纷自带工具参加破圩子、拆碉堡等打扫战场的工作，彻底毁平了敌人经营多年的巢穴。从 4 月 8 日至 13 日，我军相继收复了曹甸、泾口、塔儿头、张家桥、杨恋桥、蛤拖沟、大吕舍、鲁家庄、蚂蚁甸、受河、周庄等日伪据点 12 处。

陶勇同志是一位使敌人望而生畏的战将。这次，他谈到车桥攻坚大战，不禁连呼“打得过瘾，打得过瘾呀！”他说，守备战固然也是战，但比不上这次硬敲东洋鬼子的脑壳来得痛快。讲到群众支前，他十分动情地说，这次攻坚歼灭战的军民协作、群众支前，是空前规模的，比当年黄桥的支前工作有了显著的提高。老陶一番详尽的描述，深深地感染了我。当年他那种说话的神态，至今仍栩栩如生留在我记忆里。尤其感人至深的是，他只顾称赞战士杀敌、群众支前，绝口不谈自己。他就是这样一个勇猛顽强、威慑敌胆而又谦逊平凡的指挥员，一个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

(六)

这里，我觉得应该尊重史实，叙述一件关于车桥战役的憾事。车桥战役后，粟裕同志领导的新四军一师威名大震，几乎妇孺皆知。然而，正当万人齐颂车桥战役胜利的时候，突然在党内，而且是华中党的领导人，竟对发动车桥战役提出了尖锐

的批评。

3月中旬的一天，驻地军民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可当我走进粟裕同志的房间，却感到一种反常的沉闷气氛。桌上摊着一份华中局代理书记饶漱石从淮南黄花塘发来的电报，内容实在出人意料，犹如一首雄壮欢快的英雄交响曲中突然冒出一个不和谐音。饶漱石在电报中指责车桥战役说：“不宜主动的过分暴露自己的力量”，“过分刺激了敌人”，“很可能引起敌人的大报复”，“对局部暂时利益如果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对全部各方不良的影响和牵制”等等。电报还责令我们一师和区党委几个负责同志对此作出检查。说实在话，我们当时对饶漱石的“批评”是持相反意见的，一致认为发动车桥战役完全符合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是经过集体研究作出正式决定的。于是，经过仔细研究，决定以粟裕、叶飞和我三个人的名义，向华中局、军部发回电报，详细申述组织车桥战役的充分理由。我们认为，饶漱石这份电报，关键不是什么对客观形势估计正确与否的问题，而是故意找岔子，想整一整一师和苏中区党委的领导同志。

正当我们感到困惑之时，延安的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新四军苏北部队收复车桥的消息，热情赞扬“我粟师以雄厚兵力”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社论祝贺，并高度评价了车桥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声音，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苏中军民的抗日斗志。在当时，说句笑话，也真的“救”了我们这几个人的“命”。饶漱石从此闭口不提“检查”的事了。

不过，提到饶漱石其人，我还想起另外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记得陈毅同志奉党中央之命，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不久，华中各战略区的负责同志都被召去淮南黄花塘参加会议。那次苏中根据地的代表有管文蔚同志和我。哪是开什么会，完全是

饶漱石趁陈毅同志暂离军部之机，背后搞鬼，肆意罗织莫须有的所谓“罪状”，妄图从政治上陷害陈毅同志。饶漱石还要我们向苏中各地委、军分区负责同志作传达。因为陈毅同志在全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中威信极高，而且大家都十分了解陈毅同志的为人，所以同志们根本不相信饶某这种谬论。管文蔚同志和我回到苏中，向粟裕同志汇报了这些情况。粟裕和同志们也不同意饶漱石的说法和做法，根本不向下作传达。这件事，倒起了另一个作用，那就是使我对饶漱石的为人，从本质上加深了认识。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陈毅同志的《冬夜杂咏·青松》五言诗，为他自己的一生作了很好的写照。饶漱石一类人物的所作所为，今天回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他们的污言秽语，只能使自己出丑，决不可能玷污高洁挺拔的青松。

(七)

车桥战役揭开了华中敌后对日战略反攻的序幕，这一胜利的取得，也象以往任何一次胜利的取得一样，我苏中参战部队和淮宝地区群众，是付出了血的代价的。在这里，我想提及的，是一位英勇牺牲在车桥战斗前线的日本同志，他的名字叫松野觉。

松野觉同志是日本广岛人。1940年1月应征入伍来华，次年12月在如皋花市街战斗中，被陶勇部八团俘虏。此后经过教育，他参加了新四军和“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因进步很快，不久就担任该同盟苏中支部的宣传委员，一直和一师敌工部长陈超寰、宋之光等同志在一起工作。粟裕同志和我都见过他。

松野觉同志聪明机智、坦诚直率，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我觉得他是一位很有觉悟的反法西斯战士。

陶勇同志曾多次向我讲起这位日本青年的情况，说松野觉原是广岛日本海军某兵工厂的普通工人，有朴素的阶级意识，所以，一旦明确了真象，就能分清是非。他参加新四军后，工作非常积极，决心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一道，共同打垮日本帝国主义，愿为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的彻底解放奋斗终生。老陶还说，当初把松野觉俘虏回来时，我们请他吃饭，打消他的思想顾虑，做他的立场转化工作；这个日本小青年的酒量真不简单，连喝几碗也不见醉。

松野觉同志积极做日军的宣传工作，用日语写传单和标语。打仗时，他勇敢地冲上前线，一边喊话开展政治攻势，一边拿起武器参加战斗，逐步锻炼成为一名优秀的国际主义战士。这次参加车桥战役，表现也十分突出，他是在距日寇碉堡二、三十米的战壕中，亲手消灭了几个负隅顽抗的敌人之后，才被敌人的子弹射中而光荣牺牲的。许多新四军战士为给这位日本战友报仇，流着热泪，高呼着复仇的口号，前仆后继地冲向敌人阵地。

松野觉同志在车桥战场上英勇地倒下了。他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为了打倒日本法西斯主义，为了拯救我的同胞，如果我就此死了，也是我的心愿。”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日本反战同盟的坚强战士松野觉烈士，在中日关系最黑暗的年代里，正是他们和我们并肩战斗，将中日广大人民的心联成了一条友谊的纽带。

第五节 开展整风运动

(一)

在对敌斗争十分紧张的年月，自1942年2月开始，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全党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即整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党员干部中，以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方式进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求得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统一，以保证抗日战争的胜利。这一场整风运动，有着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1942年2月1日，在延安党校开学典礼大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题为《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他说：“我们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是没有问题的，党的工作也是有成绩的。党有数十万党员，他们在领导人民，向着敌人作艰苦卓绝的斗争。这是看得见的，是不能怀疑的”。那么，究竟我们的党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呢？毛泽东同志说，有几样东西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还显得不大正确，不大正派。他说：“所谓学风有些不正，就是有主观主义的毛病。所谓党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宗派主义的毛病。所谓文风有些不正，就是说有党八股的毛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这三股歪风，有它们的历史根源，现在虽然不是占全党统治地位的东西，但是它们还在经常

作怪，还在袭击我们。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说明之必要。”全党同志都应当“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他说：“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阐明了整风运动的目的，在于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着的妨碍贯彻党的正确路线、政策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使党成为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更加统一和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党，迎接即将到来的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在开展整风运动的时候，整个局势相对说来比较稳定。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拖住了日军，使它不可能在中国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敌后根据地也处于“扫荡”和反“扫荡”的对峙局面；我们的政权已相对巩固，各项建设工作全面展开；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被打退。因此，我党抓住这个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开展了整风运动。

从全党来看，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的任务已提到全党的面前。抗日战争开始后，由于我党坚决抗战的主张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党的威信空前提高了。由于党领导抗战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大批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先进分子纷纷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员大大增加了。我党已发展到80万人，单从数量来看，也成了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当时党长期处于农村分散的环境，党内还没有无产阶

级化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往往用他们原先的思想作风来影响党，形成了党内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和斗争。因此，党的任务，就是要在广大党员干部中，普遍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纠正各种非无阶级的思想和作风。

从党的历史上看，虽然从1935年1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遵义会议）以后，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但在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每次错误路线虽然得到纠正，但其错误思想的影响还没有在全党肃清，特别是1931年以来的教条主义错误，还没有被全党所认识。整风运动正是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加强思想建设的迫切需要。

苏中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当时，苏中地区的党组织和军队，处于三角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各种思想意识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党和军队中来，特别是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没落思想对我党的侵蚀是严重存在的；各个时期一批又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农民涌进革命队伍，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作风：打了胜仗产生骄傲情绪；打了败仗产生悲观失望情绪。长期以来，由于形势动荡、战斗频繁，不要说群众，连党员干部也极少有学习机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理想，什么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有些干部的脑子里只有模糊的概念，缺乏鲜明的、理性的认识。就是有些理论知识的“知识分子”，也恰如毛泽东同志所形容的：天天讲理论和实际联系，但还不会把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联系起来，使实际工作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苏中部队长期处于分散、独立坚持斗争的敌后环境中，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现象也严重存在。在地方上，本地干部成长了，与外来干部也产生矛盾。一般说，本地干部文化比较低，本位主义、家乡观念较

重；外地干部以为自己是开辟工作的，虽对当地的情况不熟悉，但主观主义、命令主义也较多……总之，在苏中的党和军队中，党风、学风、文风不正的问题都比较严重地存在着。纠正这些不良倾向，正是苏中开展整风运动的主要任务。

苏中整风运动稍迟于延安，从开始到结束先后历时3年多，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为根据地军民投入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作了重要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整风开始时，由于党内对整风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加上日伪对我的频繁“扫荡”、“清剿”，周围环境尚未稳定，故一时未能广泛深入展开。至1943年6月，华中局召开整风会，苏中的整风运动才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起来了。

(二)

苏中整风运动全过程，都是在紧张的战斗间隙进行的，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车桥战役前，区党委在第四次扩大会上，作出了开展整风的决定，并成立了以粟裕同志为主任的整风学习委员会，管文蔚、钟期光、周季方、刘季平、曾一凡和我为委员。我们遵照党中央及华中局的指示精神，首先组织了区党委、地委领导成员的学习，以统一思想认识。随后区党委向各地委发出了关于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提出：“今后工作应以整风为第一任务，一切工作必须围绕整风学习为中心进行，这是苏中全党特别是党的干部的任务。各级党委应以教育、巩固党为自己的基本工作。”

可是，当时环境不允许我们全力投入整风运动。四分区军民正在激烈地展开反“清乡”斗争，几乎同时，一、二、三分区也遭到日伪多次大规模的“扫荡”。尤其是日军船引部队（与南浦部

队调防)积极配合小林部队对四分区“清乡”，纠集1万2千余人，开始向二分区滨海一线进攻，从南北两个方向包围东台地区，企图聚歼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严重敌情，使根据地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苏中根据地开辟以来，党的建设确实打下了相当的基础。据1942年底统计，全苏中已有800多个党的支部。贫雇农和中农出身的党员占地方党组织中的绝大多数。党的各级组织在党领导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工作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记得1942年底，当时刚刚开始实行根据地党政军一元化领导，苏中区党委刊物《党风》创办了，编辑部同志约我为创刊号写篇短文。我在该文中提到：苏中根据地的党，由1940年全面开辟时期的初步建立，到1941年夏季的大发展及冬季的整理工作，经过与日伪顽千百次斗争的磨炼，“已再也不是过去非法、在野、狭小的组织了，党有了千数干部与万数党员，有了数万抗日革命的军队，领导数十万有组织的群众，还有数百万群众在我们党的政治影响周围。”这是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但苏中党组织毕竟是在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社会里，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后才逐步恢复、建立起来的。虽然从组织上讲，已经初具规模，然而，苏中的党还是很年轻的，斗争经验不多，理论水平还低，战斗力也不够坚强，组织上还不够巩固，思想上也还没有完全统一。为此，有大量艰苦、深入、细致的工作还需要我们努力去做。”这些估计，在其后的整风运动中，证明大致上还是准确的。

1943年夏，粟裕同志曾在区党委的一次会议上，针对整风问题作过一些指示。由于当时战斗频繁，整风运动未很好开展，粟裕同志指出：“今后要将整风学习做好，我们应以干部学习为主，这就是中央号召我们以学习为重要任务之一。”后来，粟

裕同志还找整风学习委员会的成员商量改进措施，根据他的意见，我草拟了一个关于整风学习的指示。在这份指示中，除对全区的整风工作作了具体部署外，提到当时整风学习中所存在的缺点，要求迅速加以克服。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区党委认真抓紧了整风工作。据统计，有1000多党员干部参加了学习，初步建立起学习组织和学习制度。我们主要采取边工作边学习的方法，在个人自学的基础上，小组漫谈讨论，然后联系个人思想和工作进行自我总结。这时，广大党员对整风的认识、学习态度和方法都有了明显的提高。

(三)

车桥战役打响后，苏中区党委第五次扩大会议在东台三仓河一带召开。由于车桥战役的胜利，不仅打开了淮宝地区的局面，而且出现了一个环境相对稳定的“后方基地”，从这时开始，苏中的整风运动逐步进入了正确的轨道。

参加区党委扩大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在三仓河率先开始整风。这期间，我代表区党委先后做了两个报告，一个是《半年来苏中整风工作检查与今后如何进行整风工作》；另一个是《关于整风问题的总结》。

在前一个报告中，我提出了6个方面的意见：“一、今后整风必须改变过去单一的办法，创造适合各地区、各对象的各种新办法。包括区党委，地委、县区级干部各根据情况分成甲、乙、丙三组，也可采用抽调受训和在职整风等办法。二、必须培养骨干，研究典型。三、加强联系实际，领导反省。四、必须进行打通思想，特别是打通各级党委各级部门负责人同志的思想。五、必须首

长亲自动手，加强核心的领导。六、必须不断的克服整风中的困难，争取今年完成整风的任务。”

在后一个报告中，我代表区党委，针对苏中党组织状况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

春末夏初，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陆续向宝应地区转移，整风运动开展得更加热烈。当时，区党委党校主要抽调县、团级干部为主；各地委整风队主要抽调区、营级干部为主；抗大九分校则以调训连、排级干部为主。半年时间内，全苏中计有300多名干部参加了整风学习。粟裕同志和我都曾几次去党校作辅导，与大家交流整风学习的心得体会。这一时期的整风运动，由于学习的深入，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有较显著的提高，思想作风也有所改进。

当时在党校或党训班参加学习的同志，首先认真学文件。学的文件有毛泽东同志的《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和刘少奇同志的《论党内斗争》、《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斯大林论自我批评》、《列宁斯大林等论党的纪律与党的民主》等二十二个。上面提到，许多同志参加了革命，入了党，但由于紧张的斗争环境，平时很少学习甚至不学习。许多老同志回忆起那一段时间的整风学习，都说参加革命后，是在整风学习时才开始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在那一段时期打下的，就象毛泽东同志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所说的，受到马列主义的启蒙教育的。那时候，环境艰苦，纸张少，一本《共产党宣言》，是用发黄的土纸印的，大家传看以后，字迹都模糊了。我们编印的小册子，收录了《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由于电讯经常中断，往往字里行间会出现：“此处缺一百字”、“此段缺五十字”，令人读

时接不上气。但就是这样的书，同志们抢到手，都象捧着宝贝一样拚命读，往往一本书要传读上百人。封面坏了，人们用纸头包了又包，书页坏了，把纸角补贴起来；缺漏的地方，就设法抄补上。劳动后、饭后的休息时间里，田头小径上、操场上，到处都是三五一簇的人群，谈话的内容都是整风的学习心得、体会。遇到有争论的议题，大家争得面红耳赤，待把对方说服了，大家哈哈大笑闹一阵。整个党校的学习空气，既紧张又活泼，既严肃又民主，简直比喝浓茶还有味道。

整风学习确实实是非常生动的思想教育运动。同志们除了交流学习文件的心得、体会之外，有时还会主动找自己熟悉的或在一起工作过的同志谈心，干部与干部谈心；干部与群众谈心。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每当晚饭后，映着黄昏落日余晖，田垄上、草堆里、宿舍里……到处都是三三两两的人群。那时候的同志关系，真是清澈如水。不论谁，有什么思想问题，都愿意主动找同志们倾诉，向组织上交心。有的人对照文件，自觉地检查自己在某项工作中所犯的主观主义错误，或分析自己在执行政策时发生的偏差，进一步理解“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道理，有的找自己思想作风上的毛病，分析它的危害。那时大家都有这样的愿望：“不怕脏、不怕丑”、“脱裤子”、“割尾巴”，刷去灰尘。象毛泽东同志所教导的那样，无数革命先烈在我们前面英勇牺牲了，我们继续斗争的同志，有什么缺点和错误不能丢掉呢？人们都把自己的缺点当作党的缺点对待，加以分析，加以批判，既和风细雨，又不留情面。

那段时间的整风学习，学习空气特别浓厚，领导与一般干部在一起，民主空气也特别强烈；学习的方式方法也生动活泼、多种多样。大家除了学习规定的文件外，还相互传阅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考涅楚克写卫国战争的剧本《前线》等等。这

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有些可以联系起来批判主观主义，有些可以联系起来对照宗派主义。由于文艺作品的形象性强，往往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记得很清楚，那段时间，文工团还演出过话剧《前线》，鞭挞戈尔洛夫摆老资格，拒绝接受新事物的错误思想；区党委还组织演出过果戈里的《钦差大臣》的片段，用以批判下车伊始、哇啦哇啦，不作调查研究的错误作风；由夏征农、沈西蒙、吴天石编剧、沈亚威作曲，把郭沫若同志刚发表不久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甲申祭》演出，李一氓同志后来又改写成剧本《九宫山》，用以对照批判我们的干部在革命胜利时所最易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轻敌松懈情绪和功臣自居的情绪。当时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如刘季平、夏征农、俞铭璜、林修德等多才多艺的同志，学习之余也参加排练。领导同志粉墨登场，大家看了很亲切，也富有教育意义。

整风学习的第二个阶段是对照检查、自我反省。也就是对照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大部分同志严格要求自己，能发现、提出许多过去意识不到的问题，对照文件进行分析、解剖，加深认识。紧接着是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写反省笔记。记得当时《苏中报》上还选登过一些同志的反省笔记，很发人深思。比如有的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强迫命令作风；外来干部对本地干部有包办代替作风；本地干部舍不得离开本乡本土，舍不得老婆、孩子，不肯调动工作；有的干部工作顺利时，不注意搞调查研究，凭主观办事；有的干部犯经验主义，各阶层的群众思想有了变化，仍然按老套套办事，结果碰了钉子；或者敌人变了花样，我们还是老一套，吃了亏，等等。记得那时许多反省笔记写得非常生动，有血有肉，有的非常深刻，抓住了主要矛盾，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对大家很有启发。比如说，有个县的农会会长是当地农民积极分子，开始几乎不识字，但经过整风学习，却能大讲唯物

辩证法，并联系自己的实际工作，作生动通俗的分析，一时传为美谈。

40多年过去了，如今再将整风学习的资料翻出来看看，仍感到大有教益。一个人如果能经常保持自我批评精神，他就会在工作、学习、生活中谦虚谨慎，并不断取得进步；一个政党如能时常保持着自我批评精神，就可以避免倒退、腐败而永葆青春。40多年前的整风运动，与近年来的整党一样，是我党优良革命传统和作风的延续，起到了“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下，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时地作一些历史的回顾，也会有“温故而知新”的积极意义的。

(四)

1944年11月至1945年4月的半年时间，是苏中根据地整风的最后阶段。在这期间，根据地人事方面的变动较大。但从整体上说，那时对敌斗争环境还是比较稳定的，因此整风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在1945年1月22日，区党委向全区发出了《关于目前整风学习的指示》，总结整风成绩有如下三点：

“一、由苏中到各地，都展开了较大规模的整风运动，党政军区连级以上的干部，大都经过整风或正在整风。在整风中，干部得到了提高；

“二、清除出了个别内奸份子，同时从防奸中，党内的政治警惕性空前提高，革命的保卫工作获得了不少新的经验，党在整风中，组织上是更进一步巩固了。

“三、从整风中，不少干部体会到思想斗争的重要，学会了如何运用思想斗争的武器，学会了新的组织领导方法。”

这份指示是在区党委会议期间发出的。这次会议召开于1945年1月，会议对苏中整风阶段的全面情况，作了认真的总结检查，既充分肯定了已取得的成绩，也及时指出了整风中所发生的一些不良倾向，予以纠正。

广大党员干部在长达两年的整风运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党性，尤其在整风的最后阶段中，因有前两阶段的经验和教训，收获更大。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初步克服了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加强了调查研究，与群众有了更密切的联系，改善了党政军民的相互关系，增强了革命队伍的内部团结，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巩固和加强了党的集体领导，纯洁了党的队伍，使苏中全党进一步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从而提高了党的战斗力。时至今日，当我回忆当年整风运动历程的时候，也许读者会对我上面只抽象地罗列出这许多收获感到不满足，觉得缺乏具体生活的事实例证。实际上，当时这些收获，对我来说，都是十分具体的。可惜经过了40多年，有些具体事例已只剩下不具体的记忆了。

苏中的整风运动，总体上是遵照党中央的部署，并认真贯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自上而下全面展开的。但了解当年情况的同志都知道，延安整风曾出现过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的偏差。这是由于少数人曲解中央的指示精神，给个别心术不正的人钻了空子，造成的一股“左”的逆流。由于党中央发现的早，纠正得及时，因此它对苏中并未产生过大的影响，仅稍有波及。

苏中区党委遵照1943年8月15日党中央发出的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严格掌握政策，坚持以改造党员干部思想为主来进行的。总的来说，苏中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成绩也是很大的。只是在运动中期，一度出现过“左”的偏向苗头，但我们

一发现问题，就很快纠正了。

根据当时敌我斗争形势和组织状况，进行组织整顿和审查干部，确实是很必要的，也有相当收获。但在某些地区，少数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敌情的严重性估计过了头，尤其对地富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个人经历较复杂的同志，往往把他们的经历出身与缺点、错误不恰当地联系起来，以致产生了偏差。审干工作，虽有党中央的9条方针，区党委也迭次强调审干政策，可惜还是出现了“逼供信”的做法，伤害了不应伤害的同志。我们立即召开区党委会议讨论，有关同志也对此作了深刻检查。随后，我们即起草了一份通报，要求全党引起重视，从其中吸取经验教训，严禁在整风审干中搞“逼供信”之类做法，防止类似事件发生。区党委迅速发出了关于《纠正整风偏向的指示》，指出：“必须纠正单纯防奸偏向，立即纠正整风中各种过‘左’，过火做法。”由于纠正“左”的做法及时，使被整的同志迅速放下了包袱，仍精神饱满地工作。当时我们把一些文化人集中在《苏中报》进行整风，由于知识分子集中，政策界限又交代不够清楚，整风中也一度出现过偏差，我们一发现就迅速纠正了。我和有些老知识分子谈心，他们都心情舒畅。我记得有位知识分子被错整了，纠正后情绪很高，他编写了一个活报剧，自己上台演出，说这是平生第一次上台演戏。

当年的整风运动，至今已过去40多年，但许多参加过那次学习的老同志每一忆及，仍有不少感想。近几年，我读到不少老同志的回忆录。有位老同志写了这样一首诗：“马列精神壮全党，妖魔鬼怪入牢笼。思想统一兵精锐，敌胆俱寒刃挫锋。”这诗虽然没有什么警句，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大家的心情。

第六节 开展大练兵,准备反攻

(一)

自苏中党政军领导机关迁至宝应地区后,工作环境确实比过去稳定多了。整风运动、军民大生产、改造基层政权等各项工作,开展得都很顺利。同志们打趣说:“根据地的上空是一片蓝莹莹的艳阳天。”

1944年6月1日,区党委向各地发出了《开展夏季对敌全面攻势的决定》,要求全区军民积极行动起来,“运用各种力量,攻占日伪薄弱据点,给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为了配合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的最后胜利,也为了进一步发展车桥战役后苏中根据地的大好形势,粟裕同志对整个对敌攻势作了周密的考虑和安排,拟出了好几个作战方案。然而,由于形势的变化,进展比拟订计划还要快,粟裕同志原打算亲自指挥的夏季攻势,因突然接到华中局、军部的电报,而不得不有所改变。

来电要求粟裕同志立即赶到盱眙的新铺去,商讨要事。区党委几位负责同志研究后,决定原战役计划不变,由副师长叶飞同志按既定方案部署战斗,粟裕同志翌日起程去新铺。当天,粟裕同志拟了一份回电,同时通知叶飞同志,负责指挥即将发起的新战役。

从宝应出发去淮南军部,交通比过去方便多了。宝应以西是

大运河与高宝湖，沿途有精干的警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站的同志负责护送，只需越过这两道障碍（运河是日伪封锁线），即可顺利到达目的地。那年，粟裕同志走的就是那条经淮安再西渡运河，而后从林集奔新铺的路线。当时，淮宝地下交通站对沟通淮南、淮北、苏北、苏中几个战略区起过重要作用。那些年，我也在这条路线上走过几次。

我们的夏季攻势是猛烈的。经过数十天的连续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三旅七团在四分区如皋县耙齿凌一带，一仗就击毙日军中队长加藤大尉以下日伪军 200 余人，还生俘日军小队队长以下 12 人，伪军 200 余人。当地游击队、民兵和群众都踊跃参加了这场战斗。军民并肩共歼日伪的大无畏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全区人民的抗日斗志。紧接着，七团又配合分区特务四团攻打封锁线上的南坎据点，进一步扩大了战果。四分区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民兵和群众支持配合下，连战皆捷，喜讯很快传遍苏中根据地各个角落，《苏中报》经常发布这类鼓舞人心的战绩。

在新四军一师和苏中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一、二、三分区的地方武装和民兵也充分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积极主动攻击日伪据点，杀伤大量敌人。7 月间，三分区部队攻占了石庄，俘伪军 150 余人。接着，地方武装和民兵又收复了新生港、张黄港、新坝、新市、田家铺等日伪据点。在军事攻势的同时，还普遍开展了政治攻势，有近万农民参加对日伪数十个据点进行武装喊话，造成伪军、伪组织内部的普遍恐慌与动摇，仅在夏季攻势中就有数百名伪军反正，几乎各据点伪军都普遍发生逃亡现象。

二分区的部队协同地方武装及民兵，纷纷主动出击。7 月间兴化戴家窑一仗，就俘获伪军近 200 人枪，接着盱北西团一战，

打垮了600余伪军的增援，俘240余人，缴步枪、机枪数百支。在夏季攻势中，收复了河口、墩头、谢庄、朱舍、湖北庄、洪家垛、万米庄等据点，毁平了10余座敌碉堡。

一分区江高宝各县地方武装和民兵，在夏季军事攻势中，积小胜为大胜，也取得丰硕战果。在江都真武庙一带，当地游击队、民兵设伏，袭击了日伪军下乡抢劫的200余人的队伍，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逃回据点。数日后，邵伯日军30余人在伪水上警察两个连的配合下再犯真武镇，当地军民予以迎头痛击，打垮了敌人，俘伪军60名。高邮县团在游击队、民兵配合下，强攻大黄邳伪军据点，除击溃一部外，生俘伪军20余人，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志气。在7月份的《苏中报》上，登载着宝应县地方武装在民兵配合下，对敌作战的一则短讯：“45天中，对敌作战66次，其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石塘、张桥两区与花园庄、平桥日伪作战。据统计日伪出动兵力500人以上的就有2次，300人以上的有3次。我军共俘伪连长以下9名，敌探奸细25名，伤日伪31人，毙日伪39人。”短讯还举了几个生动的例子：“宝应江乡民兵7人，将80多个伪军打退，并夺回被抢粮食30余担。秋月乡民兵基干队虽成立不久，可是在6月7日那天，也打了个漂亮仗。当望直港日伪百十人窜入该乡抢粮时，民兵配合游击队设伏袭击，当场击毙日军3人，伪军10人。”一分区主力部队与此同时也继续主动出击，在日军称之为“模范公路”的扬(州)泰(州)线上，进行伏击，炸毁敌汽艇1艘，卡车2辆，毙日寇5人，伤8人。在袭击羊肠集日伪据点战斗中，又毙伤伪军数十人。

从以上各地军民主动向日伪发动的夏季攻势中，不难看出苏中敌后抗战的形势，的确起了很大变化，即我军由被动防御转化为主动出击；由局部反攻向全面反攻过渡。

(二)

粟裕同志从军部开会归来，带来了党中央及华中局的许多重要指示。他告诉我们，继今年4月间，日军在河南发起战役，国民党40万军队溃败之后，日军又在湘北沿粤汉铁路向南发动了新的进攻，迫使国民党30万军队不战而溃，长沙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目前时局，提出了八路军、新四军都需考虑如何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的问题。在军部，他还与华中局领导同志共同研究了关于开辟河南、控制中原的战略计划，经电报延安，已得到党中央批准实施。不久，八路军与新四军将各抽部分兵力，分四路进军河南敌后。粟裕同志还说，近年来国民党税警总团陈泰运部思想日趋顽固，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打着老中央的旗号，拉拢伪军，掩护特务，荼毒群众，不断对我寻衅，阻挠破坏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华中局及军部领导同志研究后，批准我部再发起一场讨陈战役（车桥战役后曾讨伐过一次），正等待党中央最后决定的复电。

发起第二次讨伐陈泰运的战斗，在区党委会议上曾讨论过多次。这几年，在进行抗击日军的全过程中，我军遇到形形色色的障碍实在太多太多了。打垮韩德勤的顽固势力之后，又出现了李长江投靠汪精卫，现在是陈泰远的反动势力抬头，若不尽快集中力量加以扫除，势必将影响整个斗争形势。事实上，自发动夏季攻势以来，我们不断警告陈泰运，劝他以团结抗日为重。记得还在黄桥战役之前，我军就曾教训过无理寻衅的税警总团，但他不思改悔，逼着我们不得不下决心，扫除这个心腹之患。

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同志回电同意我军“在自卫立场上予以攻击，甚至歼灭他”。接到这个指示后，我们迅速进行了战斗

准备，并加强了对陈泰运部的政治攻势。苏中各界也纷纷声讨陈泰运部队的种种倒行逆施罪行，要求新四军下令讨伐，以清除抗战阵营中的害群之马。

9月下旬，我军事、政治各方面条件准备成熟，当即发起战斗。陈泰运这股敌人武器好，且十分顽固，与日军早有勾结。当我军对陈泰运部发起攻击时，苏中日军山本旅团长下令从泰州、海安、东台等地调集了3000余日伪军，公开向陈泰运增援。日军的公开出面干预，彻底揭穿了陈泰运的反动嘴脸，激起我参战部队和苏中军民的极大愤慨。因此，我们的攻势作战打得更加勇猛顽强，取得了重大成果。讨陈战役前后打了40多天，击毙、俘虏顽伪2千余人，收复控制了兴化、东台、泰县等数县的中间地带，解除了当地群众所受日伪顽三重压迫的痛苦，扩大了根据地。陈泰运率残部数百人遁入日伪据点，被编为伪第二十五军，成了丧家之犬。

1944年秋冬季节，苏中根据地进入空前巩固和发展时期。在相对稳定的有利环境下，抗日武装的建设被列入了主要的议事日程。

(三)

当年夏秋间，党中央曾数次向各战略区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由于我们正对日伪顽发动两次大规模攻势，使这项工作延至秋冬才进行。中央指示我们：各根据地应在现有基础上加紧整训军队，把军事训练和政治工作大幅度地予以提高，为将来发展一倍至数倍准备条件。具体要求是：军事整训应以技术为主，战术为辅，采用群众运动、学用一致，培养典型，带动全局的方法进行，并注意总结带兵、用兵、养兵的经验。党中央和毛

泽东同志对华中部队的整训工作，还作了针对性的指示，指出部队整训应以练兵为中心，采取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方法，把射击、投弹、刺杀和土工作业四大技术练好，同时注意提高干部的管理教育能力和指挥艺术。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华中局、军部作了具体部署，苏中区党委及一师师部立即在根据地地进行练好本领才能更多杀敌的政治动员。主力、地方武装、基干民兵都积极行动起来，迅速掀起了以提高四大技术为主的群众性练兵热潮。练兵中，各级干部既做先生，又当学生，与战士们共同操练；广大战士也勤学苦练，努力提高军事技术水平。如今，人民解放军在搞军事训练时常提的一句口号是“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早在40多年前我们在抗日根据地军训中已大力提倡，这也是继承我军的一种优良传统吧。

记得有一次粟裕同志约我去一个主力团视察军训情况，出发时，他就说：不要惊动团里的负责干部，直接下到连队训练场地，目的是想用抽查的方法，了解更多的实际情况。我们来到训练场，听见阵阵喊杀声，大家练投弹，练刺杀、练瞄准，尤其是练攀登障碍物，战士们个个都象下山的猛虎。那天，我们一早就出发，刚收割的晚稻田里还留下一层厚厚的寒霜，然而脱下棉上衣的战士们身上已在冒热气。粟裕同志向在场的一位连长询问，队列中那位身体健壮，刺杀动作标准而有力的战士是哪里人，哪年入伍的？连长汇报说，那位战士是三年前一次战斗中俘虏“解放”过来的伪军，是靖泰地区人。粟裕同志又问，“解放”过来的同志在连里有多少，他们有些什么主要特点？连长迅速答道，全连有四分之一。他们自从参加新四军后，逐步树立了抗日保乡、为劳苦大众当兵的思想，大多数人军事技术较好，打起仗来也很勇敢，只有少数人还有些旧习气，在这方面连里正抓紧

政治思想工作。

粟裕同志听了汇报，连连点头，脸上露出了微笑。接着，他还走到队列中，帮助战士们纠正拚刺动作，并对战士说，训练场也是战场，只有将民族仇恨凝聚在刺刀尖上，刺出去的枪才会更加勇猛有力。这使连队干部、战士都受到鼓舞。我在一旁听见战士们悄声议论：“能当粟司令指挥的兵，我就是今天‘光荣’了，全家都高兴。”

在那天继续视察基层连队军训的路上，粟裕同志还对我说，眼下全苏中根据地开展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不单单是个军事问题，同时也是个提高政治觉悟问题。我们一方面要继续贯彻执行学用一致、教学与实践相结合的训练原则，同时也要在练兵运动中加强部队的组织性、纪律性，克服游击习气，散漫作风，注重培养正规军的素质。抗战已近8个年头，部队的成份、结构、素质都起了很大变化。在新兵大批入伍、解放战士逐步增多的情况下，思想政治工作尤其不能放松，政治思想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一条永远不能丢掉。前一阶段政治部及各分区抓的关于俘虏改变立场的教育工作是很有成效的，看来这项工作要进一步制度化。

我们下部队，在基层看到指战员有许多生动活泼的创造。他们采用沙盘作业、民主评议等方式，检讨和总结过去实战中的战术、技术经验及教训，提高战斗和指挥水平；有的单位评选出许多神枪手、爆破手、孤胆英雄，用他们的事例讲课，现场传经，并开展各种立功竞赛，确实搞得热火朝天。

粟裕同志作为我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也是一名老兵，他不仅精通战略、战术，也深谙带兵、用兵之法。当我还是个红小鬼时，他已经在中央苏区红军学校担任队长和教官了。在苏中根据地大练兵运动中，他多次从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赴各地，给部队

上军事课。从瞄准、射击、投弹、刺杀、爆破，讲到武器装备的使用、维护、保养，还讲战斗、战役指挥。尤其使人感动的是，他亲自给干部、战士做示范动作，言传身教，一丝不苟。大家都知道，粟裕同志负伤数次，右手背还有残疾，当看到他以普通一兵的身份在训练场上参加训练时，大家既感动又尊敬。

在主力部队开展军事训练和各项建设工作的同时，苏中各地也利用农闲时间，抓紧了民兵和自卫队的训练工作。毛泽东同志说：“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过去拿惯锄头、铁耙的农民，如今虽还是农民装束，但已成了不穿军装、生龙活虎的战士，这的确是了不起的大变化。就说在宝应地区我们机关分驻的几个邻近村庄吧，几乎每天都能看到民兵进行练兵的情况。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枪，但他们用木棍、大刀、红缨枪作武器，在晒谷场上练习刺杀，用木头做的手榴弹进行投掷比赛。有的用稻草扎成靶子，到处可以听到“一、二、一”“杀、杀、杀”的操练声。记得1944年底，我曾在鹤几湾地区一个村子里看过当地民兵的练兵比赛。当时，在那些民兵自卫队员中，有男有女，有许多是父子、夫妻一起列队操练。儿童团员们看到这一情景，也学着大人的装束，把木棍插在腰间，还挂上一个红布条作标记，跟在大人后面喊口号。

军民大练兵热潮的掀起，为苏中抗日武装力量的迅速壮大，打下了广泛坚实的基础。

(四)

随着根据地的日益巩固，群众对“抗战必胜”的斗争信念更加坚定了。大批地方党员和青年、民兵积极响应区党委、行署、军区提出的扩军号召，为积蓄力量，准备大反攻，踊跃参加新

四军，掀起了大参军的群众性热潮。在各地农村中，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的动人场面。有许多区、乡，一次就有十几个、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壮士争先报名参加新四军，生动地体现了抗日战争巨大力量的源泉存在于民众之中。

1944年11月的一分区《人民报》上，就刊登了这样一则短讯：高邮县第五区各乡镇，9天中扩军180人。其经验是区委宣传发动工作做得好，推动该区各阶层组织扩军动员小组，开展竞赛，并订出奖励条例，充分调动群众抗日保家的积极性与荣誉感。在同期的三分区《江潮报》上，还有一则泰兴县的短讯：泰兴在不到10天内，就有1045名青年身体检查合格，涌进主力部队。该县召开群众大会，在1000多名新兵中选出了李桂生、叶伯和、严学章、段伯平、胡鼎高、肖然飞、吉金安等7人为参军英雄。被批准参军的人，戴上光荣花，乡里村里备了大马，扎上红彩带，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象办喜事一样。

当时的《苏中报》，几乎每天都记载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军的事例。兴化县5天内动员了500名新兵入伍；如皋县薛蔡乡一次就动员73个青年参军；东台县在12月份动员3千人报名参军。海安角斜区李敦村两个妇抗会员，在动员会上与两位参军勇士订婚，还相互宣读立功书，未婚夫表示在前方打胜仗立功，未婚妻表示在后方生产支前立功。一位区民兵队长自己带头报名参了军，以致当场就有67位民兵报名响应。宝应县有个军属老太太，已送2个儿子参军，又将自己最小的儿子与侄子送来参军，说：“到新四军队伍里我放心，我们和新四军是一棵大树的根上长的。有国才有家，抗战胜利才能过好日子。”她这一番话，引起长达3分钟的热烈掌声，大家提议以集体的名义向她致敬礼。

当时三分区靖江县委写了一份关于动员群众参军的报告，

总结了好几条经验，其中提到：“主要原因是共产党员起了模范带头作用，许多开明士绅与大批中小学教师积极协助动员，使群众更加明白参军的意义，激发了他们的光荣感。”台北县委副书记赵则三同志在总结台北参军工作经验时说得好：“在农抗、工抗，民兵等群众组织里，要成立参军的宣传小组，动员小组，便于在各抗日群众组织内部深入开展鼓动工作，同时也切实帮助参军者解决部分后顾之忧，帮助抗属排忧解难，新兵们才能放下心来去参加主力打鬼子。”

(五)

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军，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也震撼了敌占区。日伪闻讯如坐针毡，人民群众则拍手称快。兴化县城虽被日伪盘踞，但据点里的老百姓听说根据地扩军运动蓬勃开展，反攻形势日益临近，也都异常振奋，日夜盼望反攻之日早些到来。兴化城内有个公司派人向我抗日民主政府送来两面红旗，庆祝参军工作的胜利。苏南日伪“清乡”区内有些群众，也渡过长江投到抗日部队来，他们说：“不愿被鬼子抓去当壮丁送死，要参加新四军一起抗日。”

那一年的秋冬季节，国内国际的战局发展都很快。党中央鉴于形势的变化，又作出正确的决策，确定了一整套发展华南、东南的方针。为发展华南，决定以原留守延安的八路军三五九旅主力南下湘粤桂边，与东江抗日游击队联系，并依托五岭山脉创造新的抗日根据地；为发展东南，决定以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占据苏浙皖边与浙江沿海地区，争取全面控制苏、浙、皖、闽、赣诸省，创造东南大根据地，以便我军在举行大反攻时，处于有利战略地位，并能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

中央在电报指示中说，“华中在西进发展河南、南下发展东南的两大任务中，应以南下为主，江北兵力尽可能逐渐抽调南下，一切工作应首先着眼于保证南下任务的完成。”具体的南下部署是：“以新四军一师主力与原六师十六旅担负南进任务，沿宁杭路向东南伸进，发展太湖西南地区，造成与浙东打通联系的态势；浙东游击纵队除依托四明山逐步向南发展外，着重加强金华、义乌、兰溪，桐庐等地游击地区，接应由苏浙边南下的部队；还应从第一、第二、第三师抽组另外几批南下部队，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待令南进。”

这时，少奇、陈毅同志还特地从延安给华中局、军部发来电报，分析行将来临的反攻局势，强调指出华中我军主力除防御国民党桂系顽固派武装外，均应在大反攻开始时南渡长江，“破敌、收京、入沪”，在江南广大地区实行大发展。目前，除将主力逐步南调外，也应进一步加强江北各根据地的建设，使之成为坚强的战略后方。

党中央与华中局、军部的指示相继传达到苏中，接到电报后才知道，首批南下苏浙的部队是由粟裕同志挂帅的。部队南下后，成立苏浙军区，以粟裕同志为司令员，统一指挥江南斗争。得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心情非常复杂，既看到根据地又向长江以南延伸、扩展了；为迅速发展的大好抗战局面欢欣鼓舞，但我又为亲密无间的好领导、老战友粟裕同志即将离开苏中感到依依不舍。他与我在一道工作这些年，战斗情谊是很深厚的。遵照上级指示，粟裕同志准备率三旅七团从仪征地区渡江南下；另一支队伍是四分区的特务一团和特务四团，由陶勇同志率领，从杨泰地区渡江南下。

粟裕同志启程前，找叶飞、我等几位同志话别。他说：“此次奉命南下，除带走一师部分指挥机关人员和三个主力团，还有

300 地方党政干部与我们同行，苏中根据地这个大摊子，就托付给你们了。根据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战略意图判断，南下是个大动作，还会继续从我们苏中抽调相当数量主力跟进，对这一条也应有充分的精神和物质准备才好。部队的钟期光、刘先胜、陶勇、阮英平、彭德清等领导同志及地方的惠浴宇、陈扬、周林等同志都是首批南下的，到了军部，还打算把派在党校学习的彭冰山等同志也带到南边去。苏中党政军各级应尽早将领导人员充实配备齐，主力和地方武装还要加紧扩大，切不能象俗话说的那样‘拆东墙补西墙’，哪我可不好交账啊！”

他身负党的重托，挥戈苏浙，这是华中大棋盘上的金角加银边，已够他操劳的了，但老首长还念念不忘日后苏中根据地的建设。他和叶飞、管文蔚一一握了手，最后还亲切地对我说：“阿丕同志，叶飞接任区党委书记后，因军事上他要负全责，区党委工作还是你主持常务，有什么大事就跟过去一样，多和大家商量商量，相信担子再重也压不垮你的，年轻人嘛！”说得我激动难禁。

我们从驻地的庄子里一直陪着粟裕同志一行西去，出了庄子又步行了好一会儿，实在是难舍难分啊。粟裕同志再三劝大家留步，最后见劝不住，就干脆骑上马，回过头来与送行的同志挥挥手，随即手抖缰绳，两脚一夹，一溜烟地奔向前方。在回庄子的路上，我忽然想起“无情未必真豪杰”的诗句，觉得这恰好表达出我们此刻的心境。是啊，在我们的队伍里，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们，实际上也都是些心坎里埋藏着最丰富的阶级感情的，只是他们表达的方式方法与普通人略有差异罢了。

(六)

1945年元旦，苏中根据地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气氛。苏中军区直属队与区党委、行署机关都召开了盛大的庆祝会。新任区党委书记叶飞同志在会上讲了话，提出了那一年的工作任务：坚持苏中根据地原地斗争；充实与轮训主力部队；扩大与整训民兵自卫队；继续进行大规模生产运动；培养训练大批干部；开展英雄模范运动；开展沦陷区工作；彻底改善工作作风；把根据地内民主生活、民主建设做得更好，等等。行署主任管文蔚同志也作了《今年我们要做什么》的报告，进一步提出努力扩大主力和地方武装，其中扩充民兵为50万人，自卫队100万人；大规模开展生产建设运动，普遍组织各种劳动组合单位；继续开展民主建设，提高各级民主政府、各部门干部质量。叶、管的报告，很快就在《苏中报》上发表了，给根据地在新的一年里的工作指明了方向。

1月中下旬，华中局与军部电召我参加会议。待我匆匆赶到淮南才知道，粟裕同志临别前的分析果然应验：苏中还要继续抽调部队及地方党政干部南下，而且苏北的盐阜、淮海等地也要为增援江南作积极的人员与物质准备。待华中局和军部领导同志与我当面详谈后，情况更加明朗了。华中首长们说，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党中央发展东南地区的战略意图，最近又有了新的部署，除粟裕同志已率部队到达目的地外，还拟从二师抽3个主力团南进；紧接着叶飞同志也要再从苏中带3个主力团南下增援；现在苏中的原六师五十二团还得作好随时抽调的一切准备。开辟一个新区将有许多意料不到的困难，如群众基础较弱、财政物资奇缺无来源、兵工生产毫无基础等等。虽然，前不久已

恢复建立了苏南丹北地区与苏常太地区的苏中五、六地委，但短期内完全解决大江南的供应、交通问题也是很困难的。因此，华中局决定派苏中的宋日昌、朱克靖、范醒之，苏北的金明，张彦、杨纯及骆耕漠、韩振纪等在党政和财经两方面有经验的同志加强苏浙新区的领导力量。

“爆竹声中一岁除，东风送暖入屠苏”。当我匆匆赶回苏中区党委驻地时，又届阴历年关了。此时党政军机关已迁到兴化附近。一到驻地，我即将华中局的指示精神向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领导同志作了传达，大家围着火炉，烤得热呼呼的，门外不时传来喜庆的鞭炮声。

晚上点着煤油灯，我翻阅去军部期间出版的《苏中报》，迟迟不能入睡。关于扩充主力部队的消息，报上有着许多令人既欣慰又兴奋的报道。苏中军区自号召开展学习“曹立三活动”以来，又掀起了新的高潮。仅一个月时间，三分区又有数千名青年参军入伍；四分区各县许多青年、民兵也纷纷报名参加主力，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地涌到部队。

曹立三同志原是兴化县某区的民兵大队长，参军后当了一名普通战士，有点不安心。后来，经过所在部队的耐心说服教育，使他思想上有了很大转变，提高了政治觉悟，明确了参军目的，决定到抗日战争的最前线杀敌立功。这件事在根据地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兴化的群众都以有曹立三这样的好同志而自豪，参军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

3月中旬，党中央向华中局发来电报，命令叶飞同志率部南下与粟裕同志会师，以加强苏浙皖边区根据地的工作。叶飞同志和我在苏中共事多年。他是一位机智勇敢的指挥员，在苏中曾指挥过郭村战斗，车桥战役等大小数十次战役和战斗，实战经验很丰富。我们在区党委工作时，每天都互通部队与地方的情

况，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合作得很愉快。如今，粟裕同志已率部南下，叶飞同志又将奉命离开苏中，我的心情确实很不平静。送别前夕，我深情祝愿他为党为民再立战功，又再三征求他对加强和改进苏中工作的意见。那天，我们谈得很晚，彼此都忘记了时间。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叶飞同志于4月7日晚率一旅旅部、一团、二团及三分区特务团6千余人，分别从丹北和靖江地区渡江南下。这次南下的主要军队干部有廖政国、韦一平、夏光、曾如清等同志，还有数百名苏中、苏北党政干部。苏中只留下五十二团和特务三团约3千人左右的主力部队。

粟、叶率部南下前后，苏中各地党政军干部置配，作了较大的调整。陶勇同志南下后，四分区由张震东同志接任司令员；许家屯同志接替韦一平同志担任三地委书记；对一分区也加强了领导力量，由原二地委书记陈时夫同志调任一地委书记；联抗撤销后，黄逸峰同志调任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不久，华中局批准了苏中党政军新的领导班子，区党委书记由我担任，委员有管文蔚、姬鹏飞（吉洛）、陈时夫、李干辉、章蕴、卢胜、陈玉生、刘飞、黄逸峰等同志。区党委组织部长是章蕴同志，宣传部长是曾一凡同志，民运部长是钟民同志。苏中军区司令员是管文蔚同志，我兼政委；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为张藩同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是姬鹏飞同志。苏中行署主任为季方同志，副主任为刘季平同志。新的领导班子公布之时，苏中根据地的扩军任务已胜利完成，除主力部队得到了很大补充外，各地还组建了一些新的独立团和警卫团。全苏中此时有兵力近3万人枪，为日后开展大规模战略反攻，实现游击战向正规战的战略转变，作了有效的准备。



第四章 解放战争谱新篇

第一节 红旗漫卷西风

(一)

1945年春天，抗日战争正处于胜利的前夜，苏中区党委机关驻扎在宝应县境内的鹤儿湾。这时，苏中、苏北、淮南三个战略区已连成一片，宝应县一带成了三个根据地联系的要道。鹤儿湾附近绿水环绕的村庄、集镇，抗日气氛非常浓郁，临街耀眼的白墙上，刷上了醒目的标语；儿童团、民兵站岗放哨，盘查过往行人；农抗会、妇抗会、青抗会等各种抗日群众组织协助机关和部队维持秩序，做后勤工作。根据中央和华中局关于加强生产建设和建立健全各类群众组织的指示，苏中生产建设大会、职工代表大会、青年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大会、新闻工作者座谈会相继召开，并成立了全苏中统一的组织机构。

就在国际国内局势发生重要转换之际，全党盼望已久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4日在延安胜利召开了。1939年，我在皖南就听说中央筹备召开“七大”，来到苏中以后，少奇、陈毅、邓子恢等同志代表华中局，先后去延安筹备

“七大”和参加整风，这使我感到召开“七大”非同寻常。现在，党的“七大”经过好几年准备，终于胜利召开，怎不令人欢欣鼓舞。记得陈毅同志为此写过一首《七大开幕》的诗：

“百年积弱叹华夏，
八载千戈仗延安。
试问九州谁作主？
万众瞩目清凉山。”

党的“七大”与“六大”相隔 11 年之久。这期间，经过 1935 年的遵义会议，经过 1942 年的整风运动，我们党认真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已经变得相当成熟了。虽说我们党经受过严重的挫折，但更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在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我们创建了 19 处抗日民主根据地，领导着八路军、新四军为代表的抗日武装，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正是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党的“七大”号召全国人民和全党同志团结起来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建设新中国而斗争，怎不令人兴高采烈呢？

通过电波，延安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七大”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及“七大”会议一系列重要讲话。我立刻组织区党委机关的同志认真学习，让同志们更进一步理解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即将最后胜利的形势，并对夺取抗日战争胜利的任务和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个前途、两种命运加深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七大”开幕词中指出：“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这番话，恰如战鼓号角，字字句句都振奋着广大党员、干部和指战员的心灵。

在学习党的“七大”文件那段日子里，我们还兴奋地得到消

息，说陈毅同志在“七大”会议上代表华中局汇报了新四军和华中解放区广大军民艰苦奋斗、英勇抗战、驰骋大江南北的光辉历程。这使我们华中地区工作的同志格外感奋。8年来，我们新四军从江南到江北，从几千人发展到30万正规军、80万民兵，威震敌胆，屹立在华中敌后、活跃在平原湖荡、出没在崇山峻岭，克服重重困难，渡过了最艰苦的阶段。回想我初到苏中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正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陷，日寇的铁蹄肆意横行，致使万千父老无以聊生。经过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减租减息，组织武装，建立起一块又一块抗日根据地，我们才开创了新的局面。尽管日伪进行千百次“扫荡”、“清剿”、“清乡”，都没有把我们压垮。相反，在血与火的激烈斗争中，我们依靠人民群众抗击了日伪的进攻，壮大了抗日的力量，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二)

1945年夏末，新华社苏中分社的电台格外忙碌，差不多日日夜夜给我们送来震撼人心的新消息：

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150万苏军开进我国东北，对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强大攻势。

8月9日，毛泽东同志向全党发布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命令。

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各向解放区发出5道命令，要求所有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夺取并解除所有日军的武装，命令他们无条件投降，如遇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以坚决消灭。

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记得那天夜里猛然听到这令

人无比振奋的消息时,许多同志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流下了激动、喜悦的眼泪。人们纷纷冲出屋子,跑到外面向冥冥夜空高呼着胜利的口号,发出由衷的笑声。在黝黑的原野里,到处回荡着歌声、笑声和震耳的锣鼓声、鞭炮声。第二天清早,人们象过年一样,忙着开展各种庆祝活动,泪花和笑脸到处闪动。这泪水和笑容,只有饱经苦难历尽斗争艰辛的人民,才真正体会得出其中的滋味。

中国人民整整 100 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姿意蹂躏、野蛮侵略,直至今天才第一次取得了民族战争的伟大的胜利。抗战胜利,来之不易,我们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啊!在胜利到来的时刻,我不禁想起了赣粤边三年游击战争中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而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想起了皖南事变中蒙难的同志;想起了日伪“扫荡”“清剿”和“清乡”中倒下的许多战友和同志……我也禁不住流下了悲喜交集的眼泪……

在战报中,我了解到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自 1937 年至 1945 年,与日寇、伪军作战共 12 万 5 千余次;毙伤日军 52 万余人、伪军 49 万余人;俘虏日、伪军共 51 万 8 千余人;接受向我投诚反正的日、伪军 18 万 4 千余人;缴获各种炮 1900 余门;轻重机枪 11000 余挺、长短枪 68 万余支、汽车、摩托 6 千余辆、马匹 3 万多头;击毁飞机 57 架……如此辉煌的战绩,多么值得我们自豪呵!

(三)

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民党政府借口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竟通知日军只能向国民党当局投降,不准向我新四军投降,否则即是“违法”。更有甚者,蒋介石还命令所有伪军坚守阵

地，听候改编，否则以军法从事。他还发布一道又一道命令，使许多伪军头目摇身一变成了“国军”头目。如此倒行逆施，表明国民党反动派与汪伪之间，本来就是一丘之貉。

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8月9日《对日寇的最后一战》中指示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必须放手组织武装工作队，成百队成千队地深入敌后之敌后，组织人民，破击敌人的交通线，配合正规军作战。必须放手发动沦陷区的千百万群众，立即组织地下军，准备武装起义，配合从外部进攻的军队，消灭敌人。”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我和苏中区党委其他同志几经研究，即向各分区发出指示，广泛动员部队、群众向敌伪盘踞的据点发起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苏中区党委成立了战时动员委员会，以刘季平同志为主任，钟民同志为副主任，陈国栋、梅嘉生、张潮夫、曾一凡、周山等同志为委员，统一领导苏中地方党的战争动员工作。苏中军区编组了17个步兵团，组成3个旅，这是粟裕、叶飞同志带领一师主力去江南之后，苏中重新组建起来的主力部队。这些部队肩负的使命，就是彻底拔除敌据点，向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起攻势，逼使他们向我军投降。

当时苏中战场的日伪军为数不少。日本政府宣布正式投降后，各地日军拒绝向我投降，伪军也极嚣张，唯国民党之命是从。当时，日伪军仍扼制着苏中沿江、沿运河一带的县城、集镇和交通要道。按照国民党政府指令，日军先把各据点移交给伪军，然后将大批军用物资运往南通、泰州、扬州，部队也向这几个城市集中，等待国民党政府派代表来受降。据情报，一部分日军已调往苏州、徐州受降，留在苏中的日军照常持枪站岗，对我视若不

见，十分可恶！

为了抢先接收沪宁线所有城镇，蒋介石日夜将部队调赴南京、上海。起初，群众对国民党重庆政府还不太了解，以为他们一定会镇压汉奸、严办贪官污吏。谁料那些接收大员竟与汉奸、土匪狼狈为奸，一到上海、南京就大抢房子、金子、女子、车子、位子，演了一出“五子登科”的闹剧。眼见如此情景，人们对重庆政府的一点幻想，顿时化为乌有了。

汉奸、伪军在苏中尚有几万，盘踞在交通要道的几个据点里。他们根据蒋介石的旨意，摇身一变成了“陆军新编第二路军”，以孙良诚为总司令，陈泰运为副总司令。这些伪军贼性不改，公开打起国民党招牌，窜到附近乡村抢劫、绑票，无恶不作。这不能不使老百姓心头积满新仇旧恨。

蒋、日、伪公开合流，战争的阴霾重新笼罩苏中平原，广大军民还没来得及喘一口气，和平就已成了泡影，战争又要降临了。

南京汪伪集团这时也四出活动，最可笑的是许多作恶多端的汉奸，这时居然成了“为党国立下殊勋”的“英雄”。在我们眼皮底下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8月上旬，我们接到情报，大汉奸汪精卫病死在日本，陈公博继任南京伪政府主席，要到泰州来“视察”。这时日本已向盟军乞降，陈公博窜到苏中来，无非是为苏中、苏北的伪军、汉奸打气，叫他们稳住阵脚，不要向我投降。我苏中三分区派出武工队，计划截住陈逆一行或就地消灭他们。我们估计陈公博可能从泰兴县沿江的口岸进泰州，便准备了地雷阵等他。可是，狡猾的陈公博从扬州方向来泰州，我们在口岸炸毁的一辆敌车，是陈公博虚设的一路人马。陈逆一进泰州城，虽说戒备森严，行踪诡秘，但还是被我武工队摸清了他的蛛丝马迹。他准备在积谷仓赐宴部下，我们就在泰州城里动员黄包车

伙们把打倒陈公博的标语带去散发，刹刹他的汉奸气焰。由于伪军查禁十分严密，这次行动虽没有成功，却把这大汉奸一伙吓得逃之夭夭了。

这个小插曲说明，敌伪处境不妙，色厉内荏，妄想国民党收编之前稳住阵势，免遭被我歼灭之命运。

区党委和军区再三研究时局，我多次发言指出，蒋介石政府为确保南京和长江航运的安全与畅通，必将与我们争夺苏中这块要地。现在，国民党军队已向扬州、泰州进犯，并计划强占苏中战略要地海门、三仓、口岸等。国民党“接收大员”已进入南通、扬州，各地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三青团骨干更是公然四出活动。实际情况已经表明，如果我军不迅速收复各个据点、县城，坚决消灭负隅顽抗的日伪军，抗战胜利的果实就可能白白让国民党独吞了。根据中央对华中部队的一系列指示，以及华中局刚转来的陈毅同志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要求，我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各部队，应配合行动，把津浦线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整个地区打成一片，占领所有城镇，解放所有地区，打下长期巩固的根据地的基础。苏中部队只有靠自己的力量，解放全苏中。我们要迅速动员苏中军民众投入战斗。

我和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的领导同志决定停止原定召开的苏中参议会，要求开会的同志火速回到原地，组织力量攻城。从各地赶来开会的同志，没顾上喘口气，又匆匆往回赶。区党委以及行署、军区机关的同志，大多分赴各个分区前线指挥战斗，我和管文蔚同志暂时留在机关，负责联系，掌管全局。

奔赴前线的干部、战士，人人精神抖擞，整装出发。附近村庄的民兵、民工前呼后拥，扛着云梯、担架，推着小车，穿行在秋色浓郁的田野里。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河床上，急速划行着支前船队。苏中军民汇成的滚滚铁流奔向前方。远处，时断时续传

来炮声和枪声，留在家中的妇抗会同志，日夜繁忙，替部队碾米磨面，照顾伤员。她们唱着这样一支小调，盼望部队早打胜仗，多打胜仗：

“快！快！快！
鞋子做得快，
军队向前进得快！
快！快！快！
敌伪投降快，
太平日子来得快！”

(四)

“秋高马肥正是用兵时节”。1945年秋，在纵横数百里的苏中平原上，我广大军民向各日伪据点发起了凌厉攻势。大反攻的号角首先在苏中三分区嘹亮地吹响。黄桥、姜堰、泰如沿线伪军据点先后收复。很快，运河沿线苏中一分区和江海平原东南门户的苏中四分区也打响了战斗。仅仅10天时间，苏中军民势如破竹，连续拔除了30多个敌伪据点。倍受胜利鼓舞的各地农民，手执大刀，肩扛锄头，协助部队和民兵拔除据点。一时间，据点里的伪军断粮、断水、断柴，不得不投降。农民们捣毁了敌伪据点的地堡，载歌载舞，搭台唱戏，竞相举行龙灯游行，庆祝家乡解放。

这时，华中局又转来毛泽东同志去重庆谈判前夕对华中部队的指示：“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迅速占领运河沿线及串场河沿线各城市，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张治中先生的回忆录曾提到重庆谈判期间，张先生曾问毛泽东同志，谈判成功了，组成联合政府，能否请毛先生到南京共同主持国

家大计？毛泽东同志回答说，他不住在南京，打算把中共机关搬到两淮，那儿离南京近，有事可以去南京，常来常往。但是，历史进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国民党蒋介石偏不愿与我们合作，而选择了自取灭亡的绝路。

我和区党委、行政公署、军区领导同志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集中主力部队攻城。8月23日攻占了苏中第一个县城宝应。接着，我军挥戈南下，攻打兴化城。各分区部队也连续作战，分两条路线，一路沿着运河，另一路沿着串场河，如秋风扫残叶般拔除了汜水、界首、六安闸、东逻坝、安丰、丁溪、草埝、刘庄、白驹、七灶河等据点，吓得东台、海安两地的伪军弃城逃跑。泰兴、靖江、启东、海门、如皋等城也一一被我军先后收复。至9月上旬，除高邮、扬州、泰州、南通四城和邵伯、秦潼等几个重镇之日伪军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外，苏中辽阔平原已无敌踪。解放区上空红旗飘扬，广大军民扬眉吐气。

苏中大部分城镇是我军民英勇奋战，不惜流血牺牲收复的。在打兴化、泰兴等城时，守城伪军拚命抵抗，加上工事坚固，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战况之激烈不亚于抗日战争时期的战斗。

苏中地区的县城，有敌人在我强大攻势下被迫放弃的，也有在我兵临城下，经与我方谈判被我收复的。这里有一个插曲。靖江城被靖江地方武装和民兵围攻5天后，经过与伪靖江县警察局长、保安大队副陶明德谈判，迫使守敌开门投降。当时城内居民已处于没粮、没柴、没水的困境，怨声载道，群起反对陶明德继续顽抗。陶部士兵久待国民党派兵增援，望眼欲穿，士气普遍低落。这时，我城内地下党加紧工作，促使陶明德在西门外伪商会内与我靖江团团团长陈宗宝、县委书记兼县团政委陆政等同志谈判。陶对我提出的全部放下武器、集中人员开门迎接我军入城等条件，均一一允诺。但陶明德还讨价还价，其中一条要给他本

入一点“名义”，称作“起义”。我方代表慷慨答应，达成协议。靖江收复后，在贴出的第一号布告上署了“靖江城防司令部司令员陈宗宝，副司令员陶明德”字样。当时靖江县委给陶明德一个“副司令员”职务，目的是为了做个“范本”，以利将来下江南收复城市时，扩大政治影响。可是，陶明德过去作恶多端，又做过汉奸，广大民兵、群众见他成了我们的“副司令员”，都很有意见。有人还把墙上贴的布告撕下来，说陶明德杀害过我许多同志，应该严惩。群众的呼声，吓得这位“副司令员”不敢出席城防司令部会议。他苦着脸说，要是大家发起火来，把我弄死怎么办？县委从政治上考虑，也看见陶明德有悔改表现，出面做了工作。为缓和空气，让陶明德同各区代表见了面，作了一番“检讨”，才算勉强通过。事后，我们就把陶明德调出靖江，到分区部队当了一名营级干部。这段插曲，既可以看出群众对汉奸、敌人是恨之入骨的，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党的政策是很宽大的，只要放下武器、戴罪立功，任何人都是有出路的。许多年以后，人们在提起陶明德不敢出席新城防司令部会议一事，还把它作为笑话讲。

金色的秋天，根据地洋溢着欢乐气氛，我随机关、部队又来到了东台城。时隔几年，东台县城里到处是断垣残壁、碎砖烂瓦，显现在人们眼前的是凋敝残败的景象。一批批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难民，踉跄街头。日伪统治下的人民，承担了多大的灾难啊！我军派出的工作队已经开始协助地方政府整顿秩序、安置难民、赈济贫困百姓、清除垃圾污水。这样，街上的店铺陆续恢复营业；日伪破坏的工厂日夜抢修；学校开始复课，短短几天，东台城里就呈现出一派百废俱兴的景象。

对于这次从农村转入城市，把中心工作转入城内，我们事先在思想上也有过准备。1944年局部反攻阶段，党中央多次指示各中央局和各战略区党委，准备在不久的将来把工作重心由农

村转入城市，注意培养城市管理干部，学会管理城市经济。对此，苏中区党委专门开会研究过。苏中平原商业繁荣，物产丰富；沿江、沿河、沿线城市多，大小集镇星罗棋布。1944年下半年，苏中区党委、行署集中了一批干部进行培训，学习党的城市管理政策。1945年3月，宝应境内的沙沟、崔垛集镇解放，苏中区党委和行署成立了苏中第一个城市——沙沟市。由储江同志任市委书记，黄公正同志任市长，进行了城市管理的试点工作。我们十分注意培养干部的城市政策观念，还编成《城市政策歌》加以演唱。记得其中有几段是这样唱的：

“抗日军民个个要牢记，
城市政策大家要注意。
纪律严明军容要整齐，
爱护人民人民都欢喜。

……

城市资财大家要爱惜，
工厂机器保护要注意。
银行铁路矿山和电器，
查封保管不能乱处理。

……

学校机关图书和文件，
文化事业爱护要尽力，
宗教信仰允许有自由，
庙宇教堂破坏不容许。

……”

《城市政策歌》约有十段，我已经记不全了。内容涉及买卖、防奸反特、清洁卫生、文化教育、城市秩序、公私财产等等各个方面。当时，我们正准备向江南大城市进军受降，中央已经内部任

命陈毅同志为上海市市长,粟裕同志为南京市市长。其后,由于政治局势发生了新的变化,解放上海、南京的愿望直到解放战争后期才得以实现。

在东台城住下不久,接到江南新四军部队陆续北撤的命令,我们立即组织沿江群众箪食壶浆迎亲人。想到马上又要与粟裕、叶飞、陶勇诸同志见面,我的心又飞向波浪滔滔的长江边……

第二节 风云突变

(一)

秋风萧瑟中，江南我军指战员依依不舍地辞别江南父老，陆续撤回江北。粟裕、叶飞、陶勇、王必成、江渭清等同志率领的苏浙军区部队分几路从靖江、泰兴的港口上岸，受到沿途县城、集镇军民的夹道欢迎和慰问。苏浙军区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数是苏中子弟，回到家乡，重逢亲人，个个脸上都掠过一丝欢乐的笑容。不过，大家对这次撤出江南根据地是想不通的。试想江南的哪一片土地，哪一座山岭、村寨不是我军英勇拚杀流血牺牲从日伪军、顽固派手中夺回来的？现在竟然主动放弃，让给腐败透顶的国民党军队，大家心里怎么咽得下这口气？！想起告别江南亲人时那种难分难舍的情景，许多同志更加激动难抑。大家都知道，我们一撤，国民党军队就会如狼似虎，践踏解放过的土地，人民又要重新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了……

江南我军撤回江北，是我党与国民党于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所规定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我党为了避免内战、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由毛泽东同志亲率代表团飞赴重庆，与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在历时40多天的谈判中，我党以大局为重，作了许多让步。如退出8个解放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

(豫北不在内);把 130 万解放军缩编为 24 个师至 20 个师等等。在谈判期间和谈判以后,江南我军即撤回江北,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解放区集中。

同志们的思想搞不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实,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早就洞察蒋介石缺乏诚意,我党之所以同国民党和平谈判,主要是向全国人民表明我坚持和平团结民主统一的方针的诚意。毛泽东同志亲赴重庆谈判,在于迫使国民党承认和平建国的方针。至于国民党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发动内战,那它就在全国以至全世界人民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站在自卫立场上,粉碎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反共、内战的阴谋,我党是有高度警惕的。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一再告诫全党,要注意内战的危险。他明确提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不管蒋介石玩弄什么鬼花样,我们都时刻保持警惕,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蒋介石要打,我们在张家口、上党、邯郸战役中真刀真枪跟他干,消灭他几个军。蒋介石要谈,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到重庆跟他谈。

当然,那时大家对中央的方针,并不都有深刻的理解,有的同志甚至还认为撤出江南是示弱的表现。但迅速发展的局势说服了这些同志。

不久,我们就知道,蒋介石的部队一到南京,就打算杀奔苏北,一路从扬州沿运河线占领两淮;另一路从泰兴、南通出发,在如皋汇合,沿盐运河北上,到东台、盐城、阜宁等地,然后向两淮汇合,再向北进攻,把我们驱逐出黄河以北。如果苏南部队不及时撤回,苏中战局就很难预料了。

江南部队撤回江北，战友重逢，分外亲热。令人遗憾的是，我军渡江北撤时，发生了一起沉船事故。原苏中一地委书记、苏浙军区四纵政委韦一平同志率800干部战士乘坐中安号轮船，在天星港附近江面不幸沉没，绝大多数同志罹难，包括韦一平同志在内。获悉详情，追忆往事，我们都不禁潸然泪下。

在泰兴黄桥举行的欢迎会上，粟裕同志向广大军民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阐述了我军撤出江南对维护和平的政治意义，号召军民一手拿枪一手生产，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和平，敦促蒋介石实现自己和平建国的诺言，警惕内战突然发生。粟裕同志的讲话大大稳定了部队和群众的情绪。

遵照党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叶飞同志率领一部分江南部队继续北上，去山东接替开往东北的八路军，负责山东战略区的防务。粟裕同志则率领陶勇、王必成、江渭清同志的部队驻防运河一线，整编待命。中央的意图是：“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正当此时，陈毅同志受中央的委任，从延安取道晋察冀解放区兼程回到华中，到达山东主持华东局工作。新四军军部也北移山东，兼管山东军区，统一指挥山东和华中（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部队。

（二）

“双十协定”公布以后，全国各阶层人士都十分高兴，以为抗战胜利，天下从此太平了。国民党的宣传机构，尽力散播假和平舆论，转移全国人民的视线，为蒋介石赢得调兵遣将准备内战的时间。美帝国主义也暗中相助，明里口念和平经，私下里为蒋介石提供大型运输机输送兵员，为大打出手布阵势、摆兵力。一时间，和平的曲调唱得震天价响，磨刀霍霍之声处处

可闻。

经历了8年抗战煎熬的人民，心底涌起对和平的渴望，眼巴巴地希望和平真能实现，好重建破碎的家园，过上太平的日子。时刻以实现人民的意愿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清醒地估计了和与战之间十分复杂的斗争形势，极力促使和平民主团结统一建设新中国目标的实现，对国民党的步步进逼，忍让再三。我记得当时东台城里发生这样一件事。一天，晴朗的天空中，从南京方向飞来一架双翼飞机，盘旋于苏中秋野平川上，嗡嗡的引擎声吸引了满街满巷的群众。我也跟着大家跑到街上，亲眼看见飞机上撒下纷纷纸片。“传单，传单！”群众喊叫起来，许多人特别是小孩子追逐着去拣拾飘落的传单。一看是“双十协定”，群众争相传阅，议论纷纷，大家都为国共两党签署了和平协定而欣喜若狂。一时间，“和平了，和平了！”的声浪压倒了一切。

然而，蒋介石宣称要跟共产党讲和平，成立联合政府，共商国是，乃是他施放的烟幕弹。当时蒋介石对发动反共内战也确有许多顾虑。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党领导的解放区日益强大，有1亿人民、100万军队、200万民兵，控制着广阔的地域和许多重要城镇、交通要道、港口，而蒋军尚偏隅西南西北，两军态势对蒋介石极为不利。更何况蒋介石慑于国内人民铺天盖地的和平呼声和国际上强烈要求中国实现统一、成立联合政府的舆论压力。蒋介石的确是处在既缺乏军事力量又无人民支持的困境中，手上捏着一本难念的经。

当时，我们党内及群众中，一部分人对形势盲目乐观，又为若干表面现象所迷惑，一时识不破蒋介石所玩弄的花招。特别是1946年1月13日全国“停战令”下达和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使更多的人认为中国从此太平，将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了。

我记得“双十协定”、“停战令”公布前后，党中央曾向全党发布中国开始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新阶段的指示，要求党内同志学会做和平时期的工作，学会同国民党共事，部队和地方还成立复员局，着手缩编部队。中央的指示精神，是要求全党适应新的环境，从军事斗争向非军事斗争转变，而不是放弃同国民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一再提醒全党要注意内战危险的存在。在“双十协定”公布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解放区1946年工作方针明确指出：“站在自卫立场上，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仍是各解放区的中心任务。”为此，只有做好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等工作，才能克服困难，支援战争，立于不败之地。我们有些干部没有全面领会中央指示的精神，只看到人民的和平舆论暂时压倒反共内战的叫嚣，而看不到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内战的阴谋。因此，这部分同志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滋长了一种松劲情绪，认为日本投降了，国民党讲和平了，该解甲归田过太平日子了。

但是蒋介石决不愿意让中国实现真正的和平。恰如苏中沿江一带的老百姓所说的：“抗战胜利了，我们可没有过上一天太平的日子！”自日军投降后，苏中前线炮声枪声一直没有停过，残留的日伪军屡次向我解放区进犯，狂言要夺回“失地”。江南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云集岸边，不断渡江到江北，占领沿江县城，集镇。“和平”，对于蒋介石来说，只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三)

形势发展很快，为了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工作，加强作战指挥，撤销了苏中区党委，行政公署、苏中军区，我被任命为华中分局委员、组织部副部长，调到部队工作。管文蔚同志担任

华中野战军七纵队司令员，胡炳云同志为副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吉洛同志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华中部队已统一编成华中野战军，司令员为粟裕同志，政委为谭震林同志，刘先胜同志任参谋长。野战军编成六、七、八、九共4个纵队，以后加入以苏中第五军分区武装编组成的第十纵队。

七纵队是新组建的部队。“双十协定”以后，苏中部队需要缩编，我和管文蔚、胡炳云同志准备率领部队去黄海边的大中集屯垦开荒。那一带地广人稀，滩涂广阔无际，到处蒿草丛生，我们计划在那里开荒建造农场，生产自给，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又可以把部队隐蔽下来。当时我们这样打算：如果部队大批复员，那就准备就地变军为农。我们派了一批同志前往大中集筹备，但由于局势变化，屯垦开荒计划没有实现。

1945年12月，华中军区获悉江南国民党军队将大批渡江，妄图会同已经进驻扬州、泰州的国民党二十五军及高邮、邵伯的日伪军，向我苏皖边区进犯。为了保卫胜利果实，打破国民党军队分割和占领华中解放区的阴谋，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发起高邮、邵伯战役，拔除运河上这颗“钉子”，以确保华中分局、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清江市（两淮）东翼的安全。我们七纵队奉命参加战斗，担任攻击邵伯镇敌人的任务。当时高邮有日军独立第九十旅团1000人，伪军四十二师4000人，邵伯镇附近有日军佐田部队和伪军1500余人。我华中野战军则集中七、八两纵队和华中一、二分区部队，以绝对优势兵力进行猛烈攻击，并多次击退自扬州派出的国民党增援部队。经过7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消灭一部分顽抗之敌，迫使剩下的日伪军在绝望中缴械投降。战后，华中军区司令员张鼎丞同志高度评价了华中部队和民兵英勇善战的精神。

苏中的国民党军队，最早开来的是二十五军，屯驻扬州、泰州一线。同年底，江南国民党四十九军乘群众欢渡元旦，戒备稍息之际，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在过船港、八圩港作大规模武装强渡，占领了泰兴和靖江两县城及附近村镇。随后，国民党一〇〇军又沿着通扬公路由西向东进犯；七十一军在全国停战令下达之后由苏南福山渡江至南通，迅速沿通榆公路向我白蒲军事重镇进犯。这时，苏中国共双方出现临战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中独立旅奉命坚守姜堰，我和管文蔚同志带领苏中军区部队，阻击国民党一〇〇军的进犯。时值隆冬，北风呼啸，又下着夹冰夹雪的冬雨。独立旅的指战员冒着彻骨的寒冷，挖战壕、筑工事，依托着姜堰黄村的开阔河岸，在东岸部署阵地。姜堰镇附近的老百姓冒着风寒雨雪送来门板、草袋，帮助筑工事，还送来热水热汤慰劳子弟兵。那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就是硬汉子见了也会感动得流泪的。我和管文蔚同志赶到姜堰阵地前沿，听取参战部队领导人陈玉生等同志汇报战斗部署。他们打算在河东布置一个伏击圈，诱敌深入，一待敌人过河进入包围圈，即出击围歼。

拂晓，雨停雪止。一〇〇军前哨部队与我地方民兵接上火。民兵且战且退，引诱敌人钻入我军设下的“圈套”。国民党一〇〇军的士兵大都是湖南兵，还没正面和我军交过锋，气焰十分嚣张，扬言“上午进攻，下午到姜堰开庆祝会”。他们见我民兵队伍节节撤退，便大摇大摆向黄村河东压来，不知不觉陷入我独立旅的包围圈。转眼间，我军从四面八方扑来，猛打猛追，很快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缴获不少美式武器弹药。一些被俘的士兵后来说，他们部队从湖南调往汉口受降，刚到汉口即奉命开往江都、泰州。当官的欺骗他们说，姜堰有穿灰衣服的汉奸土匪部队，打他们如同吃豆腐，谁知碰了块硬石头，成了新四军的俘虏。

通过我们的教育，许多俘虏明白了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纷纷要求参加新四军。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只留了一小部分，大部分俘虏都被遣送回家。

国民党的一〇〇军在姜堰吃了亏，一时摸不清我军的虚实，被迫暂时停止进攻。恰在这时，上级传达了全国“停战令”，我和管文蔚、陈玉生、李干辉等同志估计，根据形势发展和敌人攻势受挫，可能我们会与一〇〇军实行火线谈判。独立旅前沿阵地的战士，想了个妙办法，在一块门板上写了“停火谈判”几个大字，竖在阵地上，让对岸国民党部队看到。开始，对岸敌人不识好歹，竟用机枪作答，但过不了多久，我军发现隔河的国民党军队，也在阵地上竖起了门板同意谈判。

我们考虑再三，最后决定派惠浴宇同志为我方首席代表，泰县县委副书记周伯藩同志及独立旅党委的一位干部随同前往。谈判地点设在姜堰石家埭，对方的首席代表是个副师长。整整一天时间，我们时时刻刻都替谈判同志的安全耽心。直等到日落西山，三位代表同志满面春风回到我方阵地，我们心里悬着的大石头才算落了地。

三位代表同志不顾疲劳，立刻向我们介绍谈判情况。原来，在谈判过程中，双方的斗争十分激烈。我方代表义正词严，谴责一〇〇军违反事先约定，荷枪实弹向我“示威”。说话间，对方唆使不少下级军官吵吵闹闹，挥舞拳头，喊着要跟我军再打。我方代表不甘示弱，蔑视国民党谈判者的蛮横气焰。对方见我代表态度坚决，最后不得不又换上笑脸。双方达成四条协议，主要内容是双方军队撤至原来防地，以黄村河为界，建立一块缓冲地带，双方军队均不得进入这一地区。我们根据我党的既定方针，为了实现火线停战，也做了些让步。

姜堰军事冲突平息不久，邓子恢同志代表华中分局通电表

扬苏中军区，认为火线谈判是成功的。苏中军区还为此派出文工团，对独立旅指战员作了慰问演出。

(四)

苏中国共两党军事冲突，除了姜堰地区，还有邵伯冲突，白蒲冲突。其中白蒲军事冲突，亦称“白蒲事件”，很值得记述一下。

白蒲镇在如皋县境内，地处(南)通(赣)榆公路线上，距我华中一分区所在地如皋县城较近。白蒲镇原为我军驻地，在全国“停战令”生效之际被国民党七十一军占领。我军先进行了自卫反击，后来为维护“停战令”，主动撤离了白蒲阵地。

“白蒲事件”发生，激起了华中人民强烈愤慨，纷纷致电北平军调部和重庆全国政协会议，要求派人调查，严惩挑起内战事端的肇事者。于是，北平军调部在徐州执行小组下，又设了一个淮阴小组，专门负责调处白蒲、姜堰等地国共两党军事冲突。淮阴小组由美国、国民党和我党三方代表组成。

美国以貌似公正的“中立者”身份参加“调停”，这使不少同志产生了幻想，以为美国既已表示主持“公道”，那只要讲句“公道”话，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很快就会平息下去，避免内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其实，国民党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撕毁“双十协定”，破坏全国“停战令”，一再挑起内战事端，正是幕后有美国人替他们出主意，才敢那样干的。

淮阴执行小组刚到白蒲调查，南通的国民党驻军怕暴露事实真相，急忙命令白蒲镇的伪政权威胁当地居民，要大家统一口径，说“国军”是13日“停战令”生效之前进驻白蒲镇的，妄图逃避违反“停战令”的罪责。《新华日报》当年曾载文揭露“白蒲反

“反动派玩骗术，强迫人民谎说顽军停战前进街”。现在不妨抄录一段，以存其真：

“这是在一家杂货店门口，国民党九十一师二七三团的一位排长，以指挥士兵打扫街道为名，逐家挨户问道：‘喂，老板，你晓得我们几时到白蒲的？’态度似乎比平常客气。

老板迟疑了一下，屈指一算：‘噢，我想想，是腊月 13，照阳历算，是 1 月 15 号。’‘1 月 15 号？不对，不对，我们是 1 月 13 号来的。’

老板惊奇地瞅着对方：‘你记错了，那天你们弟兄上我家来，我家伢儿还吓得哭起来！’

‘瞎说！我们是 13 号来的。记住：13 号，不是 15 号。假如有人来调查，你要说中央军是 13 号来白蒲的，懂吗？’

老板没有听懂：‘怎么？日子好搬前两天吗？’

排长光了火，不耐烦地说：‘叫你这样说，你就这样说，如果说错了，我们要找你……’”

芝麻绿豆大的一件事，国民党做贼心虚，也要抓住它大做文章，足见当时国民党军队的窘态。

谁要说真格，就对谁下毒手。如皋县勇敢乡顾庄村小学校长徐浩泉向淮阴小组反映真实情况，不几天，被当地还乡团杀死在河边。南通城进步青年集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向淮阴小组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制造出当时轰动全国的“南通惨案”。

淮阴执行小组就“白蒲事件”调查了 3 个月，毫无实质性进展。我方代表韩念龙上校、严振恒中校、蒋克定中校力促解决“白蒲事件”。美方代表邓克中校和国民党代表肖凤岐上校、杨超上校心照不宣，相互遮掩，一味拖延事件的解决。谈判时，美方处处替国民党讲话，偏袒国民党。我们曾在东台县彩衣街接待过淮阴

小组。苏中军区临时成立外宾招待处，款宴三方代表，还招待他们看话剧《甲申祭》。对淮阴小组三方，我们都以礼相待，而对美国和国民党代表只玩弄词藻掩盖事实真相，毫无诚意解决军事冲突，则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们应有的愤慨。后来，苏中战役打响，这个淮阴执行小组就名存实亡停止活动了。通过这次“调停”，广大干部终于识破了美国和国民党合唱假和平双簧的伎俩。

在淮阴执行小组进行“调停”的同时，国民党军队源源不断从江南渡江而来，印有青天白日标记的飞机唿哨苏中上空，长江水域中“国军”军舰狼奔豕突，陆上则坦克轧轧声搅得人心惶惶。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挟其海陆空优势，不断“蚕食”我苏中解放区，又相继占领了泰县的赵庄、西五厂、油坊头、港口，江都的杨家桥、嘶马镇、大桥镇，通海的三和镇、天补镇、长乐镇，启东的灵甸镇等地。逃往扬州、泰州、南通、秦潼等城的汉奸、恶霸、反动地主纷纷从地洞里钻出来，恶狠狠地叫嚣“重返家园”、“武装还乡”，以所谓“流亡者”姿态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派兵“剿匪”。

一时间，苏中沿江城市、集镇、乡村，黑云压城，狼烟四起，掀起了一阵内战的恶浪。截止1946年5月上旬，苏中沿江一线，国民党军队急遽增加到5个整编师，10万人马，长江南岸沪宁线上的二线部队也随时准备渡江。

鉴于华中（包括苏中）的严重局势，华中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公开发表谈话，严正指出：华中形势非常紧张，国民党屠杀人民的枪炮已架在面前，倘再忍让，将徒使反共分子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实现我党巩固和平建设新中国的一贯主张，只有坚决自卫。

经中央军委、新四军军部批准，华中野战军第八纵队扩充为新四军第一师，第六纵队扩充为第六师，又组建了第十纵队，由

粟裕同志亲自率领，开抵苏中前线。为确保沿江财源区域，扩大政治影响，随时准备投入自卫反击战，我们第七纵队和苏中地方部队，同一师，六师，十纵队并肩行动。

嘹亮的军号激越昂扬，响彻苏中大地，战士们迈着坚定的步伐，唱着战歌，开赴前线：

“我们是苏中人民的子弟兵，
坚守在自卫的最前线，
我们经过了战火的洗礼，鲜血的考验，
艰苦的斗争中生长壮大，
不让反动派的魔手夺去，
我们自由幸福的田园。
我们是苏中人民的子弟兵，
坚守苏中，坚守苏中，
坚守在自卫的最前线。……”

第三节 七战七捷震中外

(一)

1946年6月，蒋介石公然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令”，纠集30万兵力，向我中原解放区大举进攻。这是个惊人的信号。它表明在美国的怂恿支持下，蒋介石违背全国人民的和平意愿，终于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

当时蒋介石的总兵力有430万人，控制着3亿以上的人口和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大部分铁路交通线和丰富的资源。他还接收了百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又不断得到美帝国主义的新式装备和战备物资援助。我军只有120多万，敌军比我多2倍半，解放区人口共1亿3千多万，约占国民党统治区人口的三分之一。相形之下，蒋介石兵多武装精良，又有美帝国主义在背后撑腰，因而气焰十分嚣张，叫嚷要在3至6个月内占领各个解放区，消灭八路军和新四军。据美国某记者透露，蒋介石在1946年4月秘密接见他时，即表示决心消灭共产党。

事实果真如此。东北停战以后，蒋介石继续大量运兵，向营口、本溪、四平街进攻。5月底，强行占领四平街、长春和永吉（今吉林市）直指松花江南岸。紧接着，蒋介石又把战火烧到关内。至5月下旬，他已将35个军、99个师共计100万以上兵力布置在内战前线。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先南后北逐步

将战火燃遍各个解放区，首先下手的目标是中原解放区，继之是苏皖解放区。自6月中旬开始，蒋介石的谈判代表公开向我方施加压力，要我军退出大部分解放区，即退至黄河以北。我方代表断然拒绝其荒谬要求。国共两党南京停战谈判，又陷入了僵局。

我十八集团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从南京回延安，途经苏中解放区，向我们介绍了谈判期间蒋介石代表的无理要求。这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国共两党和平谈判已无实质性意义，内战已不可避免。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我各大解放区如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晋绥、东北等地已连成一片。唯独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等同志领导的中原解放区孤悬一处，四面受敌。“双十协定”一经发表，我军遵守诺言，撤出长江流域和广东等地8个解放区至陇海路以北和苏北、皖北解放区，但不包括豫北地区。以湖北省宣化店为中心、桐柏山脉为屏障建立的中原解放区，直接威胁平汉、陇海两线，被蒋介石视为心腹之患。6月22日，蒋介石调动大军，围攻中原解放区6万人马。在我中央军委的指挥下，我军分路突围作战略转移，至7月下旬胜利完成任务。其中皮定钧旅突围到苏皖解放区，受到苏中军民热烈慰问。皮定钧旅后来与华中野战军并肩战斗，参加了著名的盐城保卫战。

蒋介石把苏皖解放区作为第二主攻目标。苏皖解放区（即华中解放区）直接面对作为国民党政府首都的南京城，威胁着长江、津浦线徐蚌段、陇海路东段各重要交通命脉，使蒋介石寝食不安。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中，曾引用“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这句古话告诫我们，国民党要发动内战，苏北地区是必争之地。蒋介石发起全面内战，对苏皖解放区是下了“大赌注”的。在进攻苏皖解放区时，蒋介石的海陆空正规军及地方杂牌武

装共达 50 万人。

(二)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规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即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而不以保卫城市或地方为目标。在具体战役上，当敌人使用大兵力分路向我军分进合击的时候，我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灭敌军的一部分，同时用少数兵力扼制敌军的其他部队，使之不能向被我包围的敌军增援。歼敌一部分之后，视战争的发展趋势，再歼灭敌人的另一部分或收兵休整，准备再战。在战术上，当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围歼一部分敌军的时候，担任攻击的各部队，不必企图把这部分敌军一举歼灭干净，以致平均使用兵力，造成攻击部队一时不能达到歼敌的目的或延误下一步的战机，而应当集中优势兵力，向敌军较弱的一点进行猛击，务期速战速决，取得胜利。

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等华中分局的领导同志，对贯彻中央军委“南线出击”方针提出过一些设想，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及华东局领导都很重视。1946年6月下旬，中央军委命令粟裕、谭震林同志率领不少于15个团的主力进军淮南；新四军军部也命令陶勇一师、王必成六师主力速赴六合与天长之间整训，准备向徐州蚌埠段发起攻击。华中分局反复讨论，结合实际情况，要求一师、六师仍留苏中前线，在内线先打几个胜仗，然后再移兵淮南。粟裕等同志认为，当时苏中正面之敌有5个整编师（相当于军），若我主力西移，仅留下华野七纵、十纵和华中一、二分区部队，很难阻挡敌人在南线的进攻。若一师、六师留在苏中，则可以打乱敌南线部署。我在苏中作战，人力、财力、兵源都

有保障，且战士多是本地人，地形熟悉，许多有利条件都可充分利用，不象在淮南作战，又逢雨季，粮草供应也有困难。中央军委根据华中分局陈述的利弊得失，很快就复电同意了我们的“内线作战”设想。

7月初的一天，粟裕同志打电话约我到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商量后勤军需工作。大敌当前，他还是那样镇定自若，先向我传达中央命令华野主力内线作战的计划，然后详细向我介绍了敌人在华中的兵力分布。当时，蒋介石命令徐州绥靖公署具体策划进攻华中的军事行动，计划分兵三路从南、西、北向我军发起攻势。津浦路(西线)敌人由固镇、来安、六安出击，向我灵璧、五河、天长、盱眙等地进攻；陇海路东段(北线)敌人由徐州出发，向苑山、猪头山进攻，另一路驻新浦海州之敌相机配合；南线，苏中解放区面临5个整编师的敌人，形势相当严峻。

南线敌人的计划是先攻占东台、兴化、高邮以南地区，然后进逼盐城、阜宁、淮阴，与西线、北线敌人会合，将我华中野战军主力歼灭于两淮地区，或赶出苏北撤入山东。当时敌人驻扎在泰县、口岸、宣家堡、泰兴一带的整编八十三师李天霞部，正沿如(皋)黄(桥)线由西向东奔袭如皋；驻扎在南通、平湖、白蒲一带的整编四十九师王铁汉部，将沿(南)通、(赣)榆线进攻如皋；驻扎在仙女庙、扬州一带的整编二十五师黄伯韬部，将沿运河向邵伯、高邮进逼；驻扎在崇明、上海的整编二十一师和江南的整编六十五师，也将渡江北犯。

粟裕同志对我说，挫败苏中正面战场的敌人，对华中整个战局将有重大影响，对全国也有影响。华野司令部拟把苏中战役的战场放在如皋、高邮一线以南地区。海安以北人口稀少，物资不如南部地区充裕，支前工作难做。战斗很快要开始，军需、后勤任务很繁重，时间又紧迫，需要有专人负责，华中分局决定让

你阿丕负责这项工作，随司令部行动，参加前敌委员会。我意识到，这次支前任务，既光荣又艰巨，非同寻常。由于战线较长，又得连续作战，这次支前工作的规模是空前的。能否做好这项工作，关系到苏中解放区自卫反击战的胜负，也关系到华中战局的发展和变化。考虑到这一切，我坚决接受了这个任务。

(三)

7月10日左右，华中野战军司令部得到国民党军队7月15日将大举向我苏中解放区进犯的情报。这时，敌人的飞机也开始不间断地在苏中解放区上空盘旋。如皋城附近集镇、公路、农村遭到空袭，战幕即将拉开了！

我领受任务后，迅速作出部署。华中一、二地委都成立了苏中战役支前司令部。各县支前任务层层落实，民工队、伤员转运站、粮草供应站在短时间内都筹办停当。我和贺希明等同志在如皋附近分头检查落实情况。粮草、慰问品数量充足，可见苏中军民与敌人奋战到底的决心，也感受到苏中老百姓对子弟兵的深情厚意。

听完各方面的汇报，粟裕同志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战术，攻其不备，出奇制胜。他的大胆设想是建立在敌强我弱的基础上的。当时我军在苏中只有3万余兵力，与敌人是四与一之比，明显处于劣势。武器装备差距也相当大，敌人是飞机大炮美式装备，我军的重武器仍很少。如何变劣势为优势？粟裕同志认为我们不能等着挨打，而应该主动出击，灵活用兵，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我军把首战目标选择在泰兴城和宣家堡。宣家堡是个小集镇，位于泰兴以北18里，三面环水，四周有土围和高楼。我军之

所以从如皋出兵，向西远道奔袭泰兴、宣家堡之敌，主要是考虑守敌2个团相对孤立，较之泰州、南通两路敌人好打。敌人则估计我军主力在如皋、海安一线，所以泰、宣之敌较麻痹。特别是宣家堡的敌五十七团，十分骄狂轻敌，自称“天下第一团”，曾狂妄地说：如果共产党打下宣家堡，歼灭了五十七团，那他们就“可以倒扛着枪，一弹不发地进南京城。”原来，五十七团隶属于八十三师，曾参加过远征军，到过缅甸，半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在国民党军队中有铁军之称。这个师整编前为一〇〇军，在姜堰曾被我苏中独立旅消灭掉一个营，但它并未吸取教训。五十七团占领宣家堡以后，十分麻痹，工事修筑也极草率。我军看准了泰宣之敌骄狂的弱点，以长途急行军将主力悄悄向泰兴境内运动。7月13日，泰宣战斗打响，我军连夜发起攻击，敌人从睡梦中醒来，仓惶抵抗，猝不及防。很快，我军攻入泰兴城内，敌团部退入城角一座庙宇固守。经过两夜一天激战，一师彻底消灭宣家堡守敌；六师歼灭了大部分驻守泰兴城的敌人。预期目的达到，我军即主动撤出战场，除留六师少数部队钳制泰兴城残敌，并制造我军主力仍在宣、泰假象迷惑敌人外，大队人马急忙掉头向东顺原路赶回如皋，再迎战南通四十九师两个旅。

泰宣战斗歼敌3千，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急忙飞到南通召开党政军联席会议，给丧魂落魄的部下打气。敌人首战受挫，元气未伤。李默庵乘我军在宣、泰作战，如皋兵力单薄之机，急令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亲率直属队和二十六旅、七十九旅进至宋家桥、杨家桥一带，与泰州，黄桥、姜堰敌九十九旅、八十三师2个旅4个团及随后而来的敌整编六十五师夹攻如皋城。四十九师担任主攻，两路敌人协同作战。王铁汉雄心勃勃，扬言“三天拿下如皋城”。敌人的目的是先拿下如皋，然后四十九师由东向西，西路敌人由西向东，把我军消灭在如皋、黄桥、泰州之

间。

正当敌人得意忘形之时，我军一师、六师及七纵队已长途急行军迂回到四十九师后侧，布下了天罗地网，于7月18日发起了如(皋)南战斗。敌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没料到我军主力钻入他的心脏，抄了他的退路，因而部队来不及展开，就被我压在如皋东南鬼头街和杨家桥、宋家桥一带。我军用“关起门来打狗”的办法，分割围歼四十九师两个旅。经过两天激战，如(皋)南战斗共歼整编四十九师一个半旅，连同打援，共歼敌1万余人，差一点活捉王铁汉。捷报传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当天拍来贺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并嘱咐部队“集中休息，补充缺额，恢复疲劳，以利再战”。部队连日急行军，一仗接着一仗，确实非常疲劳，但战士们仍然生龙活虎，斗志十分昂扬。

粟裕同志按中央指示，下令一师、六师隐蔽在东台、台北三仓、一仓休息，七纵队在如皋、海安沿线与敌6个旅周旋，打运动防御战。经过如(皋)南一战，南通四十九师残敌与泰州、黄桥方向之敌汇合，猛攻如皋、海安两城。管文蔚、吉洛、胡炳云同志率领七纵队4个团顽强阻敌，奋战4天，杀伤敌人达3000余人，七纵队伤亡仅200余人，伤亡率是十五比一。七纵队取得海安运动防御战胜利后，按照党中央关于不计较一城一地得失的指示，即主动放弃如皋、海安两城，把“包袱”甩给敌人。这时中央军委也来电明确指示：“宁可丧失一些地方，不可举行勉强的无把握的作战”。“敌以10万大军向我进攻，我损失若干地方是不可避免的。”中央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思想英明正确，更坚定了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信念。”

李默庵在苏中战场三战三负，嚣张的气焰为之大减。为了挽回面子，他用两个整编师兵力占领了如皋、海安两座空城，又连陷西场、角斜、李堡等地，暂时无力继续北犯。我军决心再

次打乱敌人部署，使敌人得不到片刻喘息时间。

恰巧，李默庵巩固南部地区心切，对各部队进行驻防调整。粟裕同志利用敌人调动频繁之机，决定于8月10日以一师、六师、七纵队等部队同时向李堡、角斜守敌和来换防之敌发起突然袭击。此时，敌一〇五旅正待西调，新七旅刚准备接防，还未站稳脚跟，我军仅用20个小时，即歼敌一个半旅共9千人。

粟裕、谭震林同志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陈毅同志的电报指示，仔细分析了苏中战局，又看准了南通至如皋一线敌人侧翼兵力薄弱。敌人四战四败，被歼3万余人，已无更多机动部队；随着战线拉长，弱点显露，只能控制交通道口和城镇。这样，敌人用兵分散，“包袱”很重，十分有利于我军穿插围歼。而在南通至如皋沿线，敌除了受到严重打击的整编四十九师残部一个营外，仅有5个交通警察大队；敌整编二十一师刚到南通接四十九师防务，估计不敢轻易出动。经此分析，粟、谭两首长拿定主意，决定再出奇兵。

8月20日，我军主力不顾疲劳，不怕长途行军，毅然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以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战术，绕到敌人背后，向丁堰、林梓猛扑。第二天夜幕降临之后，我出其不意发动攻击，敌人听到枪声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我军是从何处钻出来的。在敌人懵懵懂懂的情况下，我军消灭了交警总队5个大队和整编四十九师1个营，共3千余人。交警总队是江西调来的特种部队，全部美式装备均被我缴获。

苏中丁堰、林梓战斗获胜，又给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但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尽管南线惨败，北线受阻，只有西线敌人乘我淮南部队东调之机，进展稍快，李默庵乃命令南线驻守扬州的整编二十五师黄伯韬部，沿运河北上攻我江都县邵伯镇，以配合西线敌人。我华野十纵队3个团及华中二分区2个团，由刘

培善同志统一指挥，坚守邵伯，阻击敌人。

邵伯鏖战的当天，粟裕、谭震林同志已带一师、六师、淮南第五旅、华中特务团向西奔袭黄桥守敌九十九旅，采用“围魏救赵”战术，攻黄桥，救邵伯。途中获悉敌九十九旅由黄桥向如皋增援，如皋一八七旅、七十九旅各一部出迎黄桥援军。这真是狭路相逢。原来李默庵误以为我军要打三面受围的如皋城，慌忙调黄桥之敌增援如皋。敌人没想到，粟裕已在如皋与黄桥之间的公路上设下两只“口袋”，等待他们来钻。

8月25日，如黄线遭遇战打响，敌九十九旅被我六师包围在黄桥东北的分界；如皋一八七旅等部被一师包围在加力、谢家甸。敌人作困兽之斗，战斗相当激烈。26日，我集中兵力先围歼九十九旅；27日又集中数倍兵力痛击加力、谢家甸之敌，还派部分力量阻击如皋增援之敌。我军犹如钢刀刺进敌人心窝，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杀得敌人鬼哭狼嚎。这次如黄线大捷，歼敌两个半旅，1万7千余人，并乘胜解放了黄桥镇。

全歼九十九旅的当天，黄伯韬怕陷入我军的包围圈，慌忙丢下2千多具尸体夺路而逃。在如黄线大捷前一天，邵伯保卫战坚持了3天4夜，也取得辉煌胜利。

自7月13日至8月27日，我军在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连续打了七仗，从北到南，由东向西，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犹如旋风似的，以3万多兵力周旋于南通至扬州一线12万国民党军队之间，歼敌约5万余人。蒋介石此时正在庐山召开会议，闻讯十分恼怒，却又无可奈何。

苏中七战七捷震惊敌胆，为各解放区军民坚持自卫反击战，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战役刚结束，延安总部发言人高兴地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指出国民党军队对苏中进攻迭遭惨败，“这件事对于今后的战局发展是有重大影响的”。

(四)

粟裕同志在总结苏中战役时说：“这七次战斗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但每次战斗都由同一战役指导思想联系着，那就是遵照中央军委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的指示，着眼于战争初期的作战要求，从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灵活用兵，哪里好消灭敌人就在哪里打仗，什么时候好消灭敌人就在什么时候打仗，什么敌人好消灭就打什么敌人。这次战役，既沉重地打击了进攻的敌人，掩护了华中解放区完成对付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全面准备，又初步探索了解放战争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完成了战略侦察任务。”在每一个具体战斗中，敌人依仗飞机、大炮之类美式装备，气焰极为嚣张，结果却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几经交战，我军迭获全胜，装备有了很大改善。而且，战士们连续急行军，有时一天要跑上百华里，甚至晚上还得夜行军，练成了一双“飞毛腿”。起初，战士们疲乏过度，不时发牢骚，埋怨领导。后来，打了一个又一个胜仗，歼灭了大量敌人，获得累累战果，大家尝到了运动战的甜头，都不禁说我们的胜仗是靠脚底板走出来的。

苏中战役基本上是打运动战，其中邵伯保卫战打的是阵地防御战。邵伯保卫战在苏中战役中具有特殊地位，这一仗不仅牢牢吸住了敌整编二十五师，使其不能抽出兵力增援如皋一带的敌人，而且守住了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淮阴、淮安的东大门，使敌人不能沿运河北上侵入解放区腹地。

邵伯保卫战的激烈程度是空前的。敌人从天上水上陆上猛扑过来，运河中敌炮艇配合陆军进攻，空军又不断狂轰滥炸我军阵地。守卫邵伯镇的我十纵队和华中二分区部队，大都是新入伍的战士，但打起仗来却很顽强，接连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国民

党军队恼羞成怒，竟然抢来大批老百姓耕牛，在尾巴上浇上汽油，点燃后赶往我军阵地。但“火牛阵”吓不倒我英勇战士，他们在狼烟翻腾的火海阵地上，不断变换位置阻击敌人。最后，在我军如黄大捷震慑下，敌人丢下2000多具尸体，狼狈撤离邵伯，逃到了扬州。

（五）

粟裕同志说过，苏中自卫战争的胜利，一是具体运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二是全体指战员的努力；三是地方党政军民的支援。

确实，苏中人民对苏中战役的支援是十分重要的。在那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我负责统筹支前工作。部队每到一地，马上就得调集粮草，组织民工运输，保证供给。有时，大批民工将粮草运到指定地点，部队已经跟敌人交手，向别处转移了。于是我们又得组织民工“跟踪追击”，千方百计将粮草送上前方，保证指战员们吃饱吃好。说实话，那时的支前工作和火线杀敌，是不可分割的。据统计，整个苏中战役中有30万民工上前线，送粮草、运伤员、打扫战场、看管押送俘虏。在战前落实支前任务时，各乡各村都先召集群众开会。一般一区成立一个担架大队，一乡为一个担架中队，一村为一小队。每5副担架编为一个小组，选出小组长。参加担架队的农民都感到很光荣。他们立即准备树棍、毛竹、绳子，制作担架，并进行训练。运输队则根据各家各户的情况而定，有小车的参加小车队，没小车的参加扁担队；上级命令一到，立即奔赴前线。筹集粮食柴草的工作也很细致。由于战争环境，公家没有粮库，平时征收的公粮都分散储存在群众家里。财粮部门只登记各家各户藏粮的数字，随时需要，随时

可以调用。一般每个战士和民伕每天供应粮食 1 斤半，烧草 3 斤。我还记得，在两淮被困时，参加苏中战役的主力部队已经相当疲乏。为了保证主力部队休整，迅速开赴两淮作战，我们支前司令部紧急动员了数万船工，用木船运送部队北上参战。近万条木船，从各县各乡迅速集中起来，数万船工争先支前，那情景确实非常壮观。

在苏中南部解放区，我军在内线与敌人作战时，人力、物力、财力源源不断，充分体现了我军所处的优势，那是敌人一点也得不到的。人民的军队在人民群众中，如同鱼儿在汪洋大海里自由游泳，而敌人却只能望洋兴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我军打完宣泰战斗，部队立即掉头急行军奔向如南，战士们来不及吃饭，黄桥镇的老百姓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在部队路过的道路旁，堆上大批瓜果、烧饼，捧出杯杯凉茶，鼓励战士们勇往直前，多打胜仗。黄桥镇民兵也跟附近各村民兵一起，连夜帮助地方部队打扫战场，押送俘虏，保证我军主力迅速转移。

如南战斗结束后，大部队集中在三仓、一仓休整，后勤供应一时显得紧张起来，附近老百姓便把打捞上来的海蛰皮之类东西送给部队食用。如皋城西北的柴湾乡在苏中战役中曾是一师、六师野战医院驻地。乡里接到支前通知后，全乡近 2 千户人家，磨粉的磨粉、舂米的舂米，昼夜不歇，特别是入夜以后，家家户户点着豆油灯，灶上蒸笼里热气腾腾。蒸好的馒头一条条摊在席子上晾干，真是一片繁忙，胜似过年。那时候，群众对伤员特别照顾，经常为他们开“营养灶”。许多农民还把自己的口粮和烧草都节省下来供应部队。

在内线作战，老百姓自觉替部队封锁消息、递送情报。我军打下李堡，又悄悄绕过敌人封锁线直奔丁堰、林梓一线打交警总队。当时那一带已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老百姓得知自己的部队

苏

夜里打回来了，高兴得很，主动封锁消息，家家看好自己家的狗不让它乱吠。我军3万人马通过这一地区，神不知鬼不觉，敌人竟毫无觉察。我一师、六师、七纵队战士大部分是苏中子弟，熟悉地形，适应在水网地区作战，而与老百姓血肉相连、鱼水情深。我军许多侦察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庄户人子弟，差不多庄庄有熟人，对敌人一举一动了如指掌，相反地敌人却如掉入漆黑的山洞，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所以，我军主力虽只3万，但有群众的支援，有群众当耳目，确实起到了一以当十的作用。

随着自卫战争节节胜利，苏中各地区贯彻中央“五四指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白天打仗，夜晚分田”，前方打仗，后方分田，做到支前、土改生产三不误。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农民获得了土地，更加激发起他们支援自卫战争的积极性，自觉地把保田保家保卫胜利果实和自卫战争紧密结合起来。大批翻身农民报名参军，仅华中一分区就有2万多青年入伍，其中80%是翻身户，形成了人人忙支前、主力打胜仗的热潮。同时，华中一分区支前的粮食就有330多万石、烧草70多万担，单如皋丁东区支前的军鞋就有一万多双。我看过有些军鞋，做得都很精细，有的还绣花绣字，取名“光荣鞋”、“拥军鞋”，充分表达了妇女们对子弟兵的深厚情意。有趣的是，不少战士领到军鞋，舍不得马上穿，揣在怀里行军，这也同样表达了子弟兵的心情。

苏中战役是一场自卫反击战，也是一场全民皆兵、主力与地方部队相结合的人民战争。这场战争的胜利，戳穿了敌人所谓“收复苏北，易如反掌”的牛皮，使全国人民对于共产党军队战胜国民党军队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大家相信“我军必胜，蒋军必败”。苏中老百姓更是欢欣鼓舞，称赞我军勇敢顽强，称赞粟裕将军用兵如神。苏中战役使粟裕同志“常胜将军”的美名誉满全

国。苏中老百姓至今怀念着粟裕同志，许多老人还能唱“粟司令打仗仗仗胜”的歌子。

粟裕同志是苏中战役主要的组织者、指挥者。他撰写的《回忆苏中战役》一文，全面系统地总结了苏中战役的起因、发展过程和作战经验，是一篇弥足珍贵的我军军事史文献。

粟裕同志平时写作不多，不象陈毅同志出口成章，但我还记得他的一首《老兵乐》，特录下作为纪念：

“半世生涯戎马间，
征骑倥偬未下鞍。
爆炸轰鸣如击鼓，
枪弹呼啸若琴弹。”

第四节 更严峻的考验

(一)

诱敌何妨让两淮？
贼军到此好椎埋。
运河不是鸿沟界，
会见狂潮卷地来！

1946年9月，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在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鉴于国民党军队对华中的攻势不断加强，决定主动放弃华中分局和苏皖边区政府所在地两淮（淮安、淮阴），向北大踏步后退。陈毅同志的七言诗《让两淮》，记叙的就是这段史实。

为什么我华中野战军取得七战七捷的胜利后，开始大踏步后撤？这个疑团，当时不少同志包括有些领导同志的思想感情，一下子扭不过来，言谈之间，不时流露出留恋华中，不愿向山东境内转移的情绪。

华中地区是我军民浴血奋战多年，从日伪、顽固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保卫、巩固和建设华中解放区，是我苏皖边区广大军民的神圣职责。苏中战役中，我军给予国民党军队以沉重打击，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打出了“蒋必败，我必胜”的信心。而从全局来看，苏中七战七捷毕竟只是华中战场局部的胜利，它并没有从

整体上根本上改变解放战争初期敌强我弱、敌主动我被动、敌进攻我防御的基本态势。蒋介石、陈诚指挥50万大军直压华中，以夺取城市、交通要道为主要目标，并伺机与我主力决战，由于我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区是完全必要的。这有利于我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等待战略反攻条件的成熟。反之，如果我军分兵把守城市、交通要道，这也想要，那也舍不得丢，那恰恰正中敌人下怀，很可能被敌人各个击破。所以，华中分局经请示中央和华东局，最终决定放弃两淮，然后渐次向北撤退，与陈毅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汇合，把华中敌军引向山东，而后设法聚歼，以改变我军被动防御的局面。

(二)

华中分局随主力部队撤出两淮前夕，急电召我去接受新任务。

七纵队派出一支警卫部队，随我连夜坐卡车去分局机关。

车近淮阴，天已大亮，迎面碰上许多部队、民工拖着大量辎重，分流向涟水方向进发。淮阴城充满撤离前的紧张气氛。不远处炮声隆隆，估计前线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正加紧向两淮紧逼。

谭震林同志正焦灼地等待我。他和我是打完苏中战役分手的。他和粟裕同志率陶勇、王必成同志等主力部队，西援两淮，历尽艰辛自不待言。此刻，我从谭震林同志布满血丝的眼睛里看出，他大概已熬了好几个夜。是啊，时局紧急，许多“十万火急”的事情，正等着分局几位主要领导同志拿主意。

一见面，谭震林同志就告诉我，邓子恢、粟裕等同志都到基

层组织北撤准备工作，分局委托他向我布置任务。他说，淮阴、淮安外围阵地已被敌人占领，若再继续守城，将使我军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分局请示华东局并报中央，决定放弃两淮，将主力先撤到涟水、泗阳一线，在两淮外围打防御战，再歼灭一部分敌人。主力北上，华中大部分地区将成为敌后，敌人会疯狂“清剿”，推行顽化，斗争肯定十分残酷。

稍停片刻，他用征询的目光望着我说：“分局常委们讨论过几次，打算让你阿丕作为分局代表留在华中，领导敌后党政军工作，想听听你的意见——”

我多年在苏中工作，情况比较熟悉。今后华中特别是苏中将变成敌后，成为敌我争夺激烈的战场，我留在敌后坚持是比较合适的。于是，我向谭震林同志表示服从分局领导的决定。

谭震林同志表示宽慰，又告诉我，分局决定立即重建苏中，苏北等各区党委和行署，眼下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就是抓紧准备，坚持敌后斗争；同时向干部、群众讲清我军战略转移的意义，要求各地同志长期坚持原地斗争。

临别时，震林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向北走了，但还是要打回来的！留下的坛坛罐罐都交给你们了。”

所谓“坛坛罐罐”，除了留在敌后的部队、机关，还有沿海地区我军1万多名伤病员和来不及撤走的军需工厂，和大批粮食、布匹等物资。当时，安置好这样多伤员和军需物资，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从分局回来，急忙进行动员，制定疏散方案。后来，万余名伤病员由各地委分散安置，伤轻者组织归队或充实地方部队；重伤员安置在老百姓家中。工厂机器大部分原地坚壁；工人们组织游击队或北上或坚持原地斗争、坚持生产；大批粮食往北或从沿海地带转运，布匹则分散保管。

在组织疏散伤员、物资期间，我的思绪万端，不禁联想起

1935年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的往事。那也是秋色萧瑟的季节，树叶飒飒飘落，红军主力部队踏上了征途。我原来估计是随主力转移的，临行前接到组织上的命令，要我随项英和陈毅同志留在中央苏区打游击。当时我年轻，能随项、陈首长行动，心里挺高兴，并不感到局势的严峻。这次奉命留在华中坚持，我感到肩上压着千斤重担！我想，华中很快就要从和平环境转入敌后环境，广大干部群众能不能适应？主力部队一旦北撤，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会潮水般涌来，各地同志能不能坚持原地斗争？我沉思着，预感到留在华中坚持斗争的同志，将会面临一场十分严峻的考验。

(三)

9月中旬，新的苏中区党委、军区、行署建立，吉洛同志任区党委书记，管文蔚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贺希明同志为行署主任。根据斗争需要，南通、海门、启东、如东四县从华中一地委划出，组成九地委。另成立十地委，领导江南敌后斗争。原有地委领导班子重新作了调整，加强了各县的领导力量。

按照华中分局的意见，我不参加区党委，而以华中分局代表名义帮助区党委工作。这时，区党委根据分局指示，向各地委布置原地坚持任务：安排干部留在原地斗争、建立秘工系统、抢运物资等等。任务重、困难多、时间紧，工作安排得很仓促。而有些地区的“还乡团”、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使斗争变得错综复杂而又非常尖锐。

时值秋收，各县秋粮征收抢运任务相当繁重，北线部队需要大批军粮，分局急电催促北运，但敌人已大规模由南向北压来。怎么办？二地委各县紧急动员，发动群众船装车推，冒着风险往

建湖、盐城逐站转运，很快就把 37 万担军粮运了出去。一、九地委也有大批公粮需要突击抢运。由于敌人推进太快，眼见粮食无法全部运走，有的地区当机立断，立刻把公粮疏散给当地农民保管，以免落入敌人手中。

10 月中下旬，江都、高邮、秦潼、泰兴、泰州、靖江、南通、如皋、海安等县相继失守，国民党军队、还乡团疯狂对我苏中解放区实行“清剿”。敌强我弱，再加上我中心区干部、群众思想准备不足，以致出现了敌猖狂、我恐慌；敌进攻、我后退的严重局面。南部各县地方武装受到不小的损失，许多干部在敌人的“清剿”中壮烈牺牲，斗争形势越来越严峻了。

(四)

要不要坚持内线斗争？能不能在原地坚持斗争？这成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

开始，我们对中央提出的“坚持原地斗争”的指示，以及斗争的复杂性、残酷性、特殊性估计不足，总以为 8 年抗战都坚持过来了，国民党“清剿”又算得什么？可是，现实严酷地表明，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远比抗日战争时期困难得多，斗争尖锐、残酷得多。日军很凶残，但毕竟对中国情况不熟悉，语言不通，生活习惯有别，离开了汉奸、伪军，就成了聋子、瞎子、哑子。况且日伪兵力有限，一般只占据城市、集镇和交通要道，广大农村始终在我控制之中，广大群众同仇敌忾，向心力强，我们的活动余地大得很。再从战争的性质上分析，抗日战争是民族战争，全国人民的大多数甚至包括大资产阶级中的爱国人士无不站在抗日的立场上，日伪侵占我广袤国土，很难找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基础，就是汉奸、伪军，死心塌地为主子卖命的毕竟也是少数。而

在解放战争之初，抗战时期的一些条件转化了、消失了、不存在了。战争的性质从民族战争转变为阶级战争，不少原先拥护抗日的地主倒向国民党政权，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阶级关系尖锐对立起来，国民党在农村中依然有其社会基础。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也不同于日伪军，特别是由恶霸地主、逃亡人员、地痞流氓组成的还乡团对我威胁更大。他们与国民党军队紧密勾结，不仅占领城市、集镇、交通要道，而且直接与我基层政权争夺农村阵地。他们又熟门熟路，哪里有条河、哪里有座桥，谁家当过共产党干部、哪家住过新四军、谁家土改分过多少地，无不一清二楚。这一切客观条件的变化，使得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后斗争格外艰难，比我们原先预想的更困难，更残酷、更尖锐复杂。

华中一地委机关被压缩在南线(泰兴、泰州、靖江、如皋)狭小地区，四周敌人逐渐收缩，处境危殆。我和吉洛、管文蔚、陈时夫同志研究后，同意一地委机关和分区部队转移到外线，最好移至如皋、海安以东地区。但要求这些县要有一定数量的干部留下坚持；各县团留三五个连武装在原地打游击。钟民等同志遂于11月中旬率领一地委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部分部队，转移到两台(东台、台北)地区。不久，在南线成立军政党委员会，由许家屯、汪海粟、柴荣生、谢克东等同志组成，许家屯同志为书记。此外，南线还留有一分区特务团1个营和如皋、泰县各留下的3个连坚持内线作战。许家屯同志带领1个特务营，坚持原地斗争。他们在敌后来回穿插，昼伏夜出，声东击西，不断打击敌人。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他们坚持了3个月原地斗争，创造了不少坚持敌后斗争的宝贵经验。他们英勇无畏的气概，坚定不移的信念，巧妙机智的斗争艺术，是可歌可颂的。

华中二地委所辖各县情况不好。江都、溱潼、高邮等县我方

阵地基本丢失，干部和县团武装被敌人“挤”出原地，干部、党员中发生严重恐慌。针对消沉、悲观、埋怨、急躁种种情绪，二地委于11月中旬在兴化县吉家舍召开了地委扩大会议。我从七纵队驻地绕道赶去出席会议。惠浴宇、陈扬、俞铭璜等地委负责同志在会上批评了某些干部退却逃跑的行为，要求各县抓紧敌人北上的时机，组织精干武装，回到原地，坚持斗争。

我着重讲坚持原地斗争的重要意义，要求各县同志“做光荣的战士，不做可耻的逃兵”，要坚定地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做到“生根立足”，坚持“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

“生根立足”、“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是基层干部提出来的，比较切合那时的客观斗争环境需要，有利于鼓励干部坚持原地斗争，也有利于鼓舞群众自卫斗争的信心。我向到会干部再三分析斗争形势，阐明坚持敌后斗争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了坚持斗争就是胜利的口号。这个谈话一传达，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当时，敌人利用我主力北撤，散布“新四军到了黄河以北，不可能再回来”等谣言，以涣散广大群众的斗志。如果我方干部和地方武装能坚持原地斗争，群众将会受到莫大的鼓舞。

实践表明，如果干部充分依靠群众，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还是能坚持原地斗争的。黄桥镇在内战爆发以后，曾两度陷入敌手。1946年7月，国民党军队伙同300多名“还乡团”占领黄桥，黄桥镇及附近10个乡，没有一个人出来为敌人办事，使顽政权始终建立不起来。青壮年跑到乡下参加游击队；商人们虽被迫开门营业，但把货物藏起来，街面冷冷清清。敌人知道黄桥镇妇女已组织起来，曾为新四军洗过衣服，硬逼她们也为国民党伤兵洗衣服。然而，在妇女会领导下，大家都不去，逼得没法，她们集体逃到乡下去了。特务让孩子们唱歌，有的孩子就唱《黄桥

烧饼歌》。歌中有这样的唱词：“反共就是准汉奸”，气得特务发抖。“还乡团”头子要拆民主人士朱履先先生住宅。朱老先生爱憎分明，他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跟我们新四军友好合作；而且在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占领黄桥之后，他住在地窖中，和群众一起坚持斗争，就是不肯向国民党当局低头。当地群众钦佩朱老先生的高风亮节，自发串连起来，卫护朱家住宅，迫使敌人只得罢手。8月，苏中战役打到黄桥附近，黄桥人民抑制不住内心喜悦，帮助新四军、游击队搜索敌人，把还乡团从躲着的棺材里、屋顶上、夹街里、防空洞里搜出来。9月，国民党军队再度占领黄桥，沿途遭到游击队不断袭击。从姚家岱到黄桥镇只有20里，敌人却走了四五天。进入黄桥镇街，家家闭户，冷冷清清，只有两家跟国民党有联系的店铺挂出“欢迎”旗帜，但刚挂出不久，就被群众扯掉了。敌人将黄桥及附近农村划为顽化“实验区”，派了大批特务、政工人员到黄桥推行顽化。由于黄桥是陈毅、粟裕同志亲自指挥“黄桥决战”的地方，是苏中人民胜利的象征，敌人想扯下这面光荣的旗帜。但黄桥人民决不向敌人屈服，黄桥游击队始终在附近乡村坚持与敌人斗争，为苏中军民树立了好榜样。

当时，我们正是从黄桥斗争中，得出坚持内线斗争不仅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的结论，进而对各县干部、党员发出了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生根立足”的号召。

二地委吉家舍会议以后，江都、高邮等县组织了南下武装工作队，穿插到原地坚持斗争，恢复“阵地”，但是损失很大。几次打回去，又被敌人“挤”出来，经过反复斗争，直至1947年下半年才打开局面。在恢复“阵地”的过程中，周山、李健等同志英勇牺牲，我们付出了血的代价。可见，要恢复一块“阵地”，是多么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在原地牢牢站住了脚。

(五)

国民党以重兵占领淮阴、淮安后，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急于寻求与我华中野战军决战。李默庵亲率3个整编师，秉承徐州绥靖公署旨意，大举向北推进。

这时，我随七纵队行动，奉命在通榆公路上阻击敌人。我们七纵队凭借河岸地形，且战且退；地方部队不断骚扰敌人，迫使李默庵每占领一块地方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到11月下旬，敌人占领了安丰、梁垛、东台、草埕、白驹、刘庄，又向盐城扑来。

我们决定在盐城南的伍佑再组织一次大的阻击战。

时值寒冬，田野一片荒芜，战士们在河岸突兀的堤墙上抢筑工事，隔河不远处敌人晃动的影子历历可见。12月上旬，敌人开始向伍佑我军阵地逼近。遭到我军猛烈阻击后，敌人集中炮火和数路步兵，在长达12华里的河岸上全面强攻，战斗十分激烈。敌人有两个师（4万人）向我阵地轮番进攻，有几路敌人已突破前沿阵地，但很快又被我组织力量压过河去。经过几天阻击，我军伤亡也很大。最后，我们达到了阻击目的，才决定逐步向后撤退。

这时，分局发来了电报，说是涟水、沐阳防线战事紧张并质问我们为何放弃伍佑，谁负责？我当时担任军政党委员会书记、华中分局代表。伍佑一仗，是我们共同研究决定，责成管文蔚、吉洛、胡炳云同志统一指挥的。我认为，这一仗打得不错，可如今分局来电质问的不是战斗情况，而是伍佑弃守问题。纵队几位领导同志一起讨论了一番，认为这个责任不能由个人来负。敌强我弱，硬顶是顶不住的，撤退是可以的。

不久，分局电令我们率部退守盐城，又命陶勇同志率一师

南下，协同保卫盐城。接到命令，我们立即加固盐城防御工事。不久，陶勇等同志率一师赶到，皮定钧旅也赶来了。陶勇同志告诉我，分局和华野司令部正在研究下一步作战方案，命令一师与七纵坚守盐城，掩护主力北撤。一师南下，加强了我方防备力量，但敌人也调来整编二十五师，加强进攻势头，这一仗打得很艰苦。

盐城保卫战是成功的，多次打退来犯之敌。正当两军暂时对峙之际，分局又来电命令解除盐城防务，部队向北撤退，并指令我七纵队继续阻击东路敌人；一师、皮旅火速北上，向宿北、新沂地区靠拢。原来，华野和陈毅同志率领的山东野战军汇合，正准备筹划宿北战役。

宿北战役，我军歼灭敌整编六十九师等2万1千余人，毙敌师长戴之奇，是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协同作战取得的第一个胜利，扭转了北撤以来的被动局面。陈毅同志曾于1946年12月题写《宿北大捷》一诗纪其事“敌到运河曲，聚歼夫何疑？试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宿北大捷后，华野主力续续北上，越过陇海路进入山东。稍后，转战鲁南，又歼敌整编二十六师和整编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

秋去冬来，华野主力从退出两淮，到全部退入山东，前后经历3个多月时间。从战局上看比较被动，华野主力最后退入山东，与山东野战军汇合，是必要的。这不仅扩大了我军活动区域，而且山区地形使敌人的机械化装备失去效用。我华东地区两支主力汇合，也有利于机动用兵，围歼敌人。电影《南征北战》和小说《红日》，对此都有细致的描述，这里就不多记述了。

(六)

七纵队与一师、皮旅分手后，继续担任通榆线阻击任务，一直退至阜宁。这时，陈毅、粟裕同志电示七纵，解除阻击任务。长达3个多月的阻击，七纵队减员很多，战士们满脸硝烟、神色疲惫，不少同志还带有轻伤，可是大家都为完成了阻击任务而感到高兴。

部队撤到阜宁县以东的射阳河南岸休整。七纵队党委和苏中区党委联合召开了几次会，总结北撤以来的工作。我们认真学习了朱德总司令1947年元旦发表的《新年祝词》，围绕“在一切被占区，都要努力普遍发展游击战，这对于主力作战和收复失地，都有极大的意义”这一主旨展开讨论。考虑到分局交给七纵队坚持苏中敌后斗争的任务，我们决定积极组织力量支持苏中各地党组织，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在休整期间，接到整编命令。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七纵队改为十一纵队兼苏中军区，管文蔚同志兼司令员，吉洛同志兼政委。新组建十二纵队，兼苏北军区，由淮海地区部分地方武装组成，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荻秋任政委，在淮海、盐阜地区开展敌后斗争。

整编完毕，陈、粟首长命令十一纵队返回苏中地区开辟敌后战场，同地方武装一起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兵力，配合山东、中原地区正面战场作战。十一纵队指战员大多是苏中入伍的，听到部队要返回老家，个个欢呼雀跃。经过20天左右的休整，战士们重振精神，准备南下。

1947年1月下旬的某夜，我们沿着海边急行军，要在黎明前越过敌人封锁线，进入台北。三九严寒，旷野寂寥，战士们急

促行进，有点象古书上所形容的“脚枚疾走”的味道。我们 3500 人悄然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穿插，人人紧跟队伍，连咳嗽都不出声，耳边只听见海堤外哗哗的海浪撞击声和远村偶然飘来的犬吠声。间或，行军队伍里发出几声轻微的击掌声，那是部队联络的信号，通知后续部队迅速跟上。

通榆公路两侧的村庄已被国民党军队和敌人土杂武装控制，沿海一带村庄稀少，敌人守备较松。途中我们也曾发现小股敌人，都主动避开，以免过早暴露我军意图。

天色泛出鱼肚白，我们顺利进入台北县境，暂时聚集在台北龙王庙附近。不久，部队便与集中在小海一带的各分区地方武装会师，开始了苏中敌后的恢复工作，准备展开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第五节 坚持长期敌后斗争

(一)

我随华野十一纵队辗转回到苏中东台和台北根据地，正遇上国民党军队第二次对苏中大“扫荡”、大“清剿”。

第一次大规模“清剿”是在1946年初冬。那时国民党以优势兵力攻占我苏中各城镇，并利用战略进攻的空隙，在华中二分区沿运河地带进行“驻扎扫荡”；在华中一、九分区，强占交通线，突击构筑碉堡、据点，在点线附近进行“梳篦清剿”，与我展开“面”的争夺。

涟水、盐城、宿北战役展开以后，国民党军队抽调兵力北上增援，苏中出现了短时间相对的缓和。我华中一、二、九分区抓紧时间，准备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待我华野主力全部撤入山东，北线战事停息，国民党军队便第二次对苏中进行大规模“扫荡”、“清剿”。我十一纵队和区党委机关，正是在这困难时期重返苏中，直接领导敌后斗争的。

十一纵队回到苏中，同志们都十分高兴。区党委书记吉洛同志传达了华野首长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战场的指示，要求各地委、县委认真总结前一阶段敌后斗争的工作，重整旗鼓，粉碎敌人的“清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以配合我军在山东、中原正面战场对敌作战。我和管文蔚、吉洛、胡炳云同志商量，决定针对

敌人在苏中北部相对薄弱的情况，让十一纵队和各分区部队以及各县、区地方武装在华中一、九分区展开积极的作战行动。

经过3个多月的阻击战，我十一纵队只有消耗，很少缴获和兵源补充，兵员和弹药严重不足，许多战士身背双枪，携带的子弹却只有二三十发，每门炮平均不过二三发炮弹。因此，我们刚回到苏中，只能避强打弱，积小胜为大胜，向敌人薄弱点实施突击，逐渐改变敌我兵力对比，同时在战斗中解决给养和兵员补充，增强部队的战斗力。

1947年2月，我十一纵在分区地方部队配合下，打响了苏中敌后斗争的枪声。2月1日，发起沈灶战斗，歼敌4个连。2月中旬，又进行了拼茶伏击战、角斜攻坚战、杨家庄出击战、马家坝阻击战，收复了西渣、小海和大中集等据点。一分区地方武装在吴泳湘、钟民、许家屯等同志率领下，于夹港口歼敌1个连，收复了营溪、古溪、东西燕庄等据点；九分区地方武装在梁灵光、周一峰等同志领导下，以如东地区为依托，也不断开展对敌作战。

蒋介石政府一贯搞舆论欺骗，向外大肆鼓吹“苏北问题”已经解决，“新四军已北退山东”。眼下，我十一纵不断向敌人发起攻势，虽歼敌不多，但戳穿了蒋介石的牛皮，使他感到震惊。于是，敌徐州行辕主任顾祝同连连下令，狂妄宣称要将我十一纵队歼灭，并派原驻陇海线东端之郝鹏举部及敌四师五十九旅赴苏中，加紧“清剿”。

我十一纵队和地方武装在敌后不断打击敌人，给敌后广大群众带来了希望，老百姓纷纷传递“新四军主力回来啦”、“要大反攻啦”的消息，大大增强了群众自卫反顽的信心。

沈灶、角斜、拼茶等一系列据点被拔除，扫清了我东台、台北根据地门口的障碍，成了我十一纵立足的“地盘”，也使各分区有了较为稳定的后方。

(二)

我十一纵队在敌后坚持公开的武装战斗，拖住约5万之众的敌人兵力，既有力地支援了中原、山东正面战场的我军作战，也增加了我在苏中敌后坚持的困难。敌人更加疯狂对我苏中南部地区“清剿”，对我北部地区“扫荡”。我华中一分区南线所属泰兴团及部分地区武装遭敌袭击，泰兴县委书记叶梯青同志牺牲，县长张鹏举同志被俘后也慷慨就义。为保存实力，我们不得不把南线一部分武装撤回北线休整；华中九分区南部也千方百计避免损失。

我内线坚持斗争受损原因是多方面的，敌强我弱是基本的因素。但从主观上分析，我内线坚持也存在缺陷，即较重视公开的武装斗争，忽视对群众进行反顽自卫斗争的领导。相反，敌人在大规模军事“清剿”的同时，积极推行顽化，建立伪政权、搞联防、设保甲、编户口、征赋税、抓壮丁，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我基层政权，割断群众与我方干部的联系。由于敌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与我争夺广大农村及群众，致使我敌后坚持斗争更为艰苦，可惜我们有些同志对此估计不足。

自从苏中自卫战争打响以后，华中分局、苏中区党委一再号召干部党员坚持原地斗争，“乡不离乡，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但是大多数干部还是被敌人“挤”出原地，也有一些干部躲藏起来，不敢出面领导斗争，使内线不少地区党的基层组织陷于瘫痪。这种局面如不尽快扭转，我在内线就不可能真正站住脚。

面对这一新情况，吉洛、管文蔚同志和我多次召开干部会议，分析形势，要求各级干部树立长期坚持斗争的思想。我们指出，苏中群众经过国民党军队、地主“还乡团”的烧杀抢掠，已从

对敌人的害怕逐渐转向对敌人的仇恨，不少地区已开始出现自发性的群众反顽捐、反烧杀、反倒租、反强奸的事件。这说明群众已经看清国民党、“还乡团”的真面目，也说明广大群众迫切需要我们振奋精神，原地立足，领导他们进行自卫斗争。我们还指出，由于国民党军队对苏中实行全面占领，战线拉长，分兵把守，机动兵力已不多，许多地区出现了空隙，一般都以土顽把守，而土顽害怕我游击队、武工队打击，常常是集中住在大村庄据点里，这很有利于我们的干部潜回原地隐蔽，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

那段时间，我们也很注意宣传和表彰自卫战争中涌现的英雄模范，用以鼓舞干部群众的斗志。各地委着重宣传了通如线上威震敌胆的郭海波游击队，女英雄高凤英、李兰英，农民英雄“林大个”，战斗模范赵成松等人的事迹，特别是泰州双堡乡妇联主任高凤英视死如归的英勇事迹。延安的《解放日报》还发表社论，把苏中的高凤英和晋绥的刘胡兰作为全国妇女学习的榜样，这是我们苏中广大干部的光荣和骄傲。

高凤英同志是姜堰西郊石家埭的渔家女。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反霸反奸斗争中，她勇敢地与恶霸、汉奸斗争，赢得乡亲们的信任，担任了双堡乡妇联主任。自卫战争打响后，她说服了丈夫，随区游击队行动，与“还乡团”、保安团周旋，每次都冲锋在前，杀死了好几个匪徒。“还乡团”对她恨之入骨，悬赏捉拿高凤英。随着局势恶化，组织上考虑到她是女同志，安排她撤到北线去，但高凤英坚决要求留在内线斗争。1947年年初，区游击队遭到敌人围袭，高凤英不幸被捕。在敌人的牢房里，她鼓励战友们不向敌人投降。敌人欺侮她是个女的，要她自首。高凤英严词拒绝，受尽酷刑，但始终保持革命气节，直至遭到敌人杀害。高凤英宁死不屈的精神，是苏中人民坚持敌后斗争的象征。

在宣传英雄、模范的过程中，各县对解放战争以来牺牲的同

志逐个立传，还组织各类纪念活动，以激发活着的同志，永远记住烈士的名字和事迹，为牺牲者报仇。各地还广泛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坚持斗争——硬骨头；退却逃跑——软骨头；自首投降——没骨头。”

各地干部经过学习，增强了回原地坚持斗争的信心，有的组成武装小组，有的乔装打扮，潜回内线开展斗争。区党委还从部队和山东调回一些原地方干部，作为骨干力量，派回内线坚持；还有些打散流到江南、上海等地隐蔽的同志，接到组织的指示，也悄悄回到了苏中。这样，骨干力量逐步增强，坚持内线斗争就有了组织保证。

在斗争的方法上，区党委根据客观情况变化，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除在有条件地区继续坚持公开的武装斗争外，一般地区都应注意进行各类辅助性斗争，秘密的或公开的、合法的或“非法”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用综合性的斗争来反对敌人的综合性进攻，打击土顽势力，摧毁顽基层政权，为我们坚持敌后斗争排除障碍。

(三)

敌人大举进犯苏中地区，制造白色恐怖，妄图采用高压手段压服苏中人民。但是，恐吓、屠杀毕竟不能长久维持统治。苏中自大革命时代起就受过革命的洗礼，抗日战争期间又是我党领导的根据地，我党和新四军在人民心中是扎了根的。敌人的暴行不可能离间我党与群众的血肉关系，而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

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所到之处，地主恶霸疯狂地对我基本群众实行“反攻倒算”。姜南区三太乡有个朱姓恶霸地主，一夜

之间将我方小组长以上的乡、村干部、土改积极分子 108 人抓起来，设堂拷打，恶狠狠地“清算”，当夜活埋和枪杀了其中 28 人。黄桥地区被视为“重灾区”，该区浩堡乡地主“还乡团”和特工人员百般迫害我干部、军烈属，一次就纵火烧掉 61 户居民住房，还杀害了 6 户男女老少。敌人杀害我干部、群众的手段是极其残忍的，砍头、挖心、腰斩、挖眼、活埋等，无所不用其极。有的恶霸地主把土改积极分子开膛挖心供祭祖先。短短几个月，仅华中一分区就有 2 万多名干部、群众、党员被杀害。我走过不少村庄，看见许多妇女披麻戴孝，有的村庄竟成了寡妇村。群众哭着向我们诉说敌人的暴行，我按捺不住满腔仇恨，向大家说：“这一笔笔血债一定要向敌人讨还，只要坚持斗争，迟早总会报仇雪恨的。”

在血腥镇压的同时，敌人还积极推行顽化。比如宝应县，敌人并乡编保甲“以三乡五乡并为一乡”，由特务化的“服务队”挨户编查保甲，保甲编好后发门牌；每保派 50 人去受训，准备抽壮丁；派特务任乡保指导员，还用写信方式威胁或扣压家属为人质等办法逼我干部“自首”。在经济上实行“倒田复租”，并强迫老百姓交纳“户口捐”、“田亩捐”、“慰劳捐”、“月捐”、“生意捐”、“自新捐”、“驴牛捐”等等，进行敲骨吸髓般的剥削。

国民党军队每一次大规模军事“扫荡”和“清剿”，群众所遭受的牺牲和损失都很大。大批粮食、财产被抢，许多农舍被焚，大片良田受践踏，无数妇女遭蹂躏，儿童遭杀害。国民党军队起初还装腔作势，到处挂“青天白日”旗，以标榜其“正统”、“合法”，污蔑新四军、共产党为“匪”，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恰说明他们是真正的土匪、强盗。当时的民歌这样唱道：

“说‘中央’，恨‘中央’，

‘中央’一到民遭殃，

奸淫还比鬼子坏，

烧杀抢掠胜‘二黄’（指伪军）。”

群众纷纷翘首向北盼望，希望新四军早点打回来，听到新四军在山东、苏北地区不断打胜仗，无不拍手称快。就连原先对新四军、共产党持中立态度的一些土绅、地主、富农，也因饱尝“刮民党”、“老中央”的欺凌、压榨而有很大转变。他们虽不喜欢共产党分田分地，但共产党做事一举一动都有政策，都讲道理，还有统一战线，不象国民党对他们如狼入鸡群，胡作非为，因而他们也希望新四军早日打回来。当时，某县有个地主写信给我干部，说现在干部们不在乡里，土改分配的土地没人耕种，只得先“收回”代种，等新四军回来，一定将土地奉还佃农，并希望新四军早点打回来。这封信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说明有些地主也深知国民党、“还乡团”的胡作非为必然不能长久，将来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因此写信向我干部打招呼。“得民心者得天下”，自古皆然，这算是又一个例证吧。

海安一带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也是盼望新四军早日打回来的。这首民谣唱道：

“蚕豆开花，

干部归家；

蚕豆挂排，

新四军要来；

蚕头结荚儿，

还乡团翘壳儿。”（意为死亡）

（四）

这时，我干部及武装工作队纷纷潜入内线联系群众，建立秘

密组织。许多地区的群众虽不象敌人刚占领时那样不敢与我方接触，却仍然耽心我们住不长。我方干部反复表明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决心，并注意把斗争方式方法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串连群众成立半公开的灰色团体，以便在“合法”的外衣保护下开展斗争。

当然，恢复工作常常伴着风险，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同志，白天蜷伏在草荡里，等到天黑才摸进村里找可靠的群众开会。有时敌人封锁严密，几天几夜无法进村，他们就挖芦根充饥，千方百计坚守阵地，逐渐在群众中“生根立足”。群众见干部们决心坚守原地，也都舍命加以保护。九分区如东县的干部，创造出“天天与群众碰头”、“夜夜与群众隔窗谈心”的办法，把群众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逐步打开了局面。

为保护在内线坚持斗争的同志，区党委加强了对“两面政权”的控制和争取。警告一些顽乡、保长，不得向“洋顽”（蒋军）报告我干部行踪；如果干部出了事，必将严惩凶手。对少数“自首”人员，各地党组织也采取挽救教育态度，使有些向顽政权“自首”的人员充当我在敌人营垒中的内应。由于区党委采取了“以便衣对便衣”、“以综合性斗争对付顽综合性进攻的”策略，我内线部分地区逐渐恢复和发展了基层政权，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建立了党支部，有些村庄和区、乡开始转为受我控制。与此同时，我外线武装不断出击，内线武装不断穿插，苏中敌后斗争的局势便开始向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了。

1947年下半年，苏中各地区群众性反顽斗争蓬勃兴起，兴化县中堡区群众反顽斗争尤其令人振奋。

中堡区是水网区，位于下官河、中官河之间，敌人刚占领中堡镇，全区即形成分割局面。干部返乡后，注意稳定群众情绪，恢复了一些乡的基层组织，很快带领群众掀起“反顽捐”、“反倒

租”、“反碉堡”、“反抽丁”、“反强奸”的斗争。因为，这些斗争都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比较容易发动。

反顽捐斗争开始，我方干部就指导群众采用逃、躲的办法抗税，家家关门落锁不见面。不久，在干部暗地组织下，群众又齐心采取拖、挤的方法，女人说男人不在家；有的则将粮食藏起来哭穷；这村推那村，这家推那家，互相推来推去。敌人恼羞成怒，见人就打，我方民兵联防队则在外围打冷枪扰乱、袭击。遇到顽政权收捐，干部就组织群众抵制。如崔垛的“还乡团”到冯家垛开“起捐会”，到会的全是老婆婆、小孩子、老头子。一开会，老头子叹气，老婆婆吵闹，小孩子啼哭，家家喊没有吃的，弄得“还乡团”束手无策。这时，我秘密武装就在村外打枪，群众听见枪声，趁机一哄而散，“起捐会”终于不了了之。

反倒租斗争——地主、“还乡团”回到家就向农民“反攻倒算”，我干部组织群众警告地主，说新四军就要回来，还是为自己留条后路为好。兴化县和中堡镇的地主催租，群众诉苦说眼下没有东西交租，待秋稻登场再交吧，先打个欠条如何？地主见群众心齐，又怕新四军回来，只得把欠条收下，吃了一顿“空心汤团”。

反碉堡斗争——敌人想在中堡镇7天之内修好碉堡，结果应差的全是老头子，拖拖拉拉搞了半个多月还砌不起来。砌的时候偷工减料，或者白天砌晚上拆，弄得敌人束手无策。

反抽丁斗争——群众把反抽丁与反编保甲斗争结合起来，涂门牌，烧门牌，谎报年龄，大报老，少报小，不让顽政权把户口册子编起来。青壮年经常躲在外面不回家，抓丁经常落空。

这些斗争形式层出不穷，使敌人穷于应付。

在组织精干秘密武装的基础上，我所控制的地区逐渐恢复了民兵组织，开展了放哨、锄奸、带路、送情报等活动。民兵组织

协助我武工队、游击队镇压敌人的密探，通知群众“跑反”、打冷枪、抽桥断路，四处骚扰下乡抢粮的敌人。苏中群众有抗战时期反“清乡”、“反扫荡”的经验，对付敌人很有办法。紫石县（现海安县）曲胡乡民兵，在反顽游击战中开展了“十大运动”：一叫“抽桥运动”，破坏桥梁，还在河里打暗坝阻止敌船行驶；二叫“挖电话杆子运动”，把敌特、秘探称为“电话杆子”，由武工队锄奸；三叫“跑反运动”，敌人扫荡时，结伴跑进湖荡、外乡；四叫“五藏运动”，敌人来时把粮食、锅、船、麻袋、箩筐都藏起来；五叫“反顽一条心运动”，把各阶层人士团结起来，参加各项反顽活动；六叫“铁番瓜开花运动”，民兵大摆地雷阵；七叫“反正运动”，组织顽匪家属写信劝降、劝反，投奔光明；八叫“天罗地网运动”，组织群众参加治安联防；九叫“打冷枪运动”；十叫“立功运动”，即鼓励群众积极参加反顽斗争。这在反顽自卫斗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华中二分区江高宝各县军民，把策反顽方人员的工作叫做“红黑点运动”，做一件好事记一个红点，做一件坏事记一个黑点，黑点越多罪恶越大，到时候武工队就会来算总帐。当时，有些地区反顽斗争声势很大，如如皋江安区5千群众高举火把游行，反对国民党军队、顽政权“割青”，石庄区发动万人集会宣誓反“割青”，都曾引起极大的震动。

苏中群众自觉组织起来，跟国民党军队、顽政权作斗争，使坚持内线斗争的同志真正得以在当地“生根立足”。许多地区表面上是顽政权控制，实际上已成为我方的游击区。当时我们还学习华北的经验，成立“武装区公所”，领导群众进行反顽斗争。

这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陈毅、粟裕同志来电，命令十一纵在苏中敌后加强攻势，以配合山东战场我军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根据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命令和苏中敌情，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决定发起李堡战役，先派出三十一旅九十三团深

入九分区通如海启地区佯攻，配合十一纵主力攻打李堡。

1947年4月，十一纵打响了李堡战斗。李堡是苏中南北部相连接的会合点，这个重镇一直是敌我争夺的要地。当时驻有敌整编四十九师七十九旅1个团及“还乡团”900余人。李堡据点处在敌人的防线的突出地带，扼住了我南北联系，打下李堡，有利于我军向敌占区腹地深入。为了打好这一仗，部队进行了长达半个月的攻坚作战训练，多次深入前沿侦察。战斗打响以后，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进展较顺利，一天就打下李堡，随后扩大战果，收复了李堡周围的大小据点30多个，歼敌近3千人。我一、九两分区的部队也乘胜追击，收复了曹家埠、丰利镇、万家码头等18个据点。华中二分区各部队也插入江都、高邮地区，收复了小纪、樊川、周家庄等据点。李堡战役的胜利，初步扭转了苏中敌后敌进我退的局面，拖住了20个团的敌人兵力无法北上增援山东。

敌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李默庵不甘心失败，命令王铁汉集中几个团的兵力，采取奔袭的办法，企图将我苏中区党委机关和主力部队全部吃掉。我和管文蔚、吉洛、胡炳云等同志得知敌人将偷袭我们机关时，决定将计就计，由胡炳云同志率领三十一旅深入南通地区，选择一二个对敌威胁较大的据点来打，把北上之敌往回拖；另派三十二旅九十五团直插泰兴以东的黄桥地区，和一分区地方武装会合，开展游击活动，扰乱、破坏敌人的后方基地。当时有个别同志担心这样的打法有点冒险。我和吉洛同志再三考虑，认为采取高度机动回旋的战术，出敌不意，插入敌后，调动敌人，符合我军一贯的游击战原则，决定按计划行动。随后，区党委机关转移到东台以东的大沟子一带。

王铁汉率部赶到大桥扑了空，正在疑虑之中，接到新四军大批人马袭击三余镇的情报，才发觉上了当。当他得知我十一纵

主要兵力不在滨海大桥根据地，而在南通一带，又急忙调头往南，企图截断我军北返道路，并将我压到北临大海、南濒长江的启东、海门这一块三角地带。

我们立即命令胡炳云同志率三十一旅迅速北返，争取抢在敌人“封口”之前回到苏中区党委所在地大沟子一带。

三十一旅迅速结束三余镇战斗之后，直奔北坎附近长沙，尔后沿范公堤西进。范公堤是沿海地区防海潮的一条大堤，始建于北宋天圣4年，采纳了当时在今东台作盐税官的范仲淹的建议修筑的，所以人们称之为“范公堤”。接到三十一旅来电，得知部队已经沿范公堤向西返回，但不久区党委与三十一旅的联系又中断了。

我们焦急地等了足足2天，直到胡炳云同志率三十一旅安全返回，我们才释然。原来，大批敌人早于我军控制了范公堤各要口，旅党委当即决定在距敌稍远的海滩上强行越过封锁线。部队到小洋口，在群众的帮助下，借着月光越过落潮后的海滩。这是很危险的夜行军，必须踡过3道大海汉，既要在天亮前踡过去，又要赶在涨潮前。部队渡过3道大海汉途中，旅部电台不慎掉到海里，失去了与区党委的联系。但部队还是赶到琼港，回到了根据地，敌人的梦想被粉碎了。

这一仗，共歼敌千余人，我亦伤亡200多人。陈毅、粟裕同志接到战报，对我出奇制胜的行动予以通报表扬。

与此同时，三十二旅九十五团在一分区南线的泰兴县境内，与一分区地方部队协同作战，也取得一定胜利。地方部队全歼顽泰兴机动大队，毙俘大队长以下250余人，缴获轻机枪9挺，受到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至此，李默庵被迫放弃了扫荡两台、袭击区党委机关的计划。我十一纵自返回苏中，经过7个月时间，打开了苏中敌后

坚持斗争的局面。

(五)

1947年夏，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和陈谢两支大军也相机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与刘邓大军互为犄角，揭开了中原逐鹿的序幕。

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为适应全国战局的变化，根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指示，重新确定了苏中敌后斗争的方针，就是在继续歼灭敌有生力量的基础上，相机夺取中小城镇，控制交通干线，逐步巩固扩大根据地，为转入反攻创造条件。

我和区党委、纵队几位负责同志分析了当时情况，认为我苏中反攻的条件还未成熟。敌人为了霸占苏中，把原拟调往东北战场的整编四十九师留下，又将江南的整编二十一师再次急调苏中加强防务。因此就苏中这一局部来看，仍处于战略反攻的前夜，敌“清剿”和我反“清剿”的斗争还会反复出现，并持续一个时期。只有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有条件逐步转向全面反攻。

苏中区党委和十一纵队司令部，对此进行了反复研究，针对敌人力量加强和我力量相对弱小的情况，许多同志认为有必要把十一纵和苏北的十二纵联合起来开展较大的军事攻势，在整个华中敌后形成我较强的机动兵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我们的这一大胆设想正符合华东局、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的战略意图。华东局认为，打破苏中、苏北战略区界限，采取联合行动，将为华中反攻创造有利的条件。很快，我们和十二纵司令陈庆先

和政委曹荻秋等负责同志取得联系，双方共同拟订了攻打盐城的计划。

盐城是苏中、苏北两战略区的枢纽。1946年底，盐城保卫战结束，我军主动弃守，盐城遂成为华东敌人联勤总部在苏北的重要补给基地之一，储备着大量武器、弹药、被服、食品和运载器具。盐城当时由郝鹏举部7000余人防守，另有“还乡团”800余人，环城四周和城墙上筑有坚固的工事。

敌后部队善于打游击战、运动战和防御战，而对攻坚战特别是对中等以上城市攻坚战还缺乏经验。我们商量的结果是由十一纵担任主攻，因为十一纵经过李堡这一仗，有了点攻坚作战的经验。我们组织十一纵的团、营、连各级指挥员实地侦察地形，对各种战斗动作、各级战斗指挥反复进行演习。

8月中旬，盐城战役开始了，部队先扫清外围伍佑、卞仓等敌人据点，紧接着分别从南门、东门两个方向发起攻击，并派一部集结于柏家巷、伍佑、刘家坎一线，阻击由刘家庄方向北援之敌。

守城敌人把四周从串场河通往城内的所有桥梁全部毁坏、拆除，这给我军的进攻带来不少困难。我盐城战役联合指挥部及时组织了苏中、苏北、十一纵、十二纵等武装力量借着夜空的星光，突击架桥，同时交叉火力，严密封锁河对岸敌之火力。翌日凌晨，突击部队踏着临时架起的浮桥相继突破敌人对河岸的封锁，强渡成功，一鼓作气向城内插去。眼见抵抗无望，敌师长李铁民和参谋长韩尹民便下令投降。至此，盐城战役胜利结束，歼敌四十二集团军郝鹏举部第一师全部，生俘师长李铁民以下官兵5千余人，缴获大量轻重武器和大量辎重。这批军用物资，装备了华中敌后的部队，直到渡江战役结束还未消耗完。战役结束，开会庆功，最先攻进城内的九十二团被评为“叶挺团”。

郝鹏举原是西北军军官，手下约有 25000 兵马。此人惯于投机，早先投降日军当汉奸，日本鬼子一投降，他又玩花招，于 1946 年 1 月率部来我解放区莒南县一带整编。陈毅同志深知其人，多次对党内同志说，设法稳住郝鹏举所部，使这支杂牌军与蒋介石的嫡系对立，能起到分化反动营垒的作用，有利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但对这支反复无常的杂牌军，我们必须高度警惕，以防不测。

当时，郝鹏举所部，经过莒南整编，已公开打出淮海民主联军的旗号，接受我军领导。我军应郝鹏举请求，派出一批政工人员，在该部帮助工作。可是，郝鹏举两面三刀，表面与蒋介石决裂，暗中与国民党派来的说客谈政治交易。此事为我军察觉，郝鹏举无法掩盖，不得不把说客抓起来，送交陈毅同志处置，同时又加紧准备率部逃跑。1947 年 2 月，莱芜战役前夕，国民党军队两路进犯山东解放区，郝鹏举以为时机已到，急忙率部叛逃。不久，我军歼灭其部过半，郝鹏举本人也被活捉。郝鹏举一见陈毅，当即磕头求饶。陈毅同志不胜愤慨，挥笔写了一首《示郝鹏举》，诗曰：“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如苟。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群众见我军如此宽待郝鹏举，捉了放，放了捉，对他们有期待，纷纷比附说，这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再现。可是，郝鹏举不识抬举，最终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盐城大捷，使苏中、苏北两区联成一片，与山东战场遥相呼应，而且标志着华中军民已经由“全面坚持”进入了“一面坚持一面反攻”的阶段。

第六节 保田保家保卫胜利果实

(一)

1947年秋冬之际，处于敌人重兵包围之中的华中战场，敌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自从华中主力北撤山东，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各根据地之间很难取得联系，只能各自开展独立的游击战争。为改变华中各根据地的分割状态，华中分局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先从九纵队抽出2个团和2个骑兵大队，再加若干地方武装，组建淮北挺进支队，由饶子健等同志率领，以洪泽湖为依托，着手重建淮北各县民主政权；又从十二纵队、十一纵队抽出警卫团，会同山东派来的部分武装力量，组成淮南支队，着手恢复淮南路东地区的民主政权。经过半年多的恢复工作，至1947年秋季，终于打破了敌人分割华中的企图，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各根据地又联结起来了。

根据华东局的指示精神，华中党政军领导机构作了全面调整，成立了华中工委，由我任书记，委员有管文蔚、陈庆先、吉洛、曹获秋等同志，统一领导华中党政军各项工作。又成立华中行政办事处，由曹获秋同志为主任，贺希明、陈国栋同志为副主任。新成立的华中指挥部（不久改为苏北军区），由管文蔚同志任司令员，陈庆先同志为副司令员，我和吉洛同志任正副政委。与

此同时，苏中、苏北两个区党委、两个军区和行政机构宣布撤销。

华中工委成立后，各武装部队指挥统一，特别是十一、十二纵队经常联合行动，对敌人构成了较大的威胁。随着武装斗争的进展，淮南、淮北、苏中、苏北局势大为改观。我们按照华东局的指示精神，积极贯彻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迅速发动群众，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

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同志，都有这样的切身体会：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很大程度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农民革命；我们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基本是由穿上军装的农民组成的；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实际是解决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改变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历代旧式农民运动，几乎都以“均田”为号召，结果都没有实现“有田同耕”的政治理想。近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曾大声疾呼“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可是从未付诸实行。唯独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井冈山、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红色根据地，就进行过土地改革，产生了《井冈山土地法》等法令。那时，广大苏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砸碎封建枷锁，踊跃参加红军，保卫胜利果实，有力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我就是在“分田分地正忙”之际，放下牧羊鞭，满怀翻身解放的喜悦参加红军的。

时隔多年，我这个参加过土地革命的“红小鬼”，如今已和大家负责领导华中千万贫苦农民投身土地改革了。虽然革命的发展阶段不一样，但党的解决土地问题的主张是一贯的。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我深切地感到，面对国民党的全面进攻、“还乡团”的疯狂反扑，我党若不广泛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使千千万万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彻底翻身，就不可能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

来参加和支持解放战争，也不可能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

(二)

华中土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发动阶段，从1946年5月至1946年9月；二是复查阶段，从1946年9月至1947年10月；三是平分土地阶段，从1947年10月到最后完成土改。

1946年5月，邓子恢同志从延安回来，在淮安中学召开华中分局委员和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传达党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土地问题指示》（即“五四”指示）。我从东台赶赴淮安，出席会议，听取传达，深感党中央的“五四”指示来得非常及时。由于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国共合作已经破裂，国内阶级关系起了急剧变化，解放区民众迫切希望解决土地问题，党中央及时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是十分英明的。

我党的土地政策和国内阶级斗争形势，总是紧密相连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党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我党将没收地主土地改为减租减息政策，对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民族战争的胜利，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此时，蒋介石悍然撕破了“双十协议”，调动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相当多数的地主明显倾向于国民党当局，部分反动地主更是猖狂进行反攻倒算，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样，我们要从军事上、政治上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就必须坚决依靠亿万农民群众；而想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就必须及时解决土

地问题。

客观情况也是这样。抗战胜利不久，华中各地农民群众不堪地主的重重盘剥，早已不满足于实行“双减”，而迫切希望直接从地主手里取得土地。1946年春，兴化县永丰区联胜乡等地农民，曾自发起来斗争汉奸、恶霸、地主，分了他们的田。还有些地方，农民自发起来斗争，实行“平均土地”，按人口均摊（包括地主在内），每人分得三亩田。这表明，农村阶级矛盾日趋激化，我们党必须尽快作出抉择，坚决支持和领导农民，开展彻底剥夺地主阶级，铲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斗争。

这次土改不同于“双减”，我们是经过深入细致的试点，有计划、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的。早在1946年5月中旬，华中分局就组织工作队，深入淮安鹅钱乡进行土改试点，不久又派工作队到淮安陈圩乡试点。在试点的同时，华中分局向各地委发出《贯彻党中央五四关于土地政策新决定的指示》，提出“在分配土地上力求其平”，注意“不侵犯中农利益，不过分打击富农”（指不变动富农自耕地），还特别强调，封建土地制度是否基本消灭，广大贫苦农民是否获得足够的土地，是衡量各地贯彻“五四”指示，充分发动群众的主要标志。此后，华中各地的土改运动，就全面展开了。

6月，各地委、县委分别进行土改试点，组织工作队下乡调查研究。经过典型调查，我对苏中农村的土地关系，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以如东县双北区11个乡为例，该区计有11户大地主，每户平均占地120亩；中地主80户，平均每户占地31.6亩；小地主507户，每户平均占地11亩；贫农占地9489亩，平均每户占地仅1.6亩；雇农249户，平均每户占地0.4亩。据此测算，地主平均占地相当于贫农的80倍，而为雇农的300倍，贫富悬殊，十分惊人。又据靖江、泰县、如皋三县抽样调查，实行减租

减息前,贫雇农占总户数的 59.3 %,占有土地仅为 10.45 %;中农占总户数的 29.49 %;占有土地为 18.3 %;富农占总户数的 4.8 %;占有土地为 9.94 %;地主仅占总户数的 4.48 %,占有土地竟达 61.02 %。经过多年减租减息,截止 1945 年,贫雇农占总户数 57.18 %,占有土地为 11.66 %;中农占总户数的 32.18 %;占有土地为 23.55 %;富农占总户数的 4.89 %;占有土地为 10.72 %;地主占总户数的 4.02 %,占有土地为 53.69 %。由此可见,经过多年实行“双减”,广大贫雇农占有土地的比例略有上升,中农占有土地的比例上升幅度较大,富农占有土地的比例也略有上升,而为数最少的地主,占有土地仍超过总田亩数的半数以上。一句话,农村的封建土地关系,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贫雇农仍然没有摆脱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

抗战期间,苏中地区敌、我、顽斗争特别尖锐激烈,边缘游击地带的“双减”很难展开。尽管我们年年发动群众搞“双减”,可是地主、富农拼命玩弄“明减暗不减”的花招,致使广大贫雇农得益不多,生活无法改善。在根据地的中心区,“双减”工作做得较好,但得益多的也是佃中农和部分贫农。由于不少贫雇农的农本少、缺乏生产资料,租种的土地少,从减租中得益也少。因此,对于我们的土改政策,广大贫雇农最拥护。他们由衷地说,“敬神无用,要靠共产党”,党的土改政策是“搀瞎子过河,替哑巴讲话”,“这一下再不翻身,一辈子也翻不了身了”。

1946 年 8 月,我们坚决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按照“力求其平”的原则,不分男女老少,一律平分土地,包括一般地主及其家属也跟农民一样分得耕地,富农仅剥夺其封建剥削部分,保留其自耕部分。兴化县草冯区存德乡的刘桶村,乃是进行“五四土改”的试点村之一,全村共有 133 户人家,542 人,1387.5 亩耕地,

地主、富农占有 800 多亩耕地，贫雇农儿无立锥之地。土改工作队一进村，掌握了这一基本情况，就分头住进贫雇农家里，跟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他们“倒苦水”“挖苦根”。通过扎根串连，贫雇农挺直了腰杆，团结中农，一起向地主作斗争。

召开说理控诉大会那天，全村男女老少踊跃参加，气氛非常热烈，40 多人相继登台，控诉地主刘同德的罪行。一声声血泪控诉，一笔笔新帐旧债，激起农民们的满腔义愤。经过说理斗争，贫雇农分了地主 711 亩土地，20 多间房屋，以及许多家具、农具、耕牛、农船。接着，清算委员会公布帐目，农会确定分配方案，经全村群众民主评议，按户分配胜利果实。这样，仅仅一个来月时间，刘桶村的贫雇农就推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

刘桶村的试点经验，颇有典型指导意义。一经总结介绍，很快就在苏中各地推广，收到了较好的效果。时值大秋作物收获季节，华中分局考虑到早日开展土地改革，可以使广大贫苦农民多得实际利益，有利于发动群众，支持自卫战争，及时发出了“力求其快”的指示。各地都加快了调查、串连、算帐、斗争、分配土地的进程，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至五天，就大体完成了一个乡的土改。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华中根据地有 70% 的乡，约 990 万亩耕地，从地主、富农手里转移到农民手里，得益者约 720 万人，占根据地人口总数一半以上。

(三)

在土改过程中，我们采用全面规划、统一领导、典型试验、分类指导的方法，因而使这场群众运动发展较为健康、顺利。我经常听取工作队的汇报，审阅各地送来的书面材料，也亲自参加

过群众性的控诉大会。广大群众强烈的翻身愿望，基层干部的聪明才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我来说，这一场伟大的群众运动，确实是一次坚持群众路线，增强群众观念的学习和锻炼。

这一场土改运动，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运动初期，农民群众迫切要求分田分地，但也不是毫无思想顾虑。一是受封建意识和宿命论的影响，感叹“一分良田一分天，没得福气沾不了边”；二是对时局发展缺乏正确的认识，唯恐有朝一日变了天，地主恶霸反攻倒算；三是不了解我党的土改政策，不敢当“出头椽子”，就怕羊肉没吃反惹一身羊骚臭。针对这样的思想状况，我们反复强调各级党组织和土改工作队要加强自身学习，充分认识这场群众运动的伟大意义，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发动工作，放手让农民群众用自己的双手粉碎沿袭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桎梏。基层党组织和土改工作队每到一处，就跟各乡各村农会一起，组织农民讨论“穷人为什么穷，地主为什么富”的问题。经过讨论，使农民真正懂得“不怕命薄，就怕剥削”，“穷人穷万年，就是没得田”，“欠了大利债，一代穷一代”的道理，从而逐步确立“农民要翻身，刨掉剥削根”的思想，与地主面对面进行说理。我参加过几个乡的说理控诉会，到会者少则有几百人，多则有几千人；登台跟地主面对面斗争的贫雇农，少则十来个，多则上百人。农民们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触目惊心的事实，揭露恶霸地主的剥削罪行，表达渴望土改的意愿，令人激奋不已。历经40来年沧桑巨变，当年苏中农民与地主进行说理的情景，依然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之中。

那时，苏中总抗会服务团，以及各旅、各县服务团、文工团，也为配合土改分赴各乡，进行宣传教育工作。每当演出歌剧《白毛女》，狠毒的黄世仁一出场，受尽欺凌的杨白劳一亮相，台下许

多农民就会忍不住高喊“打倒恶霸地主”，不约而同地指斥本乡某恶霸地主就是黄世仁。有时，农民们甚至忘记了自己是在看戏，激动得捡起泥块和瓦片，拼命向装扮黄世仁的演员砸去，砸得演员疼痛难忍。见此情景，土改工作队的同志莫不感动，深深领悟到广大农民正在觉醒，他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要成为改造旧世界、建设新农村的主力军。

这场土改运动，时间如此之短，规模如此之大，头绪如此之多，困难确实不少。搞土改，必须划清阶级界限，统计人口、丈量土地，还得考虑每一块土地的肥瘦远近，每家每户的劳动力强弱，以及生产资料的多少，才能做到分配合理，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这许多具体工作，都关系到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处理起来很不容易。但是，群众运动是一所大学校，群众里面有许多诸葛亮，任何棘手的难题，经过群众集思广益，很快就会迎刃而解。就说丈量土地吧，农会骨干基本是文盲和半文盲，不大懂得各种换算方法。于是，他们就动脑筋，自制人字形的木尺，用来丈量土地。这样，只花一两天时间，就能将一个村的土地丈量得一清二楚，不仅加快了土改的速度，而且还查清了不少地主、富农少报和瞒报的土地。分配土地也很麻烦，需要全面考虑土质、水源、地形、远近、平均收获量等各种条件，这对初来乍到的土改工作队员来说，也是一个难题。但是，经过农会骨干集思广益，先将土地按照客观条件分成若干等级，再将每家每户按人口、田亩、劳力、收益分成若干等级，采取自报公议的方法，反复征求群众意见，分配问题也就比较合理的解决了。

(四)

“五四土改”基本是成功的，但也存在一些局部性的缺陷。土

改初期，少数地区只分地主的土地，没分地主的浮财；地主自留的田地，质和量普遍优于贫雇农；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也普遍发生；还有不少地区的村干部为自己和亲友以及军属、干属留好田、近田，这不能不影响基本群众的情绪。

为此，华中分局于1946年9月，作出土改复查的决议，指示各级党委立刻着手“查公平、查隐瞒、查老契、查债务、查青苗”，并采取措施“补偿中农”。但是，由于局势变化，我军主力撤离华中，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卷土重来，不少地区一度被敌人占据，土改复查工作无法进行。直至1947年夏秋，我军主力和地方武装不断出击，收复了大片敌人占领的地区，土改复查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从中心区逐步推向边缘区、恢复区。

复查是“五四土改”的继续，重点在于“查老契”，粉碎反动地主的复辟梦。“五四土改”之初，我们曾限令地主献田交契，但有不少地主很顽固，只愿献田，拒绝交契。为了躲避翻身农民追契，查契，这些地主就交假地契，或交大契留尾契，或交尾契留大契，妄想等待国民党、“还乡团”卷土重来，准备“按契索田”、“复田倒租”。一些逃亡地主还写信告诫家属，说是“契是田根，契不丢，根不断，等到‘老中央’回来，就反攻倒算”。从1946年底到47年春，国民党、“还乡团”武装侵占华中，疯狂迫害、残杀翻身农民和我方干部，反动地主、富农乘机复田倒租，气焰十分嚣张。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使广大贫苦农民深刻认识到，“田是命，契是魂，斩草不除根，田契抓不到手不能算翻身”。所以，华中分局指示各地进行复查，又将“查老契”列为重点，是深得人心的。

1947年6月，随着战局变化，华中分局又一次指示各地坚决开展土改复查，力求做到“中间不动两头平”，切实调整土地，填平补齐，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各级党组织迅速发动群众进行土改复查，由中心区推向边缘区、恢复区以至敌占区附近，由

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结合防特锄奸，坚决打击封建顽固势力，仅仅几个月时间，土改复查就掀起了高潮。历经“还乡团”复辟浩劫的翻身农民，政治觉悟大为提高，积极投身到土改复查的行列。这一次复查，效果不小。仅据 14 个县及 2 个区 2 个乡的统计，共追查出耕牛 8406 头，农具 105087 件，水车风车 927 架，农船 27 艘，房屋 93216 间，黄金 714 两，白银 1348 斤。这许多追查出来的浮财，分给贫雇农，得益者约 11 万户。至于追查出来的田契，几乎都被付之一炬了。

(五)

1947 年 7 至 9 月，在刘少奇同志主持下，党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总结各解放区“五四土改”的经验，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 10 月 10 日正式公布。这时，我党领导的全国解放战争，已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党提出这一个旨在彻底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性文件，必然受到广大贫苦农民的热烈拥护，是不言而喻的。

华中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期间创建和发展起来的。在党中央和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华中各级党组织经历了无数严峻的考验，党内正确思想占优势，战斗力比较强。在华中土改会议上，我曾特别强调指出，“这是华中党的特点，不应该低估”。但是，华中党内农民、小知识分子成份占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的干部，也有些出身于地富家庭及其他非无产阶级家庭，党的组织状况基本是好的，但也有极少数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和投机分子，特别是某些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成份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的情况也确实存在，这不能不影响土改运动的深

入发展。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在平分土地阶段,华中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了“三查”运动。在部队,全体官兵以诉苦和“三查”为主,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在地方,克服地主、富农思想,肃清阶级异己分子,以保证各级党组织的纯洁性,为夺取土地改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应当说,华中各级党组织在上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帮助和监督下,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审查干部,吸收土改积极分子入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这对于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是有重要意义的。但是,由于土改复查后期受到“左”倾情绪的影响,某些基层党组织的骨干滋长了“宁左勿右”的思想,干了些错事。比如,个别乡村发生消灭地主肉体,严重侵犯中农和工商业者利益的事件,还错划了一部分人的阶级成份。

正在这时,党中央及时发现了土改期间的“左倾”情绪,颁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各地坚决予以纠正。1947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党内的“左倾”问题和土改的具体政策,重新印发《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等文献,重申土改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纠正土改期间党内的“左”倾指明了方向。任弼时同志还专门作了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我们华中工委即筹备华中土改会议,总结两年来的土改经验,制定贯彻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具体措施。

华中工委机关的所在地,是射阳县通洋区的藕耕堂。这一带原本是黄海滩涂,经过多年围海造田,逐渐变成了新兴的农垦区。这里的耕地大多属于农业资本家所有,我国近代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就曾在此办过实业公司,经营农牧渔业。我们华

中工委、华中办事处，华中指挥部、《新华日报》社，华中银行、华中医院、华中制鞋厂等单位共计 3000 多人，全都散居在藕耕堂公司，大顺公司、丰太祥花行等民族资本家创办的实业公司附近。

1948 年春节刚过，各地、县代表陆续赶到藕耕堂，出席华中土改会议。土改搞得较好的区、乡，也派代表到会作典型介绍。大会小会交叉进行，总共开了 78 天。

华中土改与全国各解放区比较，属于开展得较好的区域，曾受到党中央的肯定。出席会议的代表，联系各自的思想与实践，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基本精神，认真对照检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代表华中工委，作了华中土改总结报告，充分肯定拥有 3100 个乡、1000 多万人口的华中解放区，较为顺利地进行了土改运动，改变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为巩固后方、支援前方，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同时，我也向代表们提出了土改运动发展的方向，阐明了各项具体政策。会上对于如何处理中农的利益的问题，曾发生过争论。由于中央指示及时，迅速纠正了华北某些地区出现的“左”的偏向，我们很快就统一了思想，纠正了个别地区一度出现的偏差，保证了华中土改运动的健康发展。

1948 年底至 1949 年初，华中土改基本结束。千百万农民政治上、经济上大翻身，满腔热忱地掀起保田保家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潮，为我军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物力。1946 年 9 月，苏中约有 2 万多人参加新四军，其中 80 % 是土改得益户。泰兴县新街区共有 5000 户贫雇民，土改刚结束，就有 940 人参加了军。父子携手参军，妻子送夫参军，母亲送子参军，兄弟争着参军，一时传为佳话。一时间，部队里涌现了许多以翻身农民为主体的“翻身连”、“翻身营”。留在本乡的翻身农民，也纷纷成立了“保

田队”，“支前队”。前方的子弟兵奋勇杀敌，捷报频传；后方的乡亲们全力以赴，竞相支前。纵观华中大地，恰似一幅举世罕见的军民并肩作战、保田保家保卫胜利果实的壮丽画卷。

第七节 淮海战役前后

(一)

1948年，冰消雪化的初春，华中工委接到电报：为了加强华中地区我军内线反攻的力量，韦国清同志率华野二纵队不日将从胶县地区调来华中。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二纵南下，与华中的十一、十二纵合编，这对改善华中斗争局面，将起重大的作用。孤悬华中敌后的广大军民，早就盼望着大部队南下，盼望着大反攻日子的早日到来。就在这时，二纵奉命南下，抵达阜宁西北的草寨地区，与十一纵、十二纵会合，组成了苏北兵团。兵团司令员是韦国清同志，我任政治委员，吉洛同志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覃健同志任参谋长，陈玉生同志任副参谋长，邓逸凡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

早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即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我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78万人；歼灭各种杂牌军34万人，共计120万人，给蒋介石政府以沉重的打击。从1947年6月开始，我军除以一部分主力带领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之外，主要是发动外线作战，以国民党统治区为我军机动作战的广阔战场，大规模歼灭敌人。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从1947年7月至9月，我军转入全国规模的进攻，标

志着战争形势发生根本转变。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迎来了1948年。

我华东野战军在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以后，于1947年9月，集中6个纵队，出师鲁西南，逐鹿中原，大量歼灭敌人，开辟了新的解放区。在内线，谭震林、许世友同志率领的山东兵团，频频向胶东之敌发动进攻。相对来说，当时华中我军力量较弱。华东局要求华中工委认真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放手扩大面之恢复和占领”，“打通大别山(与)淮北路西的联系”。华中两个纵队在各分区部队的配合下，从1947年8月起，连续打了盐城战役、李耕线破击战和盐南伏击战，又抽调部分兵力加强淮南淮北地区的斗争，使华中成了我军南线反攻的侧翼。

蒋介石军队处处挨打，被迫转入战略防御。但敌人不愿轻易放弃华中，因为华中一旦为我军控制，则京沪线完全暴露，南京屏障尽失，势必出现“唇亡齿寒”的窘状。所以，敌人不得不拼凑10万兵力固守华中，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继续对华中各地进行“清剿”、“扫荡”。

华东局为打开华中局面，决定调派二纵南下，增强围歼敌人的力量。这样，我军在华中内线就有了三个纵队的兵力，足以发起规模较大的战役，以达到大量歼灭敌人、收复失地的目的。

(二)

韦国清同志率领的二纵队，是以新四军四师为基干扩编的，许多同志是淮北人，离家已近两年，这次重返华中，心情格外激动。当时战士们有这样的顺口溜：“反攻反攻，反到山东，一张煎饼，两根大葱，要吃大米，返回苏中！”一路上，他们边行军边整

军，搞“三查”，开展向西北野战军学习活动，部队的士气更加旺盛。二纵队也有许多山东籍同志，看到华中地区连年遭受国民党军队蹂躏，群众吃尽苦头，更是义愤填膺，决心为华中人民复仇，多消灭敌人。

华中部队十一、十二纵刚刚经过新式整军运动，部队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变化，组织纪律性明显加强，军事训练搞得热气腾腾。1947年冬季，全国野战军和地方部队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普遍开展以“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华中部队利用盐南伏击战后的休整时间，广泛组织干部战士讲家史、讲村史，开展诉苦活动。许多解放战士以革命队伍与国民党军队对比，以群众对新四军与国民党军队的态度相比，更加明确了为谁打仗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部队结合实际搞“三查”，着重加强正规化建设，克服游击习气、本位主义和个人主义等不良倾向。华中部队长期处在分割局面下，干部、战士身上游击作风、本位主义较为严重，许多营、连是刚由地方武装改编的，制度不健全，组织纪律性比较差，执行命令常常打折扣，甚至对上级调人调枪的命令不执行，或者执行得很马虎；有些部队还出现违反纪律的现象。对于这些问题，华中各部队结合三查，努力加以克服。我们当时提出口号，各部队要向主力纵队、主力旅方向努力。这次二纵队南下，原华中部队就主动提出，要虚心向兄弟部队学习，进一步落实了部队正规化的许多措施。

苏北兵团成立不久，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春季攻势从益林战役开始，按照兵团统一部署，二纵先越过旧黄河废堤，引起敌人的恐慌，阜宁守敌仓惶向风谷村逃窜，敌五十一师一一三旅直属营和两个整团则回窜益林镇固守。这时，敌七十二师、四十四师一部、暂二十五师一部主要分布在两淮、涟水，风谷村，车桥

等地。益林镇位于涟水、淮阴、盐城之间，是苏北重镇。我们估计我军攻打益林，淮阴、涟水、风谷村、车桥守敌必定会出兵增援，这正合乎我“围点打援”的设想，把敌援兵引出据点，加以歼灭。韦国清同志决定以二纵三个师和炮兵团全部人马攻打益林，以十二纵和五、六分区部队共计7个团兵力阻击青沟、风谷村、涟水、淮安等方向东援之敌。战斗从3月15日打响，经过4天激战，二纵、十二纵及地方部队如猛虎下山，扑向顽敌，结果全歼益林守敌2个整团和一一三旅直属营，重创援敌，控制了盐阜地区经济中心地带。与此同时，我十一纵和华中一分区部队配合益林战役，在海安至东台一线的安丰、梁垛、富安再次发起破击战，拔除了敌人的几个据点。

苏北兵团强有力的攻势，与山东兵团遥相呼应，犹如两只拳头左右开弓，卓有成效地支援了我军外线战场。

(三)

苏北兵团发起凌厉的春季攻势，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迫使敌人不得不挖肉补疮，从中原和山东战场抽兵增援华中。1948年3月底，敌人制定了所谓政治、经济、军事的“总体战”计划，以确保长江防务，稳固其对华中的统治。5月中旬，敌人从大别山、山东调来的部队陆续进入华中，组织了两个兵团：南兵团辖整四师、二十五师，由黄伯韬指挥，沿通榆线北上；北兵团辖七十二师、八十三师和快纵一部，由张雪中指挥，越过陇海线南下。敌人采用南北夹攻的办法，企图在盐城、阜宁间的串场河以东地区与我军决战。

敌驻华中其他部队也蠢蠢欲动，投入“总体战”，分片对我解放区“清剿”、“扫荡”。华中南部是敌人重点防区。3月底，敌方

李天霞部在泰州成立扬州、靖泰指挥所，还召开各顽县长会议布置“清剿”。李天霞纠集了整四师、二十一师、暂二十三师等部共16个团，疯狂“会剿”、“兜剿”、“扫荡”我华中一、二、九分区。这是解放战争以来敌人在该地区用兵最多的一次。

敌人的“总体战”，说穿了就是“三光政策”的重演，比以往任何一次“清剿”都残酷。这次“清剿”，实际上是敌人的垂死挣扎，与敌人刚占领华中时的“清剿”有所不同。原先敌人打算占据华中，为了站稳脚跟，经常采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而这次，敌人意在摧毁我根据地人力财力物力，使我军失去依靠，因而采用毁灭性的手段，用心极其恶毒。对此，我华中南部各地委早有思想准备，沉着应付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组织群众“跑反”，搞坚壁清野，发动群众打游击，开展保命、保田，保房运动，使敌人处处扑空，抢不到粮、抓不到丁，经常遭埋伏，时常吃“冷枪”，吃不好，睡不稳。而我大部队则严阵以待，在盐南地区布下重兵，准备打乱敌人的进攻计划。

韦国清、吉洛同志和我反复研究敌情，考虑到敌人兵多势众，我军只有迅速打乱其中一路，然后跳出包围圈，才可能避免腹背受敌。经研究，我们很快就决定，先打行动较快的黄伯韬南路之敌。

盐南战役，敌我都以主力拼杀，战斗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华中局势。这次战役，是苏北兵团组建以来三个纵队第一次协同作战，各部队密切配合至关重要。我、吉洛、韦国清同志深入到部队进行战前动员，号召指战员们发挥顽强坚韧的革命精神，以保证战役的胜利。

我们把二纵队放在划船港、引水港、渡口以西，三条港以北地区，担任出击任务。十一纵则集结在划船港、引水港、西河头以东，斗龙港以北，龙王庙以西地区，配合二纵出击，求歼沿通

榆路北犯之敌。十二纵的任务是打阻击，除留2个团于东(台)、益(林)地区和五分区部队阻击可能来犯之敌外，大部队进至伍佑地区，阻击沿串场河西岸北进之敌，随时策应二纵出击。

计议已定，盐南战役于5月23日打响。南路之敌被我凶猛的火力阻滞于伍佑、卞仓地区无法北上，二纵分段切割敌人，十一、十二纵相机配合，经过5天反复冲杀，敌黄伯韬部被我杀伤3千余人。此时，张雪中部迅速赶来，韦国清同志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分数路突围，撤出战斗。按原定计划，二纵、十二纵向东北方向转移，将敌人引入盐阜、淮海交接地段，以便寻找战机。十一纵去白驹、大中集等地向华中九分区转移，乘黄伯韬北上，长江沿岸防务空虚之际，对华中南部发起攻势，大规模收复失地。

苏北兵团分南线、西线两面牵制敌人，破坏了敌人南北夹击的计划。韦国清同志率二纵队，在涟水、泗阳先后打了几仗，消灭了不少敌人。在苏北兵团的支援下，淮北、淮南、淮海等地区收复失地进展很快。1948年6月，陈庆先、曹荻秋同志率领十二纵部分兵力，把淮南淮北两个地区统一起来，成立了江淮区党委和江淮军区。曹荻秋同志任区党委书记，陈庆先、饶子健、梁从学同志分别任正副司令员。十一纵队在华中南部地区进展也很顺利，迫使敌人龟缩在据点和交通线上，农村则基本上被我军解放了。

接着，我军的夏季攻势开始了。8月下旬，苏北兵团奉命开赴山东配合兄弟部队解放济南，韦国清、吉洛同志率二纵、十二纵北上鲁南，准备参加济南战役，配合侧翼作战；十一纵集结于宿迁县境内，警戒陇海线敌人。

我奉命留在华中工委，与管文蔚、曹荻秋等同志统筹后勤支前工作。估计济南战役结束，华东战场的重心将南移。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迎接大军南下，我们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规

模空前的支前活动。

(四)

1948年9月16日，隆隆的炮声揭开了济南战役的帷幕。我们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我军连续8天围攻，使盘踞在济南“城墙防御”中的国民党10万之众全线崩溃。守敌3个整师、9个旅无一漏网。绥靖区司令王耀武以下6万1千余人被俘；吴化文率整编九十六军军部及整编八十三师全部3个旅共2万人起义。

我人民解放军秋季攻势的神速发展，已使人民解放战争在捷报频传中进入决战阶段。济南解放，华北、中原和华东三大战略区连成了一片。当时，辽沈战役正酣；平津战役在密锣紧鼓中即将开场；我华东、中原战场也正酝酿着一场更大规模的新的决战。同志们纷纷议论华东野战军下一步的矛头所向。这时，粟裕同志从山东发来电报，指示华中工委在宿迁两侧准备一批粮食：在两淮地区筹备10万人粮食，在新浦以南筹备3万人粮食，并说华野前委正在部署包括新安镇、两淮、连云港、海州在内的“淮海战役”，即两淮至海州之间的战役。

华中工委接到电报，大家高兴得跳了起来；华中大反攻的时刻终于盼到了！

不久，华中工委又接到华东局来电，要求华中增加军粮数额，筹备100万人3个月的军粮，并要求尽快维修华中境内的道路、桥梁，以保证大部队南下作战之需。

从全国各地传来的捷报，以及支前任务的大幅度加码等情况判断，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已迫在眉睫。淮海战役开始，我带领华中干部、民工上淮海前线，顺便看望分别了两年的粟裕、

钟期光等同志。战友重逢，有许多话要说，可在那戎马倥偬、炮声隆隆的前线，容不得多叙别后之情，我只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关于淮海战役准备工作的一些情况。

早在济南战役前夕，粟裕等同志已在考虑济南战役后我军运动的方向，提出了“淮海战役”的最初方案。济南战役的战术是“围点打援”，以山东兵团为主攻克济南，同时把从鲁西南和苏北赶来参战的几个纵队安插在济南与徐州之间打徐州增援之敌，打算引敌黄伯韬、邱清泉、李弥等北上救援时，在途中拦截予以围歼或重创。粟裕同志等在运筹帷幄之时，也估计到情况的另一面，即当年7月敌区寿年兵团在豫东被我军吃掉后，蒋介石加紧从“全面防御”转向“重点防御”，重新组合部队固守战略点线。徐州之敌，主要是守郑州、徐州、济南三大战略要点。我军发起济南战役，敌七兵团黄伯韬、十三兵团李弥、十六兵团孙元良等都还未整补完毕，很可能来不及增援或不敢增援济南被围之敌。倘若如此，我军干脆一鼓作气拿下济南，然后移师向南，寻机消灭徐州之敌。

如何移师？粟裕同志向华东局、中原局（并报中央）提出两个方案：或出兵鲁西南，跨陇海路，与中原野战军会合，寻歼敌人于徐州西南；或南下入苏北，战淮海，然后攻取徐州。参加讨论的同志，大多数倾向于后一种方案。认为入苏北、打淮海，能充分利用鲁南和华中两个解放区的各种有利条件，进而逼近长江沿岸、威慑南京。粟裕同志把这一方案具体化为一攻两淮（淮阴、淮安），二攻海州、连云港。

刘伯承、陈毅、李先念同志赞成粟裕同志等提出的“淮海战役”方案，表示中原野战军为配合华东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将采取分散歼敌方针，争取在江汉地区歼敌一部，以拖住西边的敌人。

不出所料，我军发起济南战役后，敌徐州北上援军察觉到我军“攻济打援”的意图，不敢贸然行动。济南之敌被全歼后，敌主力集中在徐州、商邱、新安镇、海州、台儿庄、枣庄、韩庄地区，共计24个军约70万人左右（蚌埠、安徽、苏北第一绥靖区等兵力未列入）。敌人幻想在我中原野战军未东进之前，集中兵力击破我华东野战军一部。

我军打下济南，士气旺盛。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南线决战十分关注，对粟裕同志等华野前委的“淮海战役”方案作了重要修改。要求淮海战役分三步走：一打黄伯韬兵团；二打海州；三打两淮，使打击对象和作战意图更加明确。中央军委强调，三次作战是一个整体战役，打好了可歼灭敌人十几个旅，并打通山东和苏北的联系，迫使敌人分兵退守长江，有利于我军下一步在徐州、浦口一线作战。

鉴于全国形势的迅速发展，党中央召开了9月会议，确定我军“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的战略方针，为淮海战役决战提供了指导方针。10月11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正式下达，我华野、中原野战军指战员紧张地进行战前准备，各路大军浩浩荡荡开赴豫皖苏边区。为了组织和指挥好淮海战役，中央又批准成立了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组成的总前委。

亘古未有的淮海大战比预计的更为顺利地展开，它的胜利也比预计的更快更大。作战方案从原来的一打黄伯韬、二打海州、三打淮海，改为一打黄伯韬，二打黄维，三打杜聿明，形成了横跨中原、华东两大战略区的南线大决战，变消灭敌徐州集团军一部为全歼徐州守敌。这次淮海战役，正如毛泽东同志后来形容的那样，象一锅“夹生饭”，硬是被我军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五)

淮海战役,我参战人员达60万,部队所需的粮食、民工、担架等人力物力数量很大,需要充分保证。我军的运输工具主要靠人力运输,后勤支前任务空前繁重艰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河北等省亿万群众和543万民工为此作出了伟大的、在历史上罕见的贡献。陈毅同志事后以他的诗人气质感慨地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句话说得多么贴切、多么形象呀!

有人统计过,淮海战役仅粮食一项,以每辆小车装运200斤计,如把这些小车排成行,可从南京到北京之间排成5行!

采用如此落后的运输工具,完成如此规模的支前任务,充分显示出人民群众具有何等伟大的力量!整个淮海战役,共动员担架73900付,大小车413970辆,挑子42400多副,牲畜6300头,船只13630艘,汽车250辆,粮食5亿7千万斤,运送弹药物资330万吨。当时,淮海战役的后勤供给,主要依靠山东、苏中、苏北地区支援。这期间,我主要抓支前工作,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在支前司令部里,一份份催粮、催民工、催运送的电报,一份份筹运粮食、军需物资的命令,飞来飞去,日夜不断。每件事都得争分夺秒,每件事都得当机立断,那紧张的气氛决不亚于前线指挥所。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担负支前任务的广大军民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战争的伟力在于民众之中。粟裕同志在战役前夕曾作过这样的判断:淮海战役的规模到底能打多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区群众的支前承受能力。事实已经证明,山东等5省的军民发挥了高度的支前热忱,全力以赴地支援解放战争,为了战争的胜

利，他们的确做到了“要人有人，要物有物”，解放军打到哪里，民工就支援到哪里，前方需要什么，后方就支援什么，谱写了一首人民战争的壮丽凯歌。华东局、中原局、华中工委、冀鲁豫区党委深入发动群众，“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解放区内到处掀起支前热潮。筹集粮草，加工军粮，赶做军鞋，修桥筑路，组织参军，民工运输，几乎都是男女老少人人动手，村村户户全力支前！

当年作为我军对手的原国民党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淮海战役的经历者杜聿明，在回忆淮海战役时曾经感慨地说，淮海战役时，“共军交通不便，除靠两条腿走以外，铁路公路皆不能完全利用。”“但共军的民众组织极为严密，消息灵通，每一战役都发动群众大力支援，并以游击队截断我军后路。”（见《淮海战役亲历记》）

杜聿明先生的这些话，是当年国民党军队里讨论“对山东共军攻击计划”，分析双方利弊时所下的判断。可见，群众拥护共产党、支援解放军，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这一点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当时也看得清清楚楚。

当年群众支援淮海战役的事迹，堪称中外战史一绝。那时，北至渤海湾，南到长江边，西达洛阳古都，东临黄海，在这广袤的土地上，几百万民工从各个解放区，日日夜夜络绎不绝地涌向淮海战场。不管是随军民工、二线民工或临时民工，也不管抬担架，推小车，大家都争着干、抢着干，越累的活越抢着干，越危险的活越觉得光荣。民工团由各县县长或副县长任团长，县委书记任政委。县以下区设营，乡设连。整个民工团按部队编制组织起来，随部队一起行动，过军事化生活。

淮海战役正值冬季，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有时会遇上纷纷扬扬的大雪。就是在这样恶劣的气候下，广大群众从不退缩，一

直以高昂的热情支援前线，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例。靠近战区的一些群众急前线之所急，把自己家的门板卸下来，交给部队打仗用；有的把儿子准备娶媳妇用的新棉被，盖在担架上的伤员身上；有的群众把屋前种了多年的树木砍下来，制作支前用具；有的大娘亲自送自己的独子来当民工……

1949年元旦，战斗还在继续，为了保证前线将士能吃上肉，很多群众把平日用糠菜一瓢一瓢养大、自己舍不得吃的猪，一头一头送到部队，慰劳浴血奋战的子弟兵，这与被我军围困得水泄不通、瑟缩在野地里捱饥受冻的国民党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战斗的中心地带豫皖苏边区人民遭受国民党军队的残酷洗劫，承受的灾害最重，因而对人民军队的感情也特别深。肖(县)、永(城)地区群众为了保证我军粮草供应，宁可勒紧裤腰带，在4天之内就筹集了粮食300多万斤，解决了后方粮食一时运不上来的困难。实际上，老区连年战祸，一般农家粮食都奇缺，可是此刻为了前线，宁可自己吃粗粮，一心一意把米、麦等细粮送给参战部队吃。当时群众还提出过这样的感人口号：“倾家荡产，支援前线”。民工们长途跋涉，流动性大，运输线经常变动。有些民工随身干粮吃完，宁愿自己忍饥缩食，也不肯动用车上一粒粮食，就象苏联电影里押运粮食的华西里饿倒一样，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精神，真令人肃然起敬。

淮海战役结束后，仅华东地区17万民工中，立特等功的就有197名；立一等功的有4646名；立二等功、三等功的有2198名。这些战史上留下的光灼灼的名字，铭记着广大群众建立的不朽功勋。

(六)

我记得，济南战役结束不久，华野前委和华东局对华中支前工作只作了一般性布置，随着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逐步完善，华中工委对华野前委、华东局下达的后勤任务也逐渐明确起来。华中工委成立了华中支前指挥机构，并开始把一、二、九分区的存粮陆续运往五分区。至淮海战役前夕，运往淮海区的粮食达2300多万斤，有稻子、小麦和大秫。稻子、小麦在华中五、六分区加工，因为当时一、二、九分区许多集镇、交通要道还在敌人控制之下，特别是长江沿岸地区，运送粮食要冒风险，穿过几道封锁线。五、六分区接到粮食，发动群众日夜加工，灌云县当时就有14000名妇女磨出14万斤面供应部队。在运粮的同时，华中工委、华中行政办事处筹集347亿元，用来恢复交通，架桥修桥护路，基本上修通了阜宁、沐阳向山东；阜宁、东台向安丰；阜宁向涟水；阜宁向东沟，益林、风谷村、钦工、马厂的公路和桥梁。

11月4日，华东局在山东支前指挥部的基础上，成立了华东支前委员会，以傅秋涛同志为主任，统一领导山东、华中的支前工作。同日，华东局指示华中应全力支援前线，准备80到100万人2个月的粮食，10000付担架。并指示说，战役第一阶段打黄伯韬兵团，在陇海线地区，后勤支前由山东负责，华中加以支援。当时，华中即向部队运送了6天的用粮。11月13日，华中工委、苏北军区、华中行政办事处联名发出《华中支前总动员令》，要求华中党政军民，紧张投入这一伟大战役中去，坚决完成上级交下的支前任务。随后即加紧配备支前干部，健全支前机构，组成华中支前司令部，由贺希明同志任司令，陈国栋、万金培、吕镇中同志任副司令，华中行政办事处主任曹荻秋同志任政治委员，

李干成同志任副政治委员。围歼黄伯韬兵团不久，我军大部队迅速进入华中的江淮地区作战。山东随军民工接应不上，我江淮地区刚收复不久，群众组织不健全，致发生前方缺粮食、大批伤员无法后运的紧急情况。华东支前委员会急电华中，要求尽快与华野后勤部刘瑞龙同志取得联系，扭转前后方脱节的局面。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我和贺希明同志带领华中支前司令部机关，部分支前民工、医务人员赶往淮北，与已在江淮地区的曹荻秋同志会合，又在宿迁县找到了刘瑞龙同志，决定立即由华中调拨5500万斤粮食，由五、六分区出工，每天保持运送前方80万斤至100万斤粮食，保证前方的急需。

淮海战役期间，华中民工主要由华中五、六分区和淮北地区派出，他们都把支援前线当作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县、区、乡层层动员，在中心区、交通枢纽建起临时粮库、屯粮点和运输站，各县的县长、区长、乡长几乎都亲自带队上前线。华中支前的主要任务是运输粮食，六分区还组织了28000辆小车，6428头驴子，4000辆牛车，200余艘帆船，昼夜兼程运往前方。

全华中地区，在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107万人，其中随军民工255000人，担架15000多付，小车8万辆，供应粮食1.1亿斤。在很短的时间里，在分散而贫穷的农村，集中这么多人力物力支援前线，那是多么不容易呵！

(七)

陈毅同志在1948年冬，写过一首题为《记淮海前线见闻》的诗，把淮海战场刻画得十分生动，现在把它抄录如下：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吉普车，美蒋运输来。

闪闪电灯红胜火，

轰轰摩托吼如雷。

夜夜送千回。

老战士，几年久从戎。

拥政爱民作模范，

军民学习当先锋。

杀敌气如虹。

新战士，列队长又长。

飒飒军装何整肃，

昂头阔步挺胸膛。

杀敌志如钢。

新同志，解放最开怀。

诉苦从头难尽说，

壮丁远处被抓来。

共打蒋独裁。

在淮海战役紧张进行的同时，我华中地方部队配合野战部队作战，向残留在华中沿海，沿江，沿运河和重要城镇的敌人发起攻势，收复失地。

早在济南战役结束时，华野前委即向苏北军区下达了命令，要求华中地方部队向敌展开攻势。我六分区部队和盐警团即向灌东地区进攻，二、五分区部队向两淮、高邮的运河线进攻，一、九分区部队联合起来成立“长江纵队”，在通榆线上向海安、南通段进攻。

华中大反攻的时刻，群众情绪格外高涨，残留敌人惶惶不安，随时准备撤往江南，只因淮海战役正酣，胜负未定，江北之敌还在迟疑之中。我华中工委动员各县青壮年参军，要求每个县上升一个团当主力，另组建新的团，区队升为县团。参军运动又一次掀起热潮，既保证前线需要的兵源，又保持了华中地方部队原有的建制。

10月11日，东台守敌在我华中部队打击下，被迫撤逃到泰州。不久，驻两淮之敌五十一军两个团也慌忙逃往扬、泰线。敌人预感到形势危急，赶紧收缩兵力，退守沿江据点，准备逃跑。但他们逃走之前，仍对我沿江地区进行毁灭性的“扫荡”，实行“焦土政策”。大约是在11月初，敌集中了10个团的兵力，对我华中南部进行了最后一次的“扫荡”。

11月中旬，苏北军区命令所属部队加紧对各处敌人围歼。淮海地方部队配合主力部队解放了连云港，然后立即向沐阳出击，阻止敌人南逃。五分区部队继续向淮安、宝应之间的敌人攻击，以切断运河线阻敌南逃。江淮三分区部队向临泽守敌攻击，得手后即向宝应、高邮间之敌出击。长江纵队连续发起姜堰、口岸、龙窝口等战斗，共歼敌5724人，打破了敌人的沿江防御体系。

1949年1月10日，历时65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内有4个半师起义)，共555000人。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三个有决定意义的最大战役之一。整个战役结束后，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就完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仅过了11天，即1月21日，蒋介石即宣告“下野”、“引退”。从此，南京反动统治集团陷于土崩瓦解，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我百万雄师沿着津浦线南下，淮阴、淮安、扬州、泰州、南通等城市的敌人闻风仓惶南逃，华中地区遂全部解放。至此，横渡长江，直捣南京，席卷江南，解放全中国的号角即将吹响……

第八节 千军万马渡长江

(一)

震撼中外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经过整编，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

我们在北线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南线的淮海战役所取得的胜利，使国民党在几个月内就丧失约 154 万多人，包括国民党正规军 144 个整师。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崩溃已经指日可待了！

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也就是瑞雪纷飞的 1949 年元旦，新华社播发了激动人心的《新年献词》：“1949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 1948 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继三大战役之后，渡江战役是即将到来的又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将渡过长江，解放全中国！在天寒地冻的夜晚，我在灯下反复阅读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 1949 年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我为中国革命、人民解放战争的飞速进展而感奋不已。

献词说，解放战争的第一年，是国民党的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防御。第二年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即人民解放军在消灭了大量国民党军队之后，在南线和北线都由防御转入了进攻。第

三年的头半年（1948年7月至12月）发生了另一个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由长期的劣势转入了优势。我军不但能够攻克国民党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能够一次包围和歼灭成十万甚至几十万国民党的精锐兵团，而且歼灭国民党兵力的速度大大加快了。也就是说，敌人战略上的防线已经全部瓦解了。

献词引用了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告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决不能怜惜蛇一样的恶人，也就是不能接受美国和国民党妄图卷土重来的“和平”，在战争愈接近最后胜利的时候，一切革命的人民和一切人民的朋友，要更加团结一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坚决地彻底地消灭反动势力，彻底发展革命势力，直至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国，实现统一、民主、和平。

献词最后说：“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一百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读了这一段话，尤其使我热血沸腾，不能自己。现在摆在我面前的任务，就是全副身心地投入渡江战役的准备工作中去。

关于渡江作战，党中央、毛泽东同志酝酿已久，粟裕同志也对我说起过。1947年下半年，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纵横江淮河汉，调动了几十万敌兵麇集中原。这时毛泽东同志就设想如何使战争继续向敌人后方纵深发展，迫使中原敌人抽兵应付，以造成我军在中原大量歼灭敌人的态势。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设想，拟让粟裕同志率由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的华野一兵团，在适当时候，从宜昌、沙市之间横渡长江，沿着我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曾开辟过的洪湖、湘鄂西、湘赣、闽粤赣、闽浙赣等根据地逐次跃进，威胁京沪，迫使中原之敌南下。

粟裕同志率华野一兵团于1948年2、3月间开赴黄河北岸的濮阳地区，以水网稻田地区作战为基本内容开展训练，以适应江南环境。在这段时间里，由于我军在全国各战场的攻势进展神速，敌人在中原的防御体系出现裂痕，使我军大量歼灭中原敌人的可能性增大了。粟裕同志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华野一兵团留在中原参加作战较为有利，我军应争取在江北多消灭一些敌人，将来过江作战就可能更为有利。粟裕同志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引起毛泽东同志的重视，专门请粟裕同志赴中央面议，并最后采纳了粟裕同志的建议。这一直捣虎穴的大胆计划，因中原敌情发生变化而暂缓执行。

南线的豫东、济南战役相继胜利，创造了南线决战的有利条件。毛泽东同志在起草淮海战役作战方针时，再次提出渡江作战的设想。这次渡江已今非昔比，不仅为了牵制江北敌人，而是百万雄师渡长江，解放全中国。毛泽东同志最初计划在1949年秋季，中野、华野协同作战渡江。在黄维兵团被歼过半时，毛泽东同志根据南线提前决战的情况，在给淮海战役总前委一份通知里，决定渡江作战提前进行。

(二)

正当我军夺取淮海战役胜利，积极准备渡江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为苟延残喘，调兵遣将，等待美援，又玩弄起“和平谈判”的阴谋来。蒋介石宣告“引退”，转入幕后指挥，由李宗仁代理总统出面乞求“和谈”。当时，国内外有些人怀疑我党我军的力量，主张隔江停火，来一个“划江而治”。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以中国人民的意愿为依归，决不容许革命半途而废。明确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

到底。当然，我们也不放弃用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意派代表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在这段时间，毛泽东同志亲自写了大量评论文章，揭露国民党空喊“全面和平”的虚伪性，充分阐明我党的一贯主张，敦促国民党内部“主和派”人士摆脱蒋介石等人的幕后操纵，真心实意地为民族大业作出贡献。

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经过三大战役，已遭受到致命打击。但蒋介石仍妄想凭藉长江天险阻挡我军渡江南下。他集中了残余陆军大约 115 个师，及海、空军主力，包括海军二舰队和江防舰队（约 130 余艘舰艇），还有 280 多架飞机，总共约 70 多万人马，分布于宜昌至上海的长江防御线上。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率 40 个师，约 25 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统率 75 个师，约 45 万人，分两道战线防守长江下游地区。当时美国军舰停泊在吴淞口外，为国民党反动派壮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黑天鹅”号、“伴侣”号游弋长江，也给垂死挣扎的蒋介石撑腰打气。国民党政府的“主战派”，不断叫嚣什么“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共军要过长江，必遭曹操当年 83 万人马下江南的结局”。但我党我军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思想等各方面做好了充分准备。当时，美英帝国主义有可能直接插手干预我军行动，这引起全国上下的极大关注。有些倾向于我们的民主人士，由于长期怯懦于帝国主义者们的专横霸道，也劝告我们审慎从事，或希望我们避其锋芒。但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我党中央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三）

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我党我军不仅要在军事上做好一系

列准备，还要使广大干部、党员思想上适应这个转变，要学会做经济工作，学会管理城市，部队要担负起工作队的任务，准备过江之后接管大城市，在新解放区执行新区政策。

在渡江前夕，所有准备参加渡江南下的部队指战员和准备随军南下的干部，都集中相当一段时间，边练兵，边学习。党中央、毛泽东同志为此下达过很多指示，谆谆告诫全党加强政策学习，加强纪律性。各政治部门还编印了各类《入城守则》、《时事教材》、《新区注意事项》等小册子。

淮海战役结束不久，我和曹荻秋同志代表华中工委参加在徐州附近贾旺召开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和刘伯承同志，刚从党中央临时所在地西柏坡汇报工作回到淮海战役总前委，陈毅司令员便马不停蹄地来到三野前委所在地贾旺，参加了这次前委扩大会议。在会上，他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月8日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定。

中央重申，在淮海战役期间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组成的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队及作战的职权，具体组织渡江南下的作战。陈毅同志任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副任政委。

自1942年，我与陈毅同志分别后，倏忽6年多没见到他了。他依然那样雄姿英发、豪放爽直，向与会同志们说道，中央要求今年基本上打倒国民党政权，明年全部消灭国民党军队。全军和各地方党组织要做好渡江准备，加强干部培训，过江后接管好大城市和新解放区。会上，陈毅同志高度赞扬毛泽东同志对当前形势的深刻分析和高度的理论概括，并详细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我党对外对内政策的七点意见。记得陈毅同志那次传达讲话，内容很多，如野战军建设、新区政策、城市管理、群众工作、工农业经济、对外政策等等。这些内容，后

来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作了进一步阐发。

这次贾旺会议，是三野前委为渡江作战准备而召开的，实际上是渡江南下的动员会。会议期间，我乘隙向陈毅同志问候，他关切地询问了华中党政工作开展的情况。看得出来，陈毅同志对华中的工作一直很牵挂，同时从他的言谈笑貌中，感染得到他对即将出现的全国性胜利充满喜悦和信心。

2月上旬，华东局机关迁至徐州。大概在中旬，我又接到通知去贾旺开会，听康生传达毛泽东同志的四项口头指示，主要精神是强调要花大力气学习政策。2月搞军事、政治学习，3月学习新区政策。当时中央综合各方面情况，决定开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之后，于4月份渡江。关于渡江的具体时间，前后变动过几次。年初，中央将原定5~6月间渡江的时间提前到4月。总前委认为，4月份沿江多雨，且多东南风，对进军不利，加之4月春耕开始，组织大批民工支前，有违农时，故建议提前至3月份渡江。中央开始同意，后来因开二中全会，部队需要加强政策教育，所以毛泽东同志派康生来二野三野传达，还是决定4月渡江。渡江时间几经变动，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年十分重视对部队和广大干部、党员进行新区政策的教育。实际上，随着革命战争的飞速发展，许多我们原来熟悉的东西渐渐被不熟悉的东西代替了，不花大力气，不下大决心学习，就不可能适应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

(四)

华东局机关南下后，我们华中工委才有机会当面向华东局以及当时的华东局主要负责人饶漱石汇报请示。自从华中分局1946年底移往山东以后，华中地区与上级一直是靠电讯进行联

系的。

饶漱石出席了1月下旬的贾旺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曾找我和曹荻秋同志，听取华中工委的工作汇报。2月上旬，饶漱石与张鼎丞、曾山同志到达徐州，专门对华中工作进行了几次讨论。随后饶、张、曾三位又约我和曹荻秋同志见面。华中党在敌后坚持两年多，根据党中央和华东局、华中分局的指示精神，独立地开展艰苦的敌后工作，以武装斗争为主，先后进行了土地改革、土改复查、救灾、支前参军、纪律整顿等一系列工作。我和曹荻秋同志概括地向他们作了汇报。

张鼎丞同志听了汇报说，华中执行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是忠实的，坚决的，取得了很大成绩。华中工作总的方针是正确的，敌后斗争有了很大发展，这是很大的胜利。

在汇报中，我们谈到1946年下半年，淮南淮北地区一度出现退却和丢失阵地等问题，张鼎丞、曾山同志都说，主要责任在华中分局。他们说，当时分局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没有让这两个地区的党组织作好开展游击战争的充分准备，以致敌人迅速压过来，两个地区干部来不及安排，不少干部被困在洪泽湖，损失比较大。苏中地区由于布置敌后坚持斗争较早，所以坚持得比较好。

张鼎丞、曾山同志还肯定了华中土改，同时也指出华中工委在土改复查后期、跟着山东提出所谓“反富农路线”，产生一些“左”的做法。当然，土改中出现“左”的倾向在全国带有普遍性，而且华中对此发现得较早，纠正得比较快。

两年多来，华中党政军各级机关处于分割环境，斗争相当艰苦，这次当面聆听上级领导同志对华中工作的评价，感到由衷的亲切。其中有表扬，也提出一些缺点，实事求是，使我深受教育，按理说，我是华中工委的主要负责人，对于华中工作中出现的缺

点和错误，负有主要的责任。

饶漱石表示同意张鼎丞、曾山同志对华中党政工作的评价，他主要谈了华中在渡江作战前需抓紧搞好支前、生产、干部培训、政策学习等工作的意见。

在这段时间里，华东局对我的工作也作了调整。第一步先调我到华东支前司令部，负责渡江作战的后勤、支前工作，苏北、苏南党委的工作，由肖望东、惠浴宇同志负责。华东支前司令部是在淮海战役时成立的，经过调整充实，继续担负渡江作战的后勤支前任务，由傅秋涛、曹荻秋同志任正副司令员，宋任穷同志和我任正副政委，统一领导山东、华中两地的支前工作。参加华东支前司令部工作的同时，华东局让我继续负责华中工委的工作，并在华中工委领导班子的原有基础上，准备在渡江后组织苏南区党委，开辟新区工作。中央本来打算渡江后建立统一的江苏省委，考虑到江苏是蒋介石政府的老巢，江南江北情况有别，所以决定实行小省制，成立南京市委、苏南区党委和苏北区党委三套班子。也就是说，组织上虽让我参加华东支前司令部工作，同时又派我带领华中工委的人马渡江后筹建苏南区党委。华东局又决定，华东支前司令部渡江前的工作由傅秋涛、曹荻秋同志负责，大军渡江后的支前工作，由我在苏南具体负责筹划。

(五)

2月20日至27日，华中工委在淮阴郊区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各地党政军负责同志均出席。这是渡江前夕一次规模较大的会议，我传达了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决议和华东局对华中工作的指示，围绕上级交给华中的支前、扩军、调干、生产等

项任务一一布置落实。我领会中央的决议精神，反复强调加强新区政策学习的重要性，要求每位同志都要重视学习，以适应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以后的事实也确实证明，凡是肯认真学习的同志，在新的工作中，往往比较踏实、有成效、少犯错误，进步也较快。这恐怕是干革命工作的一条重要经验吧。

会议比较重视健全请示报告制度和加强纪律性的问题。经过华中土地会议、华中高干会议、以及区党委和地委书记联席会议等会议，同志们对加强党的政策观念，端正思想作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也有了一些进步，但也不无缺陷。因此，我在会上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军分区武装，在渡江前夕抓紧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的缺点，在思想上、作风上、制度上有较大的改进。

现在回顾起来，认真解决这类问题极其重要，这是一个带有很大普遍性的问题。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原来长期各自独立作战的解放区、战略区，都已连成一片，需要有统一的领导和指挥。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保证党的政策贯彻落实，党中央从1948年1月起就发布一系列指示，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委制、请示报告制。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又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决议。中央清醒地看到，要夺取全国胜利，就必须加强全党全军的纪律性，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华中是全国的一个局部，这个局部过去长期处于敌后分散的各自为战的状态，此时尤其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

华中工委扩大会议以后，华中党政军的工作，围绕渡江前夕的支前、调干培训、学习新区政策、扩军轰轰烈烈展开。按照华东支前司令部的要求，华中地区主要负责东路大军的民工、粮草、船只、担架、弹药运输。以贺希明同志为首的华中支前司令

部驻扎在高邮，统一调动各县人力、物力、财力。据后来统计，在渡江战役中，苏北共动员了民工166万人，其中随军民工达123000余人；供应粮食2亿2千多万斤，动员船只2万余条。修路、磨面、做军鞋更无法一一统计。总之，这次支前任务跟淮海战役一样，也是规模浩大的。

为了支援大军渡江，解放全中国，华中又一次广泛动员青壮年参军。从解放战争开始，华中向主力和地方部队源源不断输送兵员，广大翻身农民和青年学生为革命战争作出了积极贡献。渡江前夕，华中又有3万5千余青年壮年参加了解放军，我们在原来地方武装的基础上，新组编了4个警备旅，准备担负苏北、苏南两地的地方警备任务。

抽调区以上干部进行接管苏南的培训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各区、县大都配备两套班子，也就是说，每级领导班子都设置副职若干，以便带走一套由上至下完整的班子去苏南开辟新区，留下一套班子照常苏北开展工作。我们当时抽调了两批干部集中培训，第一批3100人，第二批3000人。华东局意见，苏南地区干部主要从华中抽调，另从山东调一批干部加强力量。华中工委和各地委在渡江前，已配备好苏南区党委、苏南行政公署、苏南军区以及松江、苏州、常州、镇江地委、无锡市委和各县委的军政主要干部。当时，许多干部面临重新分配工作，各种思想都有。有的想去新区，也有的家乡观念较重，怕去江南生活不习惯，也有些干部不愿在乡村工作，想进大城市过舒适安逸生活。于是，我们就进一步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告诫大家要加强纪律性，坚决服从组织安排，特别要提高警惕，防止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打中，继续保持谦虚谨慎的工作作风。对去苏南的干部反复进行思想动员，要求他们努力学习新区政策、城市政策；模范地执行党的政策，为解

放全中国多作贡献。

(六)

在紧张忙碌的渡江前夕，还有一项工作也在加紧进行，那就是加紧与江南地下党组织和武装的联络工作，要求江南的同志做好迎接大军渡江的准备。

早在1947年初，华中分局就从山东打电报给我，指示我们从苏中组织精干的武装部队去苏南、浙东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我和吉洛、管文蔚同志商量决定，先后派了第三批同志去苏南、浙东。一路以十地委书记金柯为首，这路人马配备武器最强，但垮得也最厉害。原因是金柯不听从区党委劝告，带着两个连左右的武装渡江，上岸后又麻痹大意，没有隐蔽好，遭到敌人袭击，队伍损失很大。他本人负伤，被送往上海治疗。在上海期间，他被敌人捕获，贪生怕死，成了叛徒，还出卖了杨斌等同志。杨斌同志是十地委组织部长，被捕后英勇不屈，最后被敌人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后来，金柯被敌人秘密派回我苏中根据地，隐瞒变节行为，但我们已得到了情报，便严密把他控制起来。全国解放后，经华东局批准，我们处决了这个叛徒。由于金柯的叛变，十地委遭到了破坏。但包厚昌等同志仍顽强坚持斗争，十地委仍和苏南各路工委根据苏中区党委指示，采取各种斗争方法，保存和发展了革命力量。

另一路是汤景延同志的部队去上海附近地区打游击，向皖南、浙东方面发展。当时苏中区党委利用丁锡山等人的关系，想在松江、青浦发展力量。汤景延同志率领20多人，从海上乘船去上海浦东，以后抵松江、青浦一带活动。由于丁锡山的一个亲戚出卖，汤景延、丁锡山等人被捕牺牲，队伍也垮了。幸存的同志辗

转回到苏中根据地，向我们报告了这一消息。

还有一路是钱敏同志夫妇化妆去浙东四明山地区。四明山根据地有粟裕、叶飞等同志 1945 年从江南率部北撤时留下的一部分武装力量。华东局指示苏中区党委派干部加强领导。钱敏同志夫妇接受组织交下的任务辗转去浙东。临走时，我和谢志成同志还把自己用过的长衫、旗袍送给他俩，钱敏夫妇在四明山和当地同志一起坚持斗争，直至大军南下。

(七)

1948 年 5 月，为了加强苏南工作的领导，迎接我军南下，华中工委成立了以管文蔚同志为书记，吕炳奎、包厚昌同志为副书记，江坚、谢克东为委员的华中江南工作委员会。华中一、二、九分区都建立了江南工作委员会，分工领导澄、锡、虞地区，丹北、句容、镇江地区和苏、常、太地区。我们当时对江南地下组织的总方针是：“大力开展群众合法斗争，隐蔽地发展武装力量，从群众运动中继续发展党的组织”。大军渡江前夕，华中工委领导的苏南力量有了较大发展，澄锡虞地区有我秘密组织、武装活动的乡占三分之一，宜（兴）南地区游击队发展到 300 余人，茅山地区重建了以康迪同志为书记的茅山工委，丹北地区三分之一的乡、保长为我地下组织控制。在苏南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农民的抗租、抗丁、抗粮斗争遍及整个苏南农村，沿江京沪线上各城市不断出现工人罢工、市民罢市风潮。

我们很早就着手在江阴、镇江两地搞策反工作，准备把这两个地方作为我军渡江登陆的突破口。在江阴要塞和镇江建立了地下联络点。尤其是江阴要塞，秘密策反卓有成效，在敌炮台建有我党的秘密组织。

江阴要塞地处南京、上海之间，与江北的靖江城南北相望。江面是长江下游最狭的地段，仅1500米，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兵家所重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江阴要塞配备了约3000官兵的守备总队，还有一个重炮营。国民党在节节败退时，对江阴要塞防务特别重视。至1949年春，江阴要塞驻扎了包括炮兵总部、守备总队、游动炮团、工兵营，总兵力约7000人。蒋介石、汤恩伯等把江阴要塞视为长江防线的重点之一，倚为南京、上海的可靠屏障。

当时搞策反工作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1946年春夏间，华中五地委组织部长唐君照，¹接到他在国民党军队里任职的四弟唐秉琳、五弟唐秉煜想弃暗投明的来信。五地委书记曹荻秋同志得知此事，即指示唐君照同志回信，并暗示将派人和他们取得联系。1947年春，五地委派唐坚华到上海与唐秉琳取得联系。此时，唐秉琳已调任敌江阴要塞参谋处长，唐秉煜则在国民党国防部三厅任上尉参谋，分管江阴要塞防务。唐坚华同志向唐秉琳传达了五地委党组织的指示，要他们留在要塞作为内应。同时，曹荻秋等同志又派地下党员唐仲衡同志到江阴，在城内设立地下联络站。

1947年秋，华中工委成立，苏北区党委把江阴要塞策反关系转到华中工委。华中工委非常重视这项策反工作，对唐秉琳、唐秉煜、吴广文进行了一段时间考察，由管文蔚同志代表组织正式批准他们三人为我地下特别党员。唐秉琳等同志工作做得很出色，至我军渡江前，他们已架空了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掌握了江阴要塞包括炮台总部、守备总队、游动炮团这三支要塞武装力量的实权。

渡江前夕，为保证我军在江阴一线渡江，华中工委更加抓紧对要塞的策反工作，由吴铭同志接替唐坚华同志的政治交通员

职务，华东局又调社会部情报科长王徵明同志从山东赶到华中，打入江阴要塞，全面负责策反工作。王徵明同志到华中后，我和管文蔚、杨帆（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即在淮阴专门向他交代了注意事项，要求他千方百计做好江南江北的交通联络，配合我军渡江。这项策反工作是绝密的，先由我和管文蔚同志直接掌握，不久移交给三野十兵团掌握。叶飞、韦国清同志特派二十九军的李干、徐以逊、陆德荣、王刚四位同志打入江阴要塞，协助要塞地下党组织起义。叶飞、韦国清同志还明确指示，要求保持60里防区，控制三四个港口，遇我部队不打枪，迎接渡江部队登陆。

在我党策动下，江阴要塞起义成功，保证了三野各兵团在江阴一带安全渡江，打开了国民党长江下游防线的缺口。江阴要塞策反工作带有一点传奇性，可惜我不可能匀出更多的篇幅来写这个动人的故事，将来如果有哪位文学家把它写一写，倒是一个很动人的惊险故事哩。

在渡江前夕，我华中工委领导的苏南各地党组织、游击队为我军东路渡江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对我八兵团、十兵团渡江成功，部队登陆，扩大战果，围歼敌人，起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八)

4月的泰州，桃红柳绿，我随粟裕同志和三野司令部来到这里，准备率苏南区党委机关从靖江渡江。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3月11日总前委根据中央精神，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完成了渡江南下作战的全部计划。这个纲要把京沪杭战役分成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就是渡江作战。

按照总前委命令，三野八兵团、十兵团主力组成东路大军，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渡江；八兵团在渡江战役发起同时，要派两个军钳制浦口、浦镇之敌。三野七兵团、九兵团主力组成中路大军，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由姚沟至枞阳以东段渡江。二野四、五、六三个兵团组成西路大军，由望江至枞阳段渡江。3月底，各渡江部队完成整训，全部进入江北前沿阵地。

时值暮春，阵阵江风还有些寒意，江北岸却洋溢着一派忙碌热闹的气氛。成千上万辆小车和新从敌人手里缴获的美式十轮大卡车，在纵横的大路上往来奔跑。军粮、弹药、麻布袋、稻草包源源不断送往前沿。透过岸堤，不远处有丛丛竹柳，一尊尊威武雄壮的大炮直指江南。各港口及沿江湖汉排着一溜溜披着伪装的木帆船。战士们忙着编木排、竹筏，在寒冷的水里练习泅渡。一到夜幕降临，战士们在船工的指挥下，悄悄地把停泊在港湾河汉的木船从运漕河推进长江，进入预定的起渡点。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而有秩序地秘密进行着。

望着浊浪排空的长江，遥见江南岸影影绰绰的村庄，我和广大指战员、民工群众一样，期待着伟大的渡江之役尽快打响。

越是临近大战，大家的心情越是激动。4月19日，粟裕同志在泰州白马庙召开了东路大军师以上干部会议，第二天又召开了师以上政治干部与苏南地委以上干部联席会议，正式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渡江作战的命令。这时，南京政府已经拒绝签订北平和平协定草案，我军决定在4月21日开始渡江。中路大军则提前一天行动。命令下达后，群情振奋，请战书、决心书如雪片飞舞，印有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红绿传单，迅速下发至各连队、民工队。早已整装待发、摩拳擦掌的战士、民工纷纷集合，立誓“打过长江去，解放全

中国！”

20日，中路大军突破敌人防线，登陆成功。当夜，我东路派出一支小部队偷渡也获得成功。21日夜间，东路大军正式强行渡江。我站在房门口，眼见万里长江上空照明弹摇曳，一发发炮弹划破夜空，耳畔响着激烈、密集的枪炮声，犹如一曲无比壮丽的交响乐章。我的心，伴随着英勇的突击船队，飞越天险，冲向了南岸。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终于传来了我首批船队登陆成功的喜讯，也传来了江阴要塞起义成功的喜讯。登陆部队已经控制南岸渡口，向纵深发展，敌人突然发觉神兵天降，顿时吓得魂不附体，纷纷夺路溃逃。我第二批、第三批船队陆续起锚扬帆，千船竞发，万桨齐动，恰似成群的雄鹰，振翅直扑南岸。

4月25日，是我军渡江的第4天，后续部队和粮草一批又一批运往江南。南岸我军已经解放南京、镇江、无锡、苏州，部队继续向前推进。这天，我随三野司令部到靖江的八圩港，与粟裕等同志联袂乘船渡江。

面对浩淼大江，回想在苏中艰苦奋斗的十年，我的心情很不平静。记得十年前，我们一行是在漆黑的夜晚乘坐孤帆偷渡的，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就好象发生在昨日一样。如今，我满怀胜利的豪情，正随战友们浩浩荡荡再渡长江，抚今追昔，怎不令人感慨万千。我从少年时代参加革命，辗转于山区和农村，没有上过正规的学校，只在戎马倥偬中读了一些书。每每读到苏东坡“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裂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的名句，我总是激情难抑。对于祖国的未来，对于民族的复兴，对于革命的胜利，充满着信心。然而，我们面对的现实，却是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战乱连年，长夜难眠。现在，理想

已经开始变为现实，亿万人民翻身解放的愿望实现了。这是多么令人欣慰的时刻呵！

长江象一条无尽长的巨龙，横卧在祖国的腹部、自西而东向大海滚滚流去。它流经的地域，面积达180多万平方公里，稻米产量就占全国总产量的70%。它不仅是我国重要的水运枢纽，也是物产最富庶的祖国经济命脉。我站在船头上，迎着凉爽的江风，心绪纯清如泉，整个人都好象净化了。当然，烦忙的工作正等待我去处理，容不得我多去体味欣赏。但是，长江却使我浮想联翩，久久凝视着它，思想境界好象正不断地上升、上升……

渡船破浪奋进，柳绿桃红的江南已清晰可辨，我忍不住又回首遥望渐渐模糊了的江北岸。我似乎看见，在那芦苇青青的江边，许许多多肝胆相照的战友、成千成万血肉相连的乡亲，还在翘首跼足向我们招手致意。这显然是一种幻觉，但我确实无法忘记苏中军民的深情厚意。历经十年艰苦奋斗，我深深爱上了苏北、苏中、华中，尽管它名称不一，我确实深深爱上了这块祖国的沃土。现在，我百万雄师正渡江南下，全国解放已指日可待。为适应这伟大的历史性转折，我遵照党的嘱托，离开了自己深深眷恋的苏中大地，告别了情深谊长的苏中父老，正向刚刚获得解放的苏南进发。这使我既感奋又忧虑，感奋的是崭新的人民共和国将在炮火中诞生，受尽苦难的同胞终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忧虑的是积弱百年的祖国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是那么艰巨，那么繁重，又是那么陌生，真不知自己能否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在历史的长河里，十年只是一瞬间。然而对我来说，在北渡长江与南渡长江之间的十年，却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粟裕同志晚年，多次叮嘱我把这难忘的十年写下来，甚至在病重期间

他也没有忘记这件事，经常打电话来提醒我抓紧时间进行。现在，我尊敬和爱戴的陈毅、粟裕同志已先后与世长辞。这使我哀思不绝，常在梦中再现老首长的音容笑貌，并由此联想起许多当年共创苏中解放区的老战友，包括已经作古和至今健在的新四军老同志，还有那许多情深谊长的苏中父老。于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驱使我不避浅陋，勉力记下这难忘的十年，用以纪念为解放苏中而艰苦奋斗的老首长，老战友，歌颂苏中军民的英雄业绩。自然，我的见闻经历有限，可能难以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出准确的记录和全面的评价，想来或许会得到读者们谅解的吧。

后 记

1982年，我调到北京工作后，面见粟裕同志的机会较多。说起往事，他一再嘱咐我，苏中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是有成效的，坚持苏中敌后斗争有丰富的经验，要我多关心苏中党史和苏中根据地斗争史的编撰工作。我即遵嘱找江苏省委的同志谈过多次，转达了粟裕同志的指示。与此同时，他还要求我抽点时间，把苏中解放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十年斗争历程记述一下，写一部回忆录，我表示一定认真考虑。可是由于日常工作繁忙，我迟迟没有动手。后来，粟裕同志重病缠身，我多次去探望他，在最后一次到医院看望他时，他仍念念不忘这件事，说他身体不行了，这是他未了却的一桩心愿。在这段时间里，粟裕同志的嘱托时刻挂在我的心间，经常督促我把这件工作完成，向老首长做出汇报。如今，粟裕同志已离开我们3年了，虽然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有许多问题没法向他具体请示，也未能让他仔细审阅一遍，但他对我的嘱托总算实现了，我想他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这部回忆录共分四个部分：苏中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开辟；根据地的全面建设；坚持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准备反攻；解放战争时期。我从1940年由苏南渡江北上，到1949年由苏中渡江南下，这中间恰恰十个年头，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阶段。我个人要对苏中解放区的全面工作一一进行回顾总结，是力难从心的，因此我在本书中只大体勾勒了苏中解放区十年斗

争和建设的发展过程和概貌，着重写了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我想，新中国成立已30多年了，回顾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和建设，不仅能使曾经历过这段斗争历程的老同志，可以重温历史经验，对广大青年读者来说，了解一些党的工作优良传统，也可以从中得到对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益的启示。如果做到了这一点，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本书是我个人的回忆录，这种体例要充分反映苏中解放区的全面情况，确有其局限性。若不采取第一人称的写法，从总体的角度加以叙述，又难免材料涉及面太宽，且不易成章。这种写法的局限，在于个人见闻、涉猎毕竟有限，本书记叙的史实、事例，通过许多老同志帮助回忆，力求翔实，但也难免会挂一漏万，或因年代久远而有误记之处，希望读者多加指正。

在写作过程中，我力求以写群体为主，除对陈毅、粟裕等领导同志的事迹略加记叙外，不多写个人的事例。对历史事实，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按历史本来面目记叙，不矫饰，不妄断，偶有简短的议论，也只是个人的感想和体会而已。

本书初稿完成后，我送请李一氓同志阅改，感谢一氓同志不顾年迈体弱，写了序言。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承蒙当年共同战斗在苏中各条战线的四、五十位老战友、老同志帮助记忆，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资料，中共中央档案馆、中央军委档案馆、江苏省档案局也提供了大量历史资料。还得到中共上海市委、江苏省委的大力协助，得到江苏省委党史办、江苏省有关地委、市委和县委党史办的同志们共同协助收集资料，在具体写作中，马达、庄辛、邱枫、施正东、赵斌同志帮助整理，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一并在此致以深切的感谢。

作者

1987年12月

封面
目录
正文